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雍涛 著



人民出版社



Voice Of Marxism-Leninism Group Of EBOOK

制作



作者简介

雍涛，1936年8月生，广西桂林市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7年7月武汉大学经济系提前毕业，留校任教。1962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班毕业。后回武汉大学哲学系工作，曾任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主任、哲学系主任。

作者长期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出版著作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雍涛 著



人民出版社

自 序

我与哲学结下不解之缘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1955年9月我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攻读政治经济学；1957年8月因学校加强政治理论教育的需要，提前毕业，分配到武汉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同时下放到系里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先后在生物系、化学系任团总支书记，年级党支部书记。工作之余，除继续学习政治经济学外，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我抽时间自学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特别是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李达校长撰写的《〈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哲学著作。在此基础上结合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给李校长倡导和主持的校报《新武大》理论副刊《矢与的》写稿，常有短文发表，引起了李校长的注意。1958年底至1959年初，我结合学习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的文件，写了《从六中全会文件学习辩证法》、《坚持"两点论"》等几篇短文，提出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减少主观性、片面性，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问题。文章在《新武大》发表后，受到李校长的赞赏。1959年4月他把我调到哲学系工作。不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班招生，李校长和哲学系领导又推荐我报考，因而获得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打下了比较坚实的专业基础。1962年7月我从人民大学毕业回武汉大学哲学系工作。先是担任"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课程的辅导和讲授工作，

后来被分配专教“毛泽东哲学著作选读”课，从此开始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75年至1977年参加了我系应人民出版社之约，重新编写《〈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解说》、《〈矛盾论〉解说》的工作。粉碎“四人帮”之后，武汉大学哲学系恢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我被任命为负责人。从此开始真正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一个科学对象来研究。先是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性质、特点、科学体系和历史地位，后是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和单篇著作。党的十二大之后开始研究党中央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运用和发展，继而演变成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十四大特别是十五大之后便开始了邓小平理论及其哲学的研究。

这里汇集的论文，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发表的百余篇文章中挑选出来的，不包括与研究室几位同志合写的论文。这些文章反映出我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思路和特点：

一是把毛泽东哲学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亦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的大背景中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究。而我所理解的“中国实际”，除了中国的社会历史实际（社会性质或发展阶段）之外，还应当包括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实际在内。因此，我比较注意从文化的层面来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双重文化性格”，从文化根源上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机制。

二是认为毛泽东思想包括其哲学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应当从体系上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及其内在联系；同时又要研究不属于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早期和晚年的思想观点。加之我们的研究室是高校的教学和科研机构，负有培养硕士生、博士生的任务，因此我们强调认真学习原著，深入钻研基本理论，注意系统性、科学性和学理性。我们的这种观点和做法，在一段时间内被学

术界的某些同行称之为“体系论”、“学院派”。但对此我却至今不悔。在我看来,“体系论”并不坏。邓小平曾经号召我们: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至于“学院派”问题,刘少奇曾经认为,我们党理论准备不足的原因之一,就是有一种轻视高深的理论研究的倾向,甚至在学校中,当许多党员专门学习理论的时候,也强调反对所谓“学院派”。这是完全错误的,特别是在学校中强调,就更加有害。他指出,任何比较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都必须经过埋头读书与系统研究的阶段。马克思、列宁本人更是如此。

三是认为毛泽东哲学、邓小平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但重点在方法论上。因此,我们既要研究毛泽东、邓小平在哲学理论观点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更要研究他们的方法论原则,这里包括哲学分支学科,如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经济哲学、道德哲学、艺术哲学等的研究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的研究。把世界观化为方法论,把哲学应用于党的路线和策略,这是毛泽东、邓小平最为注意的事情,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四是认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但就哲学而言,邓小平哲学不构成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并列的一个阶段,而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范围,是它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毛邓两人的哲学思想关系是先生和学生的关系,邓小平既师承毛泽东,又发展了毛泽东。不应该把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因此,对邓小平哲学的研究,要结合毛泽东哲学的研究来进行,既要看到它们的区别,又要看到它们的联系。同时还要看到,邓小平哲学实质上是一种“应用哲学”和“发展哲学”。它主要不是以纯哲学形态出现的理论哲学,而是以方法论形态出现的应用

哲学;其核心是要解决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这可以说是我研究邓小平哲学所特有的视角。

这本论文集文章的编排,主要是按照主题分类和时间顺序进行,基本上保持了历史的原貌,只是有的地方作了个别文字的删改。集纳这些文章出版,目的是想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思想资料,在当前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相对沉寂的情况下,烧一把火,鼓一点劲,为开创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新局面奉献绵薄之力。"自序"及书中观点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是同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我已毕业的博士生汪汉昌、武志军等人的热心帮助分不开的,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雍　涛

2001年5月　武昌·珞珈山

目　　录

自　序 …………………………………………………… (*1*)

导论:世纪之交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 (1)

上篇　毛泽东哲学研究

论毛泽东哲学的双重文化性格………………………………… (17)

毛泽东的哲学构成体系吗……………………………………… (27)

——雍涛访谈录

李达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 (33)

——纪念李达诞辰110周年

毛泽东哲学思想不容否定……………………………………… (49)

——批判"变构论"、"过时论"、"封闭论"

《实践论》、《矛盾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64)

《实践论》、《矛盾论》研究述评……………………………… (89)

《实践论》、《矛盾论》的当代哲学意义 …………………… (108)

——纪念"两论"问世60周年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河 ……………………… (118)

——纪念《论十大关系》发表40周年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科学
价值和历史局限 …………………………………… (129)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主要贡献 ………………… (152)
关于感性、知性、理性范畴的探讨 ……………………… (164)
关于认识总公式的几个问题 …………………………… (168)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认识论和辩证法的
新阐发……………………………………………… (179)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与当前认识论研究 ………………… (216)
毛泽东方法论思想研究 ……………………………… (221)
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 ………………………… (233)
要重视毛泽东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 …………………… (247)
论毛泽东的人学思想 ………………………………… (256)

下篇 邓小平哲学研究

毛泽东思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 (281)
——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精髓 ………………………………………… (297)
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 …………… (315)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结合 ………………… (329)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的哲学基础 ………………………………………… (343)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 …… (351)
从《邓小平文选》看邓小平思想方法论 ………………… (361)

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 (371)
——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
邓小平哲学论纲 ……………………………………………… (379)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 ………………… (389)
再论邓小平哲学 ……………………………………………… (410)
论两次历史性飞跃 ………………………………………… (420)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附　录………………………………………………………… (438)

导 论：
世纪之交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回顾过去的研究状况，展望未来的发展，开创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新局面，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是很有必要的。

一、半个多世纪以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状况的回顾

自 1937 年《实践论》、《矛盾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一部分)问世以来，人们便开始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工作，其研究过程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1. 延安时期

这一时期，只有少数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探讨，尚未将毛泽东哲学思想单独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而是与毛泽东思想研究融合在一起进行。如张如心(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1941 年 3 月在《共产党人》杂志、《解放》杂志上发表文章，评述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称它是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即哲学的代表作；艾思奇 1941 年 8 月在《中国文化》杂志上发表文章，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新民主主义论》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最大的历史收获"。①但这一时期的研究，还没有明确提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概念，而是使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毛泽东同志的宇宙观"等表述。

2. 建国以后

这一时期的研究，一是表现在1951年至1953年围绕《实践论》、《矛盾论》公开发表，国内哲学界兴起了学习、宣传、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潮。其中最有影响的成果是李达的《〈实践论〉解说》(1951年7月三联书店出版)、《〈矛盾论〉解说》(1953年7月三联书店出版)。这两个《解说》都经过毛泽东的审阅、修改，受到毛泽东的称赞："这个《解说》(指《〈实践论〉解说》——引者注)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②其次是冯友兰的文章《〈实践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中国传统哲学问题的解决》。在这篇文章中冯认为，中国以前大多数哲学家对知行关系的讨论，"都只代表片面的看法，每一派哲学家，只看到知行全程序的一面"，"《实践论》以完全新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发展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解决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哲学方面说，《实践论》正是发扬了自古以来的、认识论上的唯物论的传统，解决了中国哲学的知行关系问题。"③毛泽东曾对该文大加赞赏。

二是围绕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一周年，《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辑了李达、艾思奇、许立群等人的研究文章，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58年6月和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学习两类社会矛盾学说的体会》、《毛泽东同

---

① 《艾思奇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第555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下同)，第407页。
③ 《新建设》1951年第3卷，第6期。

志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重要意义》等研究性专著。

三是明确提出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概念。1958 年 8 月复旦大学教授严北溟在《新建设》上发表文章《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首次公开使用"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概念，称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我们时代精神的精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在中国革命具体条件下的创造性的发展。它有着无比精深博大的内容，这些内容包含在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中，也体现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全部胜利进程以及一切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中。

这一时期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的来说，还是注释、解说居多，整体的、理论性的研究较少，1958 年以后还出现了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的倾向，"文革"中更是陷入混乱，遭到极大的破坏。

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开拓创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注释、解说性的研究发展到作为科学对象来研究；从单篇著作的研究发展到整体性研究；从封闭式的研究发展到开放性研究。到 1993 年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前后达到了高潮，出现了"毛泽东热"。此后由"毛研"逐渐转向"邓研"。这一时期的研究，在若干重要问题上取得了突破，产生了许多积极成果。

(1)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定义、特点、体系和历史地位问题。许多研究者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定义、特点、体系，"两论"与 30 年代苏联哲学、中国哲学运动的关系，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取得基本共识。其成果有龚育之的《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杨超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雍涛等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石仲泉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导论》等。

(2)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其主要成果有汪澍白的《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李吉等的《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黎永泰的《中西文化与毛泽东早期思想》等。

(3)毛泽东晚期哲学思想研究。其主要成果有李锐的《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许全兴的《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雍涛的《毛泽东的探索——中国的 1956—1976》,肖延中主编的《晚年毛泽东》文集。

(4)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研究。其主要成果有黄楠森总主编、宋一秀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六、七卷,庄福龄主编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第一、二、三卷,雍涛的《毛泽东哲学的历史发展》等。此外还有许全兴等的《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冉昌光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等断代思想史的出版。

(5)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其主要成果有汪澍白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毛泽东思想的双重渊源》,毕剑横的《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何显明等的《毛泽东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陈晋的《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等。

这一时期的研究尽管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但严格说来,研究的视角还不够高,思路还不够开阔,研究课题过多重复,研究方法滞后,有待于开创新的局面。

二、世纪之交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之我见

1. 坚持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方向

有人认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可以再研究的了。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无论是历史、理论、著作、专题和

应用方面的研究，都有待于深入，都有许多工作要做。至于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和总体评价、特别是他晚年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失误及其根源的分析还做得很少很少。就资料的利用来说，除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外，目前已经公开出版了许多毛泽东著作和有关资料，如《毛泽东文集》(1—5 卷)、《毛泽东年谱》(上、中、下卷)、《毛泽东传》(1893—1949)、《毛泽东早期文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13 卷)、《毛泽东军事文集》(1—6 卷)、《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1—10 集)等，还有最近出版的《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一书。这些资料，许多研究者并未充分利用，怎么能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呢?

有人说“毛泽东热”已经过去，现在不是研究毛泽东，而是研究邓小平和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时候了。于是一些单位的毛研室纷纷改为邓研室或邓研中心，一些毛研方面的刊物或者改为邓研刊物或者干脆停刊。我以为这种想法和做法也是不妥的。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当然要摆在第一位，因为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能因此中断对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在哲学上说，毛邓关系还是先生和学生的关系。不研究毛泽东，就无法理解邓小平，孤立地研究邓小平，那是没有根基的，是研究不好的。无论是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提法，两代伟人事业的连续性和大思路的一致性，还是从哲学学科建设来说，我们都应该高度重视和加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工作。老祖宗不能丢，优良传统不能断。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丢了祖宗，断了传统，是要闹笑话、吃大亏的。

2. 拓宽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领域

（1）抓住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题，全面研究毛泽东的人学思想，适应世纪之交哲学研究主题转换的需要。

现在许多学者都认为，哲学研究的主题要转到对人的存在和发展、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效应的全面研究上来。我完全同意这种看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也应该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哲学的中心问题就是解决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解决人的存在和发展问题。它的最大特点是强调人的因素、人的作用和人的力量。毛泽东有句名言："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①]这句话不仅是表达了一个具体的理论观点，而且深刻反映了他整个哲学的主题思想。拿他的哲学代表作来说，《实践论》就是讲人的本性，人的知行关系，如何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问题；《矛盾论》讲如何分析矛盾，解决矛盾，促成事物转化，达到改变人的社会地位、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崭新的人际关系学，就是讲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两类矛盾问题）、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矛盾问题），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当然，毛泽东在讲人的问题时，有他的片面性和失误，如讲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多、讲人的个性少；讲政治关系多、讲经济利益少，讲主观能动性多、讲客观规律少；讲思想道德改造多，讲认识能力的提高少等等。我们研究他的人学理论，就是要高扬他关于主体性的思想，克服他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

"三论"（《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研究人学的，但"三论"对人学的研究需要根据时代的

---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下同），第 1512 页。

要求向前发展。拿《实践论》来说,顾名思义,《实践论》本应研究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规律。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只着重研究了在实践基础上的认识论即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未能详细研究真正的实践论即如何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他在《实践论》的结尾提出了这个任务,但并没有解决这个任务。他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最后落脚到"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①我认为这就是他的"改造论"的基本思想,是《实践论》的精华和归宿。过去我们对此有所忽视,现在应该根据这一思想写出《实践论》的续篇"改造论"。"改造论"正是真正的人论。因为改造论首先必须研究人作为主体的规定性,即人的本质、人的主体结构等等;改造是人的实践活动、人的行为,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就必须研究人的行为动机、机制、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等问题。改造客观世界包括改造自然和社会:改造自然是为了达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改造社会是为了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改造客观世界还包括人的改造。所有这些都要求研究人的行为方式、行为规律。改造主观世界的内容很多,包括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认识能力和思维方式等等,一句话,就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除《实践论》之外,毛泽东在《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在"七大"上的报告和讲话集》等著作以及《毛泽东书信选集》中,还有许多关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下同),第 296 页。

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论述，我们应当从认识论、改造论、历史观的角度概括、提炼毛泽东的人学思想。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①所以矛盾理论的内容应分为两部分——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矛盾论》虽然讲了一些解决矛盾的方法，但终归还是作为一种宇宙观来阐述的。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多极化正在向前发展；中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发展的关键时刻，各种矛盾充分暴露出来，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革命事业成败的重要问题。时代精神要求有专门解决矛盾的学问产生。因此，我认为"矛盾解决论"应当成为《矛盾论》的续篇。矛盾解决论至少应包括两个主要内容：一是矛盾同一性的充分利用；二是"两点论"和系统论的结合。《矛盾论》的核心问题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根据列宁的思想，对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问题作了很好的论述，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②但也应该承认，《矛盾论》存在着过分推崇斗争性而相对忽视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的倾向，强调"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③而没有反过来说，没有同一性同样也就没有斗争性。后来，毛泽东大概是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中对此作了修正和补充。他写道："说斗争无条件，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不是说具体的矛盾"，具体矛盾的斗争形式也是有条件的。"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04、333、333页。

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①]他在实践中也十分注意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是无条件、无根据、无限制地一味斗争。充分利用矛盾的同一性是人的智慧、人的自觉能动性的一种体现。我们要像邓小平那样"照辩证法办事",在实践中找出充分利用矛盾同一性的办法,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矛盾论》中已经包含有系统论的思想,因为系统实质上是多种矛盾的集合体、统一体。毛泽东关于"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提法,"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许多矛盾"即"矛盾群"的思想,"内部矛盾与外部原因的关系"等等,都是系统论思想的表现。但由于历史条件和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思想未能充分发挥,甚至存在着简易的"两极二分"的思想痕迹,造成后来在理解和运用"两点论"上的许多混乱,因此我们应当吸收现代科学的成果,把系统论和"两点论"结合起来,建立矛盾系统论,并致力于方法论的应用,解决各种矛盾,写出"矛盾解决论"。这应该是辩证法角度的人学理论的重要思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研究新型人际关系的著作,但它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较多地侧重于思想政治领域,对经济领域的人际矛盾以及如何用经济的方法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阐述显得不足。尽管它提出"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但总体说来,"人民内部矛盾"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概念,处理的方法基本上是"分清是非","团结——批评——团结"。这明显地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需要。我们应当克服这个局限,重视人民内部的经济利益关系,进一步研究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特点和根源,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下同),第374页。

段和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去处理这些矛盾,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

(2)把握毛泽东哲学的“双重文化性格”,深入研究毛泽东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从文化层面来看,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包括了作为文化现象的马列主义哲学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毛泽东哲学具有“双重文化性格”,即它的哲学属性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具有中国传统哲学的性质。这种“双重文化性格”的确立,从文化的深层机制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典范。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任务已经结束,相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因为“两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从当今哲学的文化走向来看,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

一是以中西文化冲突、融会为背景,深入具体地探讨毛泽东哲学的中西文化性格,揭示它的文化内涵及其意义。一方面要从横向上(本体论、知行观、辩证法、历史观等方面)具体地剖析中西文化的各个层次、各种流派(西方的如马克思主义、近现代的如进化论、康德哲学、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等流派;中国的如儒、道、释、法、墨、兵,以及主流文化、亚文化等),在毛泽东哲学内部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相互制约、相互冲突的复杂关系,揭示这些复杂关系在毛泽东一生思想和实践中的作用和反映;另一方面从纵向上动态考察毛泽东早、中、晚期思想的流变,理清其思想流变的内在关系、

转换契机和变动环节，以及中西文化冲突、融会与毛泽东一生成败得失的关系，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

二是要以“三论”为基础，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世界化。“三论”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进一步中国化，就要像“三论”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同中国传统哲学之根结合起来，不仅吸取传统哲学与之相通的优秀成果，而且也要吸取与之相异的优秀成果，因为这种相异的优秀成果更能体现中国特色。如中国传统哲学的心理之说、阴阳二分、中庸之道、天人合一、民本思想、义利之辨等等，是中国哲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概念表达的全人类共同的哲学智慧，尤其是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作为理解世界和人生的一个重要维度，具有校正和针砭西方哲学中矛盾对立绝对化倾向的作用，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的共同难题有着特殊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吸收这些中华文明长期积淀起来的哲学睿智，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扩张。中国哲学要进一步现代化就要像“三论”那样既发扬中国传统哲学精华，又大胆吸收世界哲学的优秀成果，进一步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即由直观的整体思维向辩证的系统思维转变，由经验思维向理性思维转变，由封闭半封闭思维向开放思维、创造性思维转变。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一个进一步现代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是建立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之上的，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根基的实践唯物主义毕竟产生于一个半世纪之前，不能不受当时实践水平的局限。为了反映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要吸收中国哲学的深睿智慧之外，还要批判地吸收现代西方哲学的成果，借鉴它们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更深刻的背景下对实践的各个侧面深入探讨的经验，提高实践唯物主义的水平，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一

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随着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各民族的文化、哲学正在逐渐融会成一种世界文化、世界哲学。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人，要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博大的学术胸怀，大胆吸收世界各国哲学的优秀成果，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并开展国际学术对话和学术交往，使毛泽东哲学思想走向世界，参与世界哲学的融会工作。

(3)根据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思想，既要深入研究毛泽东晚期的哲学思想，更要着重研究邓小平哲学。

毛泽东晚期哲学思想的研究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深入的理论反思还很不够，争论也比较多，而晚期思想的研究与我们今天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关系更为密切。我们应当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哲学上认真总结毛泽东晚年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扬弃其错误和糟粕，吸取其正确的、合理的思想，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我认为邓小平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新阶段，它既是毛泽东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和超越。邓小平哲学应该是当前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重点课题。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发表了许多文章，出版了许多著作，但真正的科学的研究还是十五大之后开始的。我认为对邓小平哲学的研究，首先要抓住邓小平哲学的类型和特点，然后才能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建构出邓小平哲学的体系来。因为邓小平哲学主要不是以抽象理论形态出现的“纯哲学”，而是以方法论形态出现的“应用哲学”，它表现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党建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重要文献之中。邓小平堪称我党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法的典范，也可以说是应用哲学的大师。我们应该从这些论述和实际运用中概括、提炼出他的哲

学观点和哲学思维方式，并以此来阐述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以及邓小平哲学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这里面还有一些认识问题需要澄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4)抓住毛泽东哲学的方法论特征，深入开展毛泽东应用哲学的研究，为毛泽东哲学分支学科建设和实际工作服务。

毛泽东哲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它分为基础哲学(理论哲学)和应用哲学(哲学分支学科)两部分。其总体特征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但重点在方法论上。因此，对毛泽东方法论、应用哲学的研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这个研究，一方面要抓住哲学分支学科哲理性、中介性、应用性的特点，建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道德哲学、领导哲学等分支学科，在哲学原理和具体科学之间架起由此达彼的桥梁，用以指导具体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要把毛泽东哲学具体化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去指导实际工作，增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①

3. 改进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方法

中国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要摆脱封闭半封闭的状态，转到开放性研究的轨道上来，既要立足本国，又要面向世界，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和交流工作。为此要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平。除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外，还应该有分析地引进国外学者某些好的研究方法，如“反映综合法”、解释学的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等。我们可以把毛泽东的《实践论》同葛兰西的“实践哲学”进行比较，把《矛盾论》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客体辩证法”、“否定性辩证法”进行比较，把“两类矛盾学说”同现代西方“冲突理论”比较，把邓小平的发展理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下同)；第147页。

论同西方学者的现代化理论比较，等等，这样视野会更加开阔，我们的研究会得出更为客观、更为科学的结论。

（原载《珞珈哲学论坛》第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上　篇

毛泽东哲学研究

MAO ZEDONG ZHEXUE YANJIU

SHANGPIAN

论毛泽东哲学的双重文化性格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至今仍历久不衰的文化反思大潮中，人们尖锐地提出了许多问题，如毛泽东哲学的理论来源只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既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又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这就是所谓“一源说”还是“二源说”的问题；有的人认为毛泽东是反传统主义者，毛泽东哲学的产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是纯粹的西洋“舶来品”，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这就是所谓“文化断裂论”；有的人认为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儒学诠释，是一种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外衣的中国历代政治哲学的现代翻版，这就是所谓“引儒人马论”，如此等等。要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不能不全面地研究毛泽东哲学的性质。

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包含了作为文化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毛泽东哲学具有双重文化性格，即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又有中国传统哲学的性质。这种双重文化性格，是毛泽东哲学最根本的精神特质。离开毛泽东哲学双重文化性格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哲学。

一、毛泽东哲学的双重文化性格

毛泽东哲学是西方近代社会孕育出来的最先进、最彻底的革命文化——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既具有中国哲学的传统精神特质，又具有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规定。就哲学形态的基本性质而言，毛泽东哲学无疑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

首先，从毛泽东哲学的理论来源来看，毛泽东哲学主要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来的。由于中国社会文化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不可能自发产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获得这种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能学习和引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的毛泽东哲学正是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而来。

其次，从毛泽东哲学的主体即毛泽东本人的文化背景来看，毛泽东哲学是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完成世界观转变之后产生的。1920年之前，毛泽东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的大杂烩，其世界观是心物二元论。1920年他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接受了唯物史观，掌握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开始老老实实地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后来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接着又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延安时期还研读了苏联哲学教科书，写了《实践论》、《矛盾论》，其哲学思想正是这样形成发展起来的。

最后，从毛泽东哲学的概念、范畴、体系来看，毛泽东哲学同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范畴、体系是一致的。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理性沉思，是借助概念、范畴的中介实现的。概念范畴是哲学思维的细胞，它对哲学理论的思想特质有着决定作用。黑格尔把整个人类哲学思想发展史视为哲学范畴按其自身逻辑逐步展开的过程。他认为，文化上的区别一般地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这一见解是相当深刻的。1920年以后，毛泽东所运用的哲学范畴基本上都是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如"物质"、"意识"、"认识"、"实践"、"对立统一"、"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斗争"、"人民群众"等等。仔细考察毛泽东运用这些范畴的涵义，也完全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本意的。从体系上看，毛泽东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也是由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等几部分构成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是确定无疑的。那种把毛泽东哲学看做是中国古代哲学的自然延伸、是自身逻辑发展的产物的观点，是错误的。

但是毛泽东哲学又确实具有一种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精神。鉴于这一点长期被国内学者所严重忽视，故有必要着重分析一下毛泽东哲学的中国文化性格、中国传统哲学精神风格的一面。

首先，从致思趋向来看，毛泽东哲学直接继承了中国哲学的政治、伦理哲学的思想特色。中国哲学区别于其他文化体系的哲学形态的最显著一点，莫过于它独特的致思趋向。从总体上讲，中国哲学不是一种自然哲学，没有过多的自然本体论的思辨，而主要是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刻意探索，直接为修身养性、治理社会和国家服务，因而显示出其政治、伦理哲学的思想特色。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文化背景以及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地位，决定了他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在致思趋向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总的来说，毛泽东哲学是将传统哲学济世安民的崇论宏议，化为对中国

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沉思,直接服务于他的政治实践,服务于改造社会和改造人们思想的目的。这就决定了毛泽东哲学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自然哲学或思辨哲学,而是带有浓厚政治伦理色彩的哲学。

其次,从哲学的思想风格来看,毛泽东哲学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体用不二”的思想风格。自古以来,中国哲学家就不像西方哲学家那样热衷于纯而又纯的本体论的哲学沉思,而总是倾向于强调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直接合一。在中国哲学家那里,并不存在现象与本体、此岸与彼岸、个别与一般两重世界的截然对立,相反的是,它“道不离器”、“体不离用”,作为本体意义的“道”,即在于当下的现实生活和人际关系之中。

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独特精神相对应,毛泽东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但重点在方法论上,它强调世界观要转化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要变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这种思想风格体现出来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格,而且有中国哲学“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精神旨趣。“体用不二”的精神与实践家的性格相结合,塑造出毛泽东哲学极为浓厚的方法论哲学和应用哲学的色彩,形成了毛泽东哲学同他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具体思想理论浑然一体的思想特征。葛兰西有一句名言:一个政治家的真正哲学,只能从他的政治著作中去寻找。毛泽东哲学正是如此。除《实践论》、《矛盾论》等专门的哲学论著外,毛泽东哲学大量体现在《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军事政治著作之中。即使是在哲学认识论上,毛泽东也不是离开实际的社会工作来对认识过程作纯粹的抽象思辨,在他的认识论中,“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总公式,与“群众——领导——群众”的工作路线是直接合二为一的。

再次，从思维方式来看，毛泽东哲学继承了中国哲学“躬行践履”的经验论传统。从孔子开始的中国哲学家并不热衷于哲学逻辑的抽象思辨，而十分注重主体自身的“躬行践履”的重要意义。中国哲人在现实社会中也不像西方哲学家那样以智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以贤人的面貌出现，他们必须以自己的言行举止来体现和表征自己哲学思想的合理性。毛泽东哲学属于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有着与传统哲学根本不同的思想内容，但传统经验哲学高度注重躬行践履的功夫，注重“实事求是”之学的思想风格，对毛泽东哲学的影响仍然是十分显著的。《实践论》以实践和认识、知和行的关系为核心来建构整个认识论体系，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唯物主义”精神的体现，也是传统哲学注重知行关系研究的思想风格的反映。

再其次，从文化心态上看，毛泽东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一样，表现出浓厚的伦理本体主义色彩。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社会发展观等等都带有突出的伦理化倾向。在传统儒学那里，道德伦理的完善，是个人以至社会发展的至高境界，伦理秩序的建构是维护社会统治秩序的根本途径，主体道德人格的锻冶砥砺是其他一切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根本前提。黑格尔曾经相当准确地指出：孔子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这种哲学的长处是积极地高扬人的道德意志的能动作用，从道德人格上发掘生命的价值意义。其弊端则是往往容易对意志能动作用加以强调而走向对“心力”的过度夸张。

毛泽东受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性思想的影响，一贯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对人的自觉能动性作了科学的解释；并把“改造主观世界”当做人类改造世界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形成了一个以提高主体能动性、提高人的道德境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关于改造主观世界的思想学说，继承

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伦理本位主义。

最后，从表现形式来看，毛泽东哲学也是一种地道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家热衷于建构庞大的思辨理论体系，喜欢用大部头的纯哲学论著来系统地阐述、论证自己的见解不同，中国哲学家将深奥的哲学见解散现在对于政治、人生的评论之中，习惯于用十分简朴的语言，广泛借助于寓意、形象、比喻等手法，以语录、问答、格言等表现形式来抒发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体验和哲理领悟。

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家,毛泽东善于用简朴的生活事例以及历史典故来寄寓、表现深奥的哲理,在现代中国开了哲学通俗化的先河,使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和群众也能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原理。这种表现手法,其实就是他反复强调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由此可见,毛泽东哲学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性格,而且表现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性格,它与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根基。那种认为毛泽东哲学是纯粹西洋“舶来品”、它的产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哲学的这种双重文化性格,其根本内涵并不是指其理论体系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代哲学两大部分机械拼凑而成,也不是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套上中国语言和思想表现形式的外衣,而是指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所积淀、内化形成的哲学形态的一种独特的思想特质。这种思想特质的两个方面相互交融在一起——这种交融是如此的密切,以至于人们往往难以辨别毛泽东的某些哲学思想究竟是来源于马列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共同规定着毛泽东哲学的思想特征。因此,“引儒入马论”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二、毛泽东哲学双重文化性格的意义

毛泽东哲学的双重文化性格，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冲突、渗透、融合的产物。它的形成和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对于奠定毛泽东哲学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方面，毛泽东哲学双重文化性格的确立，在文化的深层机制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有机融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中的哲学理论融入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智慧，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崭新的民族文化形式，为它在中国的生根、发展、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具体表现在：

其一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东方古老的文化土壤中找到了坚实的生长点。毛泽东哲学的双重文化性格，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新颖独特的民族文化形式，一种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有效地将它同中国文化精神之根衔接起来。这样，展现在中国人面前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再是与本民族文化精神传统格格不入的、没有中国文化根基的西洋“舶来品”，中国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时的隔阂、疏离的文化心态由此得到极大的融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五四时期传入中国以后，之所以没有像柏格森哲学、罗素哲学、杜威哲学等等那样沦为一时的时髦，而是影响日深一日，直至成为新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在极大的程度上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自己的中国化。

其二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正确道路，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范围。毛泽东哲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的思想内容转化为通俗简明的思想方法，不仅开拓出一种马

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丰富发展的方向，即哲学方法论的方向，而且还在实践中使中国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观点成为可能。毛泽东所提供的中国化、通俗化的哲学方法论，可以使文化水平不高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借助自己熟悉的实例、成语掌握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本的思想原则，并将它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其三是具有双重文化性格的毛泽东哲学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转化为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行为准则、人生取向、道德规范等等，这就前所未有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应用前景。它实际上已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步内化、积淀于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融入中国文化传统之中。

其四是借助于毛泽东哲学这一中介，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现代中国人重建文化价值秩序的思想基础，成为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精神核心。它推动了中国民族思维方式的历史性嬗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具有双重文化性格的毛泽东哲学今天仍然是我们走向现代化民族新文化的基石，它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方法论启示。我们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向前发展，任何试图抛弃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这份历史遗产，在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之外"彻底重构"中国文化，即所谓"复兴儒学"，或所谓"全盘西化"的设想，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另一方面，毛泽东哲学双重文化性格的一个重大意义在于，它完成了中国传统哲学历史发展上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变革。具体表现在：

其一是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整体思维质的变革，把古代朴素的整体思维发展到现代的辩证、系统思维的水平。中国传统哲学注重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生的整体性、和谐性的把握，但这种整体

把握，实质上是一种笼统的直观，而不是精确化分析基础上的综合。毛泽东哲学属于现代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类思维发展阶段，它以对客体的逻辑化的实证分析以及对事物矛盾的系统分析取代了笼统的直观，并进而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重新诠释整理中国古代哲学，使传统哲学中模糊含混的概念范畴以及思想逻辑得到规范化、科学化，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整体思维质的变革。

其二是把非逻辑思维的古代哲学提升到严格的逻辑思维的现代哲学水平。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过程，往往不是遵循从感觉到经验，经过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形式而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逻辑思维过程，而是直接诉诸直观和直觉。中国思想家都把直觉当做认识把握宇宙大本大源的最重要最高级的思维形式，而对于严格的逻辑思维程序并无多大的兴趣。重视直觉思维是中国哲学思维的一大特长，但过于执迷于直觉顿悟，排斥逻辑思维，却不能不是传统哲学的一大缺陷。毛泽东哲学并不排斥直觉作为一重要思维形式的意义，但它在本质上却是一种建立在近代科学文化基础上、注重严格的逻辑思维的现代哲学。它强调科学的理性认识起始于广泛的调查研究，起始于对事物的感性经验，并经过对感性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这样一个具体的逻辑思维过程，这样就摒弃了传统哲学思维那种玄而莫测的神秘色彩。

其三是将空谈“心性”、局限于道德践履的儒家哲学改造成紧密联系社会政治、经济等实践活动的应用哲学。传统儒家哲学虽有孟荀两大支流，即注重心性之学与注重外在事功的两大流派，但在历史上推崇内圣之功的一系始终被奉为正宗，其自身的发展及社会影响远驾于注重外王之功的一系。而外王之功的一系又往往局限于道德践履方面。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哲学与现实社

会的政治、经济等客观实践活动之间横亘着很大的距离。毛泽东哲学以直接服务于现实的社会实践为使命，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转化为中国人民从事自己的社会改造实践的应用哲学，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种哲学特质从根本上克服了传统哲学脱离实际的缺陷，使哲学成为中国人民从事革命和建设的精神武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变革，是借助其哲学的双重文化性格、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性格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在毛泽东那里是同一过程。一旦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对传统哲学的全面改造，使中国传统哲学在理论形态上完成现代化的嬗变，形成一种崭新的哲学形态，实质上也就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一种文化转换中介，并借此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一种哲学理论转化为一种现实的价值理想，一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模式，一种人生境界，一种工作方法等等，最终构成当代中国文化的灵魂。这就是毛泽东哲学在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本文系作者根据他和何显明合作的专著《毛泽东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观点撰写，原载《毛泽东思想论坛》1995年第4期）

毛泽东的哲学构成体系吗

——雍涛访谈录

九省通衢的武汉，有个著名的武汉大学；在武大，又有个全国闻名的哲学系。它们是和我国当代大哲学家李达的名字连在一起的。雍涛老师就一直在这里工作。由他来解答这个问题，固然因为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学有成就，同时也回答了长期以来在国内外流传的一种观点。

访问人：你认为，毛泽东的哲学构成体系吗？

雍涛：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什么叫体系。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体系，简单地说，就是"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具体地说，一门科学的体系，一般由这样三个部分构成：(1)有关这门科学的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2)建立在这些概念或范畴之上的基本原理；(3)同这些原理相联系的其他一些较为具体的理论。这三个部分又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有着前后一贯的严密的逻辑联系。这种联系不是人们主观臆想出来的，也不是仅仅依靠纯逻辑的推论得到的，而是事物的内在联系在人们思维中的反映，并且是随着人们对事物的内在联系的认识的发展而发展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体系的基本看法。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反对一切反科学的体系，并且无情地嘲笑和抵制了那些动不动就宣称自己已经建立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思想

体系的人，把这些人看做是吹牛家和骗子。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丝毫也不轻视科学体系的意义，认为某一科学体系的创立，实际上标志着人们对某一事物在某一阶段的内在联系的认识的完成。我们当然不能说凡是有条理性、系统性的东西就一定是科学的东西，但凡是科学的东西就必定是有条理性、系统性的东西。科学只有当它构成体系的时候，才能全面地或比较全面地揭示出某一领域的事物的内在联系，也才易于为人们学习、掌握和运用，并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广泛的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恩格斯在他同杜林论战的著作《反杜林论》中说："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①这种内在的联系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又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并一再强调这一体系"极其彻底而严整"。由此我们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战胜一切反科学的思潮，之所以能为千百万人民群众所掌握，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一个彻底的科学的体系。我们要掌握马克思主义，不论是它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都必须把它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来学习。毛泽东要求我们"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个道理。

访问人：那么说，毛泽东的哲学是成体系的？

雍涛：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体系的基本观点来衡量，应该说毛泽东在他的哲学创作中已经构成了一个哲学体系。理由有三条：第一，毛泽东的哲学是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它不是对个别哲学问题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第344页。

零碎的论述，也不是对某些哲学争论问题的孤立的研究，而是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领域；第二，尽管它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致的，但它又是中国化的，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性体系；第三，现代中国革命是一个由各种内在的社会矛盾所推动的合乎逻辑（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因而作为现代中国革命的逻辑在理论上的系统和正确的反映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必然要形成一个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哲学体系。这一切说明，毛泽东的哲学是有体系的。邓小平曾经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所以，从哲学领域来研究和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是哲学工作者一项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只有把毛泽东的哲学作为一个体系来学习和研究，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它的精神实质，防止用片言只语来割裂和歪曲它。至于这个体系如何表述，我认为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也是应当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的。

访问人：毛泽东的哲学究竟是怎样一个体系呢？

雍涛：在我看来，毛泽东的哲学的基本范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大体相同的，但它显出它自己的特点，如更多地使用“主观和客观”、“知和行”、“自觉能动性”、“矛盾”、“一分为二”、“社会基本矛盾”、“群众路线”等等范畴；毛泽东的哲学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一样，是由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这样一些原理构成的，但每一个原理又都有它自己突出的特点。这里我们不来详细考察这个体系各部分的内容，只是概括地说明那些同中国革命的成败密切相关同时又是经过实践考验的基本观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简要地说，这个体系的基本构成是：以实事求

是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以群众路线为特征的历史唯物论。这些基本观点之间的关系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实践观点、矛盾观点、群众观点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唯物论基础之上的。如果离开了实事求是，所谓实践观点，就会变成背离客观规律而盲目行动的实用主义和唯意志论；所谓矛盾观点，就会变成主观臆造和玩弄矛盾的诡辩论；所谓群众路线，就会变成违背群众利益的命令主义或尾巴主义，甚至会成为野心家、阴谋家欺骗和利用群众的幌子。不仅如此，实事求是还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其他观点归根到底是从不同的方面解决如何做到实事求是的问题。反过来说，不坚持实践观点、矛盾观点、群众路线，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的"是"，即客观事物的规律，只有在实践中，坚持以矛盾规律为指导去分析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世界，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可见，毛泽东哲学思想这几个方面的基本观点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体系。其基本特征是体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访问人：有人说，从体系上看，毛泽东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无根本区别，它们都同属于一个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而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构成一个单独的体系。

雍涛：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毛泽东的哲学虽然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因而在内容的侧重点和表述方式上又有自己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性的体系。同样是一种哲学体系，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形态，这在哲学史上是不乏先

例的。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资产阶级的唯物论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不能互相代替。他说：英国曾经出现过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18世纪又出现了百科全书派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并不因为有了英国资产阶级唯物论就不要法国的，也并不因为有了英国法国的，就不要德国和俄国的。① 同样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也应有不同的形态，它们是不能互相代替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不能代替列宁的哲学。没有列宁的哲学，就不能解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问题，不能解决俄国革命的新问题。同样地，列宁的哲学也不能代替毛泽东的哲学。没有毛泽东的哲学，我们就不能解决在列宁之后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问题，就不能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所碰到的新问题。

访问人：毛泽东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雍涛：考察了毛泽东哲学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容易了解毛泽东哲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历史地位了。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运用和发展，是在列宁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说明和发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宝库增添了若干新的宝贵财富；最为突出的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运用于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工作，形成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充分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这是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出的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

---

①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下同），第109—110页。

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是一个科学的世界观体系，同时又是一个科学的方法论体系。我们应该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充分发挥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用。

（这是作者应《说不尽的毛泽东》（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一书之约所写的一篇短文，编者以“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形式发表，该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李达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纪念李达诞辰110周年

2000年10月2日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李达一生坚持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世纪之交的新形势下，深切缅怀李达和毛泽东的友谊，探讨李达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影响，对于开创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新局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李达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

李达与毛泽东同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同是湖南人，他们一生关系密切。毛泽东称李达为鹤鸣兄，李达称毛泽东为润之。他们在学术上哲学上的交往更甚。1921年李达、毛泽东同为“一大”代表，出席党的成立大会。1922年“二大”之后，李达应当时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邀请，到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传播马列主义，培养党的干部。大革命时期李达还到过毛泽东主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马列主义理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江西等地开辟革命根据地，李达在上海等地执教，双方失去了联系。李达翻译出版的苏联哲学教科书——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流传到延安，毛泽东读后曾写信给易礼

容，向他打听李达夫妇的情况，信中说："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①]李著《社会学大纲》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后，李达立即将此书寄请毛泽东指正。毛泽东高兴地读了多遍，并作了详细眉批。在一次小型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遍。我写信请他再寄十本来，让你们也可以看看。"[②]在给李达的信中，毛泽东称李达是"真正的人"，称"这部著作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解放战争期间，李达除坚持执教马列主义之外，还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托为湖南的和平解放做了很多工作。

1949年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从长沙绕道香港北上赴解放区参加政协筹备工作。同年12月李达同毛泽东作了一次长谈之后，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等作历史证明人，中共中央特批李达重新入党。新中国成立时，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李达留北京工作，但李达一再请求回湖南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后获准到湖南大学任校长，他除担任教学行政领导工作之外，还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特别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工作。1950年和1952年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重新发表，李达以饱满的热情写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送毛泽东审阅，均受到充分肯定，并亲自对解说打印稿作了修改。他们在往来信件中进行切磋、商榷，实际上是一种认真的哲学对话和思想交流。五六十年代，李达任武汉大学校长，毛泽东经常来武汉，曾多次与李达晤谈，其中包括听取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稿的意见和关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口号的争论等等。1961年8月毛泽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7页。

② 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片断》，《解放军报》1978年12月28日。

东在庐山同李达谈话，建议他修改重版《社会学大纲》一书，后来李达改变主意，决心重新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1965 年该书上册即《唯物辩证法大纲》编就后铅印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写了关于辩证法的核心规律那一段很长的文字。

二、20 世纪 30 年代李达著译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影响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其主要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同时又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遗产。但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战争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能够读到的马列哲学原著不多，苏联三十年代的哲学运动和李达、艾思奇等人的中国哲学运动，也就成了毛泽东接受、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中介”。这是我们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时不能不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来看李达译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影响。1930 年苏联哲学界对德波林学派进行了批判，就其积极意义方面来说，产生了像米丁、尤金、西洛可夫等一批少壮派哲学家，他们撰写了一些质量较高的哲学论著，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比较系统的说明，强调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贡献，反映了哲学发展的新成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本书，即《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1932 年 9 月中译本），简称《西洛可夫教程》；《新哲学大纲》（米丁、拉里察维基等著，艾思奇、郑易里译，1936 年 6 月中译本）；《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米丁等著，沈志远译，1936 年 12 月中译本），简称《米丁教科书》。其中尤以《西洛可夫

教程》影响最大。该书1931年在苏联出版,1932年9月由李达及其学生雷仲坚通过日译本转译成中文,到1935年6月印行了第3版。毛泽东是在长征到达陕北之后读这本书的。从他对这本书的批划来看,至少读了三遍,第一遍的时间可能是1936年11月,最后一遍读完是在1937年4月4日。毛泽东读《西洛可夫教程》写下了12000字的批语,并从头到尾作了圈点和勾划。① 李译《西洛可夫教程》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和积累成果,一些观点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实践论》、《矛盾论》所采用。例如,关于在实践以外不能认识外界的观点;关于认识过程两个阶段的分析;关于感觉和理解之间的关系的思想;以及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由"自在阶级"进到"自为阶级"的举例等为《实践论》所采用。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吸收了《西洛可夫教程》关于主要矛盾制约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思想;关于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的观点;关于对立的双方互相联结、互相渗透的观点;关于各个过程和过程的各方面的矛盾特殊性的分析;关于对均衡论的批判等等。

二是毛泽东受李译《西洛可夫教程》基本观点的启发,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例如,在《西洛可夫教程》第3版分析马恩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对立阶级在矛盾统一体中各占据什么地位时,指出了分析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的必要性问题,但没有具体说明从哪些方面来分析对立双方的特殊性。毛泽东则系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认为所谓分析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就是着重分析研究这样三种情况:"对立的两方面中,每一方面各占何

① 石仲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等特定地位”；“各用怎样的具体形式同对方发生依存关系”；“在依存破裂时，又各用何种形式同对方斗争。”①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详细地阐明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种基本情形，提出要用发展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多方面、多层次具体分析和把握矛盾的各种特殊性，构建了一个分析矛盾特殊性的逻辑体系。又如，《西洛可夫教程》谈到了认识主体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起变化的问题，指出“人类作用于外部自然，一面变革它，同时又变革自己的性质”，主客体在社会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实现统一。但对人们如何在实践中改造自己，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毛泽东在批注中说：人们应当在实践中改变外界，同时改变自己，主客体的统一是具体历史的统一。②这个思想在《实践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提出了著名的“改造论”。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③

其次来看李著《社会学大纲》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直接影响。

这里要说明的是，李著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直接影响，不是仅仅指《社会学大纲》对毛泽东“两论”的写作而言，而是从精神实质上看《社会学大纲》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影响。因为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毛泽东写作“两论”在先，读《社会学大纲》在后。根据《社会学大纲》出版的时间和毛泽东的《读书日记》，可以看出，毛泽东读《社会学大纲》的时间是在1938年1月—3月。《社会学大纲》初版于1937年5月。李达时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

①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74、1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6页。

授、经济系主任，并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兼课，讲授哲学、经济学。这本书原是他讲授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讲义。1935年曾铅印成16开大本，1936年定稿后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毛泽东读到此书已是1938年2月（即1937年7、8月写作“两论”之后）。至于在此之前是否读过《社会学大纲》的铅印讲义，目前还没有材料可供证明。毛泽东在《读书日记》中写道：“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月十七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1——385页。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387——416。……（三月）十六日P831——852，本书完。”①《社会学大纲》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

1.《社会学大纲》第一篇第一章“唯物辩证法的前史”的论述给毛泽东以哲学史的启发。这一节主要讲哲学的起源和古希腊哲学史。这些内容是以前所读《西洛可夫教程》、《米丁教科书》没有专门讲的。毛泽东对此甚感兴趣，作了详细批注。例如，通过对原始思想和原始宗教世界观产生的历史根据的考察，了解了哲学产生的根源，得出“没有必要的闲暇是不能出现哲学的”②的结论；通过对古希腊自然哲学的考察，了解到唯物论哲学出现于希腊时代的历史根源，然后以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为例给予证实。又通过对古代观念论（即唯心论—引者注）哲学发展起来的历史分析了解到这种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根据，然后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例加以说明，并发掘出其中具有积极意义的辩证法思想。如苏格拉底“提起了从来没有被提过的道德论和认识论，把哲学引进了社会与思维两个领域，在道德论上提起了知识与行为关系的辩证法，在认识论上提

①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79—282、216页。

起了普遍与个别关系的辩证法，这些是他的大功绩。”[①]柏拉图“主张认识的对象是理念而不是感觉世界，认识的方法是依据空洞无物的概念以从事于思维。但是柏拉图的积极作用，也就在他的理念论理学。因为在他的理念论理学中，表示了概念对于思维的作用。这个概念在思维中的作用的指出，在人类认识史上有开创的意义。”[②]如果说1937年毛泽东在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包含了《实践论》、《矛盾论》）时，对哲学的起源、唯心论和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根源以及哲学史的了解还是比较简单、抽象的话，那么，1938年读李达《社会学大纲》之后就具体丰富得多了。

2. 李达关于认识过程三阶段的论述给毛泽东的发挥提供了契机。《社会学大纲》强调反映论，认为“人类的认识，是一个过程，并且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认识的过程，由实践出发，而复归于实践，其中包括着由物质到感觉及由感觉到思维的认识的发展过程。”毛泽东对此批注道：“还有，由思维到物质”。[③]《社会学大纲》继续说：“我们当分析认识过程时，第一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推移的辩证法，第二要阐明由感觉到思维的推移的辩证法。为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辩证法，就必须展开唯物辩证法的反映论。”毛泽东在此又写了一段批语，指出：“第三要阐明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即检验与再认识。”[④]这两条批语，既是对李达书中观点的重要补充，也是对当时哲学界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的重要贡献。三十年代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分析认识过程的辩证法运动，虽然都引用了列宁关于“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的论述，但在分析认识的具体过程时，却往往只分析从物质到意识和从感觉到思维这两个过程。《社会

①②③④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28、230—231、265、265—266页。

学大纲》在这点上也沿袭了苏联教科书的观点。这样讲认识过程是不完全的。因为人的认识到理性思维阶段并没有完全结束，还需要回到实践中去检验或再认识。认识过程的这一阶段往往为一般哲学家所忽视。这里，毛泽东根据列宁的思想，实际上把认识过程分解为三个阶段，而不是两个阶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把他在《实践论》中的观点——“两个过程、三个阶段”进一步明确化了。

3. 李达对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的看法和毛泽东的新发展。《社会学大纲》第一篇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在当时出版的中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书籍中，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论述得较好的一章。它的特色是对辩证法三大规律的关系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见解，对列宁的思想作了较深入的发挥。《西洛可夫教程》是完全按照恩格斯讲三大规律的顺序和观点展开论述的。《米丁教科书》改变了恩格斯叙述的顺序，首先介绍对立统一规律，认为这个规律是“辩证法中最基本最重要和有决定意义的法则，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则是这个法则的具体化”，这个观点比起《西洛可夫教程》来说是个明显的进步。但它同时又认为“否定之否定这一法则是作用最普遍最广大的法则之一”，它与对立统一、质量互变一起被当做辩证法最一般的法则。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则提出三大规律中对立统一规律是最根本的规律，它“包摄着”其余的规律和范畴。他在对立统一规律一节里写道：“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根本法则，包摄着辩证法的其余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法则、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因果性的法则、形式与内容的法则等。这个根本法则，是理解其他一切法则的关键。因为在对立物的统一发展过程中，所谓‘飞跃’、‘连续性的断绝’、‘向反对物的转变’、‘质量间的转变’、‘旧物死灭与新物发生’都是必然的形态，都是对立物的

斗争的发展，都是由对立物的转变而显现，都是由对立物的统一去说明。"①在质量互变规律一节，李达一开头就说："对立统一法则的一种显现形态，是由量到质及由质到量的转变的法则。"②在否定之否定规律一节，李达又说："对立统一法则的更进一层的具体的显现形态，是否定之否定的法则。"③从批注上看，毛泽东对李达的这一观点极为重视。在书上批划了许多符号，有些句子划了两道直线和一道浪线，而且还写有批注文字。在《社会学大纲》第三章中"这三个法则之中，对立统一的法则是根本的法则"处，漏了一个"最"字，毛在"根本"二字前面补上了一个"最"字。④ 在《社会学大纲》第三章中，李达两次用了"包摄着"的提法，毛泽东在那段文字边也批了"包摄着"三字。李达讲对立的范畴用了"许多组"的说法，毛泽东也批写了"许多组"三字。这些论述说明，毛泽东赞同李达的观点。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虽然明确提出了"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⑤但没有对三个规律的关系作具体交待。李达的观点为后来毛泽东的思考提供了启示。

李达基于对三大规律的这种看法，进而认为"肯定、否定及否定之否定，必须当作现实过程的矛盾的发展及其解决的形态与阶段去考察。"⑥这样，他就以对立统一规律来解释事物发展的肯定、否定及否定之否定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设定的阶段，是肯定中孕育着否定的萌芽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事物的矛盾的发展阶段，是否定肯定而又孕育再否定的阶段；第三阶段，是再扬弃否定的阶段，是由先行诸阶段的发展所准备的矛盾之相对的解决的阶段，是新事物的出现而又成为新事物发展的出发

---

①②③ 《李达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下同)，第 132、135、152 页。

④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250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299 页。

⑥ 《李达文集》第二卷，第 159 页。

点的阶段。"①毛泽东反复批划这段话，并批了"设定、展开、解决"六个字，赞同用矛盾的设定、展开、解决说明事物发展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三个阶段，这使人们能更好地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

4.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较明确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表现出他在理论上超前的领悟力和高于同时代理论家的认识水平。一是他明确肯定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贯穿人类社会始终并推动社会发展。他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历史的生产方法之推进的原理。这种矛盾，在一切社会的构造中，不论是在非敌对的社会或敌对的社会中，都是存在的。不过，在敌对的社会中，这种矛盾带有颉颃的性质，而在非敌对的社会中，矛盾不至发展为颉颃。"②二是明确提出"未来的新社会"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并由这一矛盾推动社会发展。他说："在未来的新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仍然存在。"只不过不会发生"一部分人去反对而另一部分人去拥护的事情。""所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正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③三是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未来社会里不会发展成为对抗的思想。他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未来极进步的社会中，也是存在的，但这种矛盾，决不发展为阶级的拮抗(因为阶级消灭了)。正因为有这种矛盾，未来的新社会才不断的向上发展。"④李达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但未充分展开，也未联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对矛盾明确定义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在批读《社会学大纲》时反复批划了关于新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不至发展成为

①②③④ 《李达文集》第二卷，第159—160、397、397—398、131页。

对抗这段话，虽然没有留下批语，但这一思想引起了他的重视，对他后来形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思想产生了影响。

三、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达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

1.《〈实践论〉、〈矛盾论〉解说》对“两论”思想的补充和发展。李达写《〈实践论〉解说》时，看到毛泽东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放在一起作为笼统的排外主义的例子来说明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的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李达感到不妥，便纠正了这种说法，只把义和团作为笼统的排外主义来讲，不讲太平天国有笼统的排外主义。因为太平天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但并不一概反对外国人。毛泽东仔细读了《〈实践论〉解说》，发现了李达的纠正，于是写信告诉李达：“《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①

又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了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突出了二者的先后顺序。李达则把自己过去讲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互渗透的观点拿来解说毛泽东关于二者关系的观点，他写道：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者互为条件，互相补充，互相发展，互相丰富其内容。两者具有有机的不可分离的关系，决不是各自独立的认识阶段，其间决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人们如果割裂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把两者分离开来，或者专重理性认识而无视或轻视感性认识，或者专重感性认识而无视或轻视理性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7—408页。

认识,就背离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而陷入于主观主义。"①

再如,《矛盾论》根据列宁的思想,对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②但也应该承认,《矛盾论》存在着过分推崇斗争性而忽视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的倾向,强调"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③而没有反过来说,没有同一性同样没有斗争性。后来,毛泽东大概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在《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中,对此作了修正和补充。他写道:"说斗争无条件,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不是说具体的矛盾",具体矛盾的斗争形式也是有条件的。"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④他在实践中也十分注意掌握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李达在《〈矛盾论〉解说》中谈到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时,则明确指出:"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在任何事物或过程中,都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我们运用矛盾法则研究任何过程时,决不可把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割裂开来,或者只认识矛盾的同一性而忽视其斗争性,或者只认识矛盾的斗争性而忽视其同一性。若果是这样,就会违反唯物辩证法,甚至要陷入机会主义的立场。"⑤李达的这些补充,使人们对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的认识更加准确。

此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李达在《〈矛盾论〉解说》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仍然是基本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它是非对抗性的,

① 《〈实践论〉、〈矛盾论〉解说》,三联书店1979年版(下同),第60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33页。

④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74页。

⑤ 《〈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第318页。

社会主义社会各成员之间的利益"是在一条共同线上"的，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可以及时改进生产关系以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并且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技术基础之上。[①] 这是五十年代初李达首先提出的观点。毛泽东在这些观点的启发下，总结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于五十年代中后期，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明确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作了科学的规定。

2. 李达批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促使毛泽东反思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错误。1958 年夏天湖北省鄂城县委门口贴出了这样的标语，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李达知道后问正在湖北视察的毛泽东："这个口号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回答道："凡事都有两重性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讲人的主观能动性。"李达进一步追问："主观能动性是不是无限大的?"毛泽东答道："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两人争吵起来，李达说我看你头脑发热、体温 39 度。争到最后，毛泽东终于在这个问题上承认了错误。[②] 1958 年 12 月毛泽东在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头脑要热又要冷，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③] 1959 年 2 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就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

① 《〈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第 337 页。

② 参见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43—246 页。

③ 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下同)，第 808 页。

符合实际的主观能动性，我们要发扬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能动性。接着是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提出要讲真话，反对讲假话；后来是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初步纠正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错误。

3.《唯物辩证法大纲》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地位的阐述和毛泽东关于辩证法核心规律的思想演化。李达在五十年代初的《〈矛盾论〉解说》中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唯物辩证法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把这个法则当作唯物辩证法的中心问题发展了。"[①]他以自己的表述方式解说毛泽东的观点。到了六十年代毛泽东多次指出了三大规律并列不妥。1965年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一书吸收了《社会学大纲》和"两论"解说中的这一优点，对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指出只有对立统一规律才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只有从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才能获得理解。[②] 对此，毛泽东作了一大段的批注："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

---

① 《〈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第120页。

② 《唯物辩证法大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41—242页。

如此类推。”①

这一批注与《唯物辩证法大纲》相同之处是突出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地位；不同之处是，“批注”贬低、否定了《唯物辩证法大纲》所阐述的辩证法其他规律的地位和作用。应该说这一批注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二重性。从积极方面说，毛泽东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规律，不同意把辩证法三个规律平行并列的传统观点，是对斯大林形而上学思想的批评，是对马克思和列宁辩证法思想的恢复，同时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和发挥，这对于掌握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对于改造哲学体系，对于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都有重要意义。从消极方面说，毛泽东在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时，有贬低或否定其他规律的倾向，把辩证法简单化了，并对实际工作产生了不良影响。“批注”把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同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范畴同等看待，降低了它们在辩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虽然可以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说明，但它们在辩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能贬低或取代的。因为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状态和道路；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方向、趋势和环节。至于说承认三个规律就是三元论，这个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我们承认三个规律，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它们的地位和作用作出统一的解释。说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只有一个，那就是对立统一规律，这是把辩证法简单化了，抹煞了辩证法活生生的多方面的内容。在一个长时间内，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如只讲“跃进”、“过渡”，不讲量的积累、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只讲批判，不讲继承；只讲破，不讲立；把螺旋式发展看成是“复旧”、“倒退”，如此等等，这与在辩证法理论上只讲对立统一，不讲量变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505—507页。

质变、否定之否定，只讲斗争性，不讲同一性的偏颇，是有一定关系的。这个教训我们应当记取。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 年第 6 期）

毛泽东哲学思想不容否定

——批判“变构论”、“过时论”、“封闭论”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通过散布“变构论”、“过时论”、“封闭论”，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价值和指导作用，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对于这些涉及毛泽东哲学思想历史命运的问题，不能不给予回答。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批判“变构论”

“变构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封建化”、“儒家化”。他们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发生了“重大变构”，失去了它的“本真意义”，变成了“伦理中心主义”，这种“伦理中心主义”是“一种用马克思主义语言表达的，但结构上十分类似儒家文化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是同现代化不相适应的，因此，必须彻底否定这种思想体系。

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非常有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必须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发生作用。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一种方法，是一种必须随着情况变化而发展的理

论。[1] 列宁说得更清楚："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2]他在谈到如何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东方落后国家的问题时，对东方各民族的共产党人说："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3]所以，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没有疑义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未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因而犯了"左"的和"右"的错误，使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和失败。毛泽东思想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斗争中，在把马列主义运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的过程中，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6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第274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第79页。

结合，首先是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实际情况相结合，同时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既反对复古主义，又反对虚无主义。1938 年毛泽东指出：对于我们的历史遗产，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①] 1940 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详细地说明了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科学态度和方针。1943 年他针对那种不加分析地认为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的观点，指出：孔孟之道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直到 1958 年 11 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还说：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什么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全盘否定孔孟之道，那是毛泽东晚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1960 年 12 月他在对两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又指出："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若干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把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文化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

---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下同)，第 533—534 页。

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①

毛泽东正是采取这种态度来对待中国哲学遗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而来，但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并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一方面要同中国哲学遗产中落后的反动的东西作斗争，另一方面要批判地吸取中国哲学遗产中合理的进步的东西。在《实践论》、《矛盾论》和《我的一点意见》等著作和文献中，他批判了孔子、孟子、董仲舒等人的“生而知之”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功利观；改造和吸取了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学说中某些合理的思想，如重视习行，强调“亲知”、“真知”，注重“效验”，主张“知行相资以为用”，要求“制天命而用之”等等，同时也改造和吸取了中国古代辩证法中“一分为二”、“相反相成”以及矛盾转化的思想等等。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决不是什么“封建化”、“儒家化”，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发生了重大变构，变成了儒家的“伦理中心主义”，其“论据”是：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达到，主要靠生产力的发展；到了列宁时代，强调改变上层建筑的重要性；而毛泽东则依靠道德教化来达到大同社会。例如，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因而“思想改造运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斗私批修”，接踵而来；毛泽东重义轻利，因而“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① 转引自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00—202页。

"割资本主义尾巴",不断发生。这类"论据"是似是而非的。

其一是,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从根本上说,绝不是道德观念决定一切的"伦理中心主义",而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①,"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②,革命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并且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③

其二是,承认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重视主观世界的改造,重视主体的道德修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变构",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来看,经典作家由于他们各自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他们的理论侧重点也有所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主要任务在于同历史唯心主义作斗争,他们特别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对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这一面则重视不够。恩格斯晚年已有所觉察,并多次作过补正。1890 年 9 月他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

---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326、282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下同),第 1079 页。

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1893年7月，他在致弗·梅林的信中又说：“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2]为了纠正这一点，恩格斯在强调经济因素、物质条件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又十分重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思想领域反过来对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列宁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已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因此，他强调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甚至提出，在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能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上层建筑的力量，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呢？[3] 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发挥了列宁的思想，提出“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4]毛泽东、刘少奇还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者“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5]的思想，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哲学遗产中注重主体修养的优良传统，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在革命实践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品德修养的重要意义，解决了认识主体的阶级立场、思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第698、726页。

③ 参看《列宁选集》第4卷，第77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2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4页。

想意识和思想方法的问题,从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实践证明,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既要抓物质文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又要抓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不能“一手硬、一手软”,否则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其三是,毛泽东晚年的确有忽视生产力,否定商品经济,夸大政治、思想、伦理道德等精神因素的作用的倾向,如主张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孤立地提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斗私批修”运动等等。这些错误是必须纠正的。但是纠正这些错误,并不是要否定毛泽东思想。实践反复证明,强调“改造主观世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倡“学雷锋”、“学焦裕禄”,提倡“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号召做“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提出“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战略任务等等,在今天来说,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也要作具体分析。在我国,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在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仍然没有停止,所以仍然有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思想阵地的问题。当然,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不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问题的关键是严格区分这些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正确的处理方法。

二、肯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作用,批判“过时论”

“过时论”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没有概括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现在已经过时了。要用“发生认识论”来取代实践论;用“系统论”来取代矛盾论;用“新英雄史观”来取代“奴隶们创造历史”的群众观点,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作用。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主要是通过对儿童心理的研究揭示认识发生的微观机制,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忽视了认识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对儿童的心理活动和认识发生并未能作出完全科学的说明,其适用范围也是有限的。有的人竭力推崇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否定作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实践论,认为发生认识论的"同化"、"活动"概念比实践论的"反映"、"实践"范畴更科学,要用它们加以取代。这种想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皮亚杰认为,"同化"就是把客体同化到主体内部存在的认识图式(结构、框架)中去,同化过程有选择性,有建构活动,并认为认识与客体有"同构性",因而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而"反映",则是消极的、受动的,抹煞了能动性。其实不然,"同化"的概念有可取的一面,但它并不科学。认识需要借助逻辑结构形式作为中介与客观事物发生联系,但不能因此就说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同化,如果这样说,就取消了客体对主体认识的客观制约性。"反映"既有受动的一面,也有能动的一面,特别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其反映内在地包含了选择、建构、创造的内容。"反映"范畴是实践论的前提、基础,是不能用别的东西来取代的。皮亚杰把"活动"作为主客体的中介和认识的源泉,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他讲的"活动"与我们讲的"实践"是不同的。"活动"主要是指儿童个体的活动,甚至包含无意识的本能活动(如婴儿的吸吮、抓握等),它忽视了社会性,抹煞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实践"则是指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变革现实的活动,它强调社会性、历史性、能动性,它注重考察的不是个体认识的原始发生,而是社会群体认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实践"范畴是不能用别的东西来取代的。

有人认为,系统论的出现使矛盾的普遍性原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以及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过时了,矛盾论应当被系统论所取代。这也是非常错误的。

从表面上看，系统论认为事物由多要素构成，客观事物并不都是“一分为二”，绝大部分是“一分为多”的，对立统一规律不适用于解决复杂的系统问题。其实不然，“一分为二”是我们对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的通俗表述。从根本上说，它是指对立面的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由人的抽象思维所把握的，而在现象形态的表现上它是无比丰富的。系统论讲的“一分为多”，是指系统的构成要素在数量上的特点，它描述的只是经验事实。我们不能一方面把“一分为二”简单化、现象化，另一方面又把“一分为多”本质化、抽象化，误以为“一分为多”是事物的本质趋向。其实，在系统的诸多要素中，最基本的倾向仍然是两种，即独立运动（竞争）与合作运动（协同），所以对立统一规律并没有过时。

有人认为，矛盾学说主张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决定的，“这使现实世界带上了简单化的特征”，其实质是承认“部分是原因、整体是结果、部分决定整体”，而这是与系统论关于系统不等于其构成要素的总和，不能单用事物内部主次关系去把握整体的原则相违背的。这种观点也是似是而非的。因为系统论并不否定各要素在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平衡性，而且一般系统论还有所谓“中心论”原理，它承认系统中主导部分的存在，强调部分对系统行为的支配作用，从而体现和证实了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原理。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曾以生物学为例指出：任何功能归根到底起源于所有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中枢神经的某一部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称为这个功能的“中心”。系统论反对的只是把孤立的组成部分看成是整体的惟一原因，而不否定系统的组成部分是系统行为、属性的原因。部分不能成为整体的惟一原因，但不能否认部分可以成为整体的原因。所以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并没有过时。

有人认为，矛盾学说关于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过时”

了。因为矛盾学说强调内因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只是通过内因起作用;而系统论则强调环境对系统的作用,没有适当的外部环境,系统便无法存在。的确,系统论认为系统只有与外界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时,才可能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低序走向高序。但是作为非平衡态的系统,它的有序化过程是系统的自组织过程,而同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与信息,只是系统的有序化的必要条件之一。所以,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原理仍然是正确的。

总之,系统论并没有否定矛盾论,而是以大量新的素材证实、丰富和深化了矛盾论。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吸取、提炼系统论的新成果,使矛盾学说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有的人还鼓吹所谓"新的英雄史观",否定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他们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信息量增殖的历史","谁为这种信息量增殖做了贡献,谁就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广大的奴隶、农民、工人,是"模仿的和重复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不增加任何信息量,因此他们不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在物质资料生产领域、精神文化生产领域为信息量增殖的人,如科学家、发明家、思想家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的"英雄史观,而是旧的英雄史观在新名词下的翻版,是地地道道的历史唯心主义。毛泽东早就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类历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信息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而是物质的普遍属性,只有物质的增殖才能带来信息的增殖。人们通过对信息的选择、加工、利用使信息增殖,这只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而物质生产活动则是体力与智力的支出,是一种物质性活动。把物质生产活动归结为"不断增殖信息量"的活动,也是错误的。毛泽东还说过:"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

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①]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广大奴隶、农民的平凡的、重复的劳动，没有他们用血汗提供的物质生活资料，就不可能出现脑力劳动者、科学家、发明家这些所谓专门提供信息的人。所以凡是为社会创造了财富、提供了价值的人，都对历史的发展起作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突出地表现在他们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奴隶的英勇斗争动摇了腐朽的奴隶制度的基础；是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打击了顽固的封建统治，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至于工人、无产阶级创造历史的作用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是不会过时的。

包括实践论、矛盾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内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过去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这种指导作用，不仅表现在它是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还以它所特有的实践性、革命性和民族精神，为我们排除思想干扰，克服各种困难，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团结广大群众，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支撑和精神动力。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如此之密切，以至我们可以说它是社会主义中国之国魂，其指导作用是必须充分加以肯定的。

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批判"封闭论"

"封闭论"诬蔑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非批判的封闭的思想体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9页。

系”，同儒家思想一样，成了“现代经学”，因此要彻底否定它、取消它。这种诬蔑是完全徒劳的，其用心是十分险恶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阶级性和实践性是它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阶级基础是中国无产阶级。它是根据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需要，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它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争取解放和建设新社会的利益和要求，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中国无产阶级是彻底革命的阶级，它的利益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一致，因此它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毛泽东哲学思想从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发展，它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吸取了人类优秀思想的成果；并且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它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开放性的思想体系。1937 年毛泽东就有过一句名言：“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①这句名言，同样适用于毛泽东思想。

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总是注意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造新理论，修改、补充、纠正自己原来的认识和理论，其中包括他的哲学名篇《实践论》、《矛盾论》。②1960 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296 页。

② 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445、407 页。

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七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足以应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候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①

由此可见，毛泽东并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包括他的哲学著作，看成是结束了真理的封闭体系，并不要求人们把它当做只能注释、讲解，不能发挥和发展的"现代经学"，而是看成一种适应一定历史任务需要的发展理论。把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当成"现代经学"，鼓吹"顶峰论"，搞"两个凡是"，那是60年代、70年代林彪、"四人帮"和其他思想僵化的人对它的歪曲和篡改，是违反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的本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他们对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的歪曲、篡改，恢复它的生机，并且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邓小平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我认为首先应当进一步全方位、多角度地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博大恢宏的体

① 转引自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35—36页。

系。除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外，还应研究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军事哲学、文化哲学、道德哲学、教育哲学，研究毛泽东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等，以展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丰富的内容和巨大的科学价值。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当前要特别重视对毛泽东晚年哲学思想的研究，辨析其正确和错误，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这一时期尽管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犯了严重错误，但仍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见解，如哲学上的“两个对子”问题，对立面的结合问题，部分质变问题，辩证法的核心规律问题，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哲学就是认识论”的问题，认识主体和认识工具问题，社会基本矛盾问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问题，群众、政党和领袖的关系问题等等，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其次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并努力作出哲学概括。当前要特别注意研究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方向、方针、方法问题，研究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带来的时代特点，研究当前世界科学技术革命与社会改革两大浪潮带来的新问题，研究国际共运的失误、曲折、暂时倒退的原因和历史教训，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加以概括和总结，并积极吸取当代各门科学发展的新成果，真正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

再就是要改进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方法。除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统一、逻辑和历史的一致、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外，还应有分析地引进一些国外好的研究方法，如比较研究法、动态分析法、综合反映法等等，开创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生动活泼的新局面。

半个多世纪以来，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经历了褒贬不一、涨落起伏的历史命运。最先是被斥为“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以后经

过反复的革命实践，才为全党所公认，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论敌企图从“左”的方面损害它的声誉，鼓吹所谓“顶峰论”，宣称“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当我们拨乱反正之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则宣布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一样“过时了”，已被他们“打得粉碎了”。然而，曾几何时，经过恢复、丰富和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又重新为中国人民所共识，一股“毛泽东热”又悄然兴起，遍及全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必将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指引中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并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继续作出新的贡献。

（原载《毛泽东哲学思想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实践论》、《矛盾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著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奠定了哲学基础。认真研究“两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提供的经验,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以及展望哲学的未来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涵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马克思主义其他组成部分的中国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一个政治范畴。其基本涵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结合和应用中创造出新的理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想武器,但是它必须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不应该把他们的理论当做教条随意套用,而应该

看做是行动的指南，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方法，它的应用“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①的特点。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各国革命实践进程的发展，这个问题日益突出起来。列宁站在俄国革命实践的立场上明确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②十月革命之后，他曾向东方各民族共产党人指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③这就是说，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个国家的国情结合起来，根据不同的情况加以具体应用，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民族化，体现出民族特色来。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来更需要与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结合起来，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党的创始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初步注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如何运用的问题，但最明确地提这个问题是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情形之后。1930年5月毛泽东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声。1938年10月毛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79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274—275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79页。

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节，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这里，毛泽东明确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概念。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在该处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他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②]

1945 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他指出：“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就必须“依据历史进程每个特殊时期和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及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并用中

---

① 晋察冀日报社编：《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0—21 页，民国 33 年 5 月初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534 页。

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与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我们进行大胆的理论创造，敢于“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①

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一个文化范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包括了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文化要在中国传播和发展，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一种融会贯通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文化，即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吸取中国文化之精华，获得中国文化的民族形式，这样才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另一方面，要用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批判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使之获得现代生命，汇入世界新文化的潮流。

应当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的应用时，总是要求人们注意各个国家与各个民族的社会历史及文化状况的差异，但他们并没有进一步明确论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必须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相融合的问题。列宁虽然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俄国革命实践，但俄国革命 70 年，并未做到马克思主义同俄国文化的完满结合，原因之一也许是更多地看到了俄国文化与欧洲文明的同一性而忽略了双方文化上的差异性。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如何将从西方引进的马克思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下同)，第 335—336 页。

主义同中国固有的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五四时期、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都有过经验教训。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从文化的高度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的民族特点相融合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但决不能生吞活剥,必须经过自己充分的消化。他指出:"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①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文化之根结合起来,并获得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专门从文化特别是艺术的角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说: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他还谈到艺术的民族形式的特殊重要性。他说:艺术"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他还认为老传统不能丢,艺术的民族性不应拒斥现代化,要提倡进步,反对落后。他强调,学习外国有用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②,发展中国的艺术,发展中国的文化。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7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6—747、751页。

从动态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一个历史范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而中国革命和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又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动态过程。这样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不断地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没有完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不会停止。毛泽东在领导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但后来又走过一段弯路，留下了许多问题。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并没有结束，还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它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样具有上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涵义。但是哲学作为远离经济基础和现实生活的最高社会意识形态，作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其传播、交流和应用又有自己的特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除具有上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涵义之外，还有自己的特殊涵义。

1938 年 4 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专门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他批评了当时一部分人不重视哲学，一部分人把哲学变成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的倾向，提出

"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①]他强调这个运动的"中心就是对新哲学、辩证唯物论的研究"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并指出,哲学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不是"书斋课堂的运动",不是"滥用公式的运动",而是从抗战的实践经验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的理论,然后把这发展了的哲学理论拿来应用,指导我们的思想行动,并根据每一时期的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理论,而不是把固定了的哲学理论当做支配一切的死公式。他还阐明了哲学中国化、现实化和通俗化的关系,认为通俗化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但通俗化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②] 1941 年 8 月他在《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辩证法唯物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根据中国自己的现实材料,在中国自己的地盘上,来发展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使它更能够成为改造中国、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锐利的方法武器。"[③]1937 年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谈到"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还提出了"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的任务,这就是说,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即既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又要使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特殊意义在于:就政治范畴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更应着眼于中国现实,要把抽象的哲学理论具体化,创造出新的哲学思想,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使之成为中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就文化范畴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从文化深

---

① 《艾思奇文集》第一卷,第 387 页。

②③ 《艾思奇文集》第一卷,第 387—388、553—563 页。

层机制即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使之具有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思维特色,更应该注意民族形式和语言表达方式,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改造中国传统哲学,实现民族化和现代化、思辨化和通俗化的统一;就历史范畴来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应该反映当代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应该反映世界哲学的趋势和未来走向,永葆其青春活力。

二、“两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贡献

从以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来看,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著作,它们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际应用,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1.“两论”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作了哲学上的论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功地为中国革命的现实服务

《实践论》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发展动力、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认识的最终目的等方面阐明实践第一的观点,并全面地论述了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能动飞跃的认识发展过程,阐明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驳了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这就从认识论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作了哲学上的论证。《矛盾论》精辟地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并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为线索阐明了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为马克

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基本原则提供了哲学基础，是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就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共性和个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相结合。

"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系统化的标志，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这一整套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等）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谈到他为什么写"两论"时，再一次强调哲学要具体化、现实化，要为当前政治服务的问题。这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他说：任何哲学都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资产阶级哲学也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他举例说，英国曾经出现过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十八世纪又出现了百科全书派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更是要密切地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对于我们来说，马恩列斯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① 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没有《实践论》、《矛盾论》的

①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09—110页。

诞生，就不能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中所出现的新问题，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2.“两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提供了文化转换中介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即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取得中国的民族形式；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哲学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实现向现代哲学的历史转变。“两论”正是这种双向互动的优秀成果。一方面，它在文化的深层机制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有机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了中国文化精神智慧，获得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另一方面，它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改造中国传统哲学，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历史转变。

我们先来分析前一方面的情况，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获得中华民族文化形式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唯物论的基础上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而创立的，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了深刻的发挥。其基本观点是实践第一的观点和认识辩证发展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建立在西方文明的基础上的，具有欧洲文化传统。要把这种认识论传播到中国来，必须找到它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通之处，赋予它中华民族的形式，这样才能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

纵观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从孔子直到孙中山，知行关系问题的探讨是始终跳动不息的哲学主旋律。中国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热心，是其他任何民族的哲学家望尘莫及的。从古代《尚书》“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论说，到宋明理学道德形而上学的知行观，再到清代学者的道德践履，直至魏源、谭嗣同、孙中山等人近代意

义上的知行学说，知行关系的讨论长盛不衰。几乎所有的中国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论说过知行关系的问题。无论是知行的先后、轻重、难易，还是知行合一或分离、知行的相资或相离，都被中国哲学家作过全面的阐述。尽管他们在知行观上意见纷呈，但从总体上说，没有一个不是重视躬行践履的道德实践功夫的。孔子虽然认为有"生而知之"的人，但他更注重"学而知之"，行而知之，孔子的"学"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包含在行之中，行比学更重要。朱熹一方面认为"论先后，知为先"，但同时又强调"论轻重，行为重"，强调必须从"行"上见真学。心学大师王阳明断言"心外无理"，"不可心外以求理"，极力主张"致良知"的向内追求功夫，在知行观上提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混淆知行界线，表面上是"消行于知"，满足于主观精神上的自省，但实际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也可以说是以行的规范来要求知，要人们将不道德的思想意念扼杀在萌芽之中，对人的道德修养功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同样也是重"行"精神的体现。清初"经世致用"的儒者对习行的推崇自不必说了。中国传统哲学这种重行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观有着某种相通之处。在知行关系的讨论中表现出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特点：重视主观能动作用。孔子就十分强调这一点。毛泽东曾经指出："观念论（即唯心论——引者注）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①他举例说：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5页。

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① 进一步说,程朱理学知行观的最大特色是突出知对行的引导和支配作用,反对无知的盲动。程颐认为:"知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须是知了方行得,不知怎生行得。"朱熹同样指出"义理不明如何践履",客观上肯定了认识对实践的重要意义,突出了主观能动性。陆王心学更是高扬主体精神,强调主观意志、独立意识,认为主体的道德修养对于社会政治实践有决定意义。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欲新其国,必先新其民"的"新民说";谭嗣同的"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的"心力说";以及孙中山重视革命理论作用的"知难行易说",都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在知行关系中对主体性和主观能动作用的注意与强调。这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重视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正确处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的思想也有着某种相通之处。

毛泽东的《实践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认识辩证发展过程的理论同中国传统哲学中上述重习行践履和强调主观能动性的思想结合起来,创立了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现代知行合一论",赋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中华民族的形式,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中国的发展找到了新的生长点,增添了新的内容。《实践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毛泽东特意给《实践论》加上一个副标题"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这就更清楚地表明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是关于世界普遍联系和发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4—145页。

展的学说。它是马克思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成分而创立的。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而对立统一规律的关键问题又是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列宁说过,辩证法就是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学说。这个学说同样是建立在西方文明基础上的,具有欧洲文化传统。要把这种辩证法引进到中国来,同样需要找到它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通之处,赋予它中华民族的形式,这样才能使它在中国得到传播和发展。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辩证思维的民族。朴素直观的辩证法观念在中国的发展无论就其历史的悠久性还是就其观念本身发展的成熟性来说,都达到了举世鲜见的发达水平。其基本观点表现在关于阴阳关系的探讨和重视和谐统一的思想之中。

阴阳观念在中国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远古时代。殷周之际的《诗经》、《尚书》中已出现阴阳二字对举的现象,但从理论源流来看,传统阴阳辩证法思想起源于战国时期的《老子》和《易传》两大源流。《老子》一书曾被毛泽东称之为"兵书",它运用了大量成对的范畴来阐述"道"的运行规律,体现了极为丰富的有关对立面相互对立、相反相成以及相互转化的辩证观念,其中最基本的范畴是阴阳范畴。它指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认为万事万物中存在着阴阳二气的对立和统一。其后《易传》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它从宇宙观上明确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把"阴阳"提升为"范围天地"、"曲成万物"的最高哲学范畴。它认为阴阳表现为刚柔,阴阳相交相感造化万物,"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它们的对立统一决定着天地万物的运动和变化。《易传》奠定了阴阳学说在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以后历代的思想家都是把阴阳的对立统一关系,当做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最根本原因。他们以此为基础,又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

发，分别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例如周敦颐的“阴阳动静”论，张载的“一物两体”论，叶适的“一两相济”论等等，直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进一步总结和充实了这种阴阳辩证法思想，认为“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他把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和消长、转化视为天地万物除旧更新的根本原因。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不但初步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在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而且也使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简易对举和二分法的鲜明特点，无论是一两观、两点论还是所谓“兵家辩证法”，都是这种朴素辩证思维模式的产物。这种阴阳学说的传统和对立面简易二分法的思维模式，尽管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不具有必然的同构关系，但由于两者的基本着眼点都在于矛盾双方的相互关系上，因此比较容易产生思想上的契合，这样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便有了一定的文化土壤和根基。

阴阳辩证法思想传统的另一个颇具特色的思想内容是关于阴阳和谐统一的思想，即矛盾的同一性思想。中国古代的辩证法虽然肯定天地万物阴阳两端对待关系的存在，认为万物存在皆由“对偶”而生，和谐与冲突共同推动事物的发展；但绝大多数思想家认为，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起始状态和终极目的，都是和谐统一、无差别、无对待的。老子就认为只有“道”才是产生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支配宇宙万物的法则。“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所谓“道”，本身就是一种“惟恍惟惚”的浑然而一的东西。“一”是指万物生成之前的统一状态，阴阳是从“一”中化生出来的。庄子更是主张万物齐一。《易传》认为乾坤、阴阳都生于“太极”（即老子的“道”），而且最终又会归于太和统一的和谐之境。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荀子的“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都力主和谐统一。其后

历代思想家大都遵循这一总的原则，一直到王夫之，也还认为“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相仇”，但“乃其究也，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所以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倾向于强调矛盾的同一性，强调统合完善、太一和谐。尽管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对同一性的注重具有某些调和论和相对主义倾向，但它对于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关于矛盾同一性的思想有一定的相通作用。

毛泽东的《矛盾论》把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同中国传统辩证法的阴阳学说与和谐统一思想结合起来，建构了一个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为精髓，以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为基础的辩证法体系，赋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中国阴阳学说和中华和合文化的民族形式，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矛盾论》指出：我们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要把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推动事物向有利于革命和建设的方向发展；决不能把辩证法看做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加以灵活运用。

总之，“两论”在文化深层机制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有机融合，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一种新颖独特的民族文化形式，(“现代知行合一论”、“中西合璧的矛盾辩证法”)，一种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有效地将它同中国文化之根衔接起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东方古老的文化土壤中找到了坚实的生长点。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后一方面的情况，即“两论”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来批判改造中国传统哲学，实现中国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历史转变。

首先看《实践论》。如前所述，中国传统知行学说具有重“行”的特点，但它所说的“行”，基本上是个人的“道德践履”，在内涵上

与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实践”概念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实践”是指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的、现实的活动，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实践论》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实践”的有关论述为基础，明确地将“行”(实践)定义为人类“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活动，简而言之，就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做或行动”，从而阐明了“行”的客观性和能动性；《实践论》还以“人的社会性”、“人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行”(实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这样就使中国传统哲学“行”(实践)的范畴最终从“道德践履”的狭隘伦理框架中解脱出来，实现了现代转型。从外延上看，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行”(实践)主要被理解为道德践履，但也有一些思想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它，认为除了应事接物的生活行为外，“治器”、“作器”、“利用厚生”的生产劳动也归入“行”的范围，但他们对“行”的理解还是直观的经验的。孙中山吸收了近现代西方思想，从生产生活、科学实验和革命活动的角度理解“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行”的范畴的近现代转化，但他也未能从哲学理论高度概括“行”(实践)的基本形式。毛泽东的《实践论》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明确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①]，但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其他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都是实践的表现形式；同时指出社会实践的主体是阶级和千百万人民群众。这样就进一步明确了实践主体的社会性，把“圣人君子之行”转变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完成了对中国传统哲学“行”(实践)的范畴的改造，在深层的文化机制上实现了“行”与“实践”范畴的对接。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2页。

《实践论》不仅对传统哲学“行”的范畴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而且对“知”（认识）的范畴作了科学阐述。中国传统知行学说的一大缺陷就是认识论伦理化，往往把知（认识）局限于道德领域，并且缺乏对认识内部机制的深入探讨。要克服这一缺陷，彻底实现现代转型，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借鉴西方的哲学传统，划清“求真”与“求善”、求知方法与道德修养的界限，明确赋予“知”以一般认识论的涵义，在一般认识论的范围内研究知（认识）与行（实践）的关系。《实践论》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指出人的认识既包括对社会的认识、对人和人的各种关系的认识，也包括对自然界的认识、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的规律性，即到达于论理（逻辑）的认识。这样就把中国传统哲学以对道德原则的体认为主要任务的“知”，转化为以“求真”为目的的“认识”，明确赋予“知”以一般认识论的涵义，这对于中国传统知行学说的现代转型来说是关键的一步。与此相联系，中国传统知行学说还缺乏对认识的内部机制、认识辩证发展过程的精微研究，显得过于笼统和直观。《实践论》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基本观点，科学地阐明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性质、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特别强调逻辑思维和科学抽象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初步阐明了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科学思维的基本方法。其用意在于用科学的思维方式纠正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缺乏逻辑分析和科学抽象的弊端，克服知行学说的直观性和简易性。更为重要的是，《实践论》根据马克思特别是列宁的思想，完整地阐明了认识发展的全过程，即“两个飞跃”的理论，强调“第二个飞跃”（从理性认识回到革命实践的飞跃）的重要意义，从实践与认识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去寻找认识发展的内部机制，克服了知行学说的重大缺陷。对

此，毛泽东本人曾做过一番自我评论。1964 年 8 月 24 日他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说："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些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但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①《实践论》则解决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问题、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应该说，这个评价是基本正确的。《实践论》用"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来概括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行合一"论。它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②这种现代知行合一论是以"行"（实践）为基础，建立在唯物论立场上的，它不同于"消行以归知"的唯心论的知行合一论，是对"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的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的批判继承。这种认识论又是以辩证法为理论前提的，它既强调"知"（认识）来源于"行"（实践），"行"（实践）对知（认识）具有决定作用；又注重"知"对"行"的指导意义，突出了认识和实践主体的自觉能动性。总之，认识与实践、知与行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它贯穿于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全过程。这个现代知行合一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中国传统知行学说的批判吸收和科学改造。

其次来说《矛盾论》。如前所述，中国传统辩证法很早就提出了"矛盾"概念，但从未对它作过精确科学的界定：有时以"矛"和

①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 389—39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296—297 页。

"盾"的关系来形象地说明事物之间相互对立和逻辑上的不相容;有时指事物的排斥、对抗关系;有时指事物性质的阴阳对待或一物两体等等。《矛盾论》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矛盾"概念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改造和科学规定,指出所谓矛盾就是对立统一,就是承认一切事物都包含着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而这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在一定条件下又互相联结、互相依赖、互相转化,即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决定着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着一切事物的发展。与此相联系,《矛盾论》进而把"矛盾"的基本思想——"相反相成"改造成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范畴。它指出:"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①这样就使矛盾概念和矛盾规律精确化、科学化,具有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形态。《矛盾论》还根据列宁的思想,进一步说明了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互关系,指出"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②中国传统辩证法在矛盾的同一性特别是矛盾的转化问题上存在着一个相当普遍的缺陷,就是忽视转化的条件,把矛盾的转化看做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论》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科学地阐发了条件对于矛盾转化的重要性。它指出:"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33页。

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1]否认矛盾转化的条件性，辩证法就会变成相对主义和诡辩论。

中国传统辩证法具有整体和谐的特点，又有其笼统直观、缺乏逻辑分析的缺陷。毛泽东的《矛盾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基本理论，提出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关系问题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重要思想，在承认矛盾普遍性的前提下，着重论述矛盾的特殊性。它关于矛盾特殊性五种情形的分析，建构了一个分析矛盾特殊性的严密的逻辑体系。它要求对于事物的内部矛盾系统和外部矛盾系统作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不仅要分析同一事物内部不同矛盾之间所构成的矛盾群体关系，分析同一矛盾不同方面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且还要进一步分析这些矛盾和矛盾不同方面之间的关系在事物发展各个过程、各个阶段上所发生的复杂变化。这样人们对事物矛盾的认识才不至于停留在笼统直观的水平上，而是一种精确的科学的实证分析和理论抽象。只有传统辩证思维方式单纯的整体直观得到了克服，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才能向现代科学的唯物辩证法转变。

总之，"两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改造，是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完成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传统哲学自身是不可能由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现代哲学形态的。"两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改造的重要成果就是使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思维水平发生了现代嬗变。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使带有浓厚伦理化的知行学说变成现代的知行合一论即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使古代的朴素的直观辩证法变成现代的科学的唯物辩证法。二是把非逻辑思维的中国古代哲学提升到严格的逻辑思维的现代哲学水平。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过程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32、333页。

往往不是遵循从感觉到经验，经过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形式而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逻辑思维过程，而是较多地诉诸直观和直觉，因而使它带上了难以揣测的神秘光环。"两论"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文化基础之上、注重严格逻辑思维的现代哲学，它并不排斥直觉作为一种重要思维形式的意义，但它强调科学的理性认识起始于对事物的感性经验，并通过对感性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的逻辑加工过程才能达到。这样就把思维过程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摒除了传统哲学思维那种玄而莫测的神秘色彩。

3."两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现实应用和通俗化开辟了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就指出他们的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他们的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哲学要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相结合，"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①]哲学不解放无产阶级，就不能变成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能解放自己。列宁也强调："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②]所以哲学的现实化、哲学的现实应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点和必然要求。

"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实应用，它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转化为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工作态度、行为准则、人生取向、道德规范等等，这就前所未有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应用前景，它实际上已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第15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第311页。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化、积淀于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融入到中国文化传统之中,其影响之深远是不可估量的。“两论”所开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通俗化道路。“两论”既短小而又简洁,既丰富而又透辟,更主要的是那样完整和明晰,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的思想内容转化为通俗简明的思想方法,不仅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丰富发展的方向,即哲学方法论的方向,而且还在实践中使中国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观点成为可能。“两论”所提供的中国化、现实化的哲学方法论,可以使具有粗浅的文化水准的人都能借助自己熟悉的故事、成语、格言、比喻等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思想原则,并将它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这就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社会范围,使哲学从哲学家的圈子里解放出来,成为广大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4.“两论”的文化性格预示了哲学未来的文化走向

“两论”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因而在性质上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中国哲学,具有中西哲学的“双重文化性格”。正是这个“双重文化性格”预示了哲学未来的文化走向。哲学的未来走向是一种世界性的哲学,但是这种世界性的哲学并不排斥民族传统形式,而是世界性与民族性、时代性与传统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50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随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

文学。"①这里的"文学"一词系指科学、艺术、哲学等各方面的书面著作。这一段话意思是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民族的文化将在愈来愈频繁的交流中形成一种世界文化。科学、艺术是如此,哲学也是如此。五十多年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应是同一切别的民族的优秀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②

现在的世界形势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当年所说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当代经济和社会生活。经济全球化趋势推动着各民族的文化向世界文化发展。拿哲学来说,现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哲学的相互交流和沟通正在加强,许多全球性的问题成为它们共同研究的主题,表现出愈来愈融合的趋向。但是由于世界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背景、语言、民族传统不同,不可能一下子形成一种统一的世界哲学。哲学发展的世界性融会趋向,并不排斥哲学发展的民族传统形式,世界哲学的前景不是一幅形式单调的文化构图,而是绚丽多姿、丰富多彩的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相得益彰。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了人类的先进思想,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成果,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连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惟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中国哲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丰富的文化资源,表现出深睿的东方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哲学的结合必将对世界文化、世界哲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毛泽东的"两论"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代表了马克思主义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6页。

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方向。在经济全球化、文化世界化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进一步中国化，就要像“两论”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同中国传统哲学之根结合起来，不仅吸取传统哲学与之相通的优秀成果，而且也要吸取与之相异的优秀成果，因为这种相异的优秀成果更能体现中国特色。如中国传统哲学的心理之说、阴阳二分、中庸之道、天人合一、民本思想、义利之辨等等，是中国哲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概念表达的全人类共同的哲学智慧，尤其是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作为理解世界和人生的一个重要维度，具有校正和针砭西方哲学中矛盾对立绝对化倾向的作用，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的共同难题有着特殊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吸收这些中华文明长期积淀起来的哲学睿智，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扩张。中国哲学要进一步现代化就要像“两论”那样既弘扬中国传统哲学精华，又大胆吸收世界哲学的优秀成果，进一步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即由直观的整体思维向辩证的系统思维转变，由经验思维向理性思维转变，由封闭半封闭思维向开放思维、创造性思维转变。在这里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一个进一步现代化的问题。因为全球化是与现代化同步的，也是由现代化推动的。没有哲学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新哲学的产生。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自不待言。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是建立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之上的，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根基的实践唯物主义毕竟产生于一个半世纪之前，不能不受当时实践水平的局限。为了反映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必须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从文化层面而言，除了要吸收中国哲学深睿智慧之外，还要批判地吸收现代西方哲学的成果，借鉴它们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更深刻的背景下对实践的各个侧面深入探讨的经验，进一步提高实践唯物主义的水平，反映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的脉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两论"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并没有结束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实现。

（本文压缩稿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

《实践论》、《矛盾论》研究述评

一、“两论”研究的历史回顾

《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1937年7、8月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时用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部分章节。该提纲曾油印过,因而广泛流传,引起理论工作者的重视和研究。“两论”的研究,从它的逻辑发展来看,可分为三个时期。

1. 延安时期

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问世之后,延安的高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便开始了“两论”的研究。1939年春,毛泽东在延安组织了一个六人哲学小组(毛泽东、艾思奇、何思敬、和培元、杨超、陈伯达),把他的“两论”油印稿发给大家研究、讨论,征求意见。据参加者回忆,讨论最多的是《矛盾论》,涉及矛盾的发展、主要矛盾、矛盾诸方面、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以及实事求是等问题。[1]

1941年4月张如心在《解放》周刊上发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除了其他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能够真正唯物地具体地理解我国的国情,真正掌握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灵

① 参看《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论文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247页。

魂——唯物辩证法。从毛泽东同志编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如何深刻透彻地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如何善于把长期的丰富的革命经验以辩证法的方法科学地综合起来。"同年6月,和培元在《中国文化》上发表《论新哲学的特性和新哲学的中国化》,指出:"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的哲学讲座迄今犹脍炙人口,他的讲授提纲——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一章是最好的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他对辩证法原则阐述之所以那样爽朗、生动、有力,这不仅由于他的文字的流畅易懂,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活的中国革命经验。这就预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次年2月张如心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认为"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论"是毛泽东全部理论和策略的思想基础。文中列举了在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论方面毛泽东的几部主要论著,头一部就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并指出特别是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实践论》最为重要。1943年8月艾思奇著文指出:"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①] 这里说的"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主要指《实践论》、《矛盾论》。

总之,这一时期对"两论"开展了初步的研究,认为"两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方向,"两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论。这些看法是很深刻的。

2. 建国以后至"文化大革命"

第一阶段:1950年至1956年

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干部的头脑,改进思想方法和工

① 《艾思奇文集》第一卷,第698页。

作方法，建设伟大的新中国，为了清除我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各种唯心论和神秘主义的反动哲学思潮，1950 年 12 月 29 日和 1952 年 4 月 1 日《人民日报》先后公开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后分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1、2 卷。我国著名学者艾思奇、李达、胡绳等纷纷著文、作报告，对“两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宣传①。艾思奇、胡绳的文章和报告正确地解释和宣传了“两论”的基本原理并且十分注意这些原理的方法论意义，这对于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李达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是这一时期研究的最高成就。其特点是用分段解说的形式，通俗的语言，丰富的例证，全面准确地解释“两论”，在解说的过程中，既忠实于原著又有创造性发挥，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和毛泽东的赞许。

在青年和学生中影响较大的是李琪的《〈实践论〉解释》和《〈矛盾论〉浅说》两本小册子。它们通俗地解答了读者在学习“两论”过程中提出的许多疑难问题，并且批评了某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正确的认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中国青年出版社重印了 10 次，累计印数达 50 余万册，日本朋友还相继把它们译成日文出版。此外，1954 年北京出版的张如心著《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贡献》，从理论上对“两论”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建国初期对“两论”的宣传和研究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风，促进了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帮助了干部和知识分子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实际工作和学术研究；同时对“两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如认识发展过程、感性和理

① 艾思奇的诸多文章、报告见《艾思奇文集》第 2 卷；胡绳的文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见《学习》杂志，1952 年第 6 期。

性与巴甫洛夫的两种信号系统之间的关系、同一性的含义等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缺点是这一时期的成果中,解说、注释、宣讲性的多,理论性的研究较少;出现了某些教条化倾向。

第二阶段:1957 年至 1966 年

这一阶段,"两论"的研究和宣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农兵学哲学运动中"两论"的普及工作;二是理论工作者所作的"两论"辅导报告,编写的党校、高校哲学教科书,以及有关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学术讨论中。

1958 年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主要是学习《实践论》、《矛盾论》,联系思想、生产、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进行讨论。一些理论工作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系师生,下乡下厂与工农同劳动同学习,给予必要的辅导。这个运动持续了数年之久,广大工农兵群众发表了许多应用"两论"的思想解释生活与工作中的复杂现象、总结实践经验的好文章。中国乒乓球队的徐寅生、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木工青年突击队长李瑞环等的成果最为突出。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大庆油田的开发和管理也是靠"两论"起家的。这一运动对于破除哲学的神秘感,促进哲学的解放,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也出现了贴标签、简单化、庸俗化的不良倾向,甚至被引导到为"大跃进"、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做宣传、造舆论的错误方向上去。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艾思奇在中央党校等许多单位多次作学习"两论"的辅导报告,写过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的文章,并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其研究成果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①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1983 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 见《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60年代初李达根据他30年代的哲学专著《社会学大纲》重新改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对“两论”的思想作了深刻的论述和发挥,尤其是对唯物辩证法各个规律和范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很好的见解,既肯定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地位,又维护了辩证法多方面的丰富内容。

我国哲学界1958年至1962年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1964年至1965年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对于如何理解《实践论》所阐明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如何理解《矛盾论》所阐明的对立统一规律,提出了一些值得考虑的问题,如精神和物质如何转化、矛盾同一性的含义及形式等等,但这些讨论很快被引向了政治大批判和政治迫害的歧途。

第三阶段:1966年至1978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践论》变成了“唯意志论”,《矛盾论》变成了“斗争哲学”,“两论”的学习和研究被推向了形式主义和庸俗化的顶峰。这段期间“两论”的学习和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曾提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注意基本理论的学习。人民出版社根据这一精神约请武汉大学哲学系和鄂城钢铁厂工人理论组根据李达生前所著的“两论”《解说》,重新编写了《〈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分别于1977年、1978年由该社出版。新的“两论”解说继承了原解说的通俗、准确的优点,对一些问题有所深化,但由于受形势的影响,有明显的“左”的痕迹。

3.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粉碎“四人帮”以后,通过拨乱反正,特别是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两论”的研究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轨道,进入了发挥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时期。这一时期是“两论”研究中最富有生气、成绩最为显著的时期。无

论是在研究的态度、研究的视野，还是研究的方法和内容方面，与过去相比，都有较大的进展，其表现是正确处理了研究中政治和学术的关系；从单一的、封闭半封闭式的研究开始转向开放式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研究；内容方面也作了一些新的开拓和探索，如开拓了“两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与苏联30年代哲学的关系、与现代科学的关系、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关系、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等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对“两论”的一些重要原理，如实践范畴、真理标准、认识阶段，以及矛盾概念、矛盾系统、矛盾发展的过程、矛盾的结合方法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这一时期，直接与“两论”有关的研究成果甚多，专著有十几本，论文上百篇。有影响、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杨超的《唯物辩证法的若干理论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1982年改名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再版）、宋一秀等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革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雍涛等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以后修订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大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许全兴等的《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石仲泉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出版）、毕剑横的《毛泽东与中国哲学传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黄楠森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6、7卷（北京出版社1989年出版）、庄福龄主编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蒋照义等的《中国革命与〈矛盾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主要论文有龚育之的《从历史决议谈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实践论〉三题》（载《在历史的转折中》，三联书店1988年出版）、石仲泉的《〈实践论〉、〈矛盾论〉——时代精神的哲学反思》（载《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出版）、汪澍白的《〈实践论〉、〈矛盾论〉

与中国哲学传统》(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7 年出版)、雍涛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不容歪曲》(载《毛泽东哲学思想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出版)等。

二、"两论"研究中的若干热点

1."两论"的写作、流传和出版问题

关于"两论"写作的时间、修改、发表情况,国外一些研究者出于各种动机,从 60 年代到 70 年代散布了种种迷雾,引起长时间的争论。他们怀疑"两论"是 1937 年的作品,甚至断言它们是 1950 年和 1952 年写的。其论据是,在这以前,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和党的文件集里都没有收过这两篇文章,中国理论家们的文章里也都没有提到这两篇文章。

我国的研究者根据延安时期老同志的回忆和掌握的确凿材料,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和澄清。他们指出:1937 年 4 月起,毛泽东应抗大邀请讲授哲学,课程总题为"辩证法唯物论",并印发了他编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为该提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是 7 月份讲授的,《矛盾论》为该提纲的第三章第一节,是 8 月份讲授的。现在查找到的《讲授提纲》,最早的是封面有"1937 年 9 月印"的油印讲义,但没有署作者姓名,这两节是展开论述了的,其他各节都很简短,讲义末尾注明:"论矛盾统一律完,1937,8 月 7 日"。油印本流传开来以后,1938 年曾在《抗战大学》杂志(广州发行的半月刊)新哲学讲座专栏内分期连载,并标明"毛泽东主讲"。此后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40 年)、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2 年)、上海中国出版社(1946 年)等都公开出版过,有的署了"毛泽东著",有的没有署名。如前所述,我国学者张如心 1942 年曾在延安出版的党中央报纸《解放日报》上著文

指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八路军杂志社出版)”,“特别是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实践论》”,是毛泽东关于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论方面的重要论著之一。至于解放前各种版本的毛选和党的文件集未收这两篇文章,是因为没有经作者审定而正式发表过。“两论”确实为1937年所作。①

至于1950年和1952年分别发表的“两论”同1937年的原印本相比,是否保持了原貌的问题,我国学者作了认真的研究,弄清了修改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实践论》修改不多,涉及内容方面的,主要是增加了一段文字,删去了一段不甚确切的话;此外只是作了个别文字上的增删、变动和修饰。《矛盾论》则作了较多的修改。为此,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本篇的题解专门作了说明。作者的修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删去了由于受苏联30年代哲学的影响而把形式逻辑当做形而上学加以批判的段落,即原印本中的第二节“形式论理学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二是增补了一些新内容、新论点,如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新陈代谢规律、矛盾的同一性对于共产党人的方法论意义等;三是将原来的思想表述得更为准确,例子叙述得更加完整。② 这种修改既保持了原貌又表现了作者的科学态度和负责精神,毛泽东希望把他的著作用自己所能达到的最完善的形式贡献给读者。

2.“两论”的理论来源问题

第一,“两论”与马列原著的关系。

国外有人认为“两论”纯系中国的产物或以中国传统文化来源为主体而涂上了一层薄薄的马克思主义的“光圈”而已,它们不

① 参见龚育之:《〈实践论〉三题》,载《在历史的转折中》,三联书店1988年版(下同),290—292页。

② 见许全兴等:《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28页。

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国内的研究者研究了《实践论》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思想渊源关系，认为《实践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和能动性的唯物主义发挥以及重要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思想；列宁关于实践标准和认识发展的辩证途径以及真理论的思想。《矛盾论》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哲学笔记》的关系更为密切。毛泽东讲话、写文章一般很少直接引证马列的原话，而《矛盾论》直接引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的原著多达十余处，它继承了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并作了独创性的说明和发挥。可见“两论”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们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

第二，“两论”与30年代苏联哲学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两种不正确的态度：一种是讳言“两论”利用了30年代苏联哲学的积极成果，担心承认这一点就会贬低“两论”的意义；另一种是抓住“两论”吸收了它的某些成果，指责“两论”是30年代苏联哲学的抄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有的研究者通过研究，澄清了一些问题；1988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提供了最直接的原始文献资料，把这一研究引向深入，使“两论”与30年代苏联哲学的关系得到了较为客观的解决。

有材料表明：毛泽东在写作“两论”之前，阅读过苏联30年代的一些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并作了大量的批注。《毛泽东哲学著作批注集》载有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研读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和雷仲坚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以下简称“西氏本”）和1937年以前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以下简称“米丁本”）的批注。毛泽东在“西氏本”中写下了一万两千多字的批语，并从

头至尾作了圈点和勾划。其中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文字最多。“米丁本”的批注约两千六百多字,从内容上看,批注最多的是对立统一规律问题,占批注文字的一半,其次是对认识论问题的批注。这说明,毛泽东研究的重点仍是矛盾问题和认识论。通过对这两本书及其批注与“两论”对照,可以看出,他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时,曾利用过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的思想资料,吸收了“西氏本”和“米丁本”中论述的观点和列举过的事例,其中不少观点及其分析使毛泽东很受启发,他以自己的方式吸取了其中一些有见地的思想。[①] 否认这一点,不是科学的态度。

但是“两论”并非抄袭或苏联教科书的中国版。研究者石仲泉指出:“两论”的主旨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对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进行总结,批判危害中国革命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在作哲学分析时,“两论”借助了苏联教科书,某些观点脱胎于苏联教科书,但它又是不同于苏联教科书的独立的科学著作,它在总体上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精神,体现了实践性和革命性的特点,具有理论的恢宏气度。同时,由于对中国现实的革命运动进行了理论总结,因而又在一些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作了重大的发挥,表现了自己的许多重要特色:一是“两论”的框架体系比苏联教科书缜密严谨;二是“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现实化的典范;三是“两论”中的许多提法、分析和论述,比苏联教科书明晰、概括、系统和深刻;四是“两论”在吸收苏联教科书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如两个飞跃,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认识运动的总规律;

① 见石仲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8 年版(下同),第 27—28 页。

以及矛盾的普遍性的科学概念，矛盾特殊性的五种情形，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转化，关于事物矛盾的精髓等等。所以“抄袭论”是站不住脚的。①

第三,“两论”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

有一种观点认为,“两论”的性质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因此它只能从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而来。许多研究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两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对中国优秀哲学遗产和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

早在50年代,李达在《〈实践论〉解说》中就指出:《实践论》是知行关系的唯物辩证法。中国以前的各种知行学说,在《实践论》之中被扬弃了,它们的消极成分已被废弃,它们的积极成分是被保存着,并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发展了。在这个意义上,《实践论》是中国数千年来知行学说的科学总结。冯友兰也曾写过一篇文章,认为《实践论》发扬了自古以来的、认识论上的、唯物论的传统,解决了中国哲学的知行关系问题。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论者提出“两源说”,即“两论”不仅渊源于马列,而且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内在的联系。汪澍白认为,《实践论》虽然没有征引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但却多次直接使用“知行”这个中国哲学史上习用的哲学范畴,字里行间更明显地看得出它批判和继承古代知行学说的痕迹。《矛盾论》也融入了我国古代辩证法的宝贵遗产。“两论”“既凝炼着革命斗争的宝贵经验,又融化了中国哲学文化的丰富遗产。没有这两方面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在中国落脚生根,也不可能在革命实践

---

① 见石仲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导论》,第29—42页。

② 冯友兰:《实践论——马列主义的发展与中国传统哲学问题的解决》,载《新建设》1951年第3卷第6期。

中发挥那么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①毕剑横则明确主张"有主次的两源说"，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两论"的主要理论来源，其次才是中国哲学遗产。②

另一种相反的观点是，"两论"完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是落后的、过时的东西。这种观点国外早已有人提出；国内则表现为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诬蔑毛泽东思想是所谓"封建化、儒家化的思想体系"，他们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以及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文献的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翻版，其基本思想是儒家的"伦理中心主义"。有的论者已著文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③

第四，"两论"与现代科学的关系。

有一种观点认为，"两论"是建立在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基础之上的，已为现代科学所超越。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有的研究者指出，对牛顿的经典物理学进行哲学批判，可以说是"两论"形成的科学前提。在"两论"思想形成过程中，毛泽东借助现代科学的成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批判了牛顿把空间看做空架子、物质被安置到这种空架子里去以及把时空看成绝对不变的东西的机械论观点。毛泽东的矛盾学说是以现代科学的物质结构理论为基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矛盾论》中，他把阳电和阴电的对立统一，列为物理学所揭示的矛盾。他还批判了牛顿的运动外因论，并以现代科学为基础，提出了要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去寻找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的思想。当然，不能说毛泽东是一个自然

① 汪澍白：《〈实践论〉〈矛盾论〉与中国哲学传统》，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0页。

② 见毕剑横：《毛泽东与中国哲学传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③ 维涛：《毛泽东哲学思想不容歪曲》，载《毛泽东哲学思想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136页。

科学素养很高的人，但他对自然科学却是非常关心的，正因为如此，他能及时了解现代科学的发展状况，自觉地把现代科学的成果作为自己哲学的科学基础。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出现使《实践论》过时了，贝塔朗菲的"系统论"使《矛盾论》过时了，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有的论者通过分析比较指出：皮亚杰的"同化"概念不能取代《实践论》的反映概念，"活动"范畴不能取代实践范畴；系统论中系统由诸多要素组成和所谓"中心化"原理，以及系统与环境的关系，并没有否定《矛盾论》的矛盾普遍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等原理。正确的态度是分析、提炼、吸收这些现代科学的新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两论"的基本思想。①

3."两论"的历史地位问题

50年代初，"两论"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发表和收入《毛泽东选集》以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它，研究它，评论它，成为"中国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苏联对"两论"的评价，经历过历史性的变化。60年代以前，苏联理论界普遍认为，"两论"继承了马、恩、列的哲学思想，同时用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于1950年第23期全文译载了《实践论》。1950年12月2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的编辑部文章，指出："毛泽东这一著作的特点是对复杂的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叙述的形象性和鲜明性结合在一起"，"作者全面地考察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并论证和发展了每一个原理。"《布尔什维克》杂志1952年第

① 维涛：《毛泽东哲学思想不容歪曲》，载《毛泽东哲学思想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136页。

9、10 期刊登了《矛盾论》,但由于斯大林否认对立面之间的同一性,不同意《矛盾论》中有关同一性的观点,刊登时他们把原文中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同一性”改为"互相联结",把另外一些地方的“同一性”改为“统一性”,该杂志没有就《矛盾论》发表评论。然而许多学者仍对《矛盾论》给予高度评价。60 年代中苏关系发生急剧变化之后,苏联理论界为了适应苏共领导政治上的需要,对“两论”采取非科学的态度,作出了和 50 年代完全相反的、是非颠倒的评价。他们说《实践论》是从 30 年代苏联教科书中抄来的,而且一经进入毛主义的公式就变了样;说毛泽东对实践作了实用主义的解释,《矛盾论》对矛盾作了形而上学的理解,对同一性的阐述是彻头彻尾的相对主义等等。80 年代初,他们停止了攻击。

日本学者研究“两论”很有成绩。1952 年日本《思想》杂志连载法政大学文学部教授松村一人的《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长篇文章,认为“毛泽东的《矛盾论》(以及《实践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它不仅仅是马列主义哲学具体地应用于中国革命的特殊实际,并具有中国民族的形式,而且还具有国际意义。”另一位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在其所著的《毛泽东的哲学》一书中,认为《实践论》所提出的三种实践形式,是毛泽东的独创,并指出,实践是社会的实践的提法,是把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明显区别开来的标志。当然,也有的日本学者对“两论”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两论”不过是 30 年代苏联哲学加若干中国革命的历史运动的实例而已。

西欧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分为“左派”、“保守派”和“自由派”,他们对“两论”的评价各不相同。这里只提一提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康福斯和美国“自由派”学者霍勒布尼奇的评论。康福斯在 1951 年 11 月出版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一书中指出:毛泽东的《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重要贡献。在

1956年出版的俄文本中他又说：毛泽东的《矛盾论》对矛盾特殊性"这个概念作了现时的马克思主义著述中最为完备的探讨。"霍勒布尼奇1962年9月在西德一个刊物上发表的《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说：《实践论》、《矛盾论》"不论是从文体还是从哲学内容方面，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多数同样的著作相比，都不见逊色"，"它们都是既短小而又简洁，既丰富而又透辟，更主要的是那样完整和明晰。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许只能把它同马克思那篇有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来相提并论"。他的这种评论虽然不尽恰当，但具有某种客观性。

国内的研究者对"两论"的评价也有过拔高和贬低的倾向。经过学习"历史决议"和对"两论"的深入研究，绝大多数认识比较一致。1981年10月龚育之在全国第一次毛泽东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上指出："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中的多数论点，是马恩列或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所已经提出过的，不能轻易说是他的创见。但毛泽东在哲学上确有非常重要的独到之处。""就'两论'对中国革命经验从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上所作的深刻的哲学的总结而言，就'两论'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种在中国革命（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造成过巨大危害的错误倾向所作的透彻的哲学的批判而言，就'两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根本原理的阐述的完整性、明晰性和创造性而言，就'两论'的那种为哲学著作所难以达到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形式而言，就它们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中所起的作用而言，就它们后来随着中国革命的影响而在世界人民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言，'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应该属于最重要著作的行列。"①庄福

① 龚育之：《从历史决议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载《在历史的转折中》，第16、26—27页。

龄主编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史》认为:“两论”是对30年代新哲学论战的理论总结;它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主导地位;提供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宝贵经验。这些对“两论”的科学价值和历史地位的概括和总结,是公允的、实事求是的,已为我国哲学界所共识。

三、对今后研究的几点意见

半个多世纪的“两论”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还有许多不足之处。笔者以为,今后的研究要把坚持和发展结合起来,要提高研究水平,回答新问题,迎接新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两论”的基本思想推向前进。

1.加强“两论”基本范畴、基本原理的研究

当前要特别重视实践范畴、矛盾概念的研究。拿实践范畴来说,目前国内外关于认识论和历史观中许多问题的争论,都与对实践范畴的理解有关;攻击、否定《实践论》,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挑战,也多从实践范畴人手。我们应当把《实践论》同《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论持久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以及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等论著联系起来,对毛泽东关于实践的含义、本质、特征、形式、结构、层次和实践的主体,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作深入的研究,以便同实用主义、南斯拉夫实践派、“西方马克思主义”、萨特存在主义以及国内的“实践本体论”等形形色色的实践观划清界限,保卫实践范畴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阵地,并使之向前发展。毛泽东的矛盾概念是《矛盾论》以至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基石。我们应当从矛盾概念入手,深入研究辩证矛盾的实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性和相对性,把握矛盾问题的

精髓，以便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哲学中否定客观矛盾的“辩证法非本体论化”，主张“原则同格”的“主客体辩证法”，抛弃对立统一、主张绝对否定的“否定的辩证法”等等划清界限，保卫和发展唯物辩证法。关于毛泽东矛盾概念的研究，笔者以为，美国学者弗朗西斯·苏的《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一书，有许多可取之处。[①] 国内研究者的文章，如周抗、李君如的《评毛泽东的矛盾观》[②]、肖诗美的《毛泽东的三种矛盾概念》[③]等为我们的深入研究作了良好的开端。

在当前讨论“实践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有人借批判“实践本体论”的名义，把毛泽东说成是“实践主义的最大集成者”，认为“两论”把实践主义哲学推向了最高峰，要“从体系和基础方面”加以批判。其主要论据是，《实践论》企图用实践去包揽一切，把认识的来源从感觉经验缩小到个人的实践，不承认人类的理性知识；《矛盾论》把世界的统一性归结为矛盾，断言矛盾即是事物，即是过程，即是思想。结论是“两论”是一种直观的范围狭小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必然走向唯心主义。[④] 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其错误的理论根源同样是歪曲了毛泽东的实践范畴和矛盾概念。笔者认为，毛泽东所讲的实践，决不局限于个人的狭隘实践，更主要的是强调群众的实践、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阶级政党的实践；人的认识的确来源于感觉，但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获得感觉经验。毛泽东在《实践论》及其他著作中，专门论述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问题，解决了个人知

---

① 见弗朗西斯·苏：《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13、124—125 页。

② 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5 年第 2 期。

③ 载《武汉大学学报》1990 年第 4 期，

④ 见《实践主义批判》上卷（征求意见稿），1988 年铅印。

识和整个人类知识的关系问题。他的实践范畴是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之上的,“实践第一”是以物质第一性为前提的。毛泽东的矛盾概念也是以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为前提的,它首先是一个实体范畴,然后才是关系范畴,“关系”存在于“实体”之中,而矛盾则是事物本质的最高表现,因此他说,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矛盾的,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之中,所以得出了矛盾即是事物、即是过程、即是思想的结论,这是完全正确的,哪里是什么“实践主义”、唯心主义呢?! 可见,关键还是对实践范畴和矛盾概念的正确理解。

2.充分发挥“两论”的方法论功能,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哲学研究和哲学论证

“两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但重点在方法论上。我们要加强对它们的方法论研究，用以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当前要用“两论”的方法论思想，回答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性问题；应联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从当今时代的变化，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和落后国家的特殊国情与面临的国际环境，开展深入的研究，回答人们思想上的困惑与问题。《实践论》关于再认识的思想，《矛盾论》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我们应以它们的方法论深入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研究当代中国的国情体系和社会主义社会以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两类矛盾为主要内容的矛盾体系，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哲学依据。此外还要研究“两论”的基本原理应用于实际的中介理论和中介方法，解决“过河”的“船或桥”的问题，写出毛泽东方法论思想的专著。国内学者陆剑杰的文章《毛泽东矛盾方法论体系探析》、《矛盾

学说的中介原理与中介方法》[1]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3. 开阔研究视野，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平

“两论”的研究既要面向现实，又要面向世界，要摆脱封闭、半封闭的状态，转到开放性的研究轨道上来。为此，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坚持运用理论和实际统一、逻辑和历史一致等传统方法外，还应有分析地引进国外学者某些好的研究方法，如“反映综合法”、“动态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等，以便提高研究水平。

（原载石仲泉主编：《毛泽东研究述评》，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

① 《毛泽东思想研究》1989 年第 3 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1 年第 4 期。

《实践论》、《矛盾论》的当代哲学意义

——纪念“两论”问世60周年

《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问世已经60周年了。在世纪之交的今天,从哲学史和文化史的高度来认识“两论”的当代哲学意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它对于中国哲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两论”的“双重文化性格”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提供了文化转换中介

“两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从文化层面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包括了作为文化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两论”具有“双重文化性格”。所谓“两论”的“双重文化性格”是指,《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属性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具有中国传统哲学的性质,离开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准确全面地理解“两论”的本质特征。

“两论”首先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1937年毛泽东在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时,就明确指出: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

自己的哲学遗产而来，而是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来的。然而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又必须清理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事实正是如此。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潮代表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在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分析中国国情，提出中国革命新道路，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过程中，研读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谈谈辩证法问题》以及苏联哲学教科书——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介——之后问世的。从决定哲学理论思想特质的细胞——概念、范畴来看，“两论”的概念、范畴如实践、认识、对立统一等等，也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致的。所以，“两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是确定无疑的。那种把“两论”看做是中国古代哲学的自然延伸，否认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属性的观点是错误的。

然而“两论”又确实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精神。首先从致思趋向来看，《实践论》以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为核心来建构整个认识论体系，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唯物主义”精神的体现，而且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注重知行关系致思趋向的反映，由此形成了《实践论》从宏观上研究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研究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特点，从而有别于注重逻辑推演和思维规律的精研发微的西方认识论。《矛盾论》以矛盾学说为中心，以个性共性的关系为红线建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这一方面是受列宁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同以“阴阳”范畴、“一两”关系为中心的中国辩证思维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由此形成了从整体直观上简捷有效地把握事物运动变化趋势的特点，使辩证思维带有较多的经验和实用性质，从而有别于重概念、范畴的逻辑推演、长于理论思辨的西方辩证法。其次从思维方式

来看,《实践论》受中国传统哲学高扬道德意志的能动作用的思想影响较深,因而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矛盾论》受中华“和合”文化思想影响,主张相反相成、斗争性与同一性相结合。最后从表现形式来看,“两论”继承了中国古代哲学用短小精干的篇幅、简朴的语言、形象的比喻、语录格言式的表达方式来阐明深刻的哲理的传统,形成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从而有别于喜欢用大部头建构庞大体系,惯于用思辨晦涩的语言来表达深奥哲理的西方哲学。

“两论”的“双重文化性格”的确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两论”在文化的深层机制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有机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中的哲学理论融入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智慧,并使之具有中华民族文化形式。这样,展现在中国人面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再是与本民族文化精神传统格格不入的、没有中国文化根基的西洋“舶来品”,中国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时的隔阂、疏离的文化心态由此得到极大的融释,产生了认同感,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文化精神之根衔接起来,有效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时,“两论”所开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通俗化的道路。“两论”既短小又简洁,既丰富又透辟,更主要的是那样完整和明晰,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的思想内容转化为通俗简明的思想方法,不仅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丰富发展的方向,即哲学方法论的方向,而且在实践中使中国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点成为可能,从而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应用的广阔前景。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4页。

其次,“两论”“双重文化性格”的确立,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历史转变。具体表现在:其一是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整体思维质的变革,把古代朴素的整体思维发展到现代的辩证思维水平。中国传统哲学注重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生的整体性、和谐性的把握,但这种整体把握,实质上是一种笼统的直观,而不是精确化分析基础上的综合。“两论”借助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范畴重新诠释和改造中国古代哲学,使其模糊含混的概念科学化、规范化,用逻辑化的实证分析和矛盾系统分析取代了笼统的直观,从而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整体思维质的变革。其二是把非逻辑思维的中国古代哲学提升到严格的逻辑思维的现代哲学水平。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过程,往往不是遵循从感觉到经验,经过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形式而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逻辑思维过程,而是直接诉诸直观和直觉。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缺陷。“两论”是一种建立在现代科学文化基础上注重严格的逻辑思维的现代哲学,它并不排斥直觉作为一种重要思维形式的意义,但它强调科学的理性认识起始于对事物的感性经验,并强调通过对感性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这样一个具体的逻辑思维过程才能达到理论认识水平,这就摒弃了传统哲学思维那种玄而莫测的神秘色彩。其三是将空谈“心性”、局限于道德践履的儒家哲学改造成紧密联系社会政治、经济等实践活动的应用哲学。“两论”以直接服务于现实的社会实践为使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转化为中国人民从事社会改造实践的应用哲学,强调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而克服了传统哲学脱离实际的缺陷,使之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精神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在世纪之交的今天,人们一方面谈论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进一步中国化,如何编写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哲学教

材，以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思考着中国哲学如何与世界哲学“接轨”，走向21世纪的问题。我想，“两论”的“双重文化性格”正好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方向和榜样。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就是要在“两论”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根进一步结合起来，按照中国的实际和特点来运用它，并使之具有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民族形式，如同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邓小平哲学一样。中国哲学的进一步现代化、世界化，就是要像“两论”那样既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又大胆吸收世界哲学的优秀成果，进一步实现哲学主题和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所谓哲学主题的转变，就是要增强主体意识、科学意识，研究人类怎样在和平与发展中走向未来，即哲学研究要以人学为中心；所谓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就是要由简单的两极化观念向系统整体观转变，由封闭半封闭思维向开放思维转变，由经验思维向理性思维转变。这样才能跟上世界哲学发展的步伐，适应时代的需要。

二、“两论”的人学思想为当代哲学研究主题的转换指明了方向

人们提出，世纪之交的哲学研究的主题需要转换，要转到对人的存在与发展、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效应的全面系统研究上来。我完全同意这种看法。其实，以“两论”为代表的毛泽东哲学的主题就是要解决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解决人的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①这句话不仅仅表达了一个具体的理论观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12页。

点，而且深刻反映了他整个哲学的主题思想。拿“两论”来说，《实践论》就是讲人的本性，人的知和行的关系，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性以及人的思想意识对人的行为的指导作用；《矛盾论》就是讲如何分析矛盾，解决矛盾，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改变人的社会地位、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这就是“两论”的人学主题思想。这一点，连一些外国学者也注意到了。例如，法国学者米歇尔·卢瓦指出：毛泽东的全部著作是一种“哲学实践”，是一种改造世界的认识论，目的是要“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和造就一代新人”。①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苏认为，“毛的著作的中心内容就是关于人和人道主义问题（就‘人道主义’这个词是指关于人和人同他人在社会中的关系而言）。毛的著作，尤其是他的辩证法理论的目的，是想通过改变社会结构来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②。

“两论”这一人学方向，不仅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而且符合当今世界哲学的潮流。如前所说，中国哲学不是一种自然哲学，而是一种人文哲学、历史哲学，它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宗旨，是一种对人与人关系的反思，其哲学特质是人文主义的。“两论”的人学方向正是这一特质的表现。当今世界哲学有两个主要思潮：一是人文主义思潮，一个是科学主义思潮。人文主义思潮本身就是人的哲学，科学主义思潮也重视人的思维方式。说到底，二者的共同点都是围绕人、围绕人的主体性做文章。“西方马克思主义”也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所以，世界哲学的致思目标、主题思想是人。再者，从中国当代的现实来说，哲学作为文明的灵魂，它必须服务于时代，反映时代精神，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改造人的

---

① 《〈实践论〉（法文版）前言》，载《外国研究中国》1978年第1集。

② 《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149页。

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已成为当务之急。这一切说明,中国哲学要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必须转换主题,必须全面研究人的哲学,而毛泽东的“两论”恰好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两论”是研究人学的,但“两论”对人学的研究需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向前发展。拿《实践论》来说,《实践论》顾名思义,是要研究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规律,但由于当时的紧迫任务,毛泽东着重研究了在实践基础上的认识论,未能着重研究认识论基础上的实践论,即“改造论”,我们应当沿着《实践论》中的人学方向进一步写出它的续篇《改造论》。毛泽东在《实践论》的结尾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最后落脚到“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①] 这就是“改造论”的基本思想,而这一思想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其实这是《实践论》的精华和归宿。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以往一切旧哲学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而“改造论”就是真正的人论。因为改造论首先必须研究人作为主体的规定性,即人的本质、人的主体结构等等;改造是人的一种活动,即人的行为,如何改造世界,必须研究人的行为动机、机制及其规律。改造客观世界包括改造自然和社会,改造自然是为了达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改造社会是为了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改造客观世界当然还包括改造人。所以,改造客观世界就必须研究人的行为方式。改造主观世界的内容很多,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认识能力和思维方式等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6页。

等，但主要的是指认识能力和思维方式。改造世界以认识世界为前提，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对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的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要随着事物的变化去认识事物，就必须变换思维方式，建立动态的思维机制。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①所以，矛盾理论的内容应分为两部分——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矛盾论》虽然谈到了许多解决矛盾的方法，但终归还是作为一种宇宙观来阐述的。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正向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发展，中国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充分暴露出来，矛盾世界呈现出一幅更加复杂的图景，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可见时代精神要求《矛盾解决论》的产生。同时，随着系统科学的出现，矛盾辩证法必须具有现代形态。矛盾和系统本来具有内在联系，因为矛盾存在于系统之中，没有系统，矛盾也就不存在。《矛盾论》中已经有了"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矛盾"等思想，我们应当进一步吸取系统论的科学成果，写出《矛盾系统论》，与《矛盾解决论》一起构成新的《矛盾论》。这种新的《矛盾论》究其实质而言，乃是高扬人的主体性，重在解决矛盾，所以它还是人的哲学方向，主体性和方法论的方向。

三、"两论"的方法论特征为当代哲学的现实应用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毛泽东在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时曾经明确指出：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04页。

辩证法唯物论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它“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两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但重点是方法论。“两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主要不在于提出了更多的新的哲学原理，而在于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化为普遍适用的方法论，化为党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实践论》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角度，《矛盾论》从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角度论证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为中国革命找到了科学的方法论。从“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来说，它具有“应用哲学”的性质。但从哲学形态上看，它还不是真正的“应用哲学”，而属于理论哲学、基础哲学。

“应用哲学”是当今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它对于实践活动有更为直接的指导作用。我们要进一步发挥“两论”对具体科学和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就必须找到一种“桥梁”和中介，建立起真正的“应用哲学”。这种应用哲学应该具备以下三个特点，即哲理性、中介性、应用性。所谓哲理性，就是指它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对某一学科领域或实际工作中最基本的关系作深入的分析，揭示其最深层次的本质和规律，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是一种哲学理论。所谓中介性，就是指它是哲学与具体科学联系的中间环节，有如由此达彼的桥梁。在理论层次上，它较具体科学高，又比理论哲学低，它所提供的不是总的世界观，不是由总的世界观直接推演出的最高方法论原则，也不是具体的研究手段、计算方法，而是两者之间较为具体的观点和方法。所谓应用性，就是指它更接近具体科学，更接近实践，能够直接指导行动，但又不是提供具体的实证方法和操作技术，而是给具体科学指明方向，给人们以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指导。根据这三大特征建立起来的应用哲学应包括两

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毛泽东哲学的各分支学科，如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毛泽东的经济哲学、毛泽东的艺术哲学、毛泽东的道德哲学、毛泽东的历史哲学、毛泽东的文化哲学等等，在哲学原理与具体科学之间架起桥梁，用以指导各门具体科学；另一方面要把毛泽东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具体化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用以指导实际工作，增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①]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义时曾经指出："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工人阶级。"[②]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说："两论"把哲学进一步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两论"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两论"的基本原理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某些具体观点要在实践中修正，但"两论"的方法论意义却是长久的，与世长存的。

（原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 年第 4 期）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47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311 页。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河

——纪念《论十大关系》发表40周年

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代表作，坚持和发展它的基本思想，对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重大关系，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改革的先声

《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其中心思想是要摆脱苏联模式，改革开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一开头就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①苏联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就经济方面而言，主要是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存在严重弊端，因此要以苏联为戒，进行多方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下同)，第23页。

面改革。

首先是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改革。

所谓产业结构的改革，当时涉及的主要是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问题。在很长的时期内，我们把苏联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和欧美一些国家发展轻工业的道路，看做是两条对立的道路。其实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苏联发展重工业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是靠牺牲轻工业和农业取得的，付出的代价十分沉重。农业长期上不去，市场供应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就是这种做法的苦果之一。一些东欧国家照搬苏联的办法，结果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严重问题。鉴于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毛泽东认为中国不能再走苏联的老路。经过对工农业问题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毛泽东打破了片面注重重工业而忽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模式，主张调整对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些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按农轻重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

这里，重工业内部还有一个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的关系问题，它涉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是更深层次的产业结构问题。苏联的教训是国防工业挤了民用工业，我们在一个时期内也出现过国防工业建设规模过大，要求过急，引起整个工业建设全面紧张的情况。毛泽东通过对苏联和我们自己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国际形势的分析，主张适当放慢国防工业的步伐，加强冶金、机械、化学工业，减少军费支出，以便腾出更多资金用于经济建设。这样一来，各类经济比例就比较好安排了，这是安排十大关系、尤其是前五大关系的重要一环。

生产力的布局问题，主要是指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

中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突出表现在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上。我国的轻重工业约有70%集中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这种不合理的地区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不能充分调动各地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而取得良好的效果。沿海地区工业生产与原料、燃料和消费严重脱节，而内地许多丰富的资源得不到充分合理的开发和利用，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因此，必须改革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缩小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差距，建立均衡的地区经济结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原则：其一是必须加速内地经济的发展。他说：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其二是要充分重视和发挥沿海地区工业的基础作用。他说：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处理沿海和内地经济关系上，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对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认识不足，无所作为，导致地区经济差距愈来愈大；另一种倾向是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地区平衡，限制沿海工业的发展，把力量、资金放在内地，要先进地区迁就落后地区，把沿海和内地拉平。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没有犯大的错误，但有一段时间，对于沿海工业的作用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重视。原因是同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不当有关。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在一段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间。因此，毛泽东要求改变限制沿海工业发展的做法，充分发挥它的积极性。他批评有些同志不敢在沿海搞工业建设，好像战争就要打起来，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论十大关系》中提到的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首先是汉

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正确处理这种关系是协调地区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指出："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民族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要解决这个矛盾，最重要的是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改变经济文化落后面貌。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少数民族地区消灭了剥削制度，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原有基础十分落后，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还不可能彻底改变那种贫穷落后的面貌。毛泽东强调不能因为少数民族地区落后而忽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民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于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农、林、牧业，开发丰富的矿产资源，不仅会提高少数民族物质生活水平，也会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毛泽东十分重视缩小各民族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他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后，不仅是一个地区结构问题，也是影响民族关系和睦的一个重要因素。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族关系十分紧张，原因非常复杂，但民族之间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毛泽东指出："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①

其次是经济体制的改革。

这里讲的经济体制问题，主要是指国家、集体、个人的责任、权利、利益的分配问题，以及国家对经济和其他事业的管理体制问题。

---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4页。

建国初期，我们的经济体制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其特点是高度集中统一。在当时，这种体制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国民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和保证重点建设方面，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其弊端日益暴露出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同时期的许多讲话、著作中已经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思想，其基本思路是责、权、利三结合，经营权和所有权的适当分离，目的是调动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归根到底是生产者的积极性。

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端之一是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责、权、利不统一，不利于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当时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办法，企业收入全部上交财政，支出全部由财政拨款，企业收入多少、能否完成，同自己本身的支出没有关系。这种办法对促进企业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收入，更好地发挥企业增收节支的积极性，有一定的限制作用。职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他们的工资收入不直接挂钩，不利于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出：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必须处理好，基本的原则是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就工厂和工人而言，毛泽东主张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工资要适当调整，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在国家与工厂、企业的关系上，毛泽东认为要处理好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系，一方面要给企业一点独立性即企业自主权，"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另一方面他又反对不讲统一性的独立性，独立性要与统一性相联系。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又提出要给企业以"自治权"，成为公开的、合法的"独立王国"或"半独立王国"。这里，实际上已触及到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适当分离的问题。因为所有权不变，又要有一点独立性，只能是经营

方面的独立性，即企业在政策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自主经营的问题。这个思想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来是很不简单的。在国家与农民、合作社与农民的关系上，毛泽东也批评了苏联的农业管理体制，认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他建议国家的农业政策应以较轻的农业税、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为基调，以避免苏联在国家与农民关系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同时，他认为在合作社收入分配中，国家应与农民共同研究一个更妥当的更合理的比例，确定公益金、公积金、管理费和农民所得的合理比例。

当时经济体制的另一弊端是管理上中央统得过死，地方丧失独立性，同时又存在"条块分割"、互不协调的倾向。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①对于"条块分割"的问题，毛泽东也提出要予以纠正。他还指出，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的发展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

再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新型的政党制度；二是精简党政机构。

1956年4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他在听取第五届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汇报时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1页。

说:我们要搞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又提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建构了一种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多党制,又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的新型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

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内容是精简机构,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他说: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二、开放的前导

《论十大关系》中专门有一节讲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向外国学习”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是后来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前导。

毛泽东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①

为什么要学习外国?毛泽东认为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他指出:“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②正因为别的国家有长处,所以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同时也因为

①②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1页。

我们有自己的短处，所以有向外国学习的必要。其次，学习外国有助于增强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同一时期，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

毛泽东向外国学习的思想是全面的，开放的。他认为外国的一切长处、一切好的东西都应该学习。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学，自然科学和技术更要学。在学习外国先进管理经验方面，毛泽东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有人认为管理有阶级性，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本质区别，不需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经验。毛泽东不这样看。他认为，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不属于根本的经济制度的范畴，无论对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适用的，而恰恰在这方面，中国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落后，需要向他们学习。他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①这里讲的学习西方管理经验，不应理解为只是企业管理经验；就是宏观管理方面，毛泽东也肯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长处。除前面我们提到的它们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经验可以借鉴之外，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论述十大关系时说过："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3页。

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1]可见，向外国学习，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微观管理、宏观管理，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可以学习。

在同一时期的许多讲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向外国学习、对外开放应该是多方面、多渠道的。一是派人到外国包括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习，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2]二是把外国人请进来。他在对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时说：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国不自私自利，中国是一张白纸，你们可以在这张纸上写字，你们的科学和文化可以驰骋在这张纸上。中国人民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各国人民都有份。[3]

如何向国外学习，毛泽东认为，首先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他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这就是说，要分清外国的长处和短处，先进的东西和落后的东西。学习他们的长处和先进的东西，抵制、批判落后的、腐朽的东西。同时要把外国的先进经验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反对一概照搬。其次是要有主见，不要跟"风"。他批评了"风派"思想，指出：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再次，要独创。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还说：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

综上所述，《论十大关系》开创了摆脱苏联模式、独立自主地

---

①②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第488、484页。

③ 1956年9月27日毛泽东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谈话。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行改革开放的先河，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起步阶段客观规律的认识。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一文中进一步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①

三、历史的局限与实践的超越

毛泽东50年代在《论十大关系》等论著中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非常可贵的。但是那时我们进行建设的时间毕竟还短，经验毕竟不足，客观过程的各方面及本质也尚未充分暴露，因而这种探索不能不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在总体上还没有突破以产品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当时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局限于调整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的管理权限，没有抓住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要害问题，因而不能跳出以产品经济为核心的传统模式。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帝国主义的封锁，对外开放也只能是有限制的，基本上仍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由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日益"左"倾，《论十大关系》的思想在以后的实践中也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

同《论十大关系》相比，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了，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变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大大深化了。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现代化建设所遇到的涉及全局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提出了正

①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71页。

确处理“十二大关系”的基本原则。“论十二大关系”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诸如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等等,是《论十大关系》所没有的,表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新的领域,取得了新的进展。“论十二大关系”还明确提出和分析了一个总揽全局的关系问题,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并将其置于“十二大关系”之首,这表明我们党对宏观发展战略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然,“论十二大关系”与《论十大关系》中类似的那五大关系问题,也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新的思想内容。总的说来,“论十二大关系”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产生了一次新的飞跃,《论十大关系》的历史局限已为实践的发展所超越。

(原载《毛泽东思想论坛》1996年第2期)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科学价值和历史局限

一、科学价值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的公开发表,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们先来看看当时和后来的一些反响,然后再作出我们的评论。

当时,有外国评论指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震动了全世界","这篇文章公开刚几日就已成了整个世界注意的中心"①。1957 年 6 月 18 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在一篇社论中说:"这篇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可能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来得大。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完全是在积极地提出新的思想和政策,而赫鲁晓夫主要是消极地贬斥过去。"1957 年 6 月 28 日,英国"一群专家"发表评论文章说:"毛的讲话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一种革新。"法国《世界报》6 月 20 日社论指出:"……肯定地说,共产主义学说在分化,同莫斯科抗衡的北京,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在与日俱增。"②二十多年后,西

① 参看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95 页。

② 转引自萧延中编:《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3 页。

方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对《正处》修改稿发表进行评价时说:"无论从它是共产主义国家'对斯大林主义最彻底的背弃'这一点看,还是从它体现了毛所承诺的极权主义社会的憧憬,他的这篇讲话仍然是一篇给人以新希望的文献。这篇讲话仍然强调说服,而不是压服;仍然提倡对罢工要持克制态度;仍然答应给那些在镇反中被整错了的人恢复名誉;仍然谴责官僚主义。讲话重申了百花齐放以及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①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对《正处》包含的思想有较多的分析和评价。他从《正处》原稿中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中体会出:"毛在1956年末和1957年初的思想当中,暗示在1955年到1956年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人民内部矛盾取代阶级斗争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在5月中旬,由于连续猛烈的批评,毛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正处》不断修改,"毛日益看到到处都是'反共产党和反人民的牛鬼蛇神'"②。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和启发作用。

日本和韩国也十分重视《正处》的学习和研究。日本创建于1968年的毛泽东思想学院把《正处》作为毛泽东的重要原著之一,引导学员认真学习领会其精神实质,目的在于联系日本的实际,解决自己的问题。韩国学者对《正处》也很感兴趣,富丽大学一教授在《新东亚》杂志1993年1月增刊上撰文,认为《正处》(还有《论十大关系》)充分反映出毛泽东的激进主义倾向和理想主义眼光,从而导致了"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③。

---

①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7页。

② 参看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7页。

③ 参看毕剑横等:《国外毛泽东研究述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178页。

《正处》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引起了很大震动，有人反对，有人赞成。例如赫鲁晓夫在《正处》发表后的一次对美国记者的谈话中说，苏联不存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矛盾。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康斯坦丁诺夫甚至说，苏联不存在人民内部矛盾。苏联哲学博士斯捷潘年则高度赞扬了《正处》，指出社会主义的统一并不排斥矛盾。哲学博士祖努索夫指出，毛的报告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如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从来就没有人作过这样辩证的全面分析。报告不仅概括了中国的经验，而且概括了苏联的经验。可惜苏党的领导人在会上还忌讳矛盾。1957 年 6 月 22 日，波兰《人民论坛报》发表的《大家都来读毛泽东的报告》一文中说："这是苏共二十大后第一个根据近年来的问题和经验如此大规模地发挥社会主义理论的尝试。中国的思想和实践的伟大成就中的许多问题使我们活跃起来，引起我们的思想共鸣。"①

我们认为，《正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篇划时代的文献，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创造性贡献，至今仍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1. 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

如前所述，首先承认和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列宁。1920 年 5 月，列宁在读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时，曾针对布哈林"资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制度。……"一语批注道："极不确切。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②但由于列宁经历社会主义的实践太短，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未能展开论述。斯

① 转引自萧延中编：《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3 页。

②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12 页。

大林长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直到 1952 年，才勉强承认，如果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也会发生冲突。毛泽东一方面肯定斯大林这个进步，同时又指出他没有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看做本质的矛盾，也不是当做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①。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建立了系统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毛泽东是第一人。以《正处》为基础，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1)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1937 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②又说："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③阶级社会是如此，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又如何呢？毛泽东认为，同样要用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观点，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他在《正处》中重申："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④他批评

---

① 参看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 年 1 月)。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305、302 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66 页。

在观察社会主义社会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①他还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②他还进一步批评道:“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③这样,他就以彻底的辩证法思想,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无矛盾论。

(2)系统地论述了两类社会矛盾学说、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一是明确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对哲学范畴。如前所述,列宁提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对抗和矛盾的关系问题,斯大林提到了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概念,但他们都未能对此作出精确的、哲学上的规定。毛泽东明确提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对范畴,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经济学的“阶级”范畴、政治学的“敌我”范畴的丰富和发展。列宁的“阶级”范畴基本上属于经济学的概念,毛泽东在“阶级”范畴的基础上提出的阶级分析则扩展了它的经济、政治、思想的内容。由此提出的“敌”、“我”范畴,已不限于经济地位,而且包含了政治

①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6、757页。

③ 毛泽东:《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1957年11月18日)。

态度,已属于革命战略策略问题。"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这对范畴,一方面立足于政治学的"敌"与"我"范畴之上,另一方面又与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这一对哲学范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它们是政治学和哲学范畴的一种结合,处于一般哲学层次与政治学层次之间,可以看做是一种"政治哲学"范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贡献。二是区分了两类矛盾的性质。"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①,是非对抗性的;敌我矛盾则是利害根本冲突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同样,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三是分析了两类矛盾的具体内容以及它们各占怎样的地位。毛泽东指出:敌我矛盾主要是广大人民同某些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分子、某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的斗争。② "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8页。

② 参看《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9—760页。

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①在这两类矛盾中,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主要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敌我矛盾则是少量的、非主要的。四是提出了处理两类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处理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毛泽东指出:"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②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则要用民主的方法。毛泽东指出:"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③在民主这个总原则下,处理人民内部的政治思想方面的矛盾,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处理科学、文化领域中的矛盾,要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处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矛盾,要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即"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等等。

(3)创立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一是确立了"社会基本矛盾"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系统地研究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④,并认为这是他们研究社

①②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8、759—760、76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

会历史的“总的结果”[①]。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他们分别概括出两个基本范畴：“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但他们没有进一步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看做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揭示出两者的相互关系及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毛泽东根据人类社会有机体的“三层楼”结构和历史发展的动力系统，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他在《正处》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②]这就是说，这两对矛盾涵盖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大领域，贯穿人类社会的各种社会形态之中，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样就全面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和发展动力，充分估计到经济、政治、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既坚持了历史唯物论，又坚持了历史辩证法。二是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和性质。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③]同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④]但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②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7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8—769页。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毛泽东举例说，公私合营企业还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有一部分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分配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的某些官僚主义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这些都表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还存在着矛盾。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①的情况，正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又相适应”，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说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相矛盾”，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进一步调整、完善和巩固。这样就既反对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完全适合论”，又反对了“剧烈冲突论”。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时，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②这就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社会主义有自我完善的能力，它的矛盾可以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具体制度的调整和改革不断解决。同时也说明，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人与人之间的表现的人民内部矛盾，也是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利益调整和其他适当方法来解决。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他说：“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

①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8、767页。

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他在这里说了很长的一段话，现在不重复。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具体的研究。但是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①

2. 在社会主义革命史上第一次对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性质作了理论上的说明

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普遍原则。但毛泽东没有教条式地理解这个原则，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把资产阶级区分为两部分——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敌人，对它采取推翻和没收的政策，而对民族资产阶级则作了特殊的处理，始终把它跟工人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对待，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如此，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处》对此作了理论上的说明。毛泽东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下同)，第 181—182 页。

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①]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马克思历来把资产阶级当做革命的对象、革命的敌人，但又多次讲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用赎买的方法即和平的方法来对待它。恩格斯指出："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赎买下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最便宜不过了。"[②]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两面性的政治特性，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定位为人民内部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没有说过的，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也是没有先例的，它是毛泽东和我们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提供了理论根据和合理解释，并指导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消灭作为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任务。

应当指出，关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性质问题，我国理论界在《正处》问世之前是没有解决的。1952 年《学习》杂志上曾发表一系列文章，用"五反"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来否定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着两面性，认为它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性，从而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仍有一定积极作用。毛泽东发现后批评了这种观点，他说："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学习》杂志上有些写文章的同志曾经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已叫他们作了更正。"[③]1956 年 8 月到 1957 年 2 月，《大公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研究》、《新建设》等报刊又开展了"过渡时期中国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矛盾性质"的大讨论。

---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58—75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503 页。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442 页。

有人认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属于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其矛盾性质始终是对抗性的。有的人则说，在过渡时期，我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局部是对抗性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其矛盾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因而具有对抗性；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由于具有反帝、反封建以及发展国民经济的共同利益，又使得它们之间的矛盾具有非对抗性。毛泽东的《正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这一争论的科学总结。他指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具有两面性。在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如果处理不当，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3.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包括中国工业化道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繁荣科学文化的方针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有鉴于我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便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论十大关系》可以说是开了这种探索的先河，而《正处》就是继《论十大关系》之后进行这种探索的又一重要成果。

首先是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我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农业大国。在这样的国家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需要我们独立解决的大问题。毛泽东较早地看到了这一点。1956

年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借鉴苏联的经验来考虑中国的工业化问题。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工业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要实现工业化，必须用辩证的观点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这样做，看起来重工业发展得少一些、慢一些，但实际上会发展得多一些、快一些。他在总结苏联和东欧工业化的经验教训时，既肯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同时又指出他们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结果造成市场上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人民生活受到影响，最后也影响到重工业的发展等错误，要求我们引以为戒。在《正处》中，他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提出了有别于苏联、东欧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新概念。他指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①]毛泽东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其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坚持一个中心，处理好两个关系”，即以重工业为中心，处理好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处理好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具体说来：第一，要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②]。因为只有重工业发展了，才能用先进的机器设备武装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和其他部门，才能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而实现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的转变。第二，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样做，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6页。
②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第三,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毛泽东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①从农业和轻工业的关系来看,"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②。轻工业的大部分原料来自农业,同时,农业既为轻工业提供市场,也为重工业提供市场。总之,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这三个最基本的生产部门的发展关系,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只有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高速度、按比例地协调发展。这一思想后来发展成为按农、轻、重的顺序编制国民经济计划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次是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某些方面的探索。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了要在体制上给地方和企业以一定的独立性即自主权,在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在《正处》中,毛泽东则从生产关系(所有制、分配关系等)的某些方面、某些环节的缺陷上,提出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的问题,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以解决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发展的矛盾;他还提到要研究如何运用国家计划去调节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的问题。在政治体制方面,《论十大关系》提出了"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③的问题,并初步论证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

①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6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33页。

督”的方针。在《正处》中，毛泽东则进一步论证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和政治基础，为我国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基础。他关于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辩证关系的论述为我们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健全民主集中制，促进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最后是提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总结苏联、东欧和我国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正处》中提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他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①这种自由发展、自由争论的方针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纲领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历史局限

《正处》是一部划时代的重要著作，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同时又有它的局限性和理论上的罅漏。

《正处》最大的理论缺陷是回避了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问题，加大了阶级斗争的分量。

如前所述，党的八大根据我国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3—784页。

已经基本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①应该说八大关于当时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论述是正确的。缺点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提法不准确，有语病：一是容易使人误解为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都超越了生产力，然而事实并不如此。二是容易使人误解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很完善了，不存在需要进行调整和改革的问题了。但它的意思是好的，是讲要赶快发展生产，充实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所以在"八大"上毛泽东虽然同意了决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但始终持保留态度。就在"八大"结束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刘少奇说："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刘少奇十分震惊，只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②1957 年 3 月 6 日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毛泽东在谈到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所引起的争论时又说："这一句话在决议中本来已经删去，但给照原样印发了，临开会时才知道。"③3 月 12 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直言不讳地公开批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不准确，理论上不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 年 9 月 27 日)，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4 页。

② 参看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一文，载《新华文摘》1998 年第 12 期。

③ 毛泽东：《在九省市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谈话》(1957 年 3 月 6 日)。

完善。4 月 4 日他在回答如何理解八大提出的主要矛盾与他所讲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的提问时又说:“我们又犯了一个错误。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这是一个错误,怎么纠正,请大家想办法。”①那么在文字上表述准确、在理论上阐述完善的社会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 毛泽东在八大上没有讲,在《正处》这篇专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著作中也只字未提。甚至在《正处》公开发表到八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时间里也没有明确回答。在《正处》中,他只是说: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现在的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即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有的研究者认为,上述提法本身已内在地包括着对主要矛盾是什么的说明,因为主要矛盾就是必须解决的根本任务或中心任务的根据,根本任务或中心任务就是为了解决主要矛盾。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牵强的。因为在当时和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把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二重化了:在《正处》中,他一方面强调主要任务是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经济和文化;另一方面又强调三个方面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还是很激烈的。虽然这时还没有把阶级斗争看做是主要矛盾,但它的分量已经大大加重了。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之后,毛泽东又反复说要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最明显的是 1958 年发动“大跃

---

① 施肇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理论观点的修改始末》,载《党的文献》1991 年第 2 期。

进";1959 年说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但又说反右倾机会主义不要影响了"大跃进";1962 年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又说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了经济工作;以后则是阶级斗争压倒经济建设……

由于缺少对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的明确回答,必然影响到对两类矛盾的严格划分和正确处理。因为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体系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第二个层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第三个层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和其他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社会的性质,是其他一切矛盾的根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解决,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相比之下,两类矛盾只是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从属于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所以,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体系中,在首先解决了基本矛盾之后,只有正确地规定和解决了主要矛盾,才能谈得上进一步解决包括两类矛盾在内的其他各种矛盾。如果把主要矛盾弄错了,或者在主要矛盾问题上含糊不清,就必然会影响到其他矛盾的解决。两类矛盾的划分,具有相对的意义。从广义上说,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而被统治阶级中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内部矛盾。在不同性质的社会形态中,社会主要矛盾和两类矛盾的相互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状况。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主要矛盾也就是两类矛盾中的敌我矛盾。能够认清敌我矛盾,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掌握了主要矛盾。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情况就不一样了。首先,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敌我矛盾了;其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人民内部矛盾,因为人民内部矛盾多种多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满足于"敌我矛盾已成为次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则是大量的"一类论

断，对主要矛盾避而不谈，显然是不够的。而在主要矛盾问题上一旦发生失误，那么不论你主观上如何强调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客观上必然会混淆两类矛盾。

第二个缺陷是两类矛盾划分的模糊性。毛泽东在《正处》中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①]这在原则上说是正确的，但作为划分敌我的标准，仍然显得过于笼统。尽管毛泽东在《正处》中又提出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并说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②]，但这些标准本来是政治生活中判断人们言论和行动的是非标准、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区分"香花"和"毒草"的标准（这本来就是形象性的不精确的概念），毛泽东却把它当做了政治上区分敌我的标准。反右派斗争中，所谓《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就是根据"六条标准"制定的，它本身也难以精确地把握。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谁是人民，谁是敌人，谁是右派，谁是左派，常常以领导人甚至基层领导人的看法和意志来决定。反右派斗争开了"以言治罪"的先例（确切地说，在此之前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早已开了先例），这样，政策就代替了法律，群众运动、群众斗争代替了司法。现在看来，划分敌我只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正因为如此，1997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就将过去沿用的"反革命罪"改为具体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

---

①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57—758、789 页。

共安全罪"[①]。1999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的部分条文，也提到了这一点。就根据事实、依据法律定罪来说，刑事犯罪中特别严重的属于敌我矛盾，而"人民内部"触犯了刑律的人也要"坐班房"，其性质当然与前者不同。1949 年毛泽东自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过："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②]

第三个缺陷是人民内部矛盾视角的狭窄性、测度的单一性。毛泽东主要是从政治思想领域的角度去分析人民内部矛盾，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法；从经济方面考虑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显得不足。《正处》中的"人民内部矛盾"概念，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概念，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主要是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内部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矛盾，知识分子之间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等。所有这些主要是政治思想方面的矛盾，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既然如此，解决矛盾的方法主要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基于过去的成功经验，毛泽东把这个方法绝对化了，以至超出了它所适用的范围。1957 年他说，我们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6 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③] 1962 年他又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惟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④]其实，物质利益上的差别与是非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3—3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476 页。

③ 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64 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18 页。

问题相比，是人民内部矛盾更为深刻的原因，利益关系的调整比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更为重要。许多经济利益问题的解决，不是靠批评与自我批评所能达到的，只有在调整利益关系的基础上，辅之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思想政治工作以至法律手段才能得到解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经济矛盾，忽视了这一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会变成一句空话。当然，在《正处》中，毛泽东也提出过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方针，说到要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国家和合作社之间的矛盾等等，但都未能具体展开，未能提出如何运用经济手段来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原因是毛泽东关心政治思想问题胜于关心经济问题，对政治思想领域的矛盾高度敏感，对经济领域的矛盾则相对忽视。

第四个缺陷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规定的抽象性。毛泽东在《正处》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其基本特点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这种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这一论点是完全正确的。但这种说明过于抽象，并没有找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正处》在谈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时，只承认我国当时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主要是资本家还拿定息；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还是半社会主义的；在各个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需要寻找适当的具体形式。在上层建筑方面也只是提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还存在。没有看到当时的所有制形式、分配形式、消费形式以及上层建筑方面的体制结构已超越了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他往后的思路是越来越认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主要是所

有制公有化的程度还不高，规模还不大，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不断提高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消灭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现“一大二公三纯”；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存在，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党内从基层到中央都有“走资派”，解决的办法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大批判，发动“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是在“某些方面”、“某些环节上”存在缺陷，只要进行“适当的调整”就可以解决问题，不存在体制方面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所以他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①这个论断有它正确的一面，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应转向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不妥的一面是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还有“束缚生产力”的问题存在，还需要通过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靠在原有体制下进行“某些方面”、“某些环节”的调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邓小平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②邓小平通过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如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区分，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具体化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此必须坚持；与生产力发展相矛盾的主要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即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因此必须改革。这种改革不是否定基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也不是原有体制个别环节、个别方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71—77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

面的调整和修补，而是体制的根本变革，具有部分质变的性质，从其对解放生产力的作用、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来说，又是一次革命。这样，邓小平就找到了当前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表现的具体形式——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

（原载《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历史反思》，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主要贡献

毛泽东的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克服了旧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缺陷，创立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毛泽东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他指出："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①毛泽东的这一论述，科学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他强调指出，这种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以唯物地解决意识和存在的关系为前提的；而人们改造世界的活动即实践的观点是它的基本的观点。这样就既坚持了认识论的唯物论，又坚持了认识论的辩证法，同唯心论的认识论和旧唯物论的认识论划清了界限。更为具体地说，毛泽东抓住了意识和存在、主观和客观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论证了认识的任务在于不断地解决这个矛盾，使主观符合客观，进而改造客观；实践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4页。

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基础;"两个飞跃"则是解决这个矛盾的辩证途径;群众路线又是解决这个矛盾的重要保证。从这个基本思想出发,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科学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什么是实践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时虽然没有明确下过定义,但从许多方面为我们揭示了实践的实质和特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实践看做是"感性的人的活动"、"对象性的活动",但这种活动又体现了人的活动的"主体方面"、"能动的方面",并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他批评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①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著作中,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的思想,他把实践看做是人们有目的改造世界的活动,这种有目的的活动又是以自然过程及其规律为基础的。列宁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②他还认为,实践可以理解为人的主观要求和客观现实性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说明和发挥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上述思想,他把实践看做是人"做或行动",明确指出它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是人类所特有的"自觉的能动性"③。这就是说,实践既不是停留在主观范围内的观念活动,也不是其他动物那种适应环境的本能活动,而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的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活动。毛泽东还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56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下同),第22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77页。

一再强调实践是“社会的实践”、“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这样就给实践的内涵以科学的规定，在肯定实践的客观性的基础上突出了实践的能动性和群众性的特点。

关于实践的形式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论述过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把实践看做是科学实验和工业生产。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认为，作为认识论的标准的实践应当包括天文学上的观察、发现等等。

毛泽东根据马列的思想对实践的形式作了明确的概括。他在《实践论》中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但是，“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① 这后一句话常常为人们所忽视，其实应看做是对实践外延的规定。它告诉我们，实践的外延是很广的，它包括人们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但基本的形式是生产活动。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后来又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把科学实验作为一项独立的重要的社会实践，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科学实验这种实践的基本特征，是把自觉的认识任务包括在实践过程之中，它的直接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获得某种物质成果，而是为了探索未知的客观过程及其规律。正是在这种活动中，人们把认识和实践、知和行自觉地统一起来，开始克服了那种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传统偏见，展示了未来人类实践的胚芽。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实验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并且逐渐从自然现象的研究扩展到社会现象的研究。所以，杨振宁博士说：毛主席把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2—283页。

科学实验作为一项重要的实践，意义是很深远的，不仅看到现在，而且看到未来。① 他的这番话是很有道理的。

马克思恩格斯一向把实践看做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础，列宁也十分重视实践的作用，他认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②但马列的这个观点，主要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方面说的。毛泽东发挥了这个观点，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真理的标准和认识的最终目的等方面，全面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他在《实践论》中说：生产活动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③；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又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④。这是因为，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

毛泽东在谈到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时，还阐明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指出就知识的总体来说，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就个人来说，多数的知识还是间接经验的东西，但汲取间接经验要以自己的直接经验为基础。

毛泽东还用实践的观点，揭示了天才问题的本质。在《实践论》中，他曾经谈到"天才条件"的问题；1970 年在批判林彪的"天才论"时，又指出，所谓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这种聪明才智即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也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无产阶级的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而是靠党，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其次，毛泽东说明了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他在《实践论》

---

① 见周培源：《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是科学的旗帜》，1978 年 9 月 10 日《光明日报》。

②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103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283 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39 页。

中指出，社会的生产活动推动着人们的认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后来，他特别强调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制造“认识工具”对推动认识发展的重大意义。他说：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这些东西是人们改造世界的工具，也是认识的工具，人们在使用工具改造世界的同时，认识也就逐步深入。这是毛泽东对实践是认识发展动力的新的说明。强调工具在认识中的作用，就能更好地克服直观的反映论的缺陷，有力地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上，毛泽东所强调的是实践标准的惟一性，强调检验真理要有时间的考验，要从实践的结果来说明，从而发挥了列宁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思想。

在实践是认识的目的问题上，毛泽东所强调的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而精通它的目的全在于运用，批判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二、具体地分析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

关于认识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作专门的论述，但他们在谈到政治经济学和一般科学的研究方法时，实际上谈到了认识的发展过程。列宁对认识发展的过程曾作过简明的概括，他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①

毛泽东发挥了列宁的思想，具体地分析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提出了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原理，即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跃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实践的原理。

在分析第一个飞跃的时候，毛泽东阐明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指出了实现这一飞跃的必要条件，揭露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根源。他深刻指出：教条主义重复了哲学史上“唯理论”的错误，把理性认识绝对化，看重理论而轻视实践；经验主义重复了哲学史上“经验论”的错误，把感性认识绝对化，看重经验而轻视理论；两者都是片面的，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克服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办法是，有书本知识的人要向实际方面发展，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把经验和理论、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结合起来。

在分析第二个飞跃的时候，毛泽东指出了这后一个飞跃较之前一个飞跃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后一个飞跃才能证明前一个飞跃是否正确，才能实现改造世界的任务。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结合着工作方法指出了实现这一飞跃的必要环节。例如：(1)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即把一般理论化为具体的目的，制定出路线、方针、政策、计划、方案、办法；(2)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即通过宣传解释，使这些理论、目的为群众所掌握，成为全体社会实践的参加者的共同观念；(3)一切经过试验，即在大规模行动之前，先通过小范围的试验，取得经验，尽可能地少走弯路；如此等等。

毛泽东在分析了两个飞跃之后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并运用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相互关系的原理说明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发挥了列宁关于真理总是具体的思想，剖析了党内不同政治路线的认识论根源，指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最后，毛泽东继承了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思想，总结了新的实践经验，吸收了 30 年代国内外哲学工作者的理论成果，明确地概

括出认识运动的总规律，这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①这一公式告诉我们，人类的认识过程就是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这对矛盾的辩证运动过程，它们的每一循环，形式上是重复的，而内容上则进到了较高一级的程度，这一过程是无限发展和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永远不会完结。

三、明确地概括了真理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曾经指出，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恩格斯认为，真理和谬误的对立只有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了这个范围，它们就要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② 列宁也说，马克思主义每前进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③ 他们的意思是说，真理和谬误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但他们并没有概括出真理发展的规律来。毛泽东发挥了他们的思想，把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真理论，总结了人类认识史上的经验，明确地概括了真理发展的规律。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6—297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1页。

③ 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

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1]这一概括深化了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指明了真理不仅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而且必定会战胜谬误而向前发展，从而揭示了认识发展过程中一个方面的本质。掌握这一规律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实践中自觉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及推动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正是自觉地应用这一规律，并总结了国内国际思想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党制定了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正确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方针告诉我们，既然真理和错误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而且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时间的考验，那么，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问题就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通过科学和艺术的实践去解决。同时，为了发展真理，科学上的不同学派，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也应当允许自由发展。

四、充分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主观能动性的原理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从唯物主义的立场提出了关于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列宁十分强调意识的能动作用。他指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2]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充分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主观能动性的原理。

首先，他对主观能动性作了科学的概括。在《论持久战》

---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30—231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

中，他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①]这就告诉我们：（1）主观能动性包括思想和行动即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而实践是更重要的方面；（2）主观能动性是人所特有的，是自觉的能动性，它是人们根据一定思想，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3）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正确和错误之分。从实际出发，思想和行动符合客观规律，就是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脱离实际，思想和行动违反客观规律，就是错误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而我们所要发扬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和行动，即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毛泽东还阐明了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一些具体表现，如预见性、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等等，从而大大地丰富了"主观能动性"的内容。

其次，毛泽东阐明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客观物质条件的辩证关系，他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②]又说："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③]他还进一步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77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4、182页。

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①他的这些话告诉我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要以客观物质条件为基础、受客观规律制约的，但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凭借一定的物质条件，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争取工作的胜利。在具备了客观可能性的时候，主观能动性在可能性变现实性中就起了决定性作用。

最后，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人们依据客观规律和客观物质条件，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获得自由。毛泽东在恩格斯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论述的基础上指出，自由不仅是对必然的认识，而且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单有认识还不行，还必须根据这种认识成功地改造世界。他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②这里，他强调了实践的意义，认为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解决。

五、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

毛泽东不仅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把认识论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化为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使认识论走出书斋和课堂，同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独创性的贡献。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87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06页。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这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历史唯物论的群众观点统一起来了。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主体主要是人民群众。领导者要取得正确的认识，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过程就是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革命的实践的过程。这样，"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和"群众——领导——群众"的公式就统一起来了。所以毛泽东强调群众路线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还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②]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经说过："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899、900 页。

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1]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这里，毛泽东又把"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同"个别—— 一般——个别"的公式统一起来了。

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2]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化为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伟大的认识工具"，这就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当然，毛泽东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认识论的真理，他的认识论中有的问题还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地去研究、探讨，同时，他晚年在认识论上也发生过某些失误。但总的说来，他对认识论的贡献是主要的、第一位的。我们要继承这份宝贵的哲学遗产，并努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它推向前进。

（原载《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论文选》，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310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311 页。

关于感性、知性、理性范畴的探讨

随着社会实践和各门具体科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感到需要把认识发展的感性、理性的理论向前推进一步。在对认识发展过程的研究中，人们经常提出以下问题，需要给予科学的回答。比如，经验的认识同感性的认识是不是一回事？人的认识一旦形成了概念，并用这些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就能从事物的全体上，从事物的内部矛盾上把握事物的本质吗？理性认识在其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可以从质上进行区分的小的发展阶段？这些问题都涉及感性、知性、理性的关系问题，涉及知性的主要特点及其在认识发展过程中的地位问题。

把人类的认识区分为三个阶段或三种形式，即感性、知性、理性，是康德提出来的，他是最早明确区分知性和理性的人。康德认为，感性是对象刺激人们的感官而产生感觉的认识形式。知性是用以整理感性材料的先天固定不变的思维形式，它通过判断对零散的感觉材料加以整理，使之带上普遍性。理性是更高级的思维形式，它是关于本质的认识。知性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而理性则要求认识无限的东西，但人们认识无限的东西时却只能使用有限的知性范畴，因而必然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由此他得出结论：人们只能认识现象，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这当然是一种不可知论，但他把知性和理性区分开来，指出知性的局限性，并把矛盾看做是理性思维的本性，反对滥用理性，却包含有辩证法的思

想。黑格尔批判地继承和发挥了康德的思想。他肯定了知性和理性的划分，阐明了二者的特点和它们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他认为，知性对感觉材料进行概括，找出普遍性的东西来，但这种普遍性乃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是与特殊性相分离的东西。知性的特征是坚持固定分明的界限，它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抽象的同一性即形式逻辑的同一律。而理性的特征则是融解知性的抽象的普遍性，把对立双方统摄于自身之内，扬弃固定分明的界限，它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对立统一规律，是具体的同一性。但是，知性在认识过程中还是有它的作用的。“没有理智，便不会有坚定性和规定性。”①这里讲的理智，也就是知性。然而知性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是有用的，超出这个范围，就会陷入形而上学。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知性，而要到达于理性。当然黑格尔的这些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肯定了黑格尔关于知性和理性相区别的思想。他指出：“**知性和理性**。黑格尔的这一区分——其中只有辩证的思维才是理性的——是有一定的意义的。”②即知性思维是有局限性的，只有辩证思维才能真正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才能达到真正的理性。

知性和理性的区分也是符合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的。儿童和早期人类思维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类思维能力经历了从知性思维能力到辩证思维能力的发展过程。科学发展史表明，概念由“抽象概念”向“具体概念”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认识由知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从古典力学到近代的相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从欧氏几何学到非欧氏几何学，从形式逻辑到辩证

---

①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17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31 页。

逻辑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类思维由知性发展到理性的缩影。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知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的一个客观的存在。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不但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分，而且在理性认识阶段还有知性和理性（狭义）之分，它们在反映事物的深刻和全面的程度上存在着差别，因而使理性认识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来。认识不但要经过这一知性认识阶段，而且必须克服知性认识的局限性，才能完成整个理性认识所要完成的任务。研究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具体地了解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是怎样实现的。

注意知性和理性的划分对于我们实际工作也有指导意义。过去，我们讲认识论往往把知性这一范畴完全摒弃了，把知性和作为思维的高级形式的理性混淆起来，因而陷入形而上学的错误。例如，我们常常满足于罗列一些现象，对事物的外部特性进行比较分类，然后概括出几个字或几句话，以为这样就把握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并以此到处乱套，给工作造成损失。这实际上是把知性的认识当做了最终的认识，把对经验事实的描述当做了普遍规律。可见对知性和理性作适当区分是很必要的。

我们认为知性范畴不可忽视，但不赞成把知性同感性、理性并列起来，作为认识过程发展的一个独立阶段，知性应包括在整个理性阶段即“抽象的思维”阶段之中。因为知性已经超出了感觉、超出了“生动的直观”，已经在进行概括、判断，已不属于感性阶段，而属于理性阶段，但它又还不能辩证地、深刻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因而只能是理性认识阶段中的一个较低的层次，而不单独构成一个阶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把认识过程的前一半分为感性和理性两个阶段，是正确的。问题是要对理性阶段的层次、环节作进一步的分析。马克思关于“具体——抽象——具体”的提法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方向。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实际上

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他说："当我们观察一件事物时，第一步的观察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好比一个初来延安的人，开始他对延安的认识只是一般的、笼统的。可是当他参观了抗大、女大以及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之后，他采取了第二个步骤，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的研究和分析。然后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这时认识的延安就与初来时认识的延安不同，他开始看见的是整个的延安，现在看见的也是整个的延安，但与开始的了解不同了，现在他对延安就有了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①这就是说，第一步是感性认识，第二、三步是理性认识，其中就有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问题，这是理性认识阶段的进一步深入和展开。过去我们对这一点研究不够，不注意理性认识中抽象概念和具体概念的区别，不重视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因此有简单化的毛病。今后应该进一步探讨，把认识过程的理论进一步向前推进。

（原载《毛泽东哲学思想大纲》（修订本），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3—24 页。

关于认识总公式的几个问题

一

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引入认识论，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创立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后来，列宁又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作了深刻的发挥。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考察了人们认识发展的具体过程，总结了人类认识运动的历史经验，把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概括为一个总公式，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①简单地说，“实践——认识——实践”，就是人类认识运动的总公式。

“实践——认识——实践”这一公式，揭示了认识运动的基本矛盾。认识运动就是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矛盾运动，就是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发展过程。“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集中体现了认识过程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集中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在认识和实践的矛盾运动中，实践是基础，它为认识提供源泉、动力、目的和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决定和支配着认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6—297页。

识的全过程；另一方面，认识对于实践又有巨大的反作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决定作用，理论指导实践，推动或阻碍实践的发展。

“实践——认识——实践”这一公式说明了人们对于一个具体事物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说明了“再认识”的重要性。人们通过实践可以认识真理,但由于受着各种条件的限制(立场、观点、方法的限制,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等等),这种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往往需要通过不断地实践来修改原来的认识,才能逐渐接近真理。这就是说,人们既要不断地再实践,也要不断地再认识。这里所谓“再认识”,就是认识的连续的和不断更新的过程。它不仅包括认识的纵向深入和横向扩展,也包括纠正错误的认识,增加新的认识,代替过时的认识。从认识的秩序来说,由个别到一般,有“再认识”的问题,由一般到个别,也有“再认识”的问题。“再认识”是认识事物的一条普遍规律。

“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还告诉我们,认识过程是螺旋式上升的无限发展过程。实践和认识的矛盾运动不是封闭式的循环,也不是直线式的前进,而是螺旋式的上升运动。实践产生认识,认识指导实践,让会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次地得到深化。这是一个对立面互相转化、由量变到质变和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从形式上看,是实践和认识不断分离又不断重合;从内容上看,则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进到高一级的程度。这种循环往复是川流不息,永无止境的。因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

从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实践——认识——实践”的循环往复，正好相当于控制论中的负反馈调节原理（减少受控量的

实际值和期望值之间的偏差，使系统趋于稳定状态），它反映了人们用负反馈调节原理认识真理的过程。在“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中，从前一个实践到后一个实践，用认识论的话说，是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的过程；用控制论的话说，则是从实践的输出端向输入端反馈，以便调节实践实现目的的过程。我们把实践的结果同依据认识所引出的预期目的相比较，也就是说，将输出信息与输入信息相对照，如果预期目的与实践结果有差距，那么，就应该通过反馈来修改我们的主观认识，使预期目的和实践结果的差距缩小。只要我们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比较，不断地修改主观认识，不断地缩小差距，我们就能不断地逼近客观真理。

可见，毛泽东提出的认识总公式是认识运动规律的科学概括，是符合人类认识发展史和现代科学知识的。

二

国内外有些研究者曾指责“实践——认识——实践”这个公式是片面性的简单化的公式。他们说，实践和认识是同时发生、互相渗透的，没有实践，不可能有认识，同样，没有认识，也不可能有实践。“实践在先，认识在后”这样的循环往复，在人类的实际认识活动中是不存在的。我们认为，这种指责是似是而非的，站不住脚的。

第一，实践和认识的确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实践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认识的过程。但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东西，仍然是有区别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人们可以把它们从联系中抽象出来，分割开来，加以考察。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从来造成困难的总是思维，因为思维把一个对象的实际上联结在一起的各

个环节彼此分隔开来考察。”对此，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写道：“对！”“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糙化，不加以割碎，不使之僵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思维对运动的描述，总是粗糙化、僵化。不仅思维是这样，而且感觉也是这样；不仅对运动是这样，而且对任何概念也都是这样。”[①]这就是说，任何描述运动的科学公式，解释概念的科学定义，都免不了“简单化、粗糙化”的“通病”，要求避免这种“通病”，无异于取消一切科学公式和科学概念。如果我们不把实际上联系在一起的实践和认识分隔开来加以考察，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人类的认识运动，就不能说明认识的发生、发展和不断深化的问题。

第二，运用上述方法来考察人类认识运动，我们就要在一定的意义上承认“实践在先，认识在后”的观点。因为任何实践虽然都是有目的有意识地进行的，都是以一定的认识作指导的，这是人的实践区别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重要特点，但我们从一个具体的实践过程来看，实践本身仍然有一个从带有盲目性到比较自觉的发展过程。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在认识、在论证之前，早已有了行动，理智还不能解决的问题，实践已经解决了。[②] 人类在对于自然界的规律还没有相当的认识之前，早就从事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了，他们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认识，是后来经过漫长的实践才逐渐达到的。无产阶级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同资产阶级作斗争，但它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和自己的历史任务的认识，却经历了从盲目到自觉，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的发展过程。毛泽东在谈到战争的问题时说：“革命战争是民众的

---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5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02页。

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①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是这样。对社会主义要有理论准备，但也不是先认识和掌握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再去实践，而是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减少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可见，“实践在先，认识在后”，这在人类的认识活动中是普遍存在的，是合乎规律的。

这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实践在先，认识在后”的“认识”，不是一般的认识，而是指正确的、科学的认识，而正确的、科学的认识是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形成的。毛泽东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②如果否认“实践在先，认识在后”，认为人们一开始实践，就可以获得正确的、科学的认识，那是违反辩证法的，是形而上学的“一次完成论”。这种形而上学的“一次完成论”，已经一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否定。历史事实说明，我们党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是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反复实践，有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取得了充分经验之后，到“七大”时，才充分认识了它的规律。对于如何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也是这样。如果从“八大”算起，也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反复实践，有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之后，到“十二大”，特别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时，我们才对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特征和建设规律有了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并且也还不能说这个认识过程已经完结了。

第三，承认不承认“实践在先，认识在后”，实际上是承认不承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8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21页。

认物质决定意识、思维是对存在的反映问题，坚持不坚持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路线问题。列宁指出："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①这是哲学上的两条基本的路线。坚持"实践在先，认识在后"，就是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②也就是说，只有坚持"实践在先，认识在后"才能导致唯物主义，才能贯彻"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哲学路线。否认"实践在先，认识在后"，认为人们在还没有某种实践之前就已经有了某种认识，或者不需要经过反复的深入的实践，就能获得深刻的认识，就只能导致唯心论的先验论，认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头脑里固有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实践——认识——实践"这个公式是"狭隘经验论"，它排斥了前人认识的成果，让人们"在自己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里苦斗"。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并不排斥前人的认识成果和科学理论的指导。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谈到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时，除了强调长期实践之外，还着重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作用。他说："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0页。

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①]在谈到从感性认识如何上升到理性认识时，毛泽东强调了能否正确运用“科学抽象”的方法，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要求把个人的实践与认识同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实践与认识结合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实践，其主体并非仅指个人，更主要的是指群众。毛泽东一向认为，实践是社会的实践、群众的实践，“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②] 他在《实践论》中，不仅一般地阐明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而且进一步分析了个人的实践与认识同整个人类的实践与认识的关系，提出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③]对于这些知识，我们应当有分析有批判地认真学习和吸取。毛泽东在反对看重书本知识而轻视直接经验的教条主义的同时，也反对看重自己的直接经验而轻视前人、别人的经验和革命理论的经验主义。他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指出：“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④]又说：“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需的，失败确是成功之母。但是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⑤]“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包含了上述思想，它并不是让人们在个人的实践和认识的小圈子里“苦斗”的“狭隘经验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8—28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3页。

③④⑤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8、181、213—214页。

论”，而是把个人的实践和认识同群体的实践和认识结合起来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为人们认识真理开辟了道路，然而它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任何情况下都绝对有效。在实际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形：看起来我们在不断地实践，并且不断地修改我们的主观认识，但结果还是停留在一个错误的圈子里，或者忽“左”忽右，从一种错误跳向另一种错误，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对象。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一公式逼近真理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实践手段，实践活动必须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用控制论的话说，就是必须有一定的可观察量和可控制量。缺乏必要的实践手段，可观察量和可控制量很少，尽管人们反复实践，反复修改理论，但这种反复并不构成理论向客观真理的逼近。其次，“实践——认识——实践”的循环速度必须跟上客体变化的速度。如果循环即反馈速度太慢，反应迟钝，尽管认识是从实践中来的，并且又回到实践中去了，但仍然落后于客体的变化，不能达到主观和客观的一致。我们某些企业的生产计划常常不符合市场的需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信息反馈速度太慢。再其次，我们在用实践检验理论的过程中，发现理论不符合实践结果而对理论进行修正时，不能作出反馈过度的反应，即不能对理论作过头的修改，不能“矫枉过正”。否则反馈过度，对理论作出过头的修改，就会发生认识过程的震荡现象，使认识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我们党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时又出现另一种错误倾向的现象，其认识论上的原因，就是我们在用实践结果修改理论时作了过头反应，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明白了“实践——认识——实践”这一公式出现障碍的原因，我们就要努力创造各种条件，不断更新实践手段，不断调整实践过程，使我们的认识逐渐逼近客观真理。

三

“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是认识运动规律的科学概括，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指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条思想路线的中心问题就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在新的历史时期中，要把中国这样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性工程之一。这个事业的许多课题，是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和解决的。我们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的指导下，勇于实践、善于学习，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遵循认识总公式前进，才能完成这一伟大工程。如果否定了认识总公式，就会动摇和否定党的思想路线，就会否定在四化建设的实践中勇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带领群众去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胡耀邦指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需要经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反复的长期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要解放思想，不断地去接触和发现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使自己的脑子有丰富多彩的具体的感性知识，同时要开动脑筋，努力掌握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使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知识，成为比较系统的有条理的理论的认识，并且不断地把它们放在实践中去检验。”①这就是说，只有遵循认识总公式，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才能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

---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868 页。

“实践——认识——实践”，既是我们党的科学的思想路线，也是我们党科学的工作路线。“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同“群众——领导——群众”的公式是一致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也是认识和实践的主体。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做到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是我们党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我们要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如果否定了认识的总公式也就否定了党的群众路线。

“实践——认识——实践”的过程，既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也是人们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过程。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①这一认识论的结论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明了方向，为广大干部和群众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和修养指明了方向。它告诉我们，一定要在四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素质，抵制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增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如果否定了认识的总公式，就会取消我们党提出的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任务，降低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取消改造主观世界的任务。

从以上的分析中所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遵循“实践——认识——实践”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而否定这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6页。

条道路，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原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85年第2期）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新阐发

毛泽东对 1958 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作了哲学上的反思，在反思中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作了新阐发。在这些阐发中有很多是真知灼见，很有价值；有的基本正确，但其中包含着错误或不够完善的地方；有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有错误，理论概括却基本正确，如此等等，对于这些复杂情况，必须作辩证的、历史的分析。

一、重提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为了总结 1958 年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毛泽东重提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一系列讲话、文章和批示中对在新的条件下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作了新的论述。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要敢于说真话。毛泽东认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反对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的浮夸风。他主持起草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愈做愈细致，我们的

各级领导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相和假相，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力求接近客观实际。"①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针对当时农业生产中普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不因地制宜、不讲真话、瞎指挥等不良作风，向各级干部写了一封信，着重强调了讲真话的问题。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②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办事。早在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曾提出："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切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看需要和可能。"③1956年八大期间，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反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观主义，他说："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④因此，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从客观需要和现实可能出发。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恰恰背离了这一点。有鉴于此，他又重新提出需要和可

---

①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2—813页。

③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年10月、11月）。

④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

能的问题。1958 年 12 月 1 日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①12 月 9 日，他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压缩高指标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武昌会议（指 1958 年 11 月在武昌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引者注）重提实事求是，要求订计划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对于钢的问题，明年搞 3000 万吨，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也想过到 1962 年搞到 1 亿或者 1 亿 2000 万吨，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 1070 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可能性发生了问题。明年 3000 万吨，后年 6000 万吨，1962 年 1 亿 2000 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② 毛泽东在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上提出需要和可能的问题,虚假的可能性和现实的可能性问题,是对 1958 年“大跃进”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是对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新贡献。

第三，坚持实事求是要把破除迷信和尊重科学结合起来。毛泽东总结 1958 年“大跃进”的经验指出，坚持实事求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也当做迷信破除了。1958 年 11 月 23 日，他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提倡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部分破得过分了，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08 页。

② 1958 年 12 月 9 日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把科学真理也破了。这是不能破的，比如说，人是要吃饭，要睡觉的，破除这两条就要死人。因此要吃饱饭睡好觉，要劳逸结合。总之，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他又说，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它跟作诗是两回事，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1959年2月2日他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反对主观主义时说，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符合实际，符合客观规律的，这是正确的主观能动性；一种是脱离实际，违反客观规律的，这是错误的主观能动性，是主观主义。违反客观规律就要受挫折、受惩罚。我们提倡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这些论述是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唯心主义口号的一种纠正，是对实事求是唯物主义思想的深化。

第四，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在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过程中，毛泽东发现对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两种不同意见。他在1959年3月15日的《党内通讯》中指出：这个问题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的地区，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感到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总之，要按照群众的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行不通的。在3月17日的信中提出，除讨论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核算之外，还应当讨论生产小队（生产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问题。他说：我们的基层干部，“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

要失败。"①

第五，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论述，丰富了调查研究的理论。1960年以来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论述和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首先是进一步阐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这几年来出的问题，大体上都是因为胸中无数，情况不明，政策不对，决心不大，方法不对头。我们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调查工作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因为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调查工作做好了，其他工作才能做好；调查工作做不好，其他工作也不可能做好。第一书记亲身进行调查工作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第一书记担负的责任最重，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否正确，是否从实际出发，最足以影响全局，他们重视了调查研究，别的同志就会跟上。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其次是强调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调查研究的态度，不可以先入为主，不可以自以为是，不可以老爷式的，不可以当钦差大臣，而应采取讨论式的、同志式的互相商量的态度。调查研究不要怕听不同的意见，原来的判断和决定，经过实践检验，是不对的，也不要怕推翻。3月22日，他在接见去湖南调查贯彻农业"六十条"情况和问题的调查组全体成员时，特别强调调查的时候头脑里不要带思想框框，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1963年5月毛泽东在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的指示中，专门有一个问

①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3页。

题讲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的问题。他说，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大胆的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这是个很坏的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深入基层，详细地占有材料，经过分析、综合和比较，得出科学的结论。我们要提倡后一种方法，反对前一种方法。最后是关于调查研究的方式，毛泽东强调要深入基层，蹲点调查，即领导干部直接深入农村、工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实践中了解情况。只有深入蹲点，才能发现新问题，解决新矛盾。他说，比如走路，像平常那样走，什么也看不见；弯下腰来细看，就可以看到地面上蚂蚁很多，就能看到很多东西，否则，不仅新鲜的萌芽的东西看不见，就是大量普遍存在的现象也看不见。

二、关于自由与必然的范畴

在纠正 1958 年以来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毛泽东一再提到自由与必然的问题。

1959 年 4 月，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为了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错误倾向，曾给各级领导写过一封信，信中指出：“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① 1960 年 6 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十年总结》的讲话，又说到自由和必然的问题。他说：“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12 页。

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①]1962 年 1 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专门讲"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中心思想就是说明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1964 年 12 月 23 日，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又增写了关于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的一段话。1965 年春，他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又谈到自由不仅是对必然的认识，还应包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等等。概括起来说，上述论述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自由和必然的思想。

第一，对自由的含义作了科学的说明。毛泽东认为，自由首先是对必然的认识。他说："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②]人们在认识客观必然性之前，只能是必然性的奴隶；认识了必然性，利用对于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己，就获得了自由。所以自由是建立在对必然性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离开对必然的认识，就没有自由可言。但是这还不够，自由更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因为必然性作为客观事物的规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6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33 页。

律，只有通过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才能被认识；这种认识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可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不可分割的，丢掉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全面理解自由。所以毛泽东强调“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① 这个关于自由的规定，强调了改造世界的实践在获得自由中的意义和作用，继承和深化了恩格斯关于自由和必然的思想。

第二，论述了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失败的教训在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中的作用。毛泽东指出：“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②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才有了自由。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没有充分的经验，就不可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也要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它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逐步取得自由。1965 年，毛泽东在重读自己的旧作《长冈乡调查》时写的一个批注中说：“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

①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33 页。

宗。"[①]所有这些都说明,失败、错误在获得自由过程中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第三,由必然向自由的转化是无限的。毛泽东指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就整个人类的认识来说,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②]这就是说,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无限的,"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③]必然向自由的转化的无限性,要求我们坚持自由和必然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每一代人只能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来认识必然,改造世界,争取一定限度的自由,而不可能达到绝对的自由。另一方面,必然向自由的转化是一个世世代代无穷无尽的连续发展的过程。任何一个人、一代人取得的自由都是整个人类自由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它既是前人自由的直接继承和必然发展,又是后人将要取得的自由的必要准备和新的起点。因此,人类要不断地获得和保持自由,就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

①②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6、845、846页。

进。

三、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为了端正全党的思想认识，做好工作，克服困难，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认为，需要从认识论上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1958年底提倡认真读书，1959年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和写《党内通讯》，1960年作《十年总结》，1961年重提调查研究，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讲自由与必然等，都是为了这个目的。1963年5月，他在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所写的前言中将上述认识论思想，作了全面的概括和进一步发挥，形成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这篇论文是毛泽东对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哲学概括，也是对当时理论界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讨论的科学总结，进一步发展了《实践论》的思想。

第一，对认识路线问题作了积极探索。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深刻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认识路线的根本对立。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毛泽东进一步概括哲学上的认识路线提供了依据。《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一开头就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①主张人的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主张人的思想"是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9页。

自己头脑里固有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主张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对认识路线的精辟概括,为我们判定认识论上的哲学派别提供了正确的标准,深化了列宁提出的“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认识路线思想。

在阐明了对立的认识路线之后,毛泽东以我国农村工作为例,强调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他认为《前十条》是我们党关于农村工作的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文件。而这个文件是经过了建国以来的 13 年的实践,特别是近 3 年的实践,即从 1960 年 11 月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指示信》(《十二条》)起,中间经过 1961 年 3 月提出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1962 年 2 月《关于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9 月《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公布《六十条》修正草案,直到今天,才能写出这个决定。可见认识客观事物,需要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这里,毛泽东的结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是正确的;但他所举的例子(认为《前十条》是“正确思想”)则是不恰当的。因为《前十条》是“左”倾思想的产物,它对当时我国社会、特别是农村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并且决策也是错误的,即要求各地训练干部,进行“四清”、“五反”的试点,“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为普遍开展社教运动作准备。毛泽东的这段话,仅就它对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放在哪一级合适的探索过程而言,才有部分真理。

第二,进一步阐明了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把“科学实验”作为一项重要的实践活动。关于实践的形式,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已有所论述,那里对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说得比较具体,对于科学实验只是一般提及。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

毛泽东把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并列为三大革命实践，认为它们是正确认识的源泉，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① 应当指出，阶级斗争只是阶级社会的基本实践活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继续把它作为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不合适的；但把科学实验作为基本的实践活动之一，则是有远见的和有重要意义的。毛泽东重视科学实验，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注意。杨振宁博士认为，毛泽东把科学实验作为一项基本实践，看得很远，不仅看到现在，而且看到社会的将来。② 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在一篇文章中说：毛泽东把“科学实验”引入“实践”之中，这不仅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认识、认识方法放在辩证唯物论中的一个正确的位置上，而且把科学家的活动放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把科学家的活动提高到与变革现实同等的位置上。特别是后一点，在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各国中，具有给科学家的作用、地位以明确保证的意义。③

第三，对认识过程作出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新概括。关于认识的发展过程，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作过较多的阐述。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他根据社会主义时期的经验，并总结了我国哲学界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讨论，把认识发展过程概括为“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的过程，并且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这样就把认识过程中两个飞跃的思想

① 写《前十条》的同时，毛泽东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上的批语。

② 参看1978年9月10日《光明日报》文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是科学的旗帜》。

③ 参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5年第4期译文：《实践和“实验”》。

用通俗而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了,进一步突出和发挥了认识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思想。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在承认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的前提下,着重阐明认识过程中物质和精神的相互转化问题,即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可以转化为人的主观认识的内容,人们在认识了客观规律之后又可以能动地改造世界,而这种转化是以实践为基础、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实现的。这也就是说,思维和存在是有同一性的。说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思维不能到达存在的彼岸,那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最后走到康德那里去。

毛泽东提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命题,当时很多人,甚至哲学家,都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怪问题:物质变精神可以理解,精神变物质不好理解,难道精神可以变成石头吗? 毛泽东回答说: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从实践中来。客观事物反映到我们脑子里可不容易啦,要经过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过程。精神也可以变石头。譬如说,大理石有自然的大理石,有人造大理石,用来建筑人民大会堂的大理石,很多不是山里搬来的,而是人造的。人为什么能造大理石? 因为通过实践了解了大理石的化学构成,即碳酸钙($CaCO_3$),也就是石灰石。认识了石灰石生成的化学反应过程,人就可以造石头,精神就可以变石头。所以化学这门学问可以说是一门精神的学问,写在书本上变成思想,然后再变成物质。① 同样的道理和例子恩格斯也举过不少。所以,“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没有什么奇怪的。

在阐述“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认识发展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强调认识的反复性。《实践论》虽然也讲到人们不可能一

① 1964 年 8 月 20 日同李雪峰等的谈话。

次完成对一个事物的认识，只有经过多次反复才能达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但它的侧重点是讲整个人类的认识运动是无穷的，要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公式前进。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则特别强调，即使是对一个事物的正确认识，也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样就揭示了认识的辩证性和历史性，坚持了认识论的辩证法，把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同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区分开来。

关于认识的发展过程，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角度作过不同的概括：在《实践论》中概括为“实践——认识——实践”，在《矛盾论》中概括为“个别—— 一般——个别”；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概括为“群众——领导——群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概括为“民主——集中——民主”，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概括为“物质——精神——物质”。这五个公式是统一的，但也不能把它们简单地等同起来，它们仍然有某些区别。大体说来，“物质——精神——物质”，是一个总的提法，它揭示了认识的出发点和归宿；“实践——认识——实践”，揭示了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的基础和手段；“个别——一般——个别”，揭示了在实践中认识物质世界的范围和秩序；“群众——领导——群众”和“民主——集中——民主”这两个公式则是前几个公式在党的领导工作和组织内部的贯彻和体现。把这五个公式结合在一起来探讨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大贡献。

第四，进一步发挥了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思想。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已经明确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又指出，检验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在写《人的正确思

想是从哪里来的?》的同年 11 月 18 日,毛泽东在修改《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一篇文章时,加写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①一语,使实践标准的思想更加鲜明、准确。

毛泽东在论述实践标准的过程中,还提出了在社会斗争中有时出现暂时的失败并不能证明思想不正确的新论点。他指出,看一个认识是否正确,要看根据这种认识去实践能否得到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②这一论断,发挥了列宁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原理。一方面,它指出了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及其某些社会原因,告诉我们,先进势力在实践中某些暂时的失败,不能立即证明它的思想不正确,所以要坚持实践标准的辩证法,不要简单化。另一方面,它又告诉人们,不要因为实践标准具有相对性而怀疑它的绝对性。正确思想终究要为实践所证实,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这对于在正确思想指导下进行革命实践的先进势力,特别是在力量对比上暂时不如反动势力的先进势力,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但是,这一论断也有某些不够完备、不够精确之处,弄不好的话,可以拿来为错误作辩护。因为它没有准确说明这里所说的先进阶级的思想究竟是指什么?是普遍性的认识,还是行动方案?是总的指导原则,还是具体细节?因而容易产生误解,以为实践中失败了也不能证明主观认识上有任何错误。事实上,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在社会斗争中的挫折和失

① 转引自《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30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40 页。

败，固然往往受力量对比的影响，但任何挫折和失败总是可以从主观认识上找出某些错误来。普遍性的认识、总的指导原则没有错，但行动方案、具体细节错了，也会导致失败。所以，要对失败的原因作具体分析，搞清楚普遍性认识、总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案、具体细节的区别和联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最后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是在对 1958 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主要是“急于过渡”）已有所觉察、并努力纠正，认识上一次比一次深刻，但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错误却有所发展（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背景下写的。当时毛泽东认为《前十条》就是经过建国 13 年、特别是近 3 年的实践所获得的“正确思想”。如他在《前十条》中提出要完成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继续纠“左”（所有制、基本核算单位问题），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抓阶级斗争，认为当时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弄得不好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要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因而他提出要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向我们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认为这两方面的认识都是“正确思想”。所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就是这种矛盾状况的产物。它一方面包含有重要的积极的内容和理论价值；另一方面也含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当做“正确思想”而坚持下来的错误倾向。这是我们考察这篇文章时应有的辩证分析态度。

四、认识主体和认识工具问题

1936 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谈到研究

战争规律时指出："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①]这就是说，认识的主体是人们的头脑。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不仅分析了以个体为认识主体的认识过程，而且还以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和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为例，分析了以群体为认识主体的认识过程。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讲民主集中制时，又谈到作为认识主体的个人与群众的关系，认为认识的主体应当是领导者和群众，即个人和集体相结合，这样才能正确认识问题，制定出合乎客观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再次明确、具体地谈到认识主体问题。当于光远问：哲学书上通常是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而在人类社会中，认识的主体往往是集体，这个问题究竟怎样看才对？毛泽东回答说：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就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还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有了认识，了解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党也是一个认识主体。毛泽东关于认识主体不仅指个人，更主要的是指集体的思想，对于我们划清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同旧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界限，对于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之所以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原因之一是，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创造出新的认识手段、认识工具，从而推动认识的发展。1964年他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谈到望远镜、人造地球卫星的认识作用时，于光远问：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地球卫星等等概括为"认识工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82页。

具"这个概念？毛泽东回答说：你说的这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在"认识工具"这个概念当中还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逐渐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人手的延长，望远镜是人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毛泽东的话告诉我们，人们要想变革环境、改造世界，不能不使用工具，而改造世界的工具就是认识世界的工具。认识工具的改进和创造，大大地提高了人的认识能力，不断地扩展着人们认识的广度和深度。认识工具是人类认识水平的尺度，它凝结着人类的集体智慧，是认识的社会性的集中表现。毛泽东提出认识工具的问题，对于认识论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只有认真研究认识工具的问题，才能更好地说明人类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能动性和社会性，才能说明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有力地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和直观的反映论。把认识工具问题引入认识论，将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开创新的局面。

五、关于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

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重视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提出了"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著名论断，强调哲学要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这一论断虽然是60年代提出来的，但基本思想早在30年代就已经产生，并且是以马列的哲学思想为依据的。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①列宁也指出："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下同），第406页。

(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1]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是一门科学的三个方面,三者是一致的,其落脚点是强调哲学的认识论(即方法论)意义。列宁讲得更明确的话是:马克思的哲学"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2]

毛泽东非常重视列宁的这个思想,早在1937年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就认为,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同一个东西,辩证法、论理学(逻辑学)、认识论也是同一个东西。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这三个东西是一个东西。1963年5月,他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讲的认识论。这些道理要让干部和群众懂得。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964年8月他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对上述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概括,指出: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没有别的。

应该说,"哲学就是认识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认识论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认识论,是指总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指整个哲学;而狭义的认识论则是关于人的认识发生和发展过程的理论,是哲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这里讲"哲学就是认识论",明显地是指前者,其意思是说,哲学不是别的,说到底,就是广义的认识论,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这一命题进一步发挥了列宁关于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三者一致,以及哲学应该是"伟大的认识工具"的思想,强调了哲学的方法论功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的特点,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哲

---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311页。

学的根本任务。因而它是哲学必须解放的内在根据。哲学只有从少数哲学家的圈子里走出来，变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才能充分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具有最高的普遍性，正因为如此，它所作出的规定也就最抽象、最简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它要对实际生活、实际工作起指导作用，必须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并且为广大的群众所掌握，否则就无法发挥它的指导作用，这是哲学这门科学的性质所决定的。

"哲学就是认识论"的命题，还反映了当今哲学发展的趋势，为我们的哲学研究和哲学体系改造指明了方向。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哲学的内容是不断分化和演变的。恩格斯在谈到黑格尔的哲学体系终结以后的情况时指出："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①]这就是说，在历史上哲学虽然内容庞杂，但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以往的全部哲学中具有独立意义的就是逻辑和辩证法。而形式逻辑作为专门科学从哲学分化出去后，剩下的只是辩证法。这个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当然既是世界观，也是认识论。当今世界哲学的一大潮流是大多数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都把认识论问题作为研究的中心问题（现代西方哲学中有许多人"拒斥形而上学"而孤立地研究认识论，即把认识论归结为只是研究人的自我意识或绝对理念，否定外部世界的存在，这当然是要反对的），这反映了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即重视哲学的方法论功能。所以毛泽东关于"哲学就是认识论"的命题有着深远的意义，对于我们的哲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和哲学体系的改造，以及如何发挥哲学的方法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7页。

功能，均有重要的作用。

六、关于矛盾的平衡与不平衡的问题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以矛盾运动的两种状态即相对静止和显著变动来说明平衡与不平衡的问题，认为平衡就是事物处于相对静止状态，保持着原有的统一体；不平衡就是事物处于显著变动状态，统一体破裂。并根据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的原理，得出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的结论。为什么如此？他认为矛盾诸方面或一事物的诸矛盾在力量、规模和发展速度上是不完全相同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别，所以表现出不平衡来；但有时它们之间又会出现某种“势均力敌”的情况，因而表现出平衡来。后来毛泽东把这一哲学原理运用于经济建设，认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平衡也是相对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他说：“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①他还说：“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②这里，毛泽东过分地强调了不平衡的绝对性，夸大了不平衡的作用，忽视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5页。

了平衡的作用。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从不平衡的绝对性和平衡的相对性出发,提出了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的问题。他认为,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过渡的,要不断学习先进经验,在前进中打破原来的平衡,只有不断打破平衡,事业才能前进。他说,我们所要的是这种不断打破旧的平衡的革命的积极的平衡,不是消极保守的平衡。[①]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不要平衡、任意打破平衡、以为越不平衡越好的"左"的错误倾向,导致了"大跃进"中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挫折。

其实,在经济建设中,"平衡"这一范畴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按比例协调发展的那样一种状况,而不平衡是指原有比例关系的被打破。很显然,这里的平衡不是指矛盾双方力量的大致相当、势均力敌;不平衡也不是指矛盾双方力量对比的差异或悬殊。因此,平衡是十分重要的。国民经济必须综合平衡,即在总体上保持平衡,计划工作必须以综合平衡为主,必须保持经常平衡,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有了 1958 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之后,毛泽东开始认识到了这一点。1959 年庐山会议前期,即 6 月 29 日、7 月 2 日他在同各协作区主任谈话时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和主要缺点之一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我们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没有兼顾。综合平衡是经济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平衡有三种:农业本身的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之间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只有搞好了这三种平衡工作,才可能正确处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在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各

---

① 1958 年 1 月 12 日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它们不断地产生又不断地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这要求我们经常做好综合平衡的工作。

由此可见，区分两种“平衡”的含义，重视平衡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经验教训之一。

七、关于部分质变问题

关于部分质变的思想，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和中国的学者已经提出。苏联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就提出：不仅要研究一种过程到他种过程的飞跃，并且要研究“过程内部的飞跃或质量内部的飞跃”，即“部分质变”。我国著名哲学家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分析飞跃的多种形式时也谈到“部分的质的飞跃”即“部分质变”问题。但他们对这个问题都没有展开论述，此后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1937 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虽然没有直接讲部分质变问题，但他关于事物发展阶段性的论述，实际上已经涉及这个问题。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结合国内国际的革命实践又多次提出并论述了这一问题。1958 年 1 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首次提出了“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的概念。他说：“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①]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明确提出并详细地论证了部分质变的原理。他认为，苏联教科书中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05 页。

有把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凝固化、主张“彻底巩固”的倾向，他针对这种观点指出：

> “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呢？如果自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就蚕的一生来说，不但它最后一定要死亡，而且在它的一生发展过程中要经过蚕子、蚕、蛹、飞蛾这四个阶段，每一阶段都要进行到后一阶段，每一阶段都不能彻底巩固的。飞蛾最后死了，旧的质变成新的质（新下来很多蚕子），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但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的发展中显然也不只是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是部分质变。人也是从生到死的这个过程中，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人从生到死是一个量变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地进行部分质变的过程。难道能够说，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变化？人的机体里，细胞不断地分裂，不断有旧的细胞死亡，新的细胞生长，人死了就达到整个的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不断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质变，不能说量变中没有质变；质变中有量变，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在一个长的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部分质变。如果没有部分质变，没有大量的量变，最后的质变也不能到来。

这就是说，毛泽东是从量变和质变的对立统一关系上，从量变和质变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上去说明部分质变原理的普遍性的。

毛泽东在论证部分质变原理的普遍性时,实际上也探讨了部分质变的形式问题。概括起来说,部分质变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局部性的部分质变,一种是阶段性的部分质变。局部性的部分质变,指的是事物的全局性质未变,而组成全局的局部发生了性质的变化。他举例说,打垮蒋介石军队,建立全国政权,这个质变是通过量变和部分质变来完成的。例如,要三年半的时间,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的军队和政权,而这个量变中间就包含着部分质变。一部分一部分地推翻反动政权,一块一块地建立革命根据地政权,这对全国来说,是量变过程,但从一个局部来说,则是部分质变。正是通过这种部分质变的积累,最后实现全国政权的质变。部分质变的另一种形式是阶段性部分质变。它指的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未变,而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毛泽东举例说,解放战争期间,战争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个新的阶段和旧的阶段比较起来都有若干性质的区别。他还说,集体所有制一定要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要死亡。共产主义社会也可能要经过许多不同的发展阶段。这里也有质变或部分质变。

毛泽东在论述部分质变原理时,还提出了一个"边"的概念。他说: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但是每个阶段总是有个"边"。我们每天读书,从 4 点钟开始,到七八点钟结束,这就是"边"。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要有笔账。例如:工业品占多大比重,生产多少钢,人民生活水平多么高等等。说建成社会主义有个"边",当然不是说不要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在这里讲的事物的"边",与"度"的概念是一致的。边或度是一定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界限,是事物的质所能容纳的量的活动范围。在这个数量界限的范围内,量变不会引起质变;超出这个范围,事物就会发生质变。毛泽东在讲部分质变原理时提出

“边”的概念,意思是讲质变或部分质变,也要注意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只有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质变或部分质变才会发生。

毛泽东关于总的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的原理,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说,毛泽东把别人早在30年代已经提出但未引起哲学界普遍重视的部分质变问题重新提出来,并用自然界、人类社会一些常见的、通俗的例子说明了它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分析了部分质变和根本质变的联系和区别,说明了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从而丰富和深化了质量互变规律。从实践上说,部分质变原理的提出,批评了当时国内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把社会主义凝固化。毛泽东认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彻底巩固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就反映了这种倾向。另一种是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我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这种错误倾向的集中表现。毛泽东关于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原理就是在反对这两种倾向中重新提出来的。他根据这个原理,提出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经过两次郑州会议,经过八届九中全会以及人民公社《六十条》的制定,初步纠正了企图超越发展阶段的“左”的错误。但是,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在具体论述部分质变原理时,其批判锋芒主要是指向所谓“把社会主义凝固化”的观点,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强调通过不断的“部分质变”来实现社会的根本质变。例如,他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一再强调: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不同的公有制组成的。这种社会主义经济,有它的发生发展过程,难道就没有进一步变化的过程吗?难道我们能让这两种所有制长远地“彻底巩固”下去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些经济范畴难道是永生不灭的么?难道是只有

生长发展，而没有死亡变化么？难道不像其他的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么？由此可以看出，他过分地强调了批判“彻底巩固论”的一面，而忽视了一定时期内事物质的相对稳定性的一面，有不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要求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的“左”的思想痕迹。这是我们在运用这一原理时要特别注意纠正和防止的。

八、关于物质无限可分性问题

20 世纪初以来，随着高能物理学的发展，物质结构理论有了重大突破。人们首先发现原子由电子和原子核组成，接着又发现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同时还发现了作为物质的一种存在形式的光子。这样就揭露了物质结构的一个新层次，即电子、质子、中子等粒子，它们被看做是组成各种物质的基本单位，因此被称为“基本”粒子。这样，自然科学的发展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基本”粒子是不是永远不变的、不能再分了的“物质始原”？人类是不是已经穷尽了对物质结构的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把“基本”粒子的研究和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55 年 1 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专门研究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发展的规划会议。会上，毛泽东问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质子、中子是由什么组成的?”钱三强回答说：“对于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新的认识，根据现有的科学研究，还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毛泽东听后说：“我看不见得。质子、中子、电子还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上虽然还没有证实，将来实验条件发展了，将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半年以后，美国第一次发现了“反质子”，一年以后，又发现了“反中子”，证实了毛泽东的正确预见。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又说："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①

1964年8月14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谈话，特别谈到《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日本学者坂田昌一写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的文章，赞赏坂田关于"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粒子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他说：

"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

① 《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1957年11月18日)。

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①

8月24日，在北京，毛泽东又找于光远、周培源到中南海他的卧室，谈坂田文章，反复阐明物质无限可分性的思想，认为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下去。宇宙从大的方面讲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讲也是无限的。

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性的思想，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说，这一思想坚持了唯物辩证法，把对立统一的观点贯彻到底，它从物质结构的内部矛盾性出发，着重说明微观物质结构的无限可分性，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从实践上说，它给高能物理学的研究以哲学方法论的指导。我国物理学家在“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指导下，于1955—1966年间提出了关于物质结构的“层子模型”理论，认为“基本”粒子是由物质更深一个层次的“层子”所组成，“层子模型”理论受到各国物理学家的普遍重视。在这前后，西方物理学家发展了关于基本粒子重粒子结构的“夸克”学说。“夸克”大致相当于“层子”。从那时以来，这方面研究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基本”粒子有更深层次的结构，在物理学界已得到公认。毛泽东逝世后，1977年在夏威夷开了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美国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格拉肖在追述了物理学家如同剥葱一样逐层深入研究物质结构的历程之后，说了这样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

① 转引自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2—103页。

的统一。"①这不只是对基本粒子命名的一个具体建议,而且表明了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表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深远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涵义,要有正确的理解,它主要是指物质层次结构的不可穷尽性。可分是绝对的,但可分的内容、形式则是相对的、多样的,绝不能把物质可分性等同于物质量的分割。"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句话就它指物质层次结构不可穷尽而言,是正确的;但如果把它理解为量的机械分割,则是不对的。"一尺之棰"如果仅用机械的方法"日取其半",分到一定的时候,其性质就起变化了,就不再是"棰"了。所以,对物质无限可分的问题,不能仅仅从量的方面去理解,而且要看到其质的变化。正确的做法是,在物质分割的每一个新的关节点上,要以科学实验为基础,去探究未知的"分"的新性质,新形式,新规律,而不是把某种已知的刻板的公式,强加于客观事物。

九、辩证法核心规律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一种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的形而上学思想;哲学上讲辩证法,完全按斯大林的说法,只讲"四大特征",把辩证法的规律、范畴平列起来,忽视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地位。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并反复强调不仅要在理论上承认对立统一规律,而且要善于运用这个规律去观察社会主义社会。1957 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重申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要求人们应用

① 参看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 106 页。

这个规律去观察和处理问题。1958 年,他又反复强调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1963 年 12 月,他在一个文件中写道:“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就是“一分为二”、“两分法”。①

1965 年,毛泽东在李达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写的一个批语中对上述思想作了概括和提升,提出了辩证法规律一元化的思想。他说:

>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②

在毛泽东看来,唯物辩证法的三个规律是不能并列的,对立统一规律是核心规律,其他规律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和展开。

第一,联系和发展是辩证法的总特征,对立统一提供了理解联系和发展的钥匙。恩格斯说过,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

①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43、847 页。

而联系实质上就是矛盾的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联系。毛泽东批评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把联系看成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观点，说“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①这就是说，联系的本质在于对立的统一，离开了对立统一，不可能科学地说明联系。列宁说过，辩证法是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而“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离开对立统一规律，就不能说明事物发展的源泉、动力、过程和方向，即事物为什么发展、如何发展。

第二，唯物辩证法的其他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和展开。毛泽东认为，质和量是对立的统一，量变和质变也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他指出：“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②相对静止的状态就是量变，显著变动的状态就是质变。量变和质变都是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的相互斗争引起的。因此，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量变和质变的根据，离开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就得不到说明和解释。

毛泽东认为，否定之否定规律，其内容就是事物内部肯定与否定这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及其互相转化。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例如，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封建社会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任何一个肯定的事物，必然在其内部包含着自己的对立面，事物内

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32页。

部肯定和否定这两个对立面的斗争，使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由肯定转化为否定。这就是事物的新陈代谢，即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可见否定之否定规律同样是受对立统一这一根本规律支配的。毛泽东还认为，不应该采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的公式，而应把“否定之否定”作为辩证法的一个要素，包括到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无穷系列中去，因为“否定之否定”只是肯定否定中的一类现象。所以，他主张用“肯定否定规律”的提法，代替“否定之否定规律”，使之更具有普遍性，成为更一般的表述。

第三，唯物辩证法其他一系列成对的范畴，如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必然和自由、可能性和现实性等等，毛泽东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也应“以事物的矛盾即对立统一去说明”。他举例说，什么叫本质？本质是由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决定的。本质不同于现象，现象是个别的、片面的、表面的东西，具有较大的变动性，而本质则是同类现象中一般的共同的东西，具有相对稳定性。但现象和本质又是统一的，现象是本质的外部表现，本质是现象的内部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其他范畴如此类推。

毛泽东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规律，不同意把辩证法三个规律平行并列的传统观点，是对斯大林形而上学思想的批评，对马克思和列宁辩证法思想的恢复，同时又作了进一步解释和发挥，这对于掌握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对于改造哲学体系，对于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都有重要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时，有贬低或否定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倾向。上述批注就是把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同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范畴同等看待的，降低了它们在辩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未

免失之偏颇。60年代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多次谈话,更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他说:恩格斯讲辩证法有三个范畴: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我就不相信后两个范畴。三个范畴并列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我看就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量和质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只有肯定否定。又说,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特征)。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矛盾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些尽管是随意的谈话,不像文字表达那样准确、完整,但仍然可以看出他的思路。我以为,这里关于"三元论"的批评,是不恰当的。因为承认三大规律,仍然可以对它们作出统一的解释,说辩证法只有一个规律,这是把辩证法简单化了,抹煞了辩证法活生生的、多方面的内容。辩证法应该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因而这种规律不止一个,而是多个。列宁说过:"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的整个哲学体系)"。[①] 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正是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状态和道路,否定之否定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方向、趋势和环节。它们虽然不能并列,但也不能互相代替、互相排斥,而应该是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的。强调其中的一个而否定其他的做法,我以为是不妥当的。这样做,只能使活生生的、内容丰富的辩证法变成干瘪的僵死的形而上学。一个长时间内,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简单化、绝对化倾向,如只讲"跃进"、"过渡",不讲相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

对稳定、量的积累;只讲批判,不讲继承;只讲破,不讲立;把螺旋式发展看成“复旧”、“倒退”;如此等等,这与在辩证法理论上只讲对立统一,不讲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的偏颇,是有一定关系的。这个教训我们应当记取。

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新概括

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所以受挫,除思想路线的原因之外,还因为没有好的工作方法。在他看来,当时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只是没有好的工作方法来保证它的实现(其实,主要不是工作方法问题,而是政治路线、思想路线问题)。因此,他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多次讲工作方法问题。这些工作方法,归纳起来,一共16条。现择其要者说明之。

多谋善断。他说,多谋善断,重点在谋字上。谋的目的是为了善断。不能多谋寡断、有谋无断,也不能少谋武断。现在我们有些人就是少谋武断,根本不同人家商量,不听不同意见。譬如订经济计划时,不同别人交谈,不去多谋,实践结果行不通,还可能造成虚假现象。

要当机立断。有的同志上不摸底,下不摸底,有的工作也有断,但断得不适当。优柔寡断是不对的。断的时候要下决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公社这个问题很明显,究竟几级管理,去年没搞清楚。经过一个过程,搞了一些调查研究,才发觉队的所有制。这次会议明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当机立断。总之,要善于分析情况,抓紧时机,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方针政策。

留有余地。他说,我们在安排工作计划时,要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

地上下都有好处。我们有些生产计划、经济计划、满打满算，不留一点余地，很容易造成虚假现象。留有余地是政治问题，也是工作方法问题。

波浪式前进。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懂得波浪式前进，不能天天搞高潮，要按照实际情况，可以高些，也可以低些。但不能公开在群众中“反冒进”，反对多快好省的总路线。

要善于观察形势。就是说，脑子不能僵化，要注意观察形势，观察动态，了解情况。要提倡嗅一嗅政治形势、嗅一嗅经济形势。所谓政治形势，就是观察各阶级的思想，观察他们的立场变化。北戴河会议时，指标订得很高，我注意观察和思考。后来我走到河北、山东，感到不行。六中全会决定把指标降低，上海会议又压了一下，一步步落实。

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毛泽东说，多数的时候是多数人胜过少数人，有时候又是少数人胜过多数人。就是说，有时候真理不在多数人这边，而在少数人或个别人这边。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马克思一个人手里。你们看过联共党史，有一次会议，大家都举手了，就是列宁一个人不举手。列宁未举手是真理，其他人都不对。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的精神。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和个别人的意见。在党内要造成有话敢讲、有缺点要改进的空气。批评缺点往往有点痛苦，但批评之后，改了，就好了。有些同志不把自己的话讲出来，中庸之道太多了。不敢讲话，无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级，怕没有面子，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离婚。有些同志生怕于自己不利，这就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领导干部对极少数人的意见，不要顶回去，要看看里边有没有真理。

要解放思想。他说，不要怕鬼，不要扭扭捏捏，要有骨有肉。在一些同志那里空气不健康，前怕狼，后怕虎，思想没解放，怕挨

整。干部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不要怕穿小鞋，怕失掉选票。就是杀了头也好么，你是为了国家、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

此外，还有与人通气，解除封锁，历史地观察问题，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权要集中，要实行集体领导，等等，这里不一一解释了。

（原载《毛泽东的探索——中国的 1956—1976》，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与当前认识论研究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它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又指导我们取得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坚持它的基本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它推向前进，这对于促进哲学的繁荣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在当前认识论的研究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有的同志认为，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反映论包括毛泽东所概括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都已经过时了，认识的客观性原则已经破灭，认识的本质不再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而是主体在思维中对信息的“建构”或“重构”；他们还认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包括毛泽东认识论，由于坚持认识的客观性原则，因而忽视了认识的主体性，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实行认识论轴心的转换，即由客体转向主体。

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论，毛泽东的认识论同样以反映论为前提，反映论的基本原则——认识的客观性，是不能动摇的。所谓认识的客观性就是解决认识是从哪里来的问题，它确认认识的内容来自客观世界。毛泽东说，认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

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而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通过社会实践）。我们必须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毛泽东强调，这种反映，不是机械的、被动的反映，而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毛泽东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这种反映是人们在“变革现实的实践”中进行的。反映的过程，就是实践的过程，就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它既要变客观的东西为主观的东西，又要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既改造客观世界又改造主观世界。

第二，这种反映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指导下进行的。领导中国革命，要有革命理论的指导，“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这就是说，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过程是有目的性、计划性的能动的反映过程。

第三，这种反映是在“认识工具”参与下进行的，认识的结构是“主体—工具—客体”的三维结构。毛泽东强调“认识工具”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人是由于制造和使用工具才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人们接触事物、变革环境、改造世界不能不使用工具，而改造世界的工具也就是认识世界的工具。人们在使用工具和改造世界的同时，认识才能逐渐深入。“认识工具”是人类认识成果的积淀，它充分体现了人的认识的能动性和社会性。

第四，这种反映，“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①，以便把握事物的本质。这个过程是一个“飞跃”，是认识能动性的重要表现，其中包括了选择、加工、创造等内容。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1页。

第五，这种反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毛泽东说：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实践这一个飞跃；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这就充分地体现了认识主体的需要和目的。

第六，这种反映论把认识论变为党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工作方法，实现了列宁关于哲学应成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伟大认识工具"的指示。

由此可见，把包括毛泽东认识论在内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看成是机械的"照镜子式"的反映论，是没有根据的。主张用"选择"、"建构"、"重构"来取代"反映"，也是不恰当的。"选择"、"建构"、"重构"等概念的提出，有其某些合理的因素，如突出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有助于探讨认识发生的机制等，但"选择"、"建构"、"重构"必须建立在反映的基础之上，因为人们首先必须从客观外界获得感性材料，然后才能进行"选择"、"建构"、"重构"，正如一个"加工厂"，要有一定的原材料，才能进行加工，制造出成品来。其次，"选择"、"建构"、"重构"是否正确，必须有一个标准来衡量。这个标准不是别的，只能是看它是否符合客观外界的规律性。所以，离开"反映"讲"选择"、"建构"、"重构"，就有可能产生主观任意性，有可能导向唯心主义。

有的同志用微观领域的认识活动中的"测不准"现象来否认认识的客观性。我认为，这也是不对的。的确，在微观领域，认识对象和认识结果常常依赖于观察方式和测量工具，当主体通过测量仪器作用于微观粒子时，客体的组态即发生变化，因而观察结果出现"测不准"现象。在这里，认识的客观性是否破灭了呢？没有。认识的客观性仍然存在。第一，"测不准"现象也是客观的，不是主观自生的。在这里，人们对它的反映，既包括了对认识对象

（微观粒子）的反映，也包括了对它的观察方式和工具（测量仪器及其对微观粒子的作用）的反映。第二，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主体因素会进入认识里面来，但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是可以把它“客观化”的，如主体的知识背景、思维方式，认识工具等，它们是受一定历史条件制约的，特别是认识工具，它是人类认识成果的凝结物，是可以使之“客观化”而加以测定的。总之，在微观领域，认识的客观性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出现了某些相对的、复杂的情况罢了。

至于说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由于强调认识的客观性而忽视认识的主体性，这也是不能成立的。认识的客观性和认识的主体性并不矛盾。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就是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对事物既要从客体方面去理解，也要从主体（主观）方面去理解。拿毛泽东的认识论来说，重视主体性是它的一大特点。毛泽东在《实践论》一开头就认为，研究认识论首先要研究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研究人的社会性、人的历史发展，否则就不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他特别强调人们的立场、观点、方法在认识世界中的作用，指出只有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才能大公无私，才能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看问题；只有掌握唯物的辩证的观点和科学的思想方法，才能心明眼亮，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对于情感、意志在认识中的作用，他也给予高度的重视。他指出，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的；同样，没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坚强意志，也是不可能获得真知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

是世界的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可惜过去我们研究不够。

当然，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包括毛泽东的认识论在内，并没有结束真理，它还需要向前发展，需要吸取现代科学包括发生认识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的新成果来补充、丰富自己，并从微观方面加强认识机制的研究。但是这种发展不能离开反映论和实践论这个基础，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前进，离开这个基础去转变“轴心”，就有可能导致唯心主义，那不是发展而是倒退；同时，这种研究也不能陷入心理学、生理学等具体科学对认识机制的细节性研究，而应当把微观和宏观的研究结合起来，并且要注意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我以为这才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正确途径。

（原载《现代哲学》1988 年第 1 期）

毛泽东方法论思想研究

毛泽东哲学的根本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化为广大干部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认真研究毛泽东哲学这一方法论功能，对于我们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毛泽东哲学的方法论特征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从一定意义上说，任何哲学都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因为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指导并最终决定着人们对方法论的选择和方法论的研究。反过来说，方法论又支持和影响一定的世界观。我们说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但并不排除它们之间的差别和不一致的一面。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区别表现在：从对象上看，世界观研究的对象是外部客体，方法论研究的对象是方法，它不仅要研究客体的规律，而且要研究客体对主体的价值关系，研究主体实现自己的目的应当采取怎样的方法；从表现形式上看，世界观回答外部客体"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问题，方法论则告诉人们"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从评判标准上看，世界观评判的标准是真假对错问题，方法论评判的标准则主要是适

用或不适用。

正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有这样的区别，哲学史上才会出现某些世界观和方法论背离的情况（世界观是先进的，而方法论是陈旧的；或者世界观是陈旧的，而方法论是先进的）；也正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各有其相对独立性，才给人们提供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单独研究世界观或方法论的可能性。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但重点放在方法论上，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哲学的最大特点。为什么呢？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来看，毛泽东哲学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方法论问题。由于历史条件不同，社会实践的需要不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研究有着不同的任务和侧重点，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有着不同的时代特点和表现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还处在准备和酝酿过程之中，他们在哲学上的主要任务是批判旧哲学，创立完备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理论武器，其重点是建构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而不是方法论问题。列宁生活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直接的实践问题而提到议事日程。在革命的紧急关头，第二国际和俄国党内的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新康德主义和庸俗进化论猖獗，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辩护，因此列宁在哲学上的主要任务是在斗争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虽然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①，即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普遍的方法，但总的来说，其研究的重点仍然是世界观问题而不是方法论，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体系。毛泽东生活在半封建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11页。

半殖民地的中国。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特点与西欧各国和沙皇俄国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中国革命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俄国革命的经验和马列主义已经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这种情况决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正在于否认这种结合的必要性,违背了这种结合的正确方法。因此,解决中国革命和实际工作中的方法论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党的面前。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就在于他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和应用,成功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其独创性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完全是出自于一种自觉的哲学认识。1941 年 9 月 29 日他在一封信中明确指出,我党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应“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①。他的这种认识,准确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对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在哲学方法论方面的突出贡献,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其次,从毛泽东著作的内容来看,也充分体现了其方法论特色。综观毛泽东的全部著作,“纯”哲学方面的比较少,除《实践论》、《矛盾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以及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哲学批注集之外,绝大部分是关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等方面的著作,这

---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89 页。

些著作都渗透着科学的方法论思想。就其哲学著作而言，则既讲世界观又讲方法论，但重点在方法论上。拿《实践论》来说，它主要告诉我们，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矛盾论》则主要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反对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主要是指出，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既要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要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反对既不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又欲充当革命向导的主观主义态度。《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为了端正广大干部的思想路线，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而写的一篇短文。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贡献，主要不在理论观点方面，而在方法论方面。毛泽东哲学的方法论特征，还直接表现在他哲理性非常鲜明的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专著中。这些专著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化为方法论的直接结果。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指出调查研究是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有效方法，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是在斗争中开创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934年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提出了任务和方法的关系问题，阐明了工作方法的重要性。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最要紧的是掌握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3年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两个基本的工作方法：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化为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1949年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指出，领导工作不仅要决

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并且提出了工作方法12条。1958年1月毛泽东对多年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工作经验进行总结，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希望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些进步，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革命形势的需要。为了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毛泽东在1959年4月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提出了工作方法9条，后来扩充为16条，他强调要实现党的路线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1961年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重提实事求是，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3年他在《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一文中强调对本地、本单位、本人和别地、别单位、别人都要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分析成绩和缺点、正确和错误，并要定为制度。

最后，从毛泽东本人对哲学的本质特征的概括来看，"哲学就是认识论"可以说是他对自己哲学的特征的最好概括。早在1937年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就曾经指出，辩证法唯物论既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以后毛泽东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过：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1960年3月他在天津会议上指出：哲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架子，不懂得这个架子，办事就要差一些，想问题就要差一些。与此同时，毛泽东强调哲学就是认识论。1963年5月，他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讲认识论。1964年8月，他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作了明确的概括："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我认为，这一论断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对他自己的哲学特征最准确、最透辟的概括。当然，他这里讲的认识论是广义的认识论，即作为认识方法的方法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都是认识方法，都应成为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毛泽东的这个论断与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更加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主体性思想,使广大干部更易于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更好地发挥它改造世界的作用。

二、毛泽东哲学的方法论体系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于实际工作,创立了一整套方法论的思想体系,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

毛泽东方法论思想首先是阐明了方法的意义和作用。任何实践活动都需要采取一定的手段或方法。方法是完成工作任务,实现主体目的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手段。毛泽东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①他早年在谈到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和方法的关系问题时说过:“目的……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②方法的选择还直接关系到实践活动的成败,影响到实践活动的优化程度。毛泽东指出,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实践中常常有由于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而失败的事,后来从调查研究入手,搞清了情况,下定了决心,改变了方法,就成功了。他又说:“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9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页。

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比如修铁路，选线路要有几种方案，在几条线路里头选一条。可以有几种方法来比较，至少有两种方法来比较。"①这就是说，通过最佳方法或最佳方案的选择，可以达到最佳的效果。

其次是提出了方法论的一般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是说明方法与世界观的关系；方法与实践的关系；方法与规律的关系等问题。方法与世界观的关系已于上述，主要是说我们的方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作指导；世界观化为具体方法要遵循从一般到特殊到个别这样一个层层推进的过程。方法与实践的关系，主要是说方法是适应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正确的方法应当到群众的实践中去寻找；不同质的实践活动要采取不同质的方法；实践发生了变化，方法也应随之变化；"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②

这里要着重谈的是方法和规律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这就是"战争的指导规律"。他说，要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不但要研究"战争的规律"，而且要研究"战争的行动规律"和"战争的指导规律"。根据我的理解，"战争的规律"是指战争这个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它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人们认识与否，都自发地起作用。"战争的行动规律"是战争主体的活动规律，是主体根据自己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和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方针。它可以说是一种"行动的推理"，是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而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的东西。"战争的行

① 《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11页。

动规律"有强烈的目的性，但这种目的是以"战争的规律"为基础的，受它的制约，因而既具有主观性，又具有客观性。"战争的指导规律"是为主体所掌握并加以自觉运用的行动规律，即人们在研究了战争的客观规律和战争的主体活动规律之后所采取的作战方针或战略战术。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所谓战争的指导规律，就是我们的战略战术，就是我们在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而这也就是我们的方法。① 我认为，"指导规律"这个概念，不只是适用于战争，而且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意义。它把方法提到规律的高度来认识，告诉我们，方法不是任意的，如果撇开枝节的东西，它是外部世界规律的反映，并且体现了主体的目的，其特点是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这样就揭示了方法的客观内容和本质，为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和方法提供了中介，这个中介不是别的，就是"指导规律"。

毛泽东方法论思想包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样一些层次。毛泽东指出："所谓方法，无非就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②思想方法就是认识方法，主要指人们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工作方法主要指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方法，对领导者来说就是领导方法。两者比较，思想方法是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的基础，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是思想方法在工作中的外化。因此，世界观向方法论转化时，首先直接转化为思想方法，然后才能转化为其他具体的方法。就适用范围而言，毛泽东方法论体系又可分为一般方法、特殊方法和具体方法三个层次。所谓一般方法是指具有世界观意义的最基本的原则，如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方法、矛盾分析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等。特殊方法是指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478 页。

② 《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 年 4 月)。

建立在一般方法基础上而适用于某一个特殊领域的方法，如军事领域里的防御中的进攻、内线中的外线、持久中的速决等作战方针；政治斗争中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文化方面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具体方法是指在各个领域中完成各项具体任务的操作方法，如调查研究中“走马看花”、“下马观花”、“蹲点”、“解剖麻雀”等等。

毛泽东哲学的方法论体系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从内容的构成来看，具有综合性和系统性。它不是某一哲学原理的简单应用，而是根据实践的需要，诸多哲学原理的有机结合和综合运用。毛泽东方法体系结构严整、层次分明，具有强大的整体性功能。二是从表达形式来看，具有民族性和大众化的特色。毛泽东以浓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和高度的理论素养为基础，用生动活泼、为中国广大干部和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表达了抽象的方法论内容，如“两点论”、“两分化”、“多谋善断”、“全国一盘棋”、“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等，就是如此。三是就其发展而言，具有开放性。毛泽东方法论思想植根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社会实践，它具有开放系统的功能，能够不断地吸收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工作经验和新的具体科学方法论的成果来丰富、补充和完善自己，因而不断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三、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方法论思想

毛泽东的方法论思想不仅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一再提倡干部学哲学，提倡改进工作方法，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陈云也告诫我们："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把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①干部学哲学，要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掌握它的方法论思想。

有人认为，现在是信息时代，高科技时代，科学方法论兴盛的时代，毛泽东的方法论思想过时了，已经被"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所取代，矛盾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已经不适用了，坚持群众路线是狭隘经验论等等。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毛泽东的方法论思想与现代科学方法论属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系统。毛泽东的方法论属于哲学方法论，是最高层次的东西，新老"三论"属于横断科学，是具体科学方法论，它虽然有较大的适用性，但比起哲学方法论来，是低一个层次的东西。这两种方法论各有其存在的价值，是不能互相取代的，相反地它们互相依赖、互相补充。哲学方法论是现代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基础，而现代科学方法论的新成果又可以补充、丰富和完善哲学方法论。毛泽东方法论中的"如实反映情况"、"矛盾分析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些基本的方法，并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当然在操作过程中，某些具体的方法是完全可以随着科学技术条件的进步而改进的。至于"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那显然是错误的。但阶级分析方法在阶级斗争仍然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今天，还是不能否定的，仍然具有其科学价值，它对于分析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现象，仍然是尖锐的思想武器。

对于毛泽东方法论思想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如何发展？我以为作为哲学工作者有几方面的工作是迫切需要进行的。

其一是加强应用哲学的研究，寻找和建立哲学通向各门具体

① 见《求是》杂志1990年第8期。

科学的"桥梁科学"。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经按照现代科学技术分类方法提出了九大"桥梁科学"。他把"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论"、"数学哲学"、"系统论"、"认识论"、"人天观"、"美学"、"军事哲学"、"社会论",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分别通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文艺理论、军事科学、行为科学的"桥梁科学"。这种"桥梁科学"就是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他的这种意见对我们哲学工作者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毛泽东在哲学与自然科学、哲学与社会、哲学与人类思维、哲学与军事、政治、文艺的关系方面有很多论述,我们应当加以研究、整理、提炼,并结合各门具体科学的实际,逐步建立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用以指导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

其二是认真研究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政治著作中的战略战术思想和政治策略原则,并且加以提炼、升华为一般方法论原则,进一步建构毛泽东方法论体系。毛泽东这方面的著作很多,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等,其中的方法论思想非常丰富,运用之妙达到了得心应手、炉火纯青的地步,我们应好好地研究。

其三是在总结毛泽东的领导方法、领导艺术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领导经验和领导方法的基础上,有分析地吸取西方管理理论和领导理论的积极成果,并使之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同时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的领导思想和丰富的传统文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领导科学,使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现代化、科学化。

毛泽东方法论思想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有着巨大的科学价值。我们应当坚持和发展它,并使之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原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1年第4期）

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

一、领导方法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创立了一整套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些方法中最基本的是实事求是、矛盾分析、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

（一）实事求是的方法

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实事求是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是思想路线，又是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从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角度看，实事求是包含着以下方法。

1. 调查研究的方法

调查研究的方法是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的运用，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贯彻，是领导机关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下级机关正确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毛泽东一再指出：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1页。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①"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②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方法对。调查研究，是领导者正确认识世界和有效地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

要做好调查研究，首先要有深入实际的作风。领导者作调查主要的是向群众作调查。因此，要满腔热情，眼睛向下，甘当小学生，尊重群众，与群众交朋友，才能调查出真情来。其次要有科学的态度。不要自以为是，不可先入为主，不要用事先定好的"调子"、"框框"去限制调查的人或束缚自己，特别不要怕听不同的意见，如果原来的判断和决定，经过调查，证明是不对的，就不要怕被推翻。

毛泽东总结我党调查研究的经验，指出调查研究的方法有"走马观花"、"下马看花"、开调查会等形式。毛泽东认为，在工作中要了解全局情况，必须做面上的调查研究。"走马观花"的方法，就是一种面上调查，了解全局情况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使调查者在较短的时间内对事物的全局有一个粗略的了解，形成一个大致的轮廓，做到从总体上对事物胸中有数。"下马看花"的方法，就是深入实际作典型调查的方法。毛泽东把这种方法又叫做"解剖麻雀"。"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只有对麻雀进行解剖，才能认识麻雀的肝胆；只有对典型事例进行细致的分析，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是"解剖麻雀"和分析典型的目的。毛泽东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这就叫做'解剖学'"，叫做"下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2页。

个‘麻雀’”①。开调查会是领导者深入群众，面对面地听取群众的意见、要求、建议，特别是通过会上的讨论、辩论，各种不同意见的交锋，可以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所以毛泽东说：“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②开调查会要注意调查技术，首先是要定好调查纲目，其次要选好到会的人，再次是开会要采用讨论的方式等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调查研究仍然十分重要，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的基本精神并没有过时，当然具体方法要改进，要现代化、科学化。如采用普遍适用的典型调查、抽样调查、全面调查、畅谈会调查、民意测验、信息网络调查法、专家意见征询法等，采用电子计算机、现代化的通讯手段等先进技术。

2.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毛泽东早就指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③建国以后又说：“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④实事求是，就要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和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以无畏的创新精神对待工作，不拘于成法，不囿于旧见，面对现实，推陈出新。所以，解放思想和实事求

①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25日)。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0、827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3页。

是是一致的。

3. 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要做到实事求是，还必须树立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思想作风。毛泽东说："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①"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②所谓说老实话，就是对情况如实地反映，对历史如实地写出，对工作如实地总结，总之，一是一，二是二，不夸大，不缩小，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所谓办老实事，就是按照实际情况来决定工作方针，根据需要和可能办事，既不因循守旧，又不盲目蛮干，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人就是老实人。

（二）矛盾分析方法

矛盾分析方法是对立统一规律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其基本要求是：

1. 坚持两点论、两分法

毛泽东指出："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③又说："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④就是说，事物都有矛盾的两个侧面，都有两点，我们必须如实地看到它的两点，采取两分法，看到成绩和缺点、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等等。只说一点，不说两点，就叫知其一不知其二，叫做片面性。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22页。

②③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2、843、740页。

2. 抓住重点

我们不仅要看到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还要抓住重点，即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这样才能抓住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因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有重点才有政策，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3. 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毛泽东指出：一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但又可能掩盖着另一种主要倾向。如在反对"左"的倾向的时候，可能出右，在反对右的倾向的时候，又可能出"左"。因此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坚持正确方向。一种主要倾向可能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问题，实质上是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关系及其相互转化的问题。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就是要求我们要充分地看到和抓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同时也要逐一解决非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方面的问题；要看到已经出现的问题，也要估计到我们还没有觉察可能出现的问题；既要看到现状，又要预见到矛盾的转化。

4. 阶级分析方法

把矛盾分析方法运用于社会历史，运用于带阶级性质的社会现象，就形成阶级分析方法。所谓阶级分析方法，就是分析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分析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分析各种社会思潮的阶级实质。阶级分析方法要求我们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即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要分析一种口号、纲领、政策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对谁有利等等。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主要矛盾、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今天，不应该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一切、观察一切"，但仍然要用阶级分析方法看待

那些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现象。

(三)群众路线的方法

群众路线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群众观点,一是群众路线的方法。这里主要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

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其基本含义是:领导要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智慧,集中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以形成既符合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又体现群众利益和意志的正确领导意见,然后把它贯彻到群众中去,检验这些意见的正确性,并将其变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其具体内容和方法有:

第一,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充分发挥领导和群众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既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既要反对命令主义,又要反对尾巴主义。

第二,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一个好的领导者,不能只发一般号召,必须深入实际,帮助下级和群众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个别指导。毛泽东指出:"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9页。

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①一切正确的领导工作都必须实行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

（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它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认识论、历史唯物论等许多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内因外因辩证关系原理的运用。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②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认识，而不是由共产国际中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又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③“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④革命是如此，建设也是如此。1958年，毛泽东在《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⑤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1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32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

根据这些论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含义是:从本国国情出发,坚持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树立和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同时反对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狭隘思想;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它不仅适用于处理国家与国家、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而且适用于经济工作、军事工作、统战工作等各项领导工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法论原则,要求领导者有独立工作的能力,能够正确认识和把握领导活动的客观环境,确立正确的工作方针,独立地处理各种问题;要求领导者正确认识和把握领导活动中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系,把统一性和独立性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问题;要求领导者正确认识和把握领导活动中内力与外力的关系,把立足点放在充分发挥内力的基点上,善于利用外力,增强内力,推动工作的顺利开展。

(五)其他的方法

1. 一切经过试验

"一切经过试验",是指某一工作、某一方针政策,在大规模开展和实行之前,先在小范围内试行,从中取得经验,发现问题和弊病,及时予以修正,避免走弯路,避免造成重大损失,以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其方法包括"种试验田"、试点、典型试验等等。

2. "胸中有数"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均有质和量的规定性,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量变到一定的界限就发生质变。毛泽东把质量互变规律运用于实际工作,提出了"胸中有数"的方法。这一方法的基本要求是:

首先,"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

本的数量的分析。”①例如，对于一项工作，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必须有基本的调查，基本的数量分析。

其次，要“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②。这就是说要把握事物发展的“度”。例如，评价一项工作，是肯定还是否定，必须把握一定的“度”。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可以基本肯定；如果相反，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则应基本否定，否则就会混淆是非界限。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我们对事物的数量分析更加具体、更加精确。因此需要使用统计方法，对事物的各种数量关系，如主要的百分比、各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局部的量与整体的量、单个的量与综合的量等等，作周密的、精确的统计，并从动态上加以观察，引入“概率”概念，从偶然性中发现必然性，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

3.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广义地说，就是我们所管的工作很多，各方面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一方面，而把别的丢掉，即既要抓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像弹钢琴一样，十个指头都要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狭义地说，就是指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出发。1957 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③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无论粮食问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442 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82 页。

题，灾荒问题，还是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等等，都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统筹兼顾"、"弹钢琴"的方法，说到底，就是系统方法。系统方法是按照事物本身的系统性，把对象放在系统中加以考察，从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环境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的科学方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真正做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科学地协调和处理各种矛盾，就必须具有系统观点，掌握系统方法，特别要注意系统的整体性、层次性、动态性，使系统稳定、协调发展。

4. 波浪式前进

波浪式前进的方法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毛泽东指出："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①因此，我们开展工作也应是波浪式前进的，不能企图直线发展，要做到有进有退，有高潮有低潮，有发展有休整。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的发展，采取波浪式推进政策，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也是采取波浪式前进的方法。

社会主义建设也要采取波浪式前进的方法。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有时快些，有时慢些，经济发展有高潮，有低潮，有跳跃，有调整，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但总的说来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发展一段时间，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上台阶后，发现问题及时治理、调整，尔后继续前进。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规律。

以上讲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揭示了领导工作的规律和程

---

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

式，但是每个领导者实际运用起来，仍有高低之分、好坏之别。这里有一个领导艺术问题。

二、领导艺术

所谓领导艺术，是指在一定的经验和知识基础之上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领导方法、卓有成效地实现领导目标的这样一种非模式化的领导才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认为，领导艺术是一种离开数学领域的才能，它能够从大量事物的复杂关系中判断出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意思也是说，领导艺术是一种非程式化、非规范化的创造性的解决关键问题的领导才能。

领导艺术和包括领导方法在内的领导科学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领导艺术来源于领导实践，它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变化多端，难以用数学方法使之公式化，是领导科学中非模式化的创造性的领导行为；领导科学是领导者实践经验的结晶，它体系严谨，知识规范，形态相对稳定，有规律可循，是模式化的东西。领导科学要不断从领导艺术中汲取营养，使自己日益丰富、完善；领导艺术要争取领导科学的指导，使自己更加精湛、高超。前者好比一个稳定的内核，后者则是前者的外围软组织，没有软组织，内核不能存在和发展，没有内核，则软组织无所依附。

领导艺术的一般特点在于它的直觉性、随机性、创造性、适度性。即领导艺术表现在领导者思维技能方面，既有理论思维，又有经验思维，更突出的是直觉思维；领导者依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机动灵活、果断地处置事物的能力，是衡量领导艺术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志；创造性思维则是领导艺术的核心，它表现为领导者在规划、决策、指挥等活动中，锐意进取，另辟蹊径，开拓前进，出奇制胜；在领导活动中，掌握分寸，宽严适度，做事恰到好处，是领导艺

术的又一重要特征。

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内容十分丰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时度势，随机决断

毛泽东在谈到军事指挥员在战争中要审时度势、随机决断时指出："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①怎样才能做到审时度势，随机决断？毛泽东认为，一是要善于观察形势，深入了解情况；二是要抓准时机、当机立断；三是不失时机地对原定计划、方案进行调整。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挥"四渡赤水"，抗日战争时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解放战争时期指挥"三大战役"以及渡江作战、向全国进军，都充分体现了他善于审时度势、随机决断的高超领导艺术。

（二）原则的坚定性，策略的灵活性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②原则是指观察、处理问题的准绳，它反映一定阶级的立场和利益。原则的坚定性，就是要求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观察、处理问题。策略是指为达到一定的目的或战略目标而采取的手段和方法。策略的灵活性，就是要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手段和方法。

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是：灵活性要服从于原则性，原则性要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6页。

贯彻过程始终,没有原则性就会失去方向,就无所谓灵活性;但原则性又寓于灵活性之中,要通过灵活性来实现,没有必要的灵活性,原则性就不能贯彻。所以,一定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和区别对待的政策;根据战略任务的要求和客观形势的变化,迅速变换斗争形式,所有这些充分说明毛泽东是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巧妙结合的典范。

(三)注意分寸,掌握火候

注意分寸,掌握火候,就是办事情、处理问题,要把握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要适度。毛泽东在谈到要适度的问题时曾经指出:“过犹不及”是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应该讲究“适度”、“时中”。他说:“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并认为“中庸”思想“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①如何才能做到“适度”、“时中”,即掌握好“分寸”、“火候”呢?这就需要领导艺术。

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同顽固派作斗争时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三原则,特别是“有节”这一点,生动地体现了他善于注意分寸、掌握火候的领导艺术。他说:第一,有理,就是自卫的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斗争的防御性。第二,有利,就是胜利的原则,即不斗则已,斗则必胜,这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有节,就是休战的原则。即“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

---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6、147页。

战。""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1]在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巧妙地运用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注意分寸，掌握火候，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次反共高潮，发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了顽固势力，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有理、有利、有节"三原则，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普遍适用性。

（原载《毛泽东哲学分支学科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749 页。

要重视毛泽东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

研究毛泽东哲学的分支学科，首先要对毛泽东哲学的性质、特点和为什么要研究它的分支学科，以及如何研究等问题，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一、毛泽东哲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

我们在过去有关的研究著作和论文中已经论述过：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①

毛泽东哲学内容十分丰富，在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它大体上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理论哲学（基础哲学），一部分是应用哲学（指部门哲学或哲学分支学科）。

就理论哲学（基础哲学）而言，主要以《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哲学批注集和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为代表。其体系可概括为：以实事求是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

① 参见拙作《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毛泽东哲学思想大纲》（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 年出版、1989 年再版）、《毛泽东哲学的历史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出版）等。

主义唯物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以阶级斗争、群众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唯物论。

就应用哲学（部门哲学或哲学分支学科）而言，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运用到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党建各个领域，形成了毛泽东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即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经济哲学、道德哲学、艺术哲学、领导哲学等部门哲学。这方面的内容也是十分丰富的，具有极大的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

总之，毛泽东哲学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遗产，是一个丰富的宝藏。任何否定它的科学价值和指导作用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我们应当好好地发掘它，利用它，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使之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邓小平在谈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时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①这里虽然说的是毛泽东思想，但我想对于毛泽东哲学来说，也应该如此。毛泽东哲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我们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应该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这种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工作，也就是毛泽东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工作。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3—44页。着重点是引者所加。

二、毛泽东哲学分支学科研究的必要性

毛泽东哲学的总体特征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但重点在方法论上。它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学。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特别注重哲学原理的运用。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中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①；搞哲学的人要"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②；"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③。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写了许多重要著作，诸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论十大关系》、《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记录》、《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的决定》、《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等等，它们既是关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领导活动方面的著作，又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这就为我们研究、提炼、建构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道德哲学、艺术哲学、领导哲学等分支学科提供了"文本"。

毛泽东哲学分支学科的建构，不仅有着可能性，而且具有迫切

---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5、798页。着重点是引者所加。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9页。

的必要性。

毛泽东说过：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1]。只有大力加强应用哲学的研究，建立起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道德哲学、艺术哲学、领导哲学等分支学科，才能更好地发挥毛泽东哲学对各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各项具体工作的指导作用。因为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具有最高的普遍性，因而又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它所作出的规定也就最抽象、最简单。它要对各门具体学科和实际工作发挥指导作用，不仅要化为一般的方法论，而且要通过一系列的"桥梁科学"和一定的"中介"。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指出：世界上的一切理论，都是一层一层地概括的，到了最高层次就是哲学，就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总结出来的最高、最普遍的原理。这种最普遍的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们一切科学部门的研究，但它又通过各种桥梁同各门科学相联系，如通过自然辩证法作桥梁与自然科学联系起来，通过历史唯物主义作桥梁与社会科学联系起来，通过数学哲学与数学科学联系起来，通过系统观与系统科学联系起来，通过认识论与思维科学联系起来，通过人天观与人体科学联系起来，通过美学与文艺理论联系起来，通过军事哲学与军事科学联系起来，通过社会论与行为科学联系起来。[2] 毛泽东哲学也是如此。毛泽东哲学要发挥它对具体科学和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也必须找到"桥梁"和"中介"，建立起毛泽东哲学的各种分支学科（部门哲学）。这种分支学科，根据我们目前的研究状况，我想至少应该建构以下六种：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毛泽东的经济哲学、毛泽东的道德哲学、毛泽东的艺术哲学、毛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6页。

② 参见1985年11月23日《光明日报》。

泽东的领导哲学。哲学分支学科或部门哲学是哲学与客观实际联系的“中介”，它一头联系着基础哲学的理论，一头联系着具体科学的实际，成为由此达彼的桥梁，这个桥梁是绝对不能缺少的。企图逾越这个“中介”而使哲学直接作用于客观实际，只能把哲学降低为实证科学，只能使它庸俗化。

只有建立起毛泽东哲学的分支学科（部门哲学），才能为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提供较为直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当哲学还停留在只是一些高度抽象的概念和理论原则（基础哲学）的时候，它是难于对客观、生动、具体的社会实践起直接的指导作用的。哲学分支学科（部门哲学）的建立，就起到了把一般基础哲学由抽象转变为具体、由理论转变为方法的作用，使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有较为直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拿经济哲学来说，它把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化为科学的经济观和经济方法论，对经济建设实践起到了较为直接的指导作用。实践证明，任何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任何经济建设的重大成就，任何经济改革的重大胜利，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科学的经济观和方法论的结果。反之，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任何重大的失误或挫折，都是与不懂得或违背科学的经济观分不开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说过：“经济理论上的许多争论，都涉及到哲学世界观方法论问题，注意从哲学的高度来回答这些问题，就可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这方面很需要得到哲学界同志们的帮助。”①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呼唤“经济哲学”为之服务。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需要相对具体的改革对策与方案，尤其需要改革的理论引导，需要对经济运行内在矛盾、内在规律的研究，不仅需要“经济技术学”，而且需要“经济哲学”，为之提供科学的经济观和经济方法论的指

① 《哲学研究》，1987年第8期。

导。同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也呼唤政治哲学、道德哲学、领导哲学等的产生并为之服务。

只有把毛泽东哲学运用到各学科领域和实践工作中去，建立起各种哲学分支学科，才能不断地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哲学理论的发展不外乎三种形式：一种是从个别到一般，即对具体实践经验、具体科学成果进行哲学概括，提出和完善某些哲学范畴、命题、原理；一种是从一般到个别，即运用哲学理论于具体实践和具体科学，解决实践中的某些重大问题，形成某些新概念或某些哲学分支学科即部门哲学；第三就是从一个理论体系发展为另一个理论体系。毛泽东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和它的部门哲学的建构，兼有第一和第二两种形式的性质，是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哲学的解放、使之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的重要措施。

三、毛泽东哲学分支学科建构的方法论原则

要建构毛泽东哲学分支学科即部门哲学，首先要紧紧把握哲学分支学科（部门哲学）的基本特点。

毛泽东哲学的分支学科，是毛泽东哲学在各门具体学科中的应用和具体化，是这些学科领域中特有的哲学问题和方法问题。因此，要研究毛泽东哲学分支学科，就是要特别注意它与一般基础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的联系与区别，从而把握它的本性和特点，给哲学分支学科（部门哲学）以科学的定位。

哲学分支学科是一般基础哲学体系中较低层次的一个分支或门类，它与一般基础哲学有明显的区别。从研究对象来看，一般基础哲学研究的是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即整个世界的全部发展过程中最一般的规律；而哲学分支学科只是研究某一特

定领域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因而一般基础哲学是从整个社会实践和各门科学中概括出来的基础理论；而哲学分支学科只是从某一实践领域和某一科学中概括出来的哲学理论。从理论性质来看，一般基础哲学属于基础理论的范畴，是“纯粹的哲学”；而哲学分支学科则属于“应用哲学”的范畴，是部门哲学。从理论任务来看，一般基础理论哲学，提供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分支学科提供的观点和方法要比基础哲学来得具体和直接，它为基础哲学的最高概括作材料准备，为基础哲学返回实践提供途径，促成理论原则和具体材料有机融合，在认识的每个阶段和层次上体现抽象与具体的统一。

哲学分支学科也不同于各门具体科学。哲学分支学科和各门具体科学虽然都是某一领域的科学，都有相同或相近的研究对象，但它们各自研究的角度和方法是不同的。具体科学着眼于研究具体的事物和现象；而哲学分支学科则着眼于从总体上、从事物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中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具体科学的研究方法带有实证性；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带有思辨性。

了解了哲学分支学科（部门哲学）与一般基础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的联系和区别，我们就会发现，哲学分支学科具有三个基本特点，即哲理性（思辨性）、中介性、应用性。

所谓哲理性（思辨性），就是它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对某一学科领域中最基本的关系作深入的分析，揭示其最深层次的本质和规律，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是一种哲学理论。因此不应把它同具体科学的实证性混淆起来。

所谓中介性，就是指它是哲学与具体科学之间的中间环节，有如由此达彼的桥梁。在理论层次上，它较具体科学高，又比理论哲学低。它所提供的不是总的世界观，不是由总的世界观直接推演出的最高方法论原则，也不是具体的研究手段、计算方法，而是介

于两者之间较为具体的观点和方法论。

所谓应用性，就是指它更接近具体科学，更接近于实践，能够直接指导行动，但又不是提供具体的实证方法和操作技术，而是给具体科学指明方向，给人们以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指导，因而具有某种实用性质。

毛泽东哲学分支学科的建构，必须紧紧抓住上述三个基本特点，必须把毛泽东哲学的一般世界观、方法论应用于政治、军事、经济、道德、艺术、领导活动等各个领域，并从这些领域的具体科学（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伦理学、文艺学、领导学等）和社会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符合毛泽东哲学本性而又对相应的具体科学具有指导意义的哲学思维理论，从而有助于人们在从事某一具体科学的研究和实践活动时，把自己的哲学思维端正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轨道上来。因此，毛泽东哲学分支学科的建构，既要体现毛泽东哲学基础理论的推广和应用，又不是它的基础理论范畴的“对号入座”、“上挂下联”，也不是用具体科学的具体结论来取消哲学思考。只有这样，才能给毛泽东哲学分支学科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

其次，既然毛泽东哲学分支学科是建立在各门具体科学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要建构毛泽东哲学的分支学科，就必须认真研究毛泽东在政治、军事、经济、伦理道德、文学艺术、领导工作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要尽可能全面地搜集毛泽东各个时期包括早期、中期和晚期的著作、文稿、谈话、批示和有关的回忆录、文献资料，并具体地了解他在各个时期的实践活动。在这个基础上，对毛泽东的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伦理学、文艺学、领导学等各门具体科学进行归纳、整理，并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没有这项基础工作，毛泽东哲学分支学科的建构，就会变成一句空话，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了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

最后，毛泽东哲学分支学科的建构，必须注意哲学提炼和哲学概括。既然哲学分支学科的性质是部门哲学，其基本特点之一是哲理性（思辨性），因此毛泽东哲学分支学科的建构，必须对毛泽东在政治、军事、经济、伦理、艺术、领导工作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哲学提炼和哲学概括，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对这些领域或学科的基本范畴、基本关系作科学分析，揭示它们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概括出新的概念、命题来充实和丰富一般的哲学概念和范畴，或提炼出具有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意义的东西。比如毛泽东政治哲学中的“人民内部矛盾”，军事哲学中的“战争指导规律”，经济哲学中“两条腿走路”，道德哲学中“动机与效果的辩证统一”，艺术哲学中的“形象思维”，领导哲学中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等等，都是经过哲学提炼和哲学概括而提出的新概念、新范畴，既具有哲理性又具有应用性。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简单地以具体科学的概念、范畴和结论直接代替部门哲学的概念、范畴和结论，是偷懒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原载《毛泽东哲学分支学科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论毛泽东的人学思想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张扬了人的个性，使人的问题凸现出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境况面临新的挑战，人才的竞争已成为国与国之间的根本竞争；……所有这一切都把人学的研究提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人学思想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就是解决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解决人的存在发展、自由解放的问题。毛泽东的人学思想包括关于人的本质、价值、特性，人的自由解放和人性、人权、人道主义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它表现在《实践论》、《矛盾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人的基本特征及其他》、《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等著作之中。

一、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和人的特性

所谓人的本质就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性质，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原因和根据。人作为自然界的一种最高存在物，必然和自然界中的其他动物一样具有某种共同的自然属性，但人之所以和自然界的其他动物不同，就在于人具有特殊的社会属性，这种特殊的属性就是人的社会本质。人的社会本质是多方面的、多

层次的。

第一,以制造和使用工具为特征的物质生产劳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根本标志。马克思曾经说过:“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劳动是人的本质。[①] 恩格斯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人则改变自然界使之为自己服务,“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②]要劳动,人就要制造和使用工具;同时,人与人之间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否则生产劳动便不可能进行。正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毛泽东指出:人和动物“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③]

第二,人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即具有“自觉能动性”,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又一特点。马克思说:“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④]恩格斯也说: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凭激情或经过思虑的。[⑤] 正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⑥]

第三,人的社会性即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人的本质最集中的表现。人总是和一定的社会关系内在联系着的,并且存在于和活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因而具有社会性。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下同),第9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3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第8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47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77页。

成人们赖以存在并活动于其中的社会关系总体。正是这种社会关系总体规定着个人、社会集团、阶级的特殊本质。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具体的社会关系即人的社会性是人们互相之间区别的根本标准，是人的本质的集中表现。毛泽东坚持和发挥了这个观点，指出："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的、无问题的。人是什么一种动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即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②

人的本质的上述方面或层次是相互联系的。物质生产劳动是基础；自觉能动性是物质生产劳动所派生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最深刻的、最根本的本质，它支配和贯穿于其他方面的本质之中。前两个方面或层次是人所共有的，它们只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只能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规定性，而不可能是人们之间相互区别的规定性。所以社会性是人的根本的社会本质，是人的根本特性。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社会性主要表现为阶级性。只有把人置于以特定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特定的社会关系之总和中，并对他们所处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进行综合的观察和分析，才能把人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把握现实的人，才能深刻地揭示人的本质。

人的本质又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是抽象不变的。这是因为作为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是具体的。在社会历史长河的各个不同阶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83页。

段里，由于社会生产发展的状况不同，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也就不同，因而人的社会本质也就不相同。因此毛泽东要求我们不能“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①

与人的本质密切联系的是人的价值问题。人的本质决定人的价值，而人的价值及其实现又体现着人的本质。只有正确理解人的本质，才能正确了解人的价值，而正确把握人的价值，又有助于更加具体而深刻地理解人的本质。

价值是指客体满足主体之需要的作用和意义。价值必须在主体需要和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相互关系中得到确定和表现。人的价值是一切价值形态中最有价值的价值。所以毛泽东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②

由人的社会性本质所决定，个人必然要与集体、社会发生相互关系，因此人的价值可分为社会价值和个人自我价值两个方面。人的社会价值指个人对集体、社会所尽的责任和义务，为集体、社会所作的贡献；个人自我价值指社会满足个人（或群体）生存发展的需要的情况，即每个人的权利和地位问题。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自我价值是有机联系、辩证统一的。但在这两个方面之中，社会价值是主要的、主导的方面。因此，每个个人都应该把对集体、社会的贡献摆在首位；同时，集体、社会又要适当满足个人正当的合理的需要。如何看待和评价社会价值和个人自我价值的关系，体现出不同的人的价值观来。

青年毛泽东的价值观是个人价值至上的价值观。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离群索居诚哉不堪，然社会为个人而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12页。

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1]他十分强调“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2]可见他那时的价值观虽然是唯心的，但同反对封建专制、追求个性解放联系在一起，具有进步作用。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其价值不只是唯物的，他特别重视人的社会价值。他提倡集体主义，提倡以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强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结合，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共产党员要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强调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但晚年有过分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原则的倾向。

与人的本质和价值密切联系的是人的特性。人的本质和价值规定和制约着人的特性，而人的特性则是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具体地表现出人的本质和价值来，其中最突出的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性和个性、群体性和个体性的统一。

人在物质生产劳动中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并结成一定的相互关系，从而形成了社会。人总是生存于和活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通过各种社会形式、各种社会构成单位，参与社会活动，了解社会生活。社会既然是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现实基础，就必然从多方面规定和影响着人的存在和发展，因此人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物、是社会的人，因而具有社会性。然而，现实的人所生活和活动

---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版（下同），第 146 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51—152 页。

于其中的经济地位、周围环境、所受的教育、所经历的人生道路等等，都是各不相同的，这就决定每个人必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个性。离开人的个性观察人，也是不能真正了解现实的具体的人的。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由于经济关系、需要、利益、目标和理想等相一致，便以此为纽带而紧密联系和组成联合体、群体。任何现实的人总是一定群体中的成员。任何群体都是由一定数量的个体组成的，并且都受个体的状况和作用的影响。因此，群体和个体是辩证统一的，现实的人总是群体性和个体性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在谈到群体性和个体性问题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党性和个性问题时指出："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①1945 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对此更有所发挥。他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发展个性，其实这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正是要解除这些束缚，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他指出："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的意见是不正确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摧残个性的，使中国人民不能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身体也不能发展，精神也不能发展，都受到了摧残"。"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独立！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②他进一步说明了党性和个性的关系："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39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 336 页。

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①"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个性，谁要抹煞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种差别，结果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②他还指出："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其实人有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各人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力和积极性，应该"不拘一格降人才"。③这些都是很好的思想，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

第二，实践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人之所以成为人并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是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性形成发展的基础。可见实践性是人所固有的，是和社会性内在联系着的。实践性是人的社会本质的体现和对象化，是人的一种客观规定性。实践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因此，实践性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基本内容，但主体性不仅包括实践性，而且还包括人的能动性和自我调控性等内容。实践性和主体性是辩证的统一。离开实践性去了解主体性，就会把主体性抽象化；离开主体性去了解实践性，就会把实践庸俗化。所以毛泽东在讲实践性时总是把它同知识、情感、意志等主体因素联系在一起，讲主体性时又同实践性联系在一起。

第三，能动性和受制性的统一。

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的，是

---

①②③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40、341、416页。

人的自觉能动性的表现。但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是要受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制约的。只有尊重客观条件，符合客观规律，自觉能动性才能得到正确的有效的发挥，才能在实践中获得成功。反之，不顾客观条件，违背客观规律行事，就要受到惩罚，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因此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必须把能动性和受制性辩证统一起来。毛泽东以军事斗争为例说明这一问题。他说："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①

第四，自觉性与自发性的统一。

人在实践中具有正确认识世界的能力和可能性，以及运用这种认识去指导行动的可能性。一旦这种能力和可能性得到体现和变为现实，就确认了人的自觉性。但人们不能穷尽一切事物和它的规律，因此人的行动又往往带有自发性、盲目性。1943 年毛泽东在《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一文中说："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②1965 年毛泽东在重读自己的旧作《长冈乡调查》时写的一个批注中指出："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182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 82 页。

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①

二、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

人类的生存发展过程以及人们创造历史的过程就是争取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提高人的价值的过程。

自由的含义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次的复杂的。自由既有哲学涵义，又是一个政治历史范畴。自由首先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是劳动的产物。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后其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同整个世界（包括社会）的关系问题。在自然界、社会的客观规律面前，人能不能达到自己改造世界的目的，这就是所谓自由问题。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的过程，是同人类劳动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分不开的。因此，自由首先是劳动的产物，并随着人类物质生产劳动的发展而发展。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不能不从事物质生产劳动，把"外在的必然"转化成"为我的必然"，从而获得自由。恩格斯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②所以，自由不是认识活动和改造活动本身，而是人们认识必然性和利用必然性为自己服务的那种能力，是人在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自觉、自为、自主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论述了自由的一般含义（哲学含义），而且阐明了"哲学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联系和区别，指出所谓政治自由不过是整个人类一般自由的一个方面、一种特殊形态，它涉及的是人和人的关系，与制度、法制、纪律相对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5页。

待，也是以必然性为前提的，依赖于对社会政治生活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利用；政治自由有其阶级性，每个阶级都为自己的政治自由而斗争。

毛泽东的贡献首先是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自由的含义从认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①"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经过反复的实践，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认识了必然性，"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②在谈到人的自觉能动性在战争中表现为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时，他说："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③可见他是把自由看做是主动性的表现，不自由是被动性地位的表现。灵活性是说明指挥员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不仅如此，毛泽东还阐明了政治自由的具体性、相对性和阶级性，以及政治自由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指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④民主和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民主要受到集中的制约，自由要受到纪律的制约。他强调民主革命时期，争取民主自由既是实现革命胜利的必要手段和条件，也是革命的基本内容和所要达到的目的；社会

①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85、83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87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1页。

主义时期，人民的国家要采取措施，切实保障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得以实现。

其次是毛泽东指明了人们从必然达到自由的诸多条件。条件之一是，要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他说："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①条件之二是，不断消除错误和盲目的必然性。毛泽东认为，在认识过程中，当人们还没有认识客观必然性、处于盲目状态时，总是要犯错误的。他说："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②只有不断消除错误和盲目性，人们才能逐步获得自由。条件之三是，主体必须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③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主体认识能力的提高，是获得自由必不可少的条件。条件之四是，必须不断创造和改进"认识工具"。人是制造工具以从事生产劳动的动物。人要在实践中获得自由，就必须不断地创造和改进自己的生产工具，这种生产工具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认识工具。毛泽东说："认识工具"这个概念有点道理，在"认识工具"这个概念中还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逐渐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望远镜是人的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④这就是说，人们变革环境，改造世界，获得自由，不能不使用工具，

---

①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 269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46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296 页。

④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 390 页。

而改造世界的工具就是认识世界的工具。认识工具的创造和改进大大提高了人的认识能力，不断扩展着人们认识的广度和深度。认识工具是人类认识水平的尺度，它凝结着人类的集体智慧，是认识的社会性和能动性的集中表现。

再其次是从历史观、认识论上阐明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从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本来是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不同社会状态的本质的范畴。“必然王国”是指人被物化的社会关系所支配的社会状态，“自由王国”则是指人支配自己的社会关系即人支配物的社会状态。马克思、恩格斯借助这对范畴正确地阐明了自然领域的自由和社会领域的自由的联系和区别，从而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历史领域自由的实质。所谓“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就是从一种社会状态向另一种全新的、合理的社会状态过渡，即由人受历史必然性统治状态向人支配历史必然性的状态过渡，由人受社会关系支配状态向人支配社会关系状态过渡，即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这个过渡的关键是要有以剩余劳动为基础的“自由时间”的出现。因为人类的自由王国是依靠“自由时间”建筑起来的。有了“自由时间”，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才有活动的自主权、主动权，才有人类能力的发展，才有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必须有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即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人类社会走向自由王国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他指出：独立性、个性、自由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有财产所有权，他们使大批的人破产，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破产，财产集中在他们手里，他们自己有独立

性、个性、自由，而广大人民丧失了财产所有权，也就没有独立性、个性、自由。因此，要恢复他们的独立性、个性、自由，就要进行革命斗争，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大力发展生产力。[①] 不仅如此，毛泽东认为，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人们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并没有完结。他从历史观和认识论的高度对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引申和扩展。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②]由必然向自由转化的无限性，要求我们坚持自由与必然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每一个人、每一代人只能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来认识必然，改造世界，争取一定限度的自由，而不可能达到绝对的自由。另一方面，必然向自由的转化是一个世世代代无穷无尽的连续发展过程。任何一个人、一代人取得的自由都是整个人类自由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它既是前人自由的直接继承和必然发展，又是后人将要取得自由的必要准备和新的起点。因此，人类要不断地获得和保持自由，就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毛泽东晚年在哲学自由问题上，有忽视客观规律、夸大意志作用的唯心主义倾向；在政治自由问题上，他把民主自由仅仅看做是

---

① 参看《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415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5页。

手段而不是目的，没有从法制上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把争民主、争自由一律看做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阶级斗争的表现而加以批判。

人从自然和社会的盲目必然性的支配下解放出来，获得驾驭和利用客观规律的自由，就意味着人的解放。解放和自由是同等程度的概念。人的解放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指从自然力和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得到自由；与此相联系，还包括人的思想解放，即从旧思想、旧观念、旧传统和旧模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使中国人民不仅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而且要使他们从旧社会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传统、旧习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特别提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干。他提出农业机械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向自然界开战，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从自然力的束缚下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毛泽东还指出，在人的解放过程中，全人类的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具有一致性。他强调，无产阶级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纪律性，身受多重压迫，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它本身没有特殊的阶级私利，它的阶级利益同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完全一致。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解放全人类。他引马克思的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

与人的解放相联系的是人的发展问题。人的发展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同社会解放、社会进步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一致的。

马克思在把人类社会发展史划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三大社会形态依次发展的同时，相应地指出了人的发展的三大阶段，即“具有原始丰富性的人”、“异化的

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三大阶段。他特别强调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①。所谓"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就社会方面来说,就是要使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社会关系的主人,自己本身的主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就是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协调一致;就个人方面来说,就是要有充分的"自由时间"来自由全面发展自己的德智体和个性,可以根据社会的需要和个人的兴趣自由地选择职业,使人的自我价值得到充分实现。

毛泽东一向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作为我们长期的奋斗目标。他要求干部"又红又专"、"能文能武",要求青年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求全体人民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营造一个有集中又有民主,有纪律又有自由,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些都是他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和社会主义全面进步的思想。无庸讳言,毛泽东晚年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也有过一些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分工状况的空想成分。如所谓人人都要学工学农学军;所谓"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都要成为至圣至善的圣人等等,但总的来说,他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思想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人性、人权、人道主义

这里讲的"人性",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与人的本质、价值相联系的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

有没有一般的共同的人性，即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人的人性中是否具有某些共同点，是否具有跟神性、兽性、非人性、反人性相对的东西。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过一段话："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①]这段话现在看来，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又有不完全的地方。正确的方面是指出了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人性一般带有阶级性，批判了超阶级的人性论；不完全的地方是实际上否认了一般的共同的人性，把人性归结为阶级性，对于实际生活带来了不良影响。

应该承认，无论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存在着"人性"这种东西。因为"人性"是对人类共同性的一种科学抽象，是从各色各样的具体的人中抽象出来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子的区别，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②]人是社会的动物，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的科学抽象，社会性就是共同的人性。但是共性（一般）只存在于个性（个别）之中，共同的人性（社会性）只存在于具体的人性之中。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不同的社会集团的人性又是不同的、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不同，人性也就不同。但不管怎样，"人"的概念、"人性"还是存在，不是虚构的。

至于"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这个提法似有绝对化的毛病。的确，在阶级社会里，由于受阶级的影响，很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0页。

②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5页。

大一部分人性带上了阶级的色彩，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但不能说人性就是阶级性。因为阶级性并非人的惟一特性，此外还有别的特性，人性概念大于阶级性概念。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关系除阶级关系外，还有其他关系，如民族关系、血缘关系、性爱关系、乡里关系、师生关系等等。不仅如此，在阶级社会里，还有不带阶级性的一般人性，即不同阶级的人们所共同具有的东西。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各阶级的人也有某些共同的审美感受。1961 年 1 月，毛泽东在同文学家何其芳的一次谈话中说："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①例如，漓江之秀丽，长城之雄伟，不同阶级的人，也有同样的审美感受，如同酸甜苦辣对于不同阶级的人都有同样的味觉一样。

承认共同的人性，是不是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论？不是。所谓超阶级的人性论，是认为人性（共同人性）能够超越（消除）人们之间存在的阶级差别（阶级性），具有超越（消除）阶级对立的力量和作用。其实，共同的人性是不可能消除阶级利益的对立，不可能填平阶级对立的鸿沟的。否认共同的人性的后果，一方面是把人性等同于阶级性，把社会关系等同于阶级关系，强调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一切、观察一切，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另一方面是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践踏人性，导致非人性甚至反人性的行为不断发生，给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

既然承认人有共同特征，人有无上的价值，人就应当有做人的权利即人权。所谓人权就是指人身自由及其他民主权利。在阶级社会里，人权有其阶级性。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针对封建专制对人性的践踏，资产阶级进步的政治家在个性自由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权这一概念。他们鼓吹"天赋人权"的思想，直接以人权作为反

① 见《人民文学》1977 年第 9 期。

对封建专制、进行民主革命的武器，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当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人权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由于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人权对他们来说是一纸空文。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剥削制度，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的民主权利有了根本保障，人权得到真正实现。近年来，人权问题成了国际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敌对势力借口“人权”问题干预别国的内政，甚至发动侵略战争。因此，对于人权问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毛泽东历来反对“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观念，但是他特别强调人民当家作主，要求真正实现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他说：没有什么“天赋人权”，人权靠斗争得来，只有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谁赋予的？是老百姓赋予的。又说：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的自由，我们要采取措施保证这些权利的实现。[①] 他还强调，人民管理上层建筑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他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②] 这个思想是极其深刻的。

讲了人性、人权，自然要讲**人道主义**。所谓人道主义就是指强调人的地位，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的一种思想体系。人道主义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之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基础之上的。它从抽象的人和人性出发，认为历史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动力在于人类

---

① 参看《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60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 129 页。

的善良天性或理性;它以利己主义为核心,其政治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符合他们“理性”的资本主义制度。这种人道主义具有进步和虚伪的两重性。从它产生之时起,就既有反宗教、反神权、反封建专制及其人身依附关系的进步性;又有用“自由、平等、博爱”、“等价交换”、“公平贸易”的假象去掩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的欺骗性。

马克思主义在分析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时,从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出发来考察人,批判和扬弃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来理解人的抽象性,认为人是“现实的人”、“具体的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发展着的人,把抽象的人道主义改造成为现实的人道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我们今天宣传和实行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也是革命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战争条件下的表现形式)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明确提出了“革命人道主义”的口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求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1939 年 12 月 1 日毛泽东为悼念白求恩写下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题词。这虽然是作为医疗卫生工作方面的口号提出来的,但它不仅仅限于医疗卫生工作,已经扩展为我们的一项重要的伦理道德原则。1958 年 10 月 6 日由毛泽东起草的、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又一次提到了人道主义。《告台湾同胞书》写道:“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①]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已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 439 页。

把人道主义原则运用到待人处事的许多方面。

——怎样对待群众？毛泽东认为要尊重群众，以平等态度待人。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对人民军队提出，对群众要“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打人骂人”。1958 年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要求干部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相互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怎样对待犯错误的同志？1942 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就提出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会主义时期提出“团结——批评——团结”、“一看二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关系。

——怎样对待敌人营垒中可以争取团结的力量？毛泽东提出“既往不咎”、“以礼相待”的方针。1965 年 7 月 27 日，毛泽东在接见李宗仁时说：跑到海外的，凡愿意回来，我们都要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不咎既往，以礼相待。

——怎样对待俘虏？毛泽东历来主张优待俘虏，不加侮辱。1936 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指出：被我们俘虏和解除武装的日军官兵，将受到优待。我们不会杀死他们，而会像兄弟那样对待他们。1940 年在《论政策》中声明：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①

——怎样对待停止捣乱的反动分子？毛泽东主张“施仁政”、“给出路”。1949 年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767 页。

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吧。”[1]在《论政策》中说：“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2]1951年5月毛泽东在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对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外，其余犯有死罪，但民愤并不太深，不必立即处死者，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3]这是一个慎重的政策，人道的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有利于建设事业。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4]这也是人道主义的一种表现。

现在的问题是，毛泽东把人道主义作为一项伦理道德原则运用于待人处世的许多方面，这是不错的，但应当说是很不够的。如果把革命的人道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简单地归结为某些伦理道德规范，那就把它的意义缩小了，地位降低了。笔者认为，革命的人道主义或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说到底，是一种价值观，它强调人的价值，赞美人的尊严，尊重人的自由民主权利，追求人的发展和完善，它的基本原则是“人的价值是第一位的”。其基本内容除上述待人处世最起码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外，主要是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社会、党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都要尊重社会成员做人的基本权利，保证他们的合法地位、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要把关心群众疾苦、为广大群众谋福利作为自己的天职；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每一个成员，都要关心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振兴，把国家、集体的利益放在首位，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6—147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67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38页。

己的力量。全体社会成员都要发扬"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建立起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型关系。总之，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应当突出人的价值，把人看做是最宝贵的财富，看成是历史的主体和社会的主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也应当十分重视创造条件来培养和开发人的潜能，使人不仅在品格方面，而且在智力、体力、审美能力方面都得到发展。这样来了解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就能够从历史观和价值观方面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指导原则，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前进。这就是我们今天研究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现实意义。

（原载《江汉论坛》2001年第3期）

下　篇

邓小平哲学研究

DENG XIAOPING ZHEXUE YANJIU

XIAPIAN

毛泽东思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认真研究毛泽东思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对于在新时期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于用当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理论、历史和现实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具体地说，应包括以实事求是为特征的思想认识路线，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和以社会基本矛盾为主要内容的唯物史观几个部分。

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因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也是它的逻辑起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路线去分析国情，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

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一个体系,其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基础性的范畴,其他范畴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性范畴之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作为一根红线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各个基本问题、基本原则之中,成为这一理论活的灵魂。

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和中国特点相结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在政治倾向上,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思想路线上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等等,所遵循的都是毛泽东所倡导的“两点论”、“两分法”的唯物辩证法原则。

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改革开放方针的理论根据。毛泽东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指出这种矛盾的性质和特点,不是对抗性的,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正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对外开放也是一种改革,目的也是为了吸收国外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可见,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是改革开放方针的理论根据。

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渊源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一篇大文章，它的上篇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下篇是社会主义革命。上篇是下篇的必要准备，下篇是上篇的必然趋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前途，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理论即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分不开的，它们之间有着历史的联系。

首先，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找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的起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出，旧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经济文化落后，革命后不能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然后再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由于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它不可能长期踏步不动，必须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样，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不可能完全把中国落后的生产力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拉平，因而就决定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而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去实现许多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历二三百年才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特别是由于我们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得过快，时间短促，这就更加重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和它的长期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因此，我们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客观实际出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的重要依据。

其次,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提供了雏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指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允许合作社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他还根据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主张"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他认为这样做,"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①这个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即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提供了雏形。当然这不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直接延伸,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生产力的现状和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的一种创造。

再其次,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提供了雏形。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国体以及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个政治体制模式为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提供了雏形。当然,我们现在的人民民主专政所担当的已经不是民主革命的任务,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但是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是不能割断的。

最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方针提供了借鉴。毛泽东根据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而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原理,提出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0页。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适应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强调批判继承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反对复古主义和“全盘西化”，并要求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和当前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这就为确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方针，即确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借鉴。

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积极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先导

毛泽东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情况，从 1956 年开始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成功的经验可以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因素和先导。

一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为按农、轻、重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与此相联系，他还提出了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挥“两个积极性”；扩大企业自主权，让企业有一定的独立性以及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思想。这就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方针和产业政策，以及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遗憾的是，这些思想没有能够很好地贯彻，农业的基础地位没有真正解决，第三产业长期被忽视，经济体制改革未能跳出原有的框框。

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讨。1958 年

11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时，批评有些人因为向往共产主义而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说：现在有人"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应当利用商品来团结几亿农民。"[①]这里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概念。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地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②]这里说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可以看做是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思想的萌芽。当然，这些概念还不具有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样深刻丰富的内涵，也不是现在我们所指的特定含义。

三是1956年底提出"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1956年12月毛泽东针对公私合营后存在的某些问题，同工商界人士进行了多次谈话。他在谈话中指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

---

① 毛泽东1958年11月10日下午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②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16页。

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①毛泽东这段话的意思是，在所有制结构上，要在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适当保存和发展一些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并引进华侨投资。这样做，可以使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有个"对立面"，保留一定的竞争机制。他当时把商品经济看成资本主义范畴的东西，因此他认为自由市场基本性质是资本主义的。至于消灭资本主义那是将来的事，不是一下子可以完全做到的。此外，在社会主义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以后重新保存和发展的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它们的地位和作用也和以前的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显露了有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束可贵的思想火花。可惜还没有形成决策，便很快为他在此之前提出的"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绝种"的思想所代替了。

四是毛泽东提出过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的思想。1958 年 11 月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总结公社化的教训时，针对当时一些干部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实行产品直接调拨的倾向，指出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发展商品交换，生活不可能富裕。他提出每一个公社都要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他还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 170 页。

他说：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不能孤立看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就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①] 此外，他还认为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认为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最终同生产力水平有关系；他不同意斯大林把商品生产局限于消费资料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消费资料是商品，有些生产资料也是商品。

与此相联系，毛泽东还强调价值规律的客观性及其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他着重指出，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存在于公社内部，也存在于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实际上生产资料各部门之间也有价值法则起作用。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等价交换，不能无偿占有。他批评“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时指出，“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为了纠正“共产风”的错误，他提议要对县社干部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客观规律、客观法则，违反它，就要碰得头破血流。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②]他批示道：公社化过程中平调社队和社员的财物旧账

---

①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34—440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一般要算清。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教会群众监督干部。①

毛泽东上述有关商品生产及其相关范畴的论述是很精彩、很深刻的，至今仍不失其光辉。但他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突出的表现是他的社会主义商品观主要是面向农业生产，目的是防止剥夺农民，而主要不是希望通过发展商品经济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没有认识到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走向现代化、走向富裕文明的必经途径。他在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划清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间的界限，实际上仍然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会引出资本主义的"鬼"，因此要限制它、防范它。这种认识上的罅漏，成为他偏颇的商品经济理论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之间的连接点。后来，他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正确认识，引导他一步步加深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又引导他进一步排斥、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此外，在民主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也作过一些思索，作出了一些重要决策。其中最主要的是提出了关于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民主、安定的政治环境；提出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民主政治指明了方向；他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希望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总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很多重要的精辟的思想，这些思想经过提炼后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①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4页。

理论的先导。但毛泽东的探索从总体上说还没有突破以产品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模式。其原因归根到底是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而邓小平则恰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有所前进。

四、对毛泽东晚年严重错误的纠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契机

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不属于作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的范围，但它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有十分重要的反思作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更重要的是对毛泽东晚年严重错误的纠正。没有这种纠正和发展，便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首先，纠正超越阶段的空想论，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立论依据。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虽然提出过“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总的来说，他晚年犯了超越阶段的空想论错误。他从所谓“不断革命”、“趁热打铁”、“趁穷过渡”的思想出发，而不是从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的实际出发，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急于求成。他批判“反冒进”，发动“大跃进”，要求短时间内超英赶美。“大跃进”受挫以后，他虽然作过一些纠正，但总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多大改变，仍然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初阶段，就要准备从生产关系上向共产主义过渡，否则就是“把社会主义凝固化”，就是主张“彻底巩固”论，就是“修正主义”。这种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来谈论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超越阶段的空想论。这种空想论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左”倾错误的总根源。邓小平纠正了这种

超越阶段的空想论，指出以往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一切教训的根子在于“当时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①]

邓小平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不是“新民主主义论”的简单延伸，也不是毛泽东的“初期阶段”、“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等称谓的变化，而是具有深刻含义的科学论断。它不是泛指一般社会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带有特殊矛盾、面临特殊任务，需要用特殊方式、途径、手段完成非常规的社会发展任务的阶段，即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实现别的国家通常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任务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今后发展的道路问题，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基本依据。

其次，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

毛泽东晚年的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之后还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反右派以后，先是重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接着认为党内斗争必然反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最后发展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经济建设则被摆在次要的、服从的地位，并要由阶级斗争、“政治挂帅”来推动，因而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果断地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只在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9页。

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新时期的阶级斗争是人民同那些反社会主义分子之间的斗争，是历史上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就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条件和政治保证。这是一个根本转变，没有这个根本转变，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第三，纠正"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决定论，恢复生产力理论、确立生产力标准，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重要基石。

重视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本来是毛泽东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一大贡献；但夸大生产关系的作用，把它变成生产关系决定论，却成了毛泽东晚年的一个严重的错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看成是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提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成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到最后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趁热打铁"、"趁穷过渡"，这一切都是他忽视生产力的发展，而以生产关系为中心考虑问题的结果。毛泽东自己说过：你们爱研究生产力，我的兴趣则是专门研究如何改变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他承认："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①他认识到这是他的一个缺点，但后来并没有多大改正。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还同意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因而否认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结果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29 页。

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的上述错误，恢复了生产力论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好坏得失的标准。这就揭示了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所在，同时也恰当地概括了现阶段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首要问题。生产力标准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认识的具体化，它把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目标同最终理想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起来，使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真正置于现实的基础上。

第四，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观念，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造精神的突出表现。

尽管毛泽东曾一度强调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但总的来说，他是排斥、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所以到了 1974 年他说：我们现在实行的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商品制度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因此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他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中不起决定作用，即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是计划，是“政治挂帅”，价值规律只是计划工作的一个工具，不是计划工作的主要依据，社会主义经济应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这样一来，价值规律的作用被人为地限制在狭小的范围，计划工作的作用被无限制地扩大，造成了长期以来我国僵死的计划产品经济机制，失去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应有生机和活力。

邓小平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从当代生产力发展要求来看，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就是

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而不是产品经济。在现阶段要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就必须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市场机制即价值规律的作用，实现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邓小平根据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经验，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已经证明，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计划与市场内在地结合起来，才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的发展。这是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认识上的一个历史性飞跃，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突破，是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大贡献。它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理论勇气和创造精神。没有这种勇气和精神，就不可能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第五，纠正平均主义的价值取向，确立物质利益原则，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表现出一种浓厚的平均主义的价值取向。1958 年他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倡“吃饭不要钱”，说这同三国时代张鲁的“五斗米道”相似，可见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①。他还提出要在整个社会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薪金制，实行供给制，后来虽有所纠正，但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60 年代他又认为，强调物质利益原则，“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

① 参看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37 页。

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①]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计件工资、奖金制度，等等，是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中他发布“五七指示”，希望把全国建成一个纯粹公有制成分、限制商品经济、产品并不丰富但分配上大体平均、社会分工模糊、人人身份平等的“共产主义大学校”。这种所谓平等、公正、纯洁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和空想成分的农业社会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纠正了这种平均主义的价值取向，坚持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关心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他明确指出，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一理论，彻底纠正了社会主义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影响，为找到并制定强化激励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的利益驱动、促使经济尽快上台阶的社会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这个过程中，既鼓励竞争，又提倡互相帮助，既合理拉开差距，又注意防止两极分化，这样就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实现公平和效率两者的内在统一找到了具体途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既有继承的关系，又有发展的关系。继承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成果，体现了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连续性；纠正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作出新概括，体现了邓小平的开拓、创新精神和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曾经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

---

①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4页。

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①这是对我们现在的工作和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最恰当的说明。继承毛泽东的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并用它来指导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夺取新的更大胜利，这是对毛泽东最好的纪念。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 年第 6 期）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00 页。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首先要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为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坚持这条思想路线对于我们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来概括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的一个创造

（一）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毛泽东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为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早在1930年5月，为了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作斗争，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概念，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指出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①，要反对从本本出发，按“既定办法”行事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并且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批判了“先哲”标准、本本标准、“上级”标准，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6页。

澄清了一些糊涂观念，标志着我们党以调查研究理论为特色的思想路线初步形成，但当时它并未能为全党所接受。

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后，为了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批判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揭露其思想根源，1937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从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联结两个方面，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实事求是”一语，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概念，赋予它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内容，用来表达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①

这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包括这样几层意思：

1.从实际出发。它肯定了“实事”即客观事物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人们认识的对象和出发点。认识应该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不应该从主观想象出发，或从死的书本出发。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1页。

2.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要求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去研究（“求”）客观事物固有的规律性（“是”），用以作为自己行动的向导，使主观符合客观，并进而改造客观。这个过程，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过程，亦即从特殊到一般，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这两个过程都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

3.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指明了“求是”的根本方法是调查研究，即深入实际，作周密的调查，详细占有材料，并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通过分析综合，得出科学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事物表面现象的罗列，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暴露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

由此可见，实事求是肯定了客观事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人的认识的出发点，它体现了唯物主义的客观性原则；实事求是认为规律是客观事物固有的联系，它存在于事物的运动变化之中，并各有其特点，原因在于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人们要想把握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过程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由浅入深的辩证发展过程。这样，实事求是就把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融为一体，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锐利的思想武器。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还深刻揭露了与实事求是相对立的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性质、特点、社会历史根源和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的途径和方法，从而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但是，这条思想路线在50年代后期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二)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突出的表现是把解放思想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明确作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下面我们来作一些具体的说明。

应该说,毛泽东所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内在地包含着解放思想的要求,因为要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必须提倡独立思考,反对盲从,反对奴隶主义。1958年毛泽东也曾提倡过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但当时没有能够很好地与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科学结合起来。1978年邓小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恰恰是从解放思想、反对"两个凡是"开始的。当时的情况是,旧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束缚还没有清除,又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枷锁。邓小平第一个站出来批评"两个凡是",认为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冲破教条主义、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禁锢。他明确指出,实事求是与因循守旧是不相容的。要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不打破"四人帮"时期形成的思想僵化,不破除本本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不能重新确立,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所以他特别强调解放思想。他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题目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标志新时期开端的一篇解放思想的宣言书。邓小平在讲话中,一开始就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

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①]接着他分析了思想僵化的原因和危害，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②]他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给予积极支持，他说这个争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它关系到思想路线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而也是政治问题。所以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也就是坚持解放思想的问题。可见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来概括党的思想路线的确是邓小平的一个创造，它使党的思想路线更有针对性，同时更加完整、更加深化。

以上这些都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的论述。在第三卷中，邓小平又反复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尤其是开卷篇和结束篇，重点是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中间还有一篇文章专门讲"解放思想，独立思考"的问题。他指出："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③]又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1、14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页。

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①他的意思是说，归根到底，我们就是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探索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第三卷的时间跨度是1982年至1992年，在这段时间里，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解放思想又有了新的时代要求，新阶段思想解放的方面很多，但一个总的主题就是不要被一些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束缚了我们的思想和手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以改革开放的几个实例来说明。

首先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的问题。这是我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口。但开始的时候并不踊跃，好多人在看，最初只有1/3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2/3，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原因是许多人受“包产到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思维定势的束缚，思想不解放。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予积极支持，肯定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并指出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同时把基层创造出来的经验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另一方面是允许看，不搞强迫，不搞运动，坚持自愿原则，这样就慢慢跟上来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找到了一种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农村面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姓“社”不姓“资”。可见，农村改革的突破，是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分不开的。

兴办经济特区，这是对外开放的突破口。这个突破，也是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分不开的。对于这件事情，一开始也有人担心是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0页。

不是“搞资本主义”，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而邓小平的态度，也是一方面提倡解放思想，指出这些人不了解特区公有制仍然是主体，外资只占一少部分，它要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国家可以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有利于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大力支持特区的试验工作，用事实来说服对特区持怀疑态度的人。1984 年 4 月，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特区还是姓“社”不姓“资”。所以改革开放的每一重大实践步骤，都要解放思想，突破姓“社”姓“资”框框的束缚。

如果说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兴办特区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在改革实践上的两个突破，那么，“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关系改革全局的理论上的三大突破。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等同起来、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然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兴衰成败的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而逐渐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观点。这个观点写进了 1984 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在这个文件通过后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

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解放思想，我们老同志有这个任务。”①邓小平这里只讲老同志有解放思想的任务，因为他是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的讲话。其实，所有的同志、全党的同志都有继续解放思想的任务。

在“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观点的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1985年10月邓小平同美国企业家代表团谈话时，客人问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他回答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的发展。”②针对有人认为如果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定位在“市场取向”上，即把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那就“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混淆了”，就会“改变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观点，邓小平在1990年12月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③到了1992年南方谈话时他再次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

①②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1、148—149、364页。

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①]这"两个不等于"，又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更是"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或者说是根据实践的发展改变了我们老祖宗说过的某些话。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剥夺了资本主义对"市场经济"的专利权，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传统观念，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蓝图，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找到了一条最大限度地学习利用资本主义、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国各阶层人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创造性，又兼顾公平和效益、实现共同富裕的希望之路。

关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论断，也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作出的，是对中国国情和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重大成果，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找到了正确的历史方位，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在现实的可靠的基础之上。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说，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重大突破都是同解放思想分不开的，而新时期解放思想的主题又是要求我们不要被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束缚了自己的思想和手脚。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②]这里要说明的是，"三个有利于"不直接就是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而是说凡是"三个有利于"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不利于综合国力增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372页。

强、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我们反对抽象的争论，不是说根本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而是说不要搞先验论，不要动不动就拿大帽子吓人，要允许闯，允许试。

二、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包含着内在的统一

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内在的统一。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他就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①在第三卷中，他也是强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凡是在讲实事求是的地方，他同时讲解放思想；凡是讲解放思想的地方，他同时强调实事求是。1992 年他在南方谈话时，要求我们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千万不要丧失时机。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②又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③“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④可见他既讲解放思想，敢试、敢闯，又讲实事求是，强调要看得准；既讲要加快发展，又讲要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64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2 页。
③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5、377 页。

切合实际、扎扎实实，稳步协调。所以他提出的“三个一点”是建立在对客观条件实事求是的分析基础上的，是根据需要和可能提出来的。

所谓需要，就是客观形势要求我们抓住时机，加速发展。我国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能否按期实现，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把握住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现在第一步的战略目标已经实现，最重要的是要走好第二步，迎接第三步。为此，必须抓住时机发展自己。邓小于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①

所谓机会或可能就是指国际和国内的有利条件。从国际条件来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德国统一，世界上美苏称霸格局已被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虽然世界并不安宁，但总的趋势是新的世界大战危险正在减弱，我们可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搞建设；从经济方面说，进入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正朝着区域集团化和在此基础上的一体化、国际化方向加速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国经济活动不能不受到全球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影响，由于我国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市场广阔，西方国家仍将有求于我，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世界上出现了高新技术革命的潮流，为我们提供了采用新技术、加快发展的好机遇。从国内条件看，我国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变化，工业总产值有较大的增长，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治理整顿取得较大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

的成效;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开辟为外商投资提供了较好的软硬环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体制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所有这一切都为加快改革开放,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所以邓小平所讲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主要是指从那些过时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中解放出来,使自己的思想认识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相一致。实事求是,则是指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出发,从客观实际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以此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因此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同一个事物,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一样的。但是这种统一,不是两者的等同,而是有差别、有侧重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解放思想是相对于禁锢思想、思想保守僵化而言的;实事求是则是相对于那种违背科学、违背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而言的。解放思想是要解决"要不要、敢不敢"冲破禁锢,更新观念的问题;实事求是虽然也包含有思想要解放,不迷信,不盲从的意思,但主要是解决"怎样解放,怎样创新"的问题。实践是不断发展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也是不断发展的,不能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只有继续防止"左",勇于解放思想,才能为实事求是扫清障碍;同时,只有实事求是,真抓实干,解放思想才不致流于空谈。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要处理好主观预想和实际需要、实际可能的关系,敢闯、敢试与从实际出发的关系,外地经验与本地实际情况的关系,尊重客观规律,量力而行,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是大的损失;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抓住机遇,把经济搞上去。90年代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以极大的历史责任感,努力使国民经济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发展速度

低了不行，那样经济就上不去，我们就会处于被动地位，就会受制于人。凡是有条件能快的就快一些发展，暂时不能快的，也应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加快发展。

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精髓，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邓小平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①这就是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需要有一个基础性的范畴或原理作为它的起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即体系。这个基础性的范畴或原理，就是这个体系的逻辑起点。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逻辑起点应该是历史起点的客观反映。恩格斯说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

的形式上的反映。"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性的范畴，其他范畴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对外开放"、"一国两制"等等，都是建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的。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逻辑起点，正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历史起点的反映。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创立，是从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的，没有思想路线的转变，也就没有政治路线的转变，没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也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部观点的中心线索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每一个基本问题和基本原则之中，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阶段问题，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和动力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和步骤问题等等，都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中心线索，成为这一理论活的灵魂。上述许多问题前面已有分析，不再赘述，这里仅就祖国统一问题上的"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而言，它更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坚持和贯彻。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②

（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方法论原则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1页。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我们提供了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原则。调查研究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和最直接的体现。生机勃勃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由亿万人民群众创造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这种创造在理论上的升华和系统化。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只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才能不断开拓前进。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提供了衡量一切工作、衡量我们的政策及其实践正确与否的标准。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这个标准破除了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避免了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现实的标准，鼓励我们在工作中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发挥积极性、创造性。"三个有利于"标准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化为方法论原则的具体表现。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提供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它要求我们树立全面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力戒主观片面性，告诉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在政治倾向上，既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等，在工作中加强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由此可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所蕴含的方法论原则，不仅告诉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而且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和"不怎样做"，这就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断取得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排除“左”和右的干扰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谈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时曾经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①在第三卷中，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 20 年，甚至再加上 50 年，整个四个现代化过程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这是说的要警惕右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特别强调要纠正和防止“左”的错误。1987 年 4 月 26 日他在同外宾谈话时指出：“搞社会主义，搞四个现代化，有‘左’的干扰。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着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扰。所谓右的干扰，就是要全盘西化，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②同年 4 月 30 日又指出：“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③1987 年 6 月他在同外宾谈话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79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25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28—229 页。

时总结历史的经验指出："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①1992年南方谈话时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和总结，他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②右的表现主要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动乱。"左"的表现主要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什么主要是防止"左"呢？

一是因为"左"是当前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主要障碍。改革开放要探索和开辟新的道路，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观念，阻力主要来自"左"。不克服"左"的影响，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无法前进。

二是因为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对党的事业危害最大、持续时间最长、造成恶果最严重的是"左"的思想影响。民主革命时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使革命根据地力量损失了90%，白区革命力量几乎损失了100%。社会主义时期20年的"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左"的东西根深蒂固，往往带有革命色彩，拿大帽子吓人，好像越"左"越革命。因此在中国克服"左"的影响，转变观念、解放思想的任务就特别艰巨。

三是因为"左"的东西在我国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一般

---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375页。

说来，在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国家，“左”的东西容易滋生。我国原是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般的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小农经济虽已不复存在，但小农意识、小生产者的心理习惯仍然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思想封闭保守，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缺乏开拓精神；“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自然经济观念；主观片面、好走极端、狂热空想、容易接受“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的思想方法等等，是产生“左”倾错误的重要社会历史根源。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党内特别在领导干部中要强调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目的在于使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密切结合当前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解放思想，同心同德，把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搞上去。当然对于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以至偏差，要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不要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或右。

（原载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光辉旗帜》，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至今已经整整20年了。认真回顾和总结20年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及其以后的历史发展，对于我们继续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深入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及其历史发展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即是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拨乱反正，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还是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维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那一套“左”的路线和徘徊不前的旧局面。当时觉醒了的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要求让老干部出来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彻底纠正以往的错误。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却提出“两个凡是”的口号，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认为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性，就不能否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意见和重要决定。从这个错误立场出发，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鼓吹"抓纲治国"，阻挠和拖延恢复老干部的工作以及平反冤假错案。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呢？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是正确的政治路线得以确立的突破口，哲学是政治变革的先导。人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找来了一件武器，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用这件武器来与"两个凡是"作斗争：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哪个领袖的决策和指示，不是哪个领导圈阅了的文件，而是社会实践，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包括路线、方针、政策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引发了一场全国规模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新华社当天转发了这篇文章，5 月 12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多少新的理论观点，但它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批评了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指出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一样。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判断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不依主观觉得如何而定。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文章指出，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可以不受实践的检验，相反，他们认为任何思想、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以便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文章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冲破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的种种禁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它大声疾呼：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这些精辟的论述，从理论上和思想路线上揭穿了"两个凡是"的画皮

和种种似是而非的依据，打中了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要害。文章发表后即在党内和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干部和群众热烈赞扬；但遭到少数人激烈反对，认为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泽东思想，是“砍旗”、“丢刀子”。斗争十分尖锐，这场讨论不仅在理论界、在人民群众中展开，而且也在党政领导机关中展开。

在讨论形势处于十分困难的时刻，是邓小平以政治家的大无畏精神和理论勇气站出来说话。早在 1977 年 5 月邓小平就表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发表后，1978 年 5 月 19 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文章符合马列主义嘛，扳不倒嘛！接着，6 月 2 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阐述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①他还在谈话中特别引证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过的一句话：“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②这就旗帜鲜明地表示了他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一时间，中央和地方的报刊连续发表讨论文章，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先后发表文章或谈话，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1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284 页。

肯定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要意义。同时，全国大专院校、党校和科研机关纷纷召开讨论会。这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很快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宣传、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这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我国现代史上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通过讨论重新确立了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于恢复我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对于全面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并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经过这一讨论之后，人们对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的认识比较一致了。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人们对拿什么来衡量实践即社会行为的好坏（包括改革开放出台的措施、领导工作的成果以及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否优越等等）又产生了种种疑问。有的人认为仍然要以“凡是”为标准，有的人认为要以“突出政治”、分清姓“社”姓“资”为标准。这个问题不解决，改革开放难以迈开步子。于是在实践标准的基础上，就进而提出了生产力标准问题。

1978 年 9 月，邓小平在谈到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时说：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加速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①同年 12 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28 页。

上论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时又指出："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是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①这段话的前一部分是专门对经济部门谈的，其中的管理、技术、劳动生产率等都是生产力方面的因素，显然包含了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准的思想；后一部分则提出了这一思想的普遍意义，即有了价值标准的内涵，人民利益标准也包括进去了。1980 年他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②

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1984 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1987 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则对生产力标准作了系统的论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初级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③并且报告还把生产力标准同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人民利益标准联系起来，强调"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繁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50、314 页。

③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下同），第 11 页。

荣，公有制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一句话，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和吸引力的不断增强，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标准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①十三大从生产力标准出发，确认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完整地提出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生产力标准问题的提出，同真理标准问题一样，引起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鸣，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学习和讨论，再一次引导人们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推进改革，扩大开放，突破了那种离开生产力发展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空想模式和僵化观念，把一切既成的观念、体制、政策、措施以及人们的行为、实践都放到生产力标准面前接受检验，从而判断优劣，决定取舍。

党的十三大以后，由于生产力标准的学习、宣传和贯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把生产力标准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如把生产力标准理解为单纯的产值标准、小集团利益标准，或把生产力标准绝对化，排斥其他标准等等。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苏东剧变，"左"的东西开始抬头，有的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反对搞市场经济，主张对改革开放先要问问姓"社"还是姓"资"，然后再决定取舍，实际上是要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正是在这个重

①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第60页。

大的历史关头，邓小平发表了在南方的重要谈话。在这个谈话中邓小平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在生产力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我们的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他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①这就是有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具体贯彻，是生产力标准的补充和完善，它把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统一起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在哲学上的立论基础，对于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开拓前进，有重要意义。

邓小平发表南方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人们掌握了“三个有利于”的锐利武器，对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虽然逐渐平息，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在改革进入关键时期，姓“社”姓“资”的问题进一步深入到了所有制层次上，具体表现为姓“公”姓“私”的争论。有些人在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和流传的打印稿中提出：现在我国私有经济的发展动摇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缩小国有经济比重的倾向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方针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用股份制来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实际上是搞私有化，如此等等。他们立论的根据仍是成段成段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公有制应该是怎样的话，判断是非得失仍然以“凡是”做标准。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同样不能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本中找证据，不能打“语录仗”，必须坚持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

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江泽民的“5.29”讲话和党的十五大报告,正是根据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阐明了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问题,回答了一些人对现行政策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诘难,推动了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对于打好改革开放的攻坚战有重要的意义。

二、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逻辑联系

如前所述,“实践标准”是检验人们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也称“真理标准”。“生产力标准”是检验实践(行为)合理性的标准。“三个有利于”是检验人们的认识和实践的是非得失的综合标准。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强调它们之间的区别,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联系,结果是把真理和价值、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完全割裂开来了。这在理论上是不妥的,实践上是有害的。

首先拿生产力标准和实践标准的关系来说,应当承认,生产力标准同实践标准是有区别的,如果不承认它们之间的区别,就等于否定了生产力标准提出的必要性和它的重要意义。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一是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属于两个不同的哲学范畴。实践标准是指人的认识是否正确,只能通过实践的结果加以检验,一般来说,成功了的就证明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证明是错误的,它解决认识的真假对错问题,属于认识论范畴,是真理标准;生产力标准是指人的实践、行为是否合理(包括人们选择的某种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否合理),只能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来检验,它解决实践的好坏、行为的善恶问题,属于历史观范畴,是价值标准。二是两者检验对象的范围不同。实践标准是普遍

的、一般的检验标准，它适用于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认识的检验，范围极其广大。而生产力标准则只限于社会历史领域范围，它检验的内容，不仅包括人们的思想认识等观念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的实践活动及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非观念的东西。

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我们不仅要看到生产力标准和实践标准之间的区别，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第一，生产力标准是实践标准的深化和发展，是实践标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具体化。因为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它是人的认识最基本的来源。在社会历史领域，实践标准首先是生产实践标准，人的认识及其行为必须接受生产实践的效果——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检验，亦即生产力标准的检验。检验人们在生产领域中的认识正确与否，生产力标准既是直接的、又是根本的。第二，判断人们在其他领域中的认识正确与否，生产力标准则起着最后的、根本的决定作用。判断人们在各个不同领域中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虽然会有各自的具体标准，但是这些标准的背后，以致终极意义上来说，生产力标准仍是根本标准。因为人的认识正确与否的直接判断是主观符合客观，主观符合客观的检验标准是实践效果。这种实践效果的根本效应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设想，一个真理性的认识当它指导实践时会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历史和现实表明，当人们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时，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提出的办法、措施，就能够达到预想的结果，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从根本上说，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又是一致的。第三，生产力标准对实践活动起导向作用。正确的实践需要正确的导向，没有正确导向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不同，实践的导向也就不同，所得到

的结果也会不同。生产力标准的提出，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规律，理所当然地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正确导向。有了生产力标准的正确导向，才能使我们的实践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展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其次再看“三个有利于”标准与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的关系。“三个有利于”标准当然不同于生产力标准和实践标准，因为它们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在外延上都是有区别的。简单地说，“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在实践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它所特指的“生产力标准”、“综合国力标准”和“人民生活标准”的内容，它比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更丰富更具体，但从根本上说，“三个有利于”标准同生产力标准、实践标准是一致的，是后者的发挥和发展。这表现在：第一，“三个有利于”标准对实践结果的评判提出了正确的价值取向，便于我们正确地具体地把握和运用实践标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况：路线、方针、政策都很好，但由于对实践结果的评判标准不同，仍然可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现在有了“三个有利于”的价值取向，对实践结果的评判一致了，实践标准就便于实际操作了。第二，“三个有利于”标准给生产力标准以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解决了坚持生产力标准和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关系问题。“三个有利于”标准明确规定：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不是泛指一般生产力，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也不是抽象的综合国力，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生活水平，也不是泛指任何人的生活水平，而是“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就把生产力标准同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统一起来了，有助于解决姓“社”姓“资”问题。第三，“三个有利于”标准，把生产力标准与实践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统一起来，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坚持生产力标准、实践标准与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的关系问题，把真理观与价值观、群众观

联系起来了，增强了这一标准的客观性、综合性。

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三者的统一，可以说是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它们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因为实践是人们为实现一定的思想理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价值取向（对客观事物与人的目的之间的价值关系的认识）而变革现实的活动，即合规律的又合目的的活动。在实践活动中，价值取向、利益追求规定着人们如何对待从实践中所获得的真理性认识。毛泽东在《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提出的实践标准，实际上也蕴涵着价值标准。他所说的实践，其主体主要是阶级和群众，其内容主要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其目的主要是为阶级、为人民谋利益。所以他说，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①“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②显然，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实践标准绝不是脱离价值主体与价值目标的纯粹认识论的真理标准，而是与价值主体、价值目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三个标准的统一既遵循和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实际与发展规律，又体现了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这样就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建立在既合乎规律又合乎目的性的基础之上，能够健康地顺利地向前发展。

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邓小平哲学研究的重要启示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对于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进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3页。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深入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逻辑发展是邓小平理论及其哲学形成发展的轨迹，我们应当以此为线索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及其哲学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

1978 年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新事业开始启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我党历史上继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果说延安整风运动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那么，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则为马列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思想前提和历史起点，其基本范畴——实践范畴则是它的理论的逻辑起点。1987 年开始的全国范围开展的生产力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实践标准讨论的深入发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的新起点。党的十三大正是以生产力标准为尺度，确认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基石，其哲学基础恰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和生产力标准。生产力理论和生产力标准构成了邓小平理论及其哲学的核心内容，这个理论武器大大地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1992 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哲学基础。如同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一样，它进一步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

放,是新的一轮思想解放的哲学指导和思想武器,是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形成体系在哲学上的标志。邓小平哲学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哲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我们应当以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为线索,深入研究邓小平哲学是怎样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产生发展起来的,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它的精神实质、内容特点和指导意义。

第二,实践观点和生产力理论是邓小平哲学的两个基本范畴,我们应当以这两个基本范畴为基础来建构邓小平哲学的理论体系。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及其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哲学有两个基本观点:一个是实践观点,即把实践理解为认识的基础和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惟一标准;一个是生产力理论,即确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前者解决认识世界的道路问题、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问题;后者解决改造世界的价值取向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取向问题。邓小平哲学的理论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两大范畴的基础上的。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来建构符合实际的邓小平哲学的科学体系。我认为这个体系大体上应包括以下内容: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的唯物论;实践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认识论;两点论和系统论相统一的辩证法;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相统一的社会基本矛盾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文明论;立足中国和面向世界的社会开放论;以人民为本位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等等。只有这样的理论体系才能真正反映邓小平哲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

第三,价值观问题是邓小平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深入研究邓小平哲学的价值观,进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世界哲学的未来走向。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及其历史

发展中可以看出，价值问题是邓小平哲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价值与实践分不开，价值观与实践观、真理观、历史观、群众观紧密相连。邓小平的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的价值观。我们应当从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入手，系统地研究邓小平关于价值的本质、价值的分类、价值目标、价值选择、价值评价、价值实现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用以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从哲学发展史来看，由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历史观，然后再到价值观，这是哲学逐步深化的过程。对价值问题的关注已成为现代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本体论、发展观、实践观、认识论、历史观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价值论，是现代哲学发展的基本特点和主要趋向。邓小平哲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真正反映时代精神，要合乎世界哲学的历史潮流，必须深入研究价值哲学，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

（原载《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教学》1998 年第 5 期；
《长江论坛》1998 年第 4 期）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结合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认真研究这两者的关系，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解决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许多认识问题和实践问题，有重要的意义。

一、基本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区分

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就是指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即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结合，就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理论突破口是“基本制度”和“经济体制”的适当区分、“经济体制”中的“占有制方式”和“经济运行手段”的适当区分。

按照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理论，社会制度是指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即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可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两个层次。基本制度决定社会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具体制度是基本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它反过来又影响基本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特定的具体制度的总和就构成一定的体制。体制由基本制度以及其他一些政治

经济因素所决定，具有客观性；但同时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人们可以根据现实社会的客观实际，尤其是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生产力状况、经济政治环境和社会心理等因素选择不同的体制。因此，同一社会制度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阶段，可以有不同的体制；不同的社会制度也可以在体制上互相借鉴。社会体制又分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等，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其中经济体制是基础，它规定和影响其他体制。

经济体制，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具有多层次性和多结构性，其内容主要包括占有方式、分配方式、组织形式、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包括经济运行手段）等。合理的经济体制有利于基本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和生产力的发展。

经济体制中的占有方式、分配方式无疑具有社会属性，但经济体制中的管理方法，如采用什么经济运行手段（市场或是计划）则既有社会属性的一面，又有自然属性的一面。这种管理方法的两重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有过明确的阐述。他指出，大凡社会化生产，都需要计划、指挥、调节，既要实施对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管理，又要实施对劳动力的管理，实现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的合理配置。这就是管理的“自然属性”或生产力属性。它反映了社会化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只要是社会化生产，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都具有这种属性。但他同时又指出，管理还有社会属性或生产关系属性的一面，在对抗性的生产方式中，管理具有阶级对立的性质。① 社会主义的管理消除了阶级对立，但仍然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自然属性，另一方面是社会属性。社会属性主要指它维护生产资料公有制，维护按劳分配，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提高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1页。

根据这种区分，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运行手段，它们虽然与社会经济制度有一定的联系，但从根本上说是由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形式（商品经济、社会化生产）决定的，属于管理的自然属性方面，是调节经济的通用手段，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它们与不同的社会基本制度结合，才具有社会制度的特性。正是这种基本制度和经济体制的适当区分、经济体制中的占有方式和管理手段的区分，为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比较

如前所述，计划作为管理国民经济的方法或手段，首先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要求。生产社会化意味着社会分工复杂，需要各方面的协作，需要有计划地分配和调节社会劳动。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它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但它们的经济活动中也有某种计划。先是各个企业内部有周密的计划，而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后来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也开始运用计划作为宏观调控经济的手段。市场，作为商品经济的范畴，是商品交换领域的经济调节手段，市场经济是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商品经济，它并不专属某种社会制度。列宁说："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①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但仍然有一定的市场，至少在消费资料的生产和经营中要通过一定的市场来调节。所以计划和市场都是社会化大生产特别是社会化商品生产的产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

①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9页。

从经济发展史上看，市场经济先于计划经济，它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几个阶段。近代市场经济的形成，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但同时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激化起来。19 世纪初，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开始出现，造成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等严重的社会灾难，此后愈演愈烈。针对市场经济这一重大弊端，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对策，在实践中走出了两条不同的路子。

一条路子是，19 世纪中叶后，科学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计划经济的设想。这一设想在 20 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得到推广。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实践证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建设规模较小，经济结构比较简单，发展目标比较单纯的条件下，计划经济比较容易取得成功。但是在经济发展规模扩大，经济结构比较复杂化，发展目标多元化，人民生活要求提高的情况下，计划经济管得过死、难以调动积极性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因而导致经济效益的增长速度下降，特别是难以解决物资匮乏和消费品不足等问题，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传统的计划经济面临着根本改革的任务。

另一条路子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 19 世纪后半叶开始，试图寻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治疗市场经济弊端的办法。特别是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危机后，出现了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和英国的“凯恩斯主义”。许多国家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等手段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一些国家还搞了指导性计划，不少国家实行了社会福利政策。由于这些国家实行的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故不能摆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困扰，但上述宏观调控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使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社会阶级对抗有所缓和，资本主义仍保持着一定的生机和活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计划和市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都各有成功和失败的经历，但从总体效率来看，现代市场经济已被证明是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更为有效的经济运行手段。为什么如此？我们不妨进一步分析它们的内在机制。

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是通过三个相互联系的机制实现的。一是价值机制。即产品的价格要反映价值，而产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这样，个别劳动消耗量低于社会必要劳动量的生产企业就可以获得超额利润，而高于社会必要劳动量的生产企业则利润减少，甚至亏损，这就迫使企业不断改进技术和管理，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二是供求机制。产品价格不仅要反映价值，而且要反映供求关系。供过于求的产品，价格会低于价值，供不应求的产品，价格将高于价值。企业为了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就要注意生产要素的流向，努力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三是竞争机制，价格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效率增长和供求变化中不断波动的。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在适应市场和提高效率上同其他企业竞争，你追我赶，优胜劣汰，从而推动整个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益的不断提高。由此可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有以下几个特点：(1)资源在部门、企业间的配置，是同部门、企业对资源使用的效率紧密结合的；(2)资源配置和使用的效率又是同部门、企业的经济利益、经济责任紧密结合的；(3)资源配置同社会需求变化联系比较紧密和及时。由于这些特点，就使市场成为组织社会化大生产、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成为调动企业和职工积极性与能动性的有力工具。

当然，市场机制也有不可避免的弱点和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一是市场调节本身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因为个人、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往往从自己的、眼前的利益出发，受局部的、暂时的利益所

驱动，势必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单靠市场调节，不能保持国民经济总量平衡和总体结构合理化，市场机制不能调节某些公共物品的供应，那些社会效益大而经济效益小的社会事业如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无人投资。二是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从价格形成、信号反馈到产品生产，有一定的时间差。加之企业和个人掌握的经济信息不足，微观决策带有一定的被动性。这在那些生产周期较长的部门，如粮食生产、牧畜养殖等部门表现尤为明显。三是市场难以实现社会公正。市场交易在原则上是平等的和等价的，但由于人们的资源禀赋不同，收入水平就会有差别，而且由于市场价格随供求关系而波动，市场自发调节容易引起收入差距扩大，造成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

我们再来看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由于国家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其调控对象是宏观领域，方式主要是凭借行政力量，通过指令性计划来干预经济活动，因此它能从宏观上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能自觉地调整产业结构和实现长期资源的合理配置，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能较好地调节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但它最大的缺陷是否认了企业的经济利益和能动性，使资源的配置和使用缺乏严格的经济责任制；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和微观经济活动，全面细致的计划不但影响效率，而且往往与实际脱节，犯主观随意性的毛病；同时容易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使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失去生机和活力。

邓小平总结历史的经验指出："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才能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8—149页。

起来,加速经济的发展呢？简要地说，就是取长补短，并互相抑制某些消极作用，即以计划的科学性抑制市场的盲目性，以市场的活力增加计划的灵活性，达到计划和市场的内在统一。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计划要以市场为基础，国家计划的制定、执行和检查，都必须围绕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去进行，国家计划目标和为实现计划目标而采取的宏观经济措施，只有符合价值规律，才能通过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来实现，并使之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市场又必须在国家计划指导和宏观调控下进行活动，这样才能克服其自发性和盲目性，使市场调节朝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结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市场与计划的结合,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结合。要说明市场经济能够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首先要了解市场经济的一般共性。

市场经济的一般共性,前面我们在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进行比较时已经有所论及,这里只作一个简要的概括,其要点如下：

1.经济关系市场化。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之中,通过市场机制(价值规律的作用,供求关系的变化)促进一切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流动,促使社会资源优化配置。

2.产权关系明晰化。界定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资产责任,是企业自主经营的前提,是多种利益主体的利益导向的基础。

3.企业行为自主化。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经济实体。这是企业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的先决条件。

4.宏观调控间接化。政府对社会经济实行宏观调控,不直接

干预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而是通过非指令性计划、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实行间接调节。

5.经营管理法制化。企业经营活动在严密的法规体系之下进行，不能超越法律允许的范围，管理部门按照法律进行监督，保证市场公平竞争。

这些就是各种类型的市场经济所具有的一般共性。但是市场经济总是与各国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它们又具有各自的特点。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相结合，它除了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共性外，还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经济上说，就是公有制为主体，从政治上说，就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从根本上说，就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结合、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相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产生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特性。这种制度特性决定了它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

1.所有制基础不同。在我国现阶段，由生产力状况所决定，我们实行的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这种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虽然有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但占主体地位的市场主体是由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组成的公有制企业。各种所有制企业都进入市场，平等竞争，但国有企业要发挥主导作用。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其市场主体是垄断资本家的私人企业。由于两种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不同，市场主体不同，它们所反映的经济关系也就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上体现了劳动者之间和联合劳动者之间的平等互利合作关系；而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反映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

由于所有制不同,生产的目的也就不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虽然公有制企业的直接生产目的是盈利最大化,但公有制所决定的社会生产目的则是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虽然企业生产的直接目的在形式上与社会主义企业基本相同,但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决定的社会生产目的却根本不同,其惟一目的是追求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

2.分配制度不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存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分配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并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按资分配的分配制度,这种制度必然要导致两极分化。

3.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不同。由于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局限,因此,各种类型的市场经济,都有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和计划调控,都要干预市场的运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以私有制为基础,政府代表少数垄断资本家利益虽有某些计划管理,但总的来说,国家宏观调控力度较弱,无法摆脱其固有的矛盾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经济运行常常出现无序状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发挥的。由于以公有制为基础,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以为全体人民服务为宗旨,因此,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微观放活和宏观协调的关系,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通过社会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

指导和行政管理,创造一个稳定的、安全的和公正的社会环境,以确保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不是外在的焊接,而是内在的统一。因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两者具有相容性。一方面,市场经济不是外加给社会主义的异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要求, 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优越性的发挥, 有赖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 社会主义也不是硬给市场经济贴上的一个标签, 它规定了市场经济的制度特征, 尽可能地减少了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 使它沿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在实践中如何具体地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结合呢? 我以为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既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又要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公有制的具体形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公有制是劳动者联合起来占有生产资料的制度,它决定了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它能够把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个人的局部利益结合起来,同时规定了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平等互助的合作关系,有着巨大的优越性。因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须坚持。但是以往公有制中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采取的是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形式,这种形式不符合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不适应市场运转的需要,必须通过改革加以改变。办法是理顺产权关系;实行政企分开,落实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

争的主体;与此相适应,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也要转变,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主要是搞好宏观调控。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要实行公司制,以"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这是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一种有效途径。"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分离"的提法与原来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提法相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因为过去企业只有经营权而没有所有权,经营权会被架空。企业没有所有权,就不能引起企业对自身权利的关注;而国家凭借财产所有权,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支配企业,甚至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现在实行公司制,国家是出资者之一,它不是企业的法人代表,因而只能从重大决策、资产受益(比如同企业的税利关系)、选择适当的管理者方面对企业予以指导,但无权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企业作为财产所有者之一,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可以充分行使企业法人的责、权、利,从而能够迫使企业管理者、生产者关心企业发展和自身利益,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这是对国家、企业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对国家权利的限定和对企业自主权的真正承认,使产权关系真正明晰化。

目前的问题是,在产权制度的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一些人以种种方式,如低估国有资产价格,利用办公司的机会把国有资产无偿变为"公司"的资产,然后通过"法人股"转个人股的办法将国有资产变为私人财产,化公为私,这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被剥夺的危险。因此,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切不可舍其"主体"而只留"主导"。因为没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很难发挥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那种认为产权制度改革的出路不是产权关系明晰化,而是化"大公"为"小公",甚至搞"私有化",是完

全错误的。

第二，在分配问题上，既要引进市场机制，强调效率优先，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注意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我国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我们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但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收入分配高度集中，工资等级和数量都由国家统一规定，完全排斥了市场调节作用，导致平均主义盛行，严重妨碍生产者积极性的发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要消除这种弊病，必须实行改革，让市场参与收入分配过程，引进市场机制，逐步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收入分配体制。即依照不同生产要素贡献的大小或价格水平的高低来确定其报酬，其中按劳分配是主体，按其他要素分配是补充（如资金、技术的投入也按其效率进行分配）。这种市场机制与按劳分配的结合，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而是寻找到了实现这一分配原则的有效方式。

市场机制与按劳分配的结合，要贯彻到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之中。就一般情况而言，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基本上由市场来调节，应强调效率的原则，即企业之间、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处理，要符合市场经济运行方式要求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原则，使所有劳动投入和其他要素投入都有机会获得应有的报酬。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则要通过平等规范的税收和财政收支来调节，以解决分配不公、贫富差距不合理拉大的问题，保证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点则是解决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收入分配关系，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调剂资金、加速经济发展等问题。

当前的情况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已经使竞争在很多方面展开，但又有许多东西阻碍着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平

等竞争，尤其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使得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另外，分配不公的问题十分突出，诸如正当劳动阶层收入相对减少，知识分子囊中羞涩，靠工资吃饭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的还不能按月领到工资，离退休职工面临着物价上涨的威胁等等，引起人们强烈不满。这些问题的解决，同样需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一方面，要通过制定经济法规，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鼓励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另一方面，要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解决。即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校正一些企业在承担国家义务上的不合理现象，制定符合各行各业实际情况的工资制度，对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尤其是非劳动因素造成的收入分配悬殊，要通过征收累进的个人所得税、高额财产税和遗产税、建立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和增加对低收入者的福利措施等办法加以解决。

第三，在经济运行中，既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又要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

如前所述，市场经济有许多优点和长处，但也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方面，这种弱点必须通过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来加以解决。在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受政府调控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之下发挥的。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宏观调控的主要方法是经济办法，其依据是市场，市场又要接受宏观总量调控、结构平衡计划的约束，以及国家运用价格、工资总量、利率、汇率等市场信号，影响企业的行为。因此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是统一的，它们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

我们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关系，使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求得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市场作用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又存在着市场盲目发展和经济秩序混乱的现象。因此，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特别是发展生产要素市场，规范市场行为，打破地区、部门的分割和封锁，反对不正当竞争，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目前特别要注意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保持货币发行和信贷的适度规模，防止投资膨胀，整顿金融秩序，加强国家对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控，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控制物价上涨幅度，特别是注意控制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消费品和服务收费的上涨幅度。由此看来，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排斥国家宏观调控，计划已经丧失存在的客观必要性，以及无须运用一定的行政手段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结合，它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又利用了市场手段在配置资源方面的有效性，克服了计划经济的弊端，保留了其合理功能，对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有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本文压缩稿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4 年第 4 期）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哲学基础

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本文简称《决定》),把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原则具体化、系统化,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设计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蓝图,是我们实现从旧经济体制向新经济体制过渡的宏伟纲领。《决定》的理论依据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其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毛泽东、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认真研究《决定》产生的哲学基础,对于深刻理解和自觉贯彻执行这个《决定》,推动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实践呼唤自觉的理论指导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受实践的检验,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阐明了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并引证了列宁的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后来他在驳斥王明“左”倾路线的时候,又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他指出:指导中国革命,要有中国革命的理论,好比建造房屋,要有关于房屋的图样即蓝图。同样,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要有关于中国改革

开放的理论、改革开放的图样，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能动的反映。《决定》就是这样的图样，这个图样，在实践中产生，反过来又能动地指导实践的发展。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总目标以后，人们迫切希望能够进一步回答这样一系列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底是什么样子？应该如何去建立？应该怎样去实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的中国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象？完整、系统地回答这些问题是非常必要的。改革初期，由于我们对改革的对象与重点，经济体制各环节间的内在联系，改革的复杂性与风险性乃至改革的难点缺乏明确的认识，不可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总体方案，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经过15年的探索、实践，以至付出必需的代价之后，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这就为进一步前进提供了清晰的参照系。如今，各体制环节间的内在关系已经暴露得较为清楚，改革的具体目标和框架已经廓清，改革的重点也很明显，改革的风险与复杂程度已可估计。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有条件而且应该有更多的审时度势的理性指导。回顾改革的历程，总结改革的经验，人们已不满足于自下而上的推动，也希望进一步增强改革的计划性、预见性和超前性，以指导改革的深入发展。同时改革发展到了目前全局性整体推进的关键阶段，也迫切需要有总体设计方案。15年的改革实践，一方面，为我们创造了实现改革全局性整体推进的条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迅速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逐步展开；另一方面，某些重要领域的改革滞后，成为经济体制链条上突出的薄弱环节，又影响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就迫切要求改革的全局性整体推进，因而需要进行总体设计，需要强调体制和政策的规范化。《决定》就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应运而生。

《决定》制定的过程，是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路线，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突破旧观念，开拓新视野，创造新理论的过程。为了制定《决定》，党中央成立了专门的起草小组，同时组织了有各部门和地方的同志参加的16个专题调研组，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关问题深入各地，进行广泛而又有重点的调查研究，为文件的起草提供了来自实践的依据和认识基础。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领导，对起草的文件进行了反复的研究、讨论、修改，并征求了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的意见，以及党内老同志和经济界专家的意见，七易其稿后才提交十四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它的产生过程是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全党智慧，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生动体现。

尽管《决定》为我们提供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总体蓝图，还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完善，但有了这个基本框架和总体蓝图，改革工作的指导，就能够更有预见性，改革的推进就更具有整体性和规范性，就能更顺利、更健康地向前发展。理论的指导作用充分显示了出来。

二、唯物辩证法系统观的具体运用

邓小平在领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过程中，一再强调要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他把加强工作中的系统性作为一项特别要求十分严肃而郑重地向全党同志提了出来。他说：我们要求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从而加强我们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他总是用系统的观点看问题，把改革作为一

项浩大的系统工程来设计和实施，强调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各个领域的改革必须“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有秩序分层次地进行，使系统达到“最优化”。同时，每一项改革本身也是一个系统，也要系统设计，系统实施，系统反馈，综合配套。他在谈到价格改革时指出：不仅是价格一个方面的改革，而且是多方面的、综合的改革。只有多方面的、综合的改革，才能为价格改革创造条件。价格改革是如此，其他改革也是如此。

《决定》正是运用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为我们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即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前提下，由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么五个主要环节构建而成的有机整体。上述五个环节就是这个整体的五个子系统，而每个子系统又由若干要素构成，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互相制约，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具有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鲜明特色。如果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作一座大厦，这五个环节就是大厦的五大支柱；大厦的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在这里，企业，是大厦的关键部位，只有搞活企业，市场经济才能发展；市场，是大厦的主体架构，只有培育和发展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才能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宏观调控，是大厦的营造管理的“统帅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害部位，只有加强国家宏观调控，才能克服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和消极方面，保持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系统工程，还要有其他的社会系统工程为它配套。其中，科技、教育、文化、道德风尚以及生态环境、人

文环境等，既有市场机制起作用的一面，又有其独特个性的一面，也是一系列的系统工程。

三、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现实运动再认识的理论结晶

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其唯物史观的基础是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现实运动的再认识。

大家知道，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从性质上看，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不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不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从特点上看，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但它们的某些形式、某些环节还不够完善，同生产力之间又存在着矛盾；从解决的方法上看，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即在坚持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可以对这些形式和环节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对这种不完善的方面还没有作出准确的具体的界定，后来，历史的曲折发展，更使得这一蕴涵着改革的思路未能继续下去。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但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生产力的发展长期缓慢，根本的原因是现行体制的弊端。由此得出结论：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在当前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发展生产力与僵化的经济

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等的矛盾。因此要进行全面改革。这种改革，是对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具体制度、具体形式的变革，不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否定，而是它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一种部分质变；但这种改革又不是在旧体制范围内对它作某些修补和调整，而是体制上的根本质变，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又是一次革命，它对于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真正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对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在当前的主要表现形式的科学分析是我们进行体制改革的哲学基础。

循此前进，十四大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经济方面改革的总体目标，这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经济体制再认识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十多年来探索的理论成果都包括在这个目标模式中。这个飞跃得以实现的理论突破口是对社会制度作“基本制度”和“体制”的必要区分之后，又对“体制”中的占有方式、占有制度和经济模式、经济运行手段作了必要的区分。

所谓社会制度，就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它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两个层次。基本制度规定社会的性质和方向，具体制度是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和表现形式。特定的具体制度的总和构成一定的社会体制。社会体制具有客观性，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但这种客观性并不排除人们对它的选择性，人们可以根据现实社会的客观实际，尤其是它所处的发展阶段、生产力的状况，以及文化传统、社会心理因素等选择具体的制度。因此，同一社会制度可以有体制上的差异，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在体制上借鉴。社会体制又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等，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其中经济体制是基础，它规定和影响其他体制。

至于经济体制，它也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具有多层次性和多

结构性。经济体制还与一定的模式相联系。每一种经济体制在实现其功能的过程中，总要采取一定的具体样式和方式，实行相应的管理方法，规定经济运行的主要原则，所有这些方面总和起来就称为经济模式。经济模式具有更多的选择性。

过去，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常常把基本制度和体制混为一谈，进而又把体制中的占有方式、占有制度和经济模式、经济运行手段等同起来。这样，就在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严格的禁区：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邓小平上述社会基本矛盾观和经济理论，冲破了这个禁区，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而是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他明确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就是说，管理方法，是经济体制中具有二重性的东西，它除了社会属性之外，还有自然属性的一面，反映了生产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经济，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优化配置资源、充分利用有限资源，加速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运行手段，它本身没有“姓‘资’姓‘社’”的问题，同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相结合，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的发展。所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把市场经济这种经济运行手段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经济制度）结合起来，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所以，邓小平的社会基本矛盾观、生产力标准就是我们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原载《学习月刊》1994年第4期）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其内容和表现形式，比当年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时错综复杂得多，处理得好，可以促进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处理不好，矛盾激化，小事会变成大事，甚至酿成乱子。我们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特点，积极探索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方法，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它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竞争，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实践表明，市场是组织社会化大生产，优化资源配置，调动企业和职工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手段。当然市场也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主要表现是市场调节本身具有自

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单靠市场调节不能保持国民经济总量平衡和总体结构合理化；市场调节容易产生收入差距扩大，造成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因此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

这种经济体制改革，即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实质上是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涉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人民内部矛盾会明显增多，有的还会日益突出起来。同时还要看到，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是采取"一步到位"的激进方式，而是采取"先易后难"、"先外围后攻坚"的渐进方式。这样做好处是避免了社会的动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利于降低改革成本和风险；缺点是保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双轨制的时间过长，带来的问题很多：旧体制下的矛盾还没有解决，新体制下的矛盾又冒了出来；两种体制之间的摩擦、碰撞甚为激烈；两种体制的并存使经济、社会生活发生扭曲，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等等。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和特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广泛地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错综复杂，形式多样。

在经济领域，首先是多种经济成分带来的多种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存、共同发展。由于这些经济成分在所有制形式、生产条件、经营方式、收入情况方面各不相同，必然形成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如公有制企业利益群体，私营企业利益群体，个体经营者利益群体，外贸、合资利益群体等，他们之间在生产、分配等方面必然会发生各种利益矛盾。不仅如此，同一经济形式内

部也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如同一工人群体内部又存在脑力劳动者群体与体力劳动者群体，经营者群体、管理者群体和生产者群体；私营企业内部存在着雇主群体和雇员群体等。他们之间在具体利益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别和矛盾。此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过程中，由于利益驱动、市场竞争等因素的作用还产生了另外一些利益群体，如行业性利益集团、等级性利益集团、暴发性利益集团等。中央和地方、地方政府和企业、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利益关系，也是一种人民内部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

其次，分配不公是当前经济领域人民内部矛盾的焦点。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分配制度方面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资金、技术等)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以及历史上的原因、工作中的偏差所造成的新的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悬殊，已成为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焦点。收入差距表现在高低收入人群差距悬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拉大；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不同行业的从业人员收入差距过大；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收入差别悬殊等等。

第三，失业和就业的矛盾更加突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十二亿多人口的大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的加大，我国失业人口出现了增长趋势，失业和就业的矛盾更加突出。这可以说是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民内部一个突出的矛盾。

在政治领域，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为党政矛盾，政企矛盾，执政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之间的矛盾，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等等。其中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是主导性的矛盾。这个矛盾当前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少数党员干部包括某些领导

干部经不起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利用手中的职权谋取个人私利，大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巧取豪夺，这种腐败行为广泛存在，蔓延滋长，已经到了令广大群众深恶痛绝的地步。它大大激化了干群矛盾，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形象，如不得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就有自我毁灭的危险。二是某些领导机关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官僚主义严重，沿袭计划经济条件下思想僵化、墨守成规、遇事推诿、办事效率低下，说官话、套话，不办实事，大搞形式主义，以及当官做老爷、欺压百姓的恶劣作风，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造成领导和群众关系紧张。

在思想文化领域，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为革新与守旧、解放思想与思想僵化的矛盾，社会主义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矛盾，科学与迷信、无神论和有神论之间的矛盾等。这方面的矛盾有时还十分突出，例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发生困惑和动摇，封建迷信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就是思想文化领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的一种表现。此外，学术领域不同学派和不同风格之间的矛盾则是经常发生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物质利益矛盾突出。这首先是由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我国社会现阶段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目前我国社会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产品尚不丰富，用于人们需求的物质文化生活资料极为紧张，人民内部各阶层、群体和个人日益增长的利益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这就使得各种利益矛盾成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中心和主导。同时我国正在进行的

经济体制改革，其实质是人们利益关系的新调整，因此必然在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触及人们的利益，人民内部的各种经济矛盾必然显得突出、尖锐。

二是人民内部矛盾较之过去更为复杂。其表现是人民内部矛盾不仅存在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而且广泛存在于政治领域、思想文化领域之中；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竞争、流动、分化的趋势，人们开始打破单位、地区、城乡、所有制的局限，交往范围扩大，横向联系加强，群体矛盾明显化。加上两种体制在一定时期并存、转换，使得人民内部矛盾变得更加复杂。

三是容易激化，影响社会稳定。人民内部矛盾绝大部分本来是不带阶级斗争性质的非对抗性矛盾，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又存在着某些对抗性的因素，如个体经济和“三资”企业中雇工和雇主之间的雇佣劳动关系就包含着某些对抗因素。对一些纯属人民内部的具体利益差别问题、是非问题所引起的矛盾，如果缺乏警惕，处理不当也会发生对抗。当前突发性群体事件增多，就是矛盾容易激化、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表现。总之，改革是人们经济利益的调整，政治权力的再分配，思想观念的更新，社会心理的变迁，弄得不好会引起矛盾激化，发生对抗，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才能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和方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利益矛盾，要遵循公正、平等、有序的原则。

首先是公正原则。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也就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结合的原则。这一原则具体包括(1)普遍受益原则，即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因此必须保证广大人民得到实际利益，保证所有参与者充分享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果。(2)适度差距原则，即分配应与效率相联系，以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既允许一定程度和范围的差距拉开，又要适当掌握合理差距的“度”，防止两极分化。(3)改革成果和代价公平分配原则，即应该使人们的所得和应得、所付和应付尽可能相对称，努力避免出现代价付出最大的主体却不是成果享受的主体，成果享受最多的主体却很少付出代价这样一种情况。(4)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原则。这个目标不应是可望不可及的东西，而应实现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过程之中。

其次是平等原则。其基本内容包括政治权利平等、人格尊严平等、社会地位平等三个方面。所谓政治权利平等，就是坚持在各项协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决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公民”的存在。所谓人格尊严平等，就是一方面要使任何一个公民不论其出身如何、职业如何，也不论其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高低，都应在利益协调的过程中拥有平等对话权，另一方面必须尊重和保护每一个公民的人格尊严，即使在利益协调的实际过程中有些人的实际利益可能有所损失或增加，但每一个人的人格尊严不能被剥夺、被侵犯。所谓社会地位平等，即坚持人们在利益实现的机会和利益实现的尺度上平等。这就是说，一方面要使每一个人获得生存和发展能力的机会平等，另一方面要求按同一尺度(标准)进行利益分配与协调。

三是有序原则。就是必须坚持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充分发挥政府在利益协调中的职能，自上而下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地循

序渐进，逐步理顺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最终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利益协调模式。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不但要讲正确的原则，而且要有有效的方法。

1. 发展经济的方法。

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存在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是经济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不仅那些物质利益矛盾直接根源于国家相对贫困，就是思想上、道义上的矛盾也或多或少地同经济落后相联系。因此，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就是靠自己的发展。所谓发展，就是要保持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有关专家认为，从保持社会经济稳定和广大群众信心的要求来看，近一二十年内，我国经济必须力争保持在7%以上的增长速度，否则势必导致失业人数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相当一部分人的实际生活可能不升反降，从而严重影响广大群众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信心，甚至有可能带来种种社会不稳定因素。

发展中国经济，当前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加快西部大开发。加快西部大开发，不仅可以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而且对于扩大内需，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都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西部大开发要有新的思路和方法。如果这件事情做好了，中国经济将会有一个大发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问题就有了更多的物质条件。

2.改革的方法。

当前许多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改革中出现的，或者是由于新旧两种体制并存和交叉碰撞而引起的，或者是由于改革没有配套而产生的，或者是用旧观念对待新事物而引发的。因此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使这些矛盾得到较好解决。

我国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其复杂性可

以说是过去未曾有过的。这是因为在过去的改革中我们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某些矛盾和问题。如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确立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在经济扩张时期可能被“掩盖”起来,而到了经济紧缩时期却变本加厉地暴露出来,因而显得十分棘手。因为我们一方面面临着这些老大难问题非解决不可,另一方面又要想方设法把已经迟缓下来的经济轮子重新发动起来并使其加快。在这种多重压力下,我们应该在诸多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而在主要矛盾中又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要强调发展,强调速度。但究竟如何发展?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看来还是要在改革中发展。有关专家指出:中国经济现在出现的种种问题可能是“制度综合症”的反应。当今中国要继续发展,继续保持经济快速、持久、健康地增长,已经到了非解决制度层面上的问题不可的时候了。加快制度层面的改革,经济体制方面主要是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等等,尽快地结束时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双轨制”并存的局面,完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政治体制的改革首先是指党政分开、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实现由个人高度集权的人治型体制向民主的法治型体制的转变。如果我们对此再像以往那样采取回避态度,那么总有一天这些问题会以某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激烈的甚至是消极的形式爆发出来。

3.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

解决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必须运用经济手段进行经常性调节。一要用好市场手段,在微观上把人、财、物的配置推向市场,通过市场对社会利益总量进行第一次分配和调节。二要通过财政、信贷、利率等宏观调控手段,对社会利益进行第二次分配和调节。宏观调节过程实际上是正确处理市场经济中人民内部矛盾的过

程。比如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和地区差距扩大的矛盾就是一个例子。

行政手段是由国家或政府部门发布行政命令、指示、规定、条例,下达指令性任务或采取组织措施来管理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例如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为了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中央作了关于党、政、军、警、法不得办公司、搞创收,所属公司一律与其脱钩的决定;为了提高效益,使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政府下令制止不合理的重复建设,关、停、并、转污染江河湖泊的企业等等,都是运用行政手段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事例。

法律手段是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手段。因为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即市场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法人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以法律为准绳。不然市场机制就难以正常运行,经济活动就盲目无序。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政府制定颁布了一系列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环境保护法》、《公司法》、《证券法》等等。这些法律法规既是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手段,也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手段。反腐败也主要靠法律手段和群众监督。

4.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运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必要的,但绝不能放松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仍然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手段。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对于理顺情绪、沟通关系、缓解矛盾、加强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人民内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广泛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既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基础，也是避免某些矛盾发生的重要条件。现在的问题是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

5.贯彻“双百”方针。

处理学术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学术领域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学术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在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中要划清政治问题与学术是非的界限。在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的问题上，一定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对于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严肃批判，但在批判中要注意摆事实、讲道理，达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在于领导，因此必须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政策水平和实际能力。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和群众的思想动态，善于捕捉矛盾发生的时机和容易发生问题的群体，掌握人民内部矛盾发展的规律，努力做到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把问题尽可能地解决在萌芽状态，做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大文章，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原载《学习与实践》2000年第10期）

从《邓小平文选》看邓小平思想方法论

邓小平思想方法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研究邓小平思想方法论，对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邓小平思想方法论是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它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吸取了现代科学的优秀成果，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

思想方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思想方法主要是指理性认识的活动方式，即概念、判断、推理、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逻辑思维方法。广义的思想方法指人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我们这里所讲的思想方法，就是指广义的思想方法。按照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说法，思想方法包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同哲学世界观相联系，又具有应用性、操作性的特点。所谓立场，就是说，观察问题、处理问题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人民的立场上，广而言之，就是要以主体的价值取向即主体的利益、目的、需要、愿望为出发点；所谓观点，就是唯物的辩证的观点；所谓方法，就是带操作性、技术性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据此来考察邓小平的思想方法论，可以看到它包括广泛的内容和多层次的结构。

一、思维视角和价值取向:立场问题

邓小平的思维视角和思维的价值取向,可以说集中体现在他为景山学校的题词中:"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不仅是对教育工作的要求,而且也是他对新时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提出的新要求。"三个面向",从思维方式上说,就是要求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以现代化、世界和未来为参照系,建立一种时空统一、现在与未来统一、中国与世界统一的恢宏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为人们规定了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立场和角度,以及思维的原则、形式和方法,体现了认识论、价值观、方法论的统一,表现出相关性、整体性、系统性的现代思维的特征。

二、思维的基本原则:观点问题

1.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思想方法的基础

1978 年,邓小平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他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后来又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把解放思想看做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并赋予解放思想

以时代的内容:在拨乱反正阶段,主要是冲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在全面改革阶段,主要是破除姓"资"姓"社"的思维定势。在具体操作上,提出了以实践和"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是非得失的标准。解放思想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一个重要的法宝。江泽民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精神。思想不解放,脑筋不换,一切工作都很难推动。思想解放了,脑筋活了,想问题的面就宽了,无论是发现选拔人才,无论是克服前进的困难和障碍,无论是开拓新领域和新事业,办法就会更多,路子就会更广阔。所以可以说,解放思想是一个法宝,是一个帮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永远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法宝,必须伴随建设和改革长期坚持下去。

实事求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主要是探索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规律问题。在具体操作上,首先是要解决中国现时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问题,作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规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目标,同时制定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体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科学的工作态度,强烈的时代特征,是邓小平思想方法论的基础。

2. 两点论和系统论是邓小平思想方法论的灵魂

所谓两点论和系统论,就是要求用全面的、系统的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是把系统论引入辩证法,要求我们不只是看到事物的"两点",事物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事物的整体,事物的系统。系统论的主要特点就在于:视对象为系统,注重系统的整体性,注意分析系统内部诸要素(子系统)之间、要素和系统整体之间、系统和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重视结构与功能的关系,追

求系统的最优化目标。按照这种方法思考问题，其逻辑程序是：由整体到局部，再回到整体；由系统到要素（子系统），再回到系统；由综合到分析，再回到综合。它明显地不同于那种由分析到综合，由局部到整体，用局部解释整体的传统分析方法。邓小平在领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过程中，强调用系统的观点看问题。他把加强工作中的系统性作为一项特别要求十分严肃而郑重地向全党同志提了出来。他说：我们要求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从而加强我们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他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做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来对待。在这个浩大的系统工程中，它的各个子系统之间以及每个子系统的内部的各个方面都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经济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不可分割；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可分割；经济建设内部，工业与农业、第三产业不可分割。根据这种系统分析，邓小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设计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观贯穿于邓小平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各个方面，成为它们的活的灵魂。

3. 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是邓小平思想方法论的主体性原则

这一原则的内涵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这就是说，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出发考虑问题。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经济落后，科学技术落后。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少。中国人口多，耕地少。现在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还处在不发达阶段，即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因此“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二是中国的事情“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中国人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事业是群众自己的事业。因此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三是独立思考，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必须独立思考，走自己的道路。总之，从中国特点出发，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走自己的道路，这就是邓小平思想方法论的主体性原则，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三、思维和实践的技术：具体方法

1. 实践方法

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所谓“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就是勇于试验、勇于探索、勇于实践。当然，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要看得准，即要调查研究，弄清情况，不是盲目实践，瞎闯蛮干；二是要不断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一出来就抓紧解决。

2. 信息方法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现在的时代是“信息时代”。知识靠信息传播，信息是决策的基础，不及时收集和处理各种信息，就无法进行科学的决策，就无法科学地管理和领导。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需要信息。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过去闭塞，造成信息不通，是一个很大的弱点。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因此，他强调现代领导者必须具有信息观念，做管理工作要注意收集信息。他说：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嘛，确实很

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

为了及时、全面、准确地获取和处理各种信息，就必须使调查研究工作科学化、现代化，建立覆盖面广、灵敏度高的信息网络，建立信息的收集、传递、汇总、加工、利用的工作制度。

3. 反馈方法

从控制论的角度看，领导活动是一个可控系统。领导活动系统的信息输入，就是领导者在调查研究中对情况的了解；根据这种了解制定决策方案，并付诸实施，最后取得一定的结果，这就是领导活动系统的信息输出。把这些输出的信号收集起来，进行分析，再输入到系统中去，重新调整计划、方案，以期实现预定的目标，这便是反馈方法。

根据控制论的思想，邓小平提出，在总的路线方针已定的情况下，我们的改革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不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赶快改。"所谓"走一步"就是按原定计划、方案实践一段；"看一步"就是对原来走的那一步进行总结，即把系统输出的信息收集起来，并与原来的计划方案作比较，肯定成绩，检查失误，对原来的计划方案进行修正，形成更加符合实际的新计划新方案，通过进一步的实践贯彻下去，如此循环往复。"走一步，看一步"的方针，把目的、手段、结果、反馈等要素构成一个动态系统，使目的与结果通过反馈过程，更加符合实际，是一个体现时代精神的现代行动方针。

4. 比较方法

比较是认识事物的重要方法。"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比较方法有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邓小平善于运用比较方法，既注意纵向比较，更重视横向比较。比如，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他认为要把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作比较，分析其特点，找出解决的办法。他说：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

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因此，要克服官僚主义，除了要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外，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再比如，发展是硬道理。我们的经济发展必须有适当的速度。这也是进行比较、特别是横向比较后得出的结论。邓小平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

5.系统方法

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已如上述。这里主要谈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如何运用这些基本原则。

一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在工作中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方针，即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等。“两手抓”是两点论和系统论的具体运用。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矛盾着的统一体，对立统一是事物的根本规律，所以人们观察问题时要坚持“两点论”，在处理问题时要“两手抓”，即要注意到事物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不可“一手硬，一手软”；同时要注意到事物在运动过程中每一阶段的重点，并预见到它的转化。一系列“两手抓”，是一个由诸多要素相互作用而构成的系统。“两手都要硬”则是求得系统的动态平衡，以防止因突出一手而失衡。“两手”之间相辅相成，不能出现相互对立或相互限制的现象。在处理“两手抓”的复杂问题时，邓小平采取了极其务实的态

度和方法。他强调从实际出发,现实地对待各个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现实地确定某个时期“两手抓”中间的重点,但不允许以重点取代一切,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二是改革要“整体推进,综合配套”。根据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看问题,改革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必须有序分层次地进行,但有序分层次的改革不等于单项突破。实践证明,单项突破由于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缺乏配套措施,结果往往是顾此失彼,不能达到预期目标,甚至造成某种畸形发展。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整体推进,综合配套”的改革方针,即城市改革与农村改革相结合,政治体制改革、科技文教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微观改革与宏观改革相配套,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协调推进。整个改革是一个系统,其中各个领域的改革是“部分”,但这些“部分”本身也是系统,它们是由更小的“部分”构成的。例如经济体制改革就由生产体制改革、流通体制改革、分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组合配套而成,而每一项改革本身也是一个系统,也要系统设计、系统实施、系统反馈、综合配套。

6. 台阶式递进飞跃

发展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发展或者发展缓慢,那就意味着落后,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拉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体现不出来,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无法巩固。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总结国际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多次强调中国要加速发展,“要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他指出:我们的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他对我国1984—1988年那5年的加速发展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种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尽管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它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5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这种台阶式的递进飞跃，既区别于“走小步，不停步”一类的渐进式发展，又不同于大起大落的急躁冒进式的发展，而是通过部分质变逐步实现根本质变的一个飞跃形式，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7. 先富带动后富

邓小平根据物质利益原则，从我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出发，制定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政策。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如何实现先富带动后富，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认为要引入竞争机制，鼓励勤劳致富、依法致富，合理拉开差距；通过税收政策，调节高额收入；扶持贫困地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权利；把握时机，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时，突出地提出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

8.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

在处理改革开放的中国同国际环境的关系时，邓小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我们应付国际局势剧变的正确方针，这就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所谓“冷静观察”，就是不要急躁，冷静分析利弊得失，预见事态的发展和结局；“稳住阵脚”，就是中国自己不要乱，中国的旗帜不能倒，“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变；“沉着应付”就是心中有

数，对突发事件不做过度反应，采取适当应变对策；“韬光养晦”，就是不露锋芒，埋头实干，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重要的是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决不当头”，就是自己不当“中心”，不当头，不称霸，争取主动，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

综上所述，邓小平思想方法论由思维视角、思维价值取向、思维基本原则和具体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等几个层次建构而成。它是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新的科技革命蓬勃发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潮流势不可挡，人类社会实践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它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中心内容，以针对性强，包容性大和简洁、明快、朴素的语言文字为表达方式，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容易为中国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接受。从思维方式发展的水平和程度来看，它汲取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属于现代辩证思维类型，具有开放性、系统性、创造性的特点。

（原载《学习月刊》1994年第11、12期）

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

1998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实现了我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和新道路,推动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好纪念,就是认真贯彻十五大精神,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科学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一、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启动的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起点。从1978年5月开始,在我国理论界和全党、全国人民中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兴起了我国近代史上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禁锢。在真理标准问题过论的基础上,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会议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进而提出了全面改革的方针，即“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①。会议还认真讨论了“文革”中和“文革”前的某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问题，坚决平反冤假错案，要求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就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而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邓小平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成了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理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发展起来的。

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得以产生的逻辑起点。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构成都要有一个基础性的范畴或原理作为它的起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形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②即体系。这个基础性的范畴或原理，就是这个体系的逻辑起点。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逻辑起点应该是历史起点的反映。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基础性范畴，正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历史起点的反映。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从十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3页。

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也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形成发展起来的。20 年来的实践证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每一项重大成就的取得，发展道路的每一步拓展，理论问题的每一次突破和创新，都是通过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取得的。正是通过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才解决了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才得以起步；正是通过冲破“姓资姓社”的思想束缚，才解决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正是通过冲破“姓私姓公”的思维定势，才确立了公有制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的思想，推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所以，从纵的方面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从横的方面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础性范畴，其他范畴都是建立在这个范畴的基础上的，并且像一条红线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各个方面，成为这一理论活的灵魂。例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分析我国现阶段所处的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所作出的清醒科学的估计。“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正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思历史，面对现实，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结晶。其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步骤、条件的论述，以及祖国统一问题上的“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也无不体现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

有人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而是它的认识论基础，“发展生产力”才是它的逻辑起点。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两者比较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更为基础的范畴，“发展生产力”这个范畴只有在“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之后才能提出来，并且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正确规定它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二、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是合乎历史发展、合乎逻辑的过程。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1987年十三大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1992年十四大提出"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1997年十五大把这一理论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且把它写入党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组成部分。这不仅是称谓、用语的变化，而且表明它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科学体系，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统一关系。

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

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①

从这段论述来看，我以为邓小平理论的体系虽然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但主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这个体系由四个部分构建而成。

第一部分是其哲学基础，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包括实践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认识论，“两点论”和系统论相统一的辩证法，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础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等。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表现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②如前所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它贯穿于这一理论形成发展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成为这一理论的活的灵魂和精髓。

第二部分是其立论的根据，即“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和“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立论的根据。这两个估计是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观察世界、分析中国国情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邓小平理论立论的根据和理论的基石，是我们党制定现阶段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第三部分是其理论主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对象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又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进

①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01 页。

行“再认识”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弄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是邓小平理论框架的轴心。另一方面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寻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里包括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正确把握和处理发展、改革、稳定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处理不当，就会吃苦头，付出代价。

第四部分是基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即由理论通向实践的中介和桥梁。围绕理论主题所形成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只有通过基本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些中介和桥梁才能变成现实。这主要是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及同这条基本路线相适应的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一整套方针政策。这些路线方针政策既是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贯彻实践邓小平理论必不可缺的内容。

可见，邓小平理论是一个比较系统、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但还是一个初步的轮廓，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还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三、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的准确的科学的评价。

大家知道，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理论,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但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不同,因而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战争和革命"成为主题的时代,在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它主要回答和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邓小平理论则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时代,在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它主要回答和解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种区别不是个别场合、个别问题上的区别,而是有其历史性、时代性的特点,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不只是在一些个别问题或具体论断上的继承和发展,而是整体上的推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在毛泽东思想之后的又一个阶段。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因为:第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过程中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两个最基本的观点,即实践观点和生产力观点,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说出了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话,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第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第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作出了新判断;第四,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新鲜经验和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理论。

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

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国际局势出现种种新变动,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当代经济和社会生活。我们既面临良好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为了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坚持用它作为我们观察世界、发展自己的强大思想武器,作为统领全局、贯穿各项工作的灵魂,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学习和运用这一理论,并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

(原载《学习月刊》1998年第12期)

邓小平哲学论纲

邓小平哲学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它的哲学基础，是贯穿邓小平理论各个方面的灵魂。深入研究邓小平哲学的性质、特点、历史地位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对于加深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邓小平哲学的性质和特点

邓小平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是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和它的哲学基础，是毛泽东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哲学有如下一些特点：

1.邓小平哲学是应用哲学。这是从哲学的类型上说的。邓小平哲学主要不是理论哲学，而是应用哲学。应用哲学的特征是具有哲理性、中介性、应用性，它高于具体科学，低于基础哲学。邓小平哲学比毛泽东哲学更注重应用性，更贴切实践和生活。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化为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2.邓小平哲学是价值哲学。从哲学的功能来看,邓小平哲学更注重实效,注重人民的功利,把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统一起来,把实践观和价值观统一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哲学更多地带有价值哲学的特点。

3.邓小平哲学是大众哲学。从哲学的阶级基础来说,邓小平哲学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又采用中国广大干部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用短小精干的篇幅、朴实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哲理。邓小平一再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①邓小平哲学正体现了这种为大众所接受、所需要的特点。

二、邓小平哲学与毛泽东哲学的关系

邓小平哲学既是毛泽东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毛泽东晚年在哲学上的错误的纠正和超越。它们之间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既有连续性,又有阶段性。其共同点或连续性表现在:其一是革命事业的连续性带来哲学上的继承性。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又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所从事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的两个互相联系的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所做的工作是毛泽东未竟之业的继续。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②其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0页。

二是理论思路的连续性。邓小平哲学和毛泽东哲学在大思路上是一致的，即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哲学主要是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是关于中国革命的逻辑；邓小平哲学主要是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是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其三是理论内容的连续性。邓小平哲学和毛泽东哲学同属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它们的概念、范畴、原理基本上是一致的，如“实践”、“矛盾”、“生产力”、“生产关系”、“人民群众”等范畴和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社会基本矛盾等原理。其四是理论风格的共同性。邓小平哲学和毛泽东哲学一样，注重实际，不尚空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表现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但是，由于这两种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和面临的任务的差异，也给它们带来了一些不同的特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哲学和毛泽东哲学相比较，在两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个方面是哲学理论重心的变化。由于时代不同、任务不同，毛泽东哲学和邓小平哲学在几个主要的哲学观点上有着各自不同的侧重点。例如，在实事求是观上，毛泽东更多的是强调调查研究，把理论付诸实践；而邓小平更多的是强调解放思想，在实践中检验、修改和发展理论。在矛盾观上，毛泽东把斗争性放在首位，强调在同一中把握对立；邓小平则对同一性给予更多的关注，强调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在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毛泽东更多强调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和“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通过革命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则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另一方面是思维方式的转变。毛泽东强调思想方法的客观性、全面性、科学性，反对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他提倡的实事求是、矛盾分析、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中国革命事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他晚年在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形成了狭隘的僵化的思维定势，如夸大意志的作用，崇尚“斗争哲学”，热衷于“大搞群众运动”，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思维定势，吸收了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管理方式的积极成果，使之与我党传统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结合起来，提出了“三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维方式以及加强工作中的“四性”（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要求，这就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变：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从朴素的整体思维走向系统辩证思维，从经验思维走向理性思维、创造性思维。

经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尽管邓小平的著作和实践处处充满着唯物论和辩证法，但他毕竟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尽管邓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有许多新贡献，但从总体上看，基本点还是毛泽东哲学的东西，还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并纠正毛泽东晚年在哲学上的失误，没有提出在性质上不同于毛泽东哲学的理论体系（不是指表述体系）。所以我们说邓小平哲学是对毛泽东哲学的继承、运用和发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范围内发展的新阶段，而不是同邓小平理论一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阶段。因为哲学体系的发展，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有所不同，要形成一个独立的哲学体系，更重要的是需要提出有严密逻辑联系的哲学概念、范畴、原理，建构出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需要经受长时间的实践考验。我们这样来给邓小平哲学定位，是郑重的、严肃的，也是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邓小平自己在谈

到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时，就郑重指出："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①我想，我们对邓小平哲学的历史地位的评价也应该有同样的科学态度。

三、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

邓小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应用哲学即方法论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哲学观点方面，这是我们从他的著作、言论和实践中提炼和抽象出来的。

1. 把实践观和价值观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贡献除了恢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权威，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丰富和发展了实践观和"再认识"的理论之外，最重要的是把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统一起来，把实践观和价值观统一起来，为解决如何使实践活动既符合客观规律，又符合主体的目的提供了新的思路。

应该说，在毛泽东那里已经有了实践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某些思想，表现在他谈到实践标准时一再提到要看是否达到了"预想的目的"、实现了"预想的结果"，同时又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并用这些标准去规范和评价人们和政党的实践活动。但后来没有很好地加以贯彻，而把所谓政治标准抬到了第一的、绝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9—300页。

对的地位，发生了许多错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把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这就意味着用价值、效果、预期目的去评价实践的合理性问题，从而也检验了指导这一切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真理性，这样就把实践观和价值观统一起来了。生产力标准可以说是实践标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深入和具体化。“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的延伸和补充，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运用。它既对实践结果的评判提出了正确的价值取向，使实践标准便于实际操作，又给生产力标准以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并同国家、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增强了这一标准的综合性、客观性，使我们的实践活动既遵循和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实际与发展规律，又体现现代化建设主体的利益需要，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建立在合乎规律又合乎目的的基础之上。这事实上是要求我们把长期分开的认识论和价值观的研究统一起来，贯通起来。

2. 把“两点论”和系统论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两点论”是毛泽东对辩证法的通俗表述，是一种全面的、辩证的发展观。但毛泽东晚年有把“两点论”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产生了主观性、片面性。邓小平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发展观，特别是强调发展是对立的统一、质变和量变的统一、当前发展和今后持续发展的统一；尤其要求充分利用矛盾的同一性，提倡“求同存异”兼容思维。他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搁置争端、共同开发”的主张，等等，都是充分利用矛盾的同一性，提倡兼容思维，创造性地运用辩证法的生动体现。

邓小平对辩证法的最大贡献是把“两点论”和系统论统一起来，强调辩证系统思维。应该说，《矛盾论》在分析矛盾群、分析多种矛盾时已经有了某些系统论思想，但由于科学技术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限制，那里的系统论思想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邓小平根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把系统论的思想引入辩证法，要求我们不仅看到事物的“两点”、事物简单的“一分为二”，而且要从多要素、多层次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协调上来考虑问题。他特别把加强工作中的“系统性”①作为一项要求郑重地向全党同志提出来。他强调要注意事物的相关性、有序性、整体性，如做工作要照顾“左邻右舍”，不能顾此失彼，要调整比例关系，掌握适度原则，注意有序发展，看问题、办事情要从整体出发，从全面出发，等等，这些都是系统论思想的体现。

3. 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思想。

毛泽东曾经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并从原则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和解决方法，这是他对唯物史观的一大贡献。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严重的缺点：一是忽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夸大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没有搞得很清楚，不是集中精力进行体制改革，而是搞所谓“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一方面恢复了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基本原理，重申生产力标准是衡量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并且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坚持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理论。另一方面他提出了“革命是解放生产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7页。

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①“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②的重要思想，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③邓小平的论述表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就充分论证了生产关系中的体制改革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反作用；同时也说明了改革的性质不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否定，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既区别于在原有体制下的适当调整和枝节性的修补，又区别于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既是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也是对社会革命理论的新贡献。

4. 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起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贡献在于，从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的角度阐明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为历史唯物主义增添了新的范畴；并且阐明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指出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的发展起巨大的推动作用，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互相促进。邓小平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其实质就是要解决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问题，即社会全面进步、全面发展的问题；而且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四有”新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这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步骤。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

①②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113、370页。

明“三位一体”，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这就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经验。

5. 把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统一起来，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指出人类社会发展有两种趋势：一种是从纵向上看，历史越来越成为“人类史”（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一种是从横向上看，从近代开始，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史”（经济文化的交往和联系越来越密切），两种趋势的统一是共产主义社会得以产生的两大前提。但是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当代世界历史的复杂情况，没有说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在当代世界历史中求生存图发展的问题。毛泽东根据世界历史理论解决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经由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未能解决在当今世界历史中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邓小平根据当今世界发展的总体形势，发挥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①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尤其如此。因此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必须对外开放，自觉地走进世界历史的行列，充分利用人类文明的成果发展自己；同时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不能丧失自我。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不等于资本主义化，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既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又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防止受制于人，同时要警惕敌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正是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曲折的情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当代人类史和世界史趋势的统一，它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他说：“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①他批评有些人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认为马克思主义消失了、社会主义失败了的观点。这样就科学地回答了在世界历史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发展、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崇高的历史使命的前提问题，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坚定了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原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年第2期）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383页。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所取得的最大实践成果是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最大的理论成果是产生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由此我们可以认定，邓小平哲学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它的哲学基础。邓小平哲学主要不是以抽象理论形态出现的“纯哲学”，而是以方法论形态出现的“应用哲学”、“实践哲学”，它表现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重要文献之中。邓小平的哲学修养特别是他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办事的作风，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赞赏，堪称我党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法的典范。我们需要从这些论述和改革开放的实际运用中提炼出他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思维方式来。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不仅表现在方法论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哲学理论方面，尤其是他对社会历史观的贡献，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下面我们仅就他在哲学理论方面的贡献作一些简要的分析。

一、把实践观和价值观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首先是恢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权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但是在我国,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个人崇拜思想泛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鼓吹“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文革”结束后党的主要领导人又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个基本原则遭到严重破坏。在拨乱反正中,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和理论勇气,积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批评“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错误思想,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①他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惟一标准”②,强调一切观念形态的东西包括革命导师的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凡是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为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这样就解决了一个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即“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③。正是在这个最重大的问题上邓小平恢复了实践的权威。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4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8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79 页。

在重新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主要表现是，在实践胆略上提出“敢闯论”，主张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闯，开辟认识和实践的新领域；在实践方法上强调“试验论”，主张积极探索，减少不必要的损失，避免盲目蛮干；在实践进程上提出“风险论”，主张预见到各种复杂情况，勇于承担风险，努力化险为夷；在实践形式上提出“经济中心论”，强调生产实践的基础地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实践结果上提出“价值论”，突出实践的目的性，强调实践的价值效果；在实践主体上提出“群众主体论”，强调发挥群众积极性，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所有这些都发挥了实践的能动性、目的性思想，邓小平的实践观实质上是创新的实践观。

其次是阐明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丰富和深化了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

在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基础上，邓小平论述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①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又是解放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解放思想才不致于陷入胡思乱想的主观主义。因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②所以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来简要地概括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的一大贡献，它突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内容，使党的思想路线更有针对性，同时又更加准确、更加深化。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本身就包含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1、364页。

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①的意思。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运用于认识过程，提出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问题。他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②这就是说，对社会主义也要进行反思，也要"再认识"。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从学说到实践，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必然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必然要根据新的实践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到新的发展。"③这段话说明了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必要性以及"再认识"的内容和所要达到的目的。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断，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重大成果，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由此我们可以抽象出一般认识论的结论，即所谓"再认识"，就是以实践为认识的源泉和真理的标准，对原有的认识进行重新思考，经过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不断发扬正确的认识，纠正错误的或不符合新的实际的思想观念，从旧的框框中解放出来，使我们的认识得到新的补充、新的突破、新的发展。"再认识"最终落脚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造新理论上。邓小平关于"再认识"的思想，反对了形而上学"真理一次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9、312页。

③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第57—58页。

完成论”，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论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

其三是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把实践观和价值观统一起来，解决了如何使实践活动既符合规律又符合目的的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解决了检验认识包括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只能以实践为标准的问题。那么，一种实践包括领导工作、改革行为是否合理，成效如何，又用什么来检验呢？邓小平继承和发挥了毛泽东提出过的生产力标准的思想，他指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①“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针对姓“资”姓“社”的争论，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我们一切工作的成败得失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③为标准。生产力标准是实践标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深入和具体化，因为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在社会历史领域，实践标准首先是生产实践标准，人们的认识和行为必须接受生产实践的效果——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检验，即生产力标准的检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的延伸和补充，它既对实践结果的评判提出了正确的价值取向，使实践标准便于实际操作；又给生产力标准以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并同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增强了这一标准的客观性、综合性。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可能发生矛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8、31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

盾，但经过主体的自我调节，可以具体地历史地统一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之中。三者的统一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观的统一，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外在尺度（客观规律）与内在尺度（人的需要）的统一，它使我们的实践活动既遵循和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实际与发展规律，又体现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建立在既合乎规律又合乎目的的基础之上。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最大贡献。

二、把"两点论"和系统论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首先是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丰富和发展了辩证法的发展观。

邓小平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虽然是针对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提出来的，但它具有普遍适用的哲学意义，实际上反映了一种辩证的、全面的、持续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包含以下要点：一是发展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要把变与不变统一起来。邓小平在谈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时指出："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① 他在谈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形势和香港的繁荣稳定问题时指出："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② 我们对香港的政策 50 年不变，"不要担心变，变不了。再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③ 二是发展是对立的统一，内因与外因的统一，量

①②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7、283、73 页。

变与质变的统一，前进与曲折的统一。他指出：发展不仅要“破”，更重要的是“立”，“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①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但中国的事情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办。发展要讲速度，也要“讲效益，讲质量”②。“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③三是要持续、稳定的发展。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规划时指出：“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④；我们当前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⑤他还强调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这样的发展观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又充分反映了时代特征，丰富和发展了辩证法的发展观，是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哲学基础。

其次是强调利用矛盾的同一性，提倡“求同存异”的兼容思维。

列宁曾经说过：“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辩证法是“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统一）的学说。⑥ 可见矛盾同一性问题在辩证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是长期以来，许多人强调矛盾的斗争性而忽视矛盾的同一性，崇尚所谓“斗争哲学”，喜欢在非此即彼的两极中思维，造成政治上“左”的错误不断发生。邓小平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纠正了这种思维方式，强调利用矛盾的同一性。他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既存在斗争性，也具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除了“吸收和借鉴”这层关系外，还有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这层关系，即在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6页。

②③④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368、312、131页。

⑥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90页。

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私人经济、三资企业长期存在、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得益于辩证法关于矛盾同一性的思想。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对立的一面，也有兼容的一面，因此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更有效地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更是得益于辩证法关于同一性的思想。这一构想的基本内容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存在，共同发展，在对立中求“一国”之大同，存“两制”之小异，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两种制度的矛盾，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所有这些事例都说明，邓小平着力于把列宁的辩证发展观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以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处理各种重大矛盾关系上着眼于把矛盾两方面统一、协调、结合于一体，在对立面中寻找共同点，研究对立面怎样能够同一，变两极思维为兼容思维，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其三是把“两点论”和系统论统一起来，强调辩证系统思维，这是邓小平对辩证法理论的最大贡献。

“两点论”是毛泽东对辩证法的通俗表述。“两点论”要求我们看问题要看到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既看到正面，也要看到反面；既抓住重点，又照顾一般；既看到一种倾向，又注意到可能掩盖的另一种倾向。邓小平的“两点论”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关于“要讲两句话”、“要两手抓”的一系列论述中。例如他在谈到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时说：“我看对反右派斗争，还是两句话：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扩大化了。”①在谈到经济特区问题时，他说：“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80页。

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①如此等等。他强调做工作，"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②

毛泽东在论述辩证法的矛盾规律即"两点论"时，已经包含有系统论的思想，因为所谓系统实质上是各种矛盾的集合体、各种矛盾的统一体。但由于科学技术条件和历史条件的局限，在毛泽东那里，系统论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根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把系统论的思想引入辩证法，要求我们不仅看到事物的"两点"、事物简单的"一分为二"，而且要从多要素多层次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协调上来考虑和处理问题，着眼于事物的整体、事物的系统。他特别把加强工作中的"系统性"作为一项要求，郑重地向全党同志提出来。他说：我们要求党的各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③所谓系统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观念：一是相关性观念。系统论认为，一事物与他事物处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因而系统思维要求从事物的相关性中来全面分析事物。邓小平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④他从各个方面揭示了事物的相关性即相互依存关系，比如"比例关系"、"综合平衡关系"、"主体与补充关系"、"中心与非中心关系"等等。二是有序性观念。系统论认为，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关系，以及一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都是有

①②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3、306、14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250页。

"序"的,即有规则的。对事物进行系统思维,就要把握事物的"序"。事物的"序"是多方面的,有事物构成的"序",如所有制的结构、产业结构的"序";有事物发展的"序",如事物发展各阶段的重点或不同的"度"等等。因此我们在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时要掌握合理有序的原则;在处理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时,要统筹兼顾,把握好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循序渐进,夺取胜利。三是整体性观念。系统论认为,事物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了高于事物本身的整体性,即事物的"系统质"或"整体质",因此看问题、办事情要从整体出发,从全局出发。邓小平总结改革初期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整体推进,综合配套"的方针,即城市改革与农村改革相结合,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微观改革与宏观改革相配套,对内搞活与对外开放协调推进,这充分体现了系统论的整体思想。

三、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首先是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恢复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提出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认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引起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毛泽东把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并且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提出了解决矛盾的一些方法。但是毛泽东晚年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夸大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把它们变成了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以为单凭主观愿望,依靠政治运动就可以极

大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并没有搞清楚，误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化程度还不够高、不够纯，没有看到传统的经济体制不适应我国生产力的状况，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了主观主义错误。邓小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指出：毛泽东“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①邓小平作了最大的努力来纠正这一错误，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②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生产力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作了新的阐发，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有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社会主义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推进，以至共产主义的实现，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承认并且充分重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但是，只有在承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承认生产力是根本标准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保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能够真正适应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要求，而不致陷入主观随意性。”③这样就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在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的迷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

---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

③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第59—61页。

其次是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解决了生产力发展的内部动力问题。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说过："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①]恩格斯也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②]邓小平坚持马恩的观点，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文革"中"四人帮"把它作为"唯生产力论"大加批判。"文革"后邓小平重申这一观点，并且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代生产和技术革命的新经验，明确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③]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科学技术在当代物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的科学概括，它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生产力概念；揭示了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解决了生产力发展的内部动力问题；阐明了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一论断是我们在知识经济时代初见端倪的形势下"科教兴国"战略方针制定的理论依据。

其三是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统一起来，既肯定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又承认生产关系的巨大反作用，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邓小平在南方重要谈话中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④]这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新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7页。

③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5、370页。

论断，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这个思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已经提出来了。毛泽东也讲民主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但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还有没有束缚生产力的问题，还要不要继续解放生产力？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虽然有矛盾，但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得到解决。这一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它比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没有矛盾的思想大大地前进了。但它一直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旦建立（不论是什么形式的），就必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会发生束缚生产力的问题，虽然有矛盾，但只要通过适当的调整，就可以解决。所以他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实践证明，基本制度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但它的许多具体制度，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等，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不是靠适当的调整、枝节性的修补所能解决问题的，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旧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建立起新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里的关键是对基本制度和体制作适当区分。正是有了这种区分，才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当前的具体表现，而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就是改革。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否定，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对生产力的解放。改革既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种革命。邓小平还指出：“生产力方面的革命

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①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主要通过体制改革和科学技术革命来实现。所以他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②，"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③这里讲的"革命"既区别于在旧体制下的适当调整和枝节性的改良，也区别于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充分揭示了改革在社会主义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把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必然引起革命的思想贯彻到底，指出改革同革命一样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所不同的是，革命是完成社会形态根本质变的形式；改革是社会形态总的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的形式。人类社会正是通过革命、改革这两种形式不断解放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

既讲通过革命或改革的手段去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上层建筑），使生产力获得解放；又讲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着力于改善生产力诸要素的状况，研究生产力诸要素的合理配置、现实结合与作用的发挥，特别是依靠技术进步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就全面阐明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即一方面，解放生产力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不能离开生产力的长期积累和发展去空谈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大发展只有在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新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后才有可能。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就是这样辩证地统一在一起。它既肯定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又体现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巨大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1页。

②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5、113页。

反作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辩证转化过程也就是社会基本矛盾辩证运动的过程。“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辩证转化过程,就是社会基本矛盾“基本适合——基本不适合——新的基本适合”的辩证运动过程。整个人类社会就是经过发展生产力到解放生产力再到发展生产力这样的循环往复,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的无限循环的历史,就是一部永不停息、万古长青的人类历史。这既是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又是对社会革命理论的一大贡献。

四、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起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

首先是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作了科学规定,为历史唯物主义增添了新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把文明看做是与人类原始状态相区别的社会进步和开化状态,但并没有对“文明”概念作出具体界定。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在80年代初就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①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作了科学规定,指出:人们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两方面的任务,而客观世界又分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个部分。人们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它表现为人们的物质生产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7页。

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改造社会的成果是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社会的改造,社会制度的进步,最终都将表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①] 这个科学规定,以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来说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生、发展及其具体内容,把两个文明建立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之上,使之具有普遍意义,并且揭示了社会历史进步和社会生产发展相互关系的规律,为历史唯物主义增添了新范畴。这对范畴同其他范畴,如物质和精神、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具有相对独立性,是其他范畴所不能代替的,它反映了社会结构的一个层次或方面,是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志。

其次是阐明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解决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正确导向,两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的发展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同步的、平衡发展的。精神文明并不被动地依赖于物质文明,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反作用于物质文明。他反复强调:精神文明搞得好,可以对物质文明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搞不好,物质文明也要受破坏,走弯路。[②] 精神文明包括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学习

① 参看《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8—29 页。

② 参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44 页。

和培养这些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程度。因此要破除精神文明建设上的自发、等待思想，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互相促进。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最后是提出了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三位一体”的思想，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必将使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最终进到全面发展的社会和全面发展的人的理想境界。一切民族最后都要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①这种经济形态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其实质就是坚持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坚持在社会主义阶段要努力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邓小平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②因此，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发展相区别。而社会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又是与人的个性全面自由的发展分不开的，它是社会发展、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邓小平关于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3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

学文化素质的精神文明建设思想和措施，是逐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而也是推动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重要步骤。所以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的“三位一体”的思想，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文明观。

五、把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首先是邓小平提出的“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论断，凸现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出过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种趋势：一种是从纵向上看，历史将“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①，即由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类历史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趋势，决定了人的主体解放程度不断增强，人类愈来愈成为自然界、社会和自己的主人；另一种趋势是从横向上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日益扩大，“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②即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达，带动社会分工、商品交换、社会交往和交通通讯工具的日益发展，因而自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开放化、整体化、全球化的趋势。“人类史”和“世界史”两种趋势的统一，是共产主义社会得以产生的两大前提。这是唯物史观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但是马克思并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8页。

度与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并没有说明在两种制度并存的当代世界历史中，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求生存图发展的问题。毛泽东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解决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经由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未能解决中国在当今世界历史中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邓小平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趋势的理论分析了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①、“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②的论断，指出在两种制度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世界历史中，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把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统一起来，自觉地走进世界历史的行列，抓住机遇，充分利用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以跳跃式的方法实现现代化；如果相反，把独立自主变成闭关自守，一切从头开始，重复别人的老路，那就只能愚昧落后。邓小平的这些论断，解决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的历史走向问题，凸现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意义。

其次是提出市场经济可以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填补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留下的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用什么经济体制去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空白。

马克思晚年运用“世界历史理论”分析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的具体情况，提出落后国家可以在先进国家帮助下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是对于实现“跨越”的国家应当运用什么经济体制去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并没有作出具体论述，从而留下了一大理论空白，有待后人去探索和填补。邓小平根据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情况和我国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成败得

---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78页。

失的历史经验指出，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只有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更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实践证明，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更好地同世界性的市场经济接轨，最充分地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吸收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促进国民经济发展，逐步跨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获得“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以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应当建立怎样的经济体制去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是指出社会主义是当代人类史趋势和世界史趋势的统一，坚定了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马克思指出，“世界历史”的形成，“并不能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①。相反，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根据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和当今世界的形势，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必须向世界开放，积极地融入“世界历史”的潮流；另一方面又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能忘记自己崇高的历史使命——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当今世界的现代化、经济的全球化决不等于资本主义化。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既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又要保持清醒头脑，注意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防止受制于人，同时要警惕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的图谋。正是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曲折情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当代人类史和世界史趋势的统一，它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可逆转的。他说：“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5页。

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①]他批评有些人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认为马克思主义消失了、社会主义失败了的观点。这样就科学地回答了在世界历史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发展、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崇高的历史使命的前提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坚定了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此外，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以及人生哲学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因篇幅有限，这里不再赘述。

（载中宣部理论局编:《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学习出版社 1999 年版）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82—383 页。

再论邓小平哲学

我曾写过一篇《邓小平哲学论纲》的文章，论述了邓小平哲学的性质、特点及其与毛泽东哲学的关系等问题，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 年第 2 期)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不同反响。而我自己也觉得言犹未竟，须再作一短文加以说明和补充，请专家、读者指正。

一、两类哲学和两种哲学家

人们在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时，常常会问：邓小平有没有哲学思想？构不构成体系？算不算哲学家？……我想，要解决这个疑问，关键在于正确理解两类哲学和两种哲学家的问题。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对世界根本问题的系统看法。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哲学就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①从哲学的性质、功能和发展历史来看，哲学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哲学(基础哲学或“纯哲学”)，一类是应用哲学(部门哲学或哲学分支学科以及实际工作的哲学)。前者着重于哲学范畴和基本原理本身的研究；后者侧重把哲学范畴、原理应用于各门具体科学和实际工作，解决具体科学和实际工作中带普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816 页。

遍性的根本问题,并概括出具有哲学意义的理论来。这种分类如同自然科学可区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类一样,它们对于推动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也如同中国科学院主要从事基础理论研究,中国工程院主要从事应用研究,两院同等重要,不存在谁高谁低一样。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也可以分为理论哲学和应用哲学两大类。如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哲学笔记》、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尽管它们用了许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类认识史方面的实际材料,但这些材料都是为了论证和阐述哲学范畴和哲学原理的,所以应把它们视为理论哲学。另一类是应用哲学。最典型的莫过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了。《资本论》显然不是纯粹的哲学著作,它涉及的主要是政治经济学,但它却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们读《资本论》不仅能够获得有关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和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而且可以得到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等辩证法的启示。列宁说过:虽说马克思没有留下大写字母的"逻辑"即一般辩证法,但却给我们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即《资本论》的辩证法。①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也不是纯粹的哲学著作,而是为了解决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领导工作等方面的问题而写的论著。但这些著作中都渗透着丰富的哲理,同时也提出了哲学上的许多新概念、新范畴、新原理,所以我们把它们称之为"应用哲学"。

还应当指出的是,任何一个哲学家的著作,都包括着理论哲学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

和应用哲学两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几十卷，理论哲学只占一小部分，应用哲学占了绝大部分，马恩把哲学应用于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科学和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等各个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列宁说："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①列宁著作也有好几十卷，大部分也是应用性的著作。毛泽东的著作，从已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来看，属于理论哲学的著作是少量的，绝大多数是应用哲学，即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最大贡献。

同上述两类哲学相联系，产生出两种哲学家：一种是专业哲学家，一种是革命家、政治家兼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围来说，前者如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苏联时期的罗森塔尔、米丁，中国的李达、艾思奇等；后者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

根据两类哲学和两种哲学家的区分，看一个人有没有哲学，是不是哲学家，不能只看他有没有哲学专著或专著的大小、多少。孔子的《论语》是由他的学生记下的谈话录，老子的《道德经》也不过几千字，可是谁能说他们不是思想家、哲学家呢？我们也不能拿专业哲学家同作为革命家、政治家兼思想家的革命领袖相比，要求后者更多地从事专门的哲学研究。葛兰西说得好："政治家往往也从事哲学的著作，但是他的'真正的'哲学恰好应该在他的政治论文中去找。"②看一种思想、著述构不构成体系，主要看它有没有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没有一个着力研究和解决的中心问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VI。

② 《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5页。

题,是否围绕中心问题形成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因为体系无非是“概念和理论的系统”①。邓小平哲学恰恰具备上述条件,已自成系统,自成体系。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党建等各个方面,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中心问题,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等互相联系的基本观点,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的某些基本观点。当然,他的哲学主要不是以纯哲学形态出现的“理论哲学”,而是以方法论形态出现的“应用哲学”。邓小平还与毛泽东有所不同,邓小平没有像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那样的哲学专著,但他有深睿的哲学头脑和哲学思维,是在行动中、实践中运用哲学、运用辩证法的大师,可以称得上“应用哲学家”。他的哲学修养,特别是他善于运用辩证法办事的作风,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赞赏。邓小平在太行山工作时有过一句名言:要按辩证法办事。这句话,他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也说过。1945 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总结发言中,高度评价了这句话:总而言之,就是如太行山的同志们所说的,要按辩证法办事。1957 年 1 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又说: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又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拨乱反正,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堪称我党按辩证法办事的楷模,是当之无愧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291 页。

的应用哲学家、实践哲学家。

二、一个哲学理论体系，两个不同发展阶段

我们承认邓小平有哲学，并且构成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独立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之外的另一个体系，而是与毛泽东哲学同属一个哲学理论体系（统称"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

我们说邓小平哲学和毛泽东哲学同属一个哲学理论体系，这是因为：

第一，革命事业的连续性决定了哲学上的继承性。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又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所从事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的两个互相联系的阶段，是一篇大文章的上下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所做的工作是毛泽东未竟之业的继续。正如邓小平所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间，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①哲学上也是如此，就是要继承和坚持毛泽东正确的东西，纠正他错误的东西，继续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第二，邓小平所使用的哲学基本概念、范畴来自毛泽东哲学，其框架体系也大体上与毛泽东哲学相一致。例如，从实际出发；实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0页。

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抓主要矛盾，要有全局观念；波浪式前进；生产力标准，社会基本矛盾，走群众路线，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等等，这些概念、范畴都是从毛泽东哲学那里学来的。邓小平哲学的基本结构仍然是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等几个方面的思想内容，其框架体系没有超出毛泽东哲学。从哲学的师承关系上看，可以说毛邓关系是师生关系。邓小平自己说过："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①

第三，邓小平为什么没有创建一个在性质上不同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呢？这要从历史任务和主观条件两个方面来分析。从历史任务来说，历史发展到 80 年代、90 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方面的任务，主要不是去创建一个有别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的理论体系，而是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总结经验教训，解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因为实践证明，作为集体智慧的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其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挫折和毛泽东晚年个人的失误是由于偏离了原来正确的哲学思想造成的。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方面的任务就是要拨乱反正，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哲学的反思，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而不是去创建一个有别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体系。从主观条件方面来说，一个新的哲学体系的创立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它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有所不同，需要对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作出完整的解答；需要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划时代的发展作出哲学的概括和总结；需要有一系列哲学概念、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82 页。

范畴、原理的创新;需要经受长时期的实践考验。

邓小平哲学不是有别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另一个新的哲学体系,但它的确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新阶段。这是因为:

一是由于时代和任务不同,因而哲学理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是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他的任务是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邓小平所处的时代是和平和发展成为主题的时代,他的任务是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因而在哲学观点上,毛泽东把矛盾的斗争性放在首位,强调通过革命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则注重矛盾的同一性,提倡求同存异,强调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利用科技发展生产力,因而显示出邓小平哲学与毛泽东哲学相异的阶段性来。

二是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在哲学上的一些错误,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显示出邓小平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新阶段。例如,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阐明了现阶段的阶级斗争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殊形式的遗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邓小平还纠正了毛泽东晚年把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的反作用夸大为无条件的决定作用的错误,恢复了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唯物史观,并且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显示了新的时代特征和创新精神。

三是在思维方式上邓小平哲学根据时代的要求,吸取了现代科学的成果,实现了部分质的飞跃。毛泽东哲学和邓小平哲学在思维方式上同属现代辩证思维方式,但毛泽东晚年在思维方式上有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形成了狭隘的僵化的思维定势,如简单的"一分为二"的两极思维,崇尚斗争哲学,固守已有的经验,夸大

意志的作用等等。邓小平超越了毛泽东晚年的思维定势，吸收了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管理方式的积极成果，使之与我党传统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结合起来，提出了“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维方式以及加强工作中的“四性”（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的要求，这就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维方式在辩证思维的基础上发生了部分质的飞跃；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从朴素的整体性思维走向系统辩证思维；从经验思维走向理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因而也使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显出阶段性来。

三、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从理论哲学方面看，主要是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理论观点。概括地说：一是完整地科学地表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它补充了新的内容，即把“解放思想”作为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把“实践检验”作为最终标准，完善了这条思维路线的动力系统和检测系统；二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在实践胆略上提出了“敢闯论”，在实践方法上强调“试验论”，在实践进程上提出了“机遇论”、“风险论”，在实践结果上强调“效果论”，突出了实践的能动性和目的性思想；三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统一起来，强调认识既要符合规律又要合乎目的，实现了真理和价值的统一；四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把系统辩证法和矛盾辩证法统一起来，强调系统思维和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五是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六是丰富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从社会实践活动的角度来说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生、发展及其具体内容，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七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要把主动融入“世界历史”潮流和坚持独立自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统一起来。应当指出，这些哲学观点并不是邓小平著作中现成的论述，而是我们运用科学抽象的方法，从他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实践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这正体现了邓小平哲学的性质和特点。

另一方面是应用哲学上的贡献，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初步地系统地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进而创立了一种具有一般意义的“应用哲学”即“发展哲学”。所谓“发展哲学”，如同“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一样，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特别是要解决“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和发展模式等问题。邓小平的“发展哲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为主体，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它吸取了现代西方各种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具体地说，邓小平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关系的原理，走出了一条既坚持社会主义的共性又体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和内因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运用目的和手段的辩证关系的原理以及“体制”问题的中介，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结合起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力图解决发展理论中这个世界性的难题；运用发展不平衡的原理，提出了先富带

动共富的大政策，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途径问题，等等。这个“发展哲学”是“应用哲学”最大的、最重要的成果，它使哲学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运用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至于邓小平“照辩证法办事”所形成的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领导方法、工作方法，诸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照顾左邻右舍”，“改革是动力”，“发展才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台阶式递进”，“先富带动共富”，“求同存异”以及“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等等，也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重要发展，显示了辩证法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的巨大威力。

总之，邓小平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同毛泽东哲学一样并没有结束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要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创造出反映时代精神的新形态。

（原载《三峡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 年第 3 期）

论两次历史性飞跃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取得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认真研究两次飞跃的伟大意义和基本经验，对于我们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顺利实现新世纪党的历史任务，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意义

从1848年鸦片战争失败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都失败了。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但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俄国人的经验，是不是就完全解决问题了呢？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人的经验还有一个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曾经向东方各民族共产党人指出："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

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其动力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其道路是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其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它不仅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而且还包括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特别重要的是贯穿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等三个重要方面,构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毛泽东思想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

第一,从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来看,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指导思想和光辉旗帜。实践证明,在现代中国,孔孟的儒家思想、现代新儒家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不能指导中国革命胜利,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79页。

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才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并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中国人民就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说："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①"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②毛泽东思想是同我们党的历史、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结合在一起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③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探索，至今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从思想文化上看，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升华，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划阶段的重大标志。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思想界进行着东方文化同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如何解决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这两组矛盾，观点各异，争论甚多。谁能在理论上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并据此在实践中解决中国独立和解放两大历史任务，谁的理论就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思想旗帜和精神支柱。毛泽东科学地回答了上述重大问题，他用"洋为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解决了中学和西学的矛盾，又用"古为今用"、"批判继承"的方法，解决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毛泽东思想的诞生，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赢得了特殊的地位，实现了从西方到中国的转变；又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赢得了特殊的地位，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从而使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

①②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0、345、298页。

段。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思想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对于社会上层建筑的结构和走向，以及人们的社会心理、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甚至语言文风等，无一不发生着巨大的影响。可以断言，在今后中国文化的建设中，它仍将继续发挥其独特的重要作用。

第三，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东方的重大发展，具有世界性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欧，但就其内涵而言，则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学说，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指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向。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是全球性的。但是这种理论本性的实现，即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展，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过程，而且不可能是轻而易举的。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向世界东方的发展，即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新环境，更是不容易的事情，需要互相熟悉、反复碰撞、不断磨合。毛泽东思想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从西方向东方发展的重要一环，它为东西方文化转换提供了中介，使马克思主义这一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中的理论融入了东方文化的精神智慧，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西欧形式变成了东方形式，为马克思主义在东方以至全世界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思想具有世界性的伟大意义。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回到“文革”时期的自我吹嘘，而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结论。

邓小平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了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比较系统地初步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

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产生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理论的主体内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但它又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学、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邓小平理论中所体现出来的求实创新精神和哲学思维方式，更是邓小平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

邓小平理论无论在党的指导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都有着重大意义。

第一，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定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经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近二十年的实践，党的十五大又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样在我们党的旗帜上就写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胜利前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从新的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

阶段。邓小平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作用不是短暂的，而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都将发挥指导作用。

第二，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历史地位。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它发生在中国，其意义也主要在中国，但不能因此否认它有一定的世界意义。这种世界意义，一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推动和鼓舞作用；二是对一些落后国家的发展有借鉴和启示作用。推动和鼓舞作用表现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的情况下，中国由于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社会主义旗帜不但不倒，而且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走出了困境，出现了勃勃生机，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令整个世界瞩目，使世界无产阶级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希望，受到极大的鼓舞，增强了信心；借鉴和启示作用表现在：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难题：如必须经历一个初级阶段，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等等，在这些问题上给他们以借鉴和启示。

第三，邓小平理论是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的旗帜。邓小平立足于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收外国文化有益成果，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理念，提出“三个有利于”的价值观和增强“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这就不仅指明了中国文化教育和科技改革与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且为整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构提供了基本思路，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迅速走向世界，向更高的现代文明形态转变。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邓

小平理论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将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两次历史性飞跃,两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不同时期的两个阶段,统一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全过程。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同样,没有后者,前者的生命也就停止了。邓小平理论正是在继承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也就否定了邓小平理论的根基。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可以使我们更好地领会邓小平理论;站在邓小平理论的高度,能够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价值。任何把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正确的。

二、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

从以上关于两次飞跃的历史过程的阐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些基本经验。

首先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前提。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需要注意如下几点。

一是要区分普遍真理和特殊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要是根据西方的历史发展和当时的现实情况写成的,它所阐明的种种观点,有很多是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和认识发展的普遍规律的普遍真理,但也有不少纯粹是反映西方特殊情况的特殊真理,因此普遍真理与特殊真理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这就只能靠我们认真研究他们的著作和通过实践加以辨别。例如,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这是一切国家都适用的普遍真理;而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这只是适用于西方国家的特殊真理,教条主义者却把它照抄照搬到中国来,结果使中国革命屡遭失败。毛泽东认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出: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由于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① 这样就把普遍真理与特殊真理区分开来，既维护了普遍真理，又明确了特殊真理的适用范围，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二是要区分基本原理和个别结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人的认识的复杂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作出的个别结论本来不很正确或者不够完善，但当时人们没有觉察出来而误认为是普遍适用的基本原理。例如，马克思、恩格斯依据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导致了生产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推断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消灭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结论。过去我们把这个结论当做适用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原理来应用，结果限制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这一结论至少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适用的或者说不正确的。所以邓小平说："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②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1页。

三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个科学体系，其基本观点之间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但由于时间、地点、条件不同，有时强调的重点则有所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有所不同，我们不能用一个观点去否定另一个观点，用一个提法去否定另一个提法。否则就会肢解、歪曲他们的科学体系。所以邓小平在谈到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时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①]对毛泽东思想是这样，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也应该这样。

四是最重要的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我理解的就是它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它不崇拜任何东西，不向任何东西低头；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

其次是要对国情有深刻了解。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现实根据。

所谓了解中国的国情，就是要了解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的和不利的现实因素，特别是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实际，即中国社会的性质或发展阶段，以及中国的文化传统。

在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碰到的最大社会历史实际就是中国半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2—43页。

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毛泽东指出：只有认清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他正是根据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教条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从根本上说就是他们忽视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超越了历史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碰到的最大的社会历史实际就是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说："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①]过去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与社会性质相联系，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也是不能忽视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反复强调，不应把他们的理论当做教条随意套用，而应当做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方法，它的应用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文化传统。[②]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曾经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文化传统问题，提出要用科学的方法对文化遗产进行分析批判，把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西方文化思想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的民族形式，同时又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得到改造和升华，建构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遗憾的是，毛泽东晚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失误：一方面违背了他自己提出的必须批判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正确主张，采取了否定一切中国的和外国的文化遗产的错误立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民族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他晚年实际上所继承的有许多是封建性的糟粕，如"家长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52 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179 页。

制"、"一言堂"等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正是鉴于这种情况，邓小平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时，一再强调"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①，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加上我们对它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因此"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②。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能忽视文化特点。这个问题不解决，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文化根基，就不牢靠，就不能做到真正融为一体。

最后是注意理论创新。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重要的主体条件。

早在1935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第一次论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时就提出：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路线③；1942年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谈到什么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时又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④这里，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关键在于创造作了明白无误的揭示。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强调"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⑤江泽民更加明确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20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2页。

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1]马克思主义同样需要创新，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其他领域的创新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如何才能做到理论创新？总结历史的经验，一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敢于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的个别结论，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着眼于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概括新理论。继承前人，突破陈规，就是要不丢马克思，不丢列宁，不丢毛泽东，但又要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符合实际的新话。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就是要懂得：只有坚持才能发展，不发展就不能坚持，坚持是基础，发展是目的。毛泽东、邓小平正是在正确处理这些关系中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互动方法。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2]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反对教条主义，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马克思主义，使之化为中国革命行动的指南，化为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就是赋予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以中国实际的特点，更新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1941 年 9 月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又提出"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概念。[3] 所谓"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

---

①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9 页。

② 原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收入《毛泽东选集》正式出版时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34 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 374 页。

义化”，就是要反对经验主义，要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使之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从认识论上说，这是两个认识过程：一个是从一般到个别，一个是从个别到一般。这两个方法的双向互动，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的相互结合达到最佳境界，才能做到真正的理论创新。

三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理论创新的标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的标准。1937 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①]毛泽东的实践标准同后来邓小平提出的“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统一的，后者是前者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延伸和具体运用，但又增添了价值标准的内容，使之更具有综合性和可操作性。我们衡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是否相结合，是否实现了飞跃，是否具有理论创新，不以哪个“本本”或哪个人“主观上觉得如何”为标准，而是看客观上是否把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推向前进。

三、坚持和发展两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是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基础，只有用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战斗力，顺利实现党的各项任务。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284 页。

当前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于：一是中国共产党有过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这一弱点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存在。1941 年刘少奇在总结我党理论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中国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亦是很好的，并且有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这些优点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党所不及的。然而，中国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就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不够。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不是工作上的失败，而是指导上的失败。因此，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就十分必要。所谓理论准备，包括对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① 1945 年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之后，党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遭受挫折之后，毛泽东也深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事业的理论准备不足。1962 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从全党来说，是非常不够的。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②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再指出：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但对“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③改革初期的工作也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状态。邓小平理论产生之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一切都说明了加强理论武装的必

---

① 参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220—222 页。

② 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29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37 页。

要性。二是新形势新任务迫切要求我们加强党的理论建设。当前，国际上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加速发展，给我们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国内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前进道路上出现了种种困难和问题；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挑战，一些人的社会主义信念发生危机；而我们党又肩负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因此必须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这样才能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保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三是我们党正处在大批新老干部交替的历史时期。几十万、上百万的年轻干部纷纷走上领导岗位，他们有文化、有知识，懂业务、懂技术，但多数人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缺乏斗争经验。只有加强理论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增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①

如何加强党的理论建设？首先是要加强全党的理论学习，培养党员的理论意识和理论兴趣。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号召全党要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兴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要在全党造成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在学习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当前特别要引导党员和群众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正确认识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澄清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坚定建设有中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7页。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解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等深层次的思想认识问题。

在理论学习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倾向，我以为值得注意。那就是学理论，只学邓选，而不学毛选，更不学马恩列斯选，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离我们现在的实际太远了，不大管用了。不仅一般党员和群众如此，就是许多干部和一些理论工作者也是如此。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如前所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来源和基础，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学邓小平理论，而不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是学不好的，那会丢掉根本，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尤其如此。这里，我们应当重温 1971 年毛泽东的谆谆教导：“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①]他一再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弄通马克思主义，这样才能抵制王明、陈伯达这一类人。1961 年邓小平在谈到如何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时，曾经尖锐指出：“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②]江泽民在谈到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时也指出各级干部在学习邓小平理论时要适当选读一些马列和毛泽东著作以及党的重要文献。在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上他又指出：必须更加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应用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巩固马列主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6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84 页。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其次是要提高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理论素养，提高我们党的领导水平、执政本领、建设本领。1938 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体验深切地说："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①江泽民在谈到各级干部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时指出：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形势，要求我们勤奋学习科技知识、经济知识，更要求我们潜心钻研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孜孜不倦，学以致用，融会贯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党和国家高级干部的知识结构、思想理论政治水平、治党治国的能力，直接关系到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如果我们党有一大批同志，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且能够运用这一理论去研究和解决重大问题，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就会大大提高。"

最后是要培养和造就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以至发展创新，除了靠党的领袖、各级干部的高度重视之外，还要靠一代又一代的理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来维护，来实现。毛泽东早就指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533 页。

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反复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需要有一批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治党、治国、治军的干部，而且需要有一批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骨干。他还号召培养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是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措施。

只要我们坚持和发展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在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础上，加强政治、组织、作风建设，就一定能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胜利完成党的历史任务。

（向“全国高校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理论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压缩稿收入《光荣属于伟大的党》，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

附　　录

（一）作者出版的著作（含参写的作品）

1. 《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署名：雍涛、陈祖华、李南熏）。

2.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运用和发展》，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署名：雍涛、陈祖华、李南熏）。

3. 《毛泽东哲学思想大纲》，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 年初版，1989 年修订（署名：雍涛、陈祖华、李南熏、王广正）。

4. 《领导活动的过程、要素和结构》，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署名：雍涛、陈祖华、李南熏）。

5. 《经济体制改革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署名：雍涛、陈祖华、李南熏）。

6. 《哲学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署名为陶德麟等著，作者统稿并撰第 2、5、8 章）。

7. 《毛泽东哲学的历史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8. 《毛泽东的探索——中国的 1956—1976》，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9. 《毛泽东哲学分支学科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10. 《邓小平哲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11. 《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历史反思》，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12. 《毛泽东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署名:何显明、雍涛)。

13.《中华小百科全书·哲学卷》,四川教育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作者主编)。

14.《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北京出版社1989年初版,1996年修订(本书总主编为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作者撰写第7卷第2章)。

15.《〈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解说》,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作者参加编写和定稿,出版时署名为武汉大学哲学系、鄂城钢铁厂工人理论组)。

16.《〈矛盾论〉解说》,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作者参加编写和定稿,出版时署名为武汉大学哲学系、鄂城钢铁厂工人理论组)。

(二)作者发表的论文(含参写的作品)

1.《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纪念〈实践论〉发表40周年》,《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77年第4期(作者执笔,发表时署名:武汉大学哲学系、鄂城钢铁厂工人理论组)。

2.《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光辉文献——纪念〈矛盾论〉发表40周年》,《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77年第5期(作者执笔,发表时署名:武汉大学哲学系、鄂城钢铁厂工人理论组)。

3.《坚持两分法反对形而上学——学习〈克服骄傲自满　固步自封〉》,《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77年第6期。

4.《坚持客观真理》,《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78年第5期。

5.《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79年第2期。

6.《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江汉论坛》1979年第1期。

7.《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2期(署名:刘纲纪、雍涛、陈祖华、李南熏)。

8. 《坚持主观和客观的统一——重读刘少奇〈人为什么犯错误〉》,《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3期。

9.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湖北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第3期(署名:刘纲纪、雍涛、陈祖华、李南熏)。

10.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革命》,《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4期(署名:刘纲纪、雍涛、陈祖华、李南熏)。

11.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论思想》,《江汉论坛》1981年第4期。

12. 《思想路线问题上的杰出贡献》,《江汉论坛》1982年第4期。

13.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主要贡献》,载《首届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4.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载《首届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论文集》(署名:刘纲纪、雍涛、陈祖华、李南熏)。

15. 《坚持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新湘江评论》1982年第8期。

16. 《分析特殊矛盾,制定战略方针》,《新湘江评论》1982年第8期。

17.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全面性》,《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6期。

18. 《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运用和发展》,《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2期。

19. 《略论毛泽东的哲学唯物论》,《江汉论坛》1983年第2期。

20. 《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新阶段和新特点》,《湖北日报》1983年3月15日。

21.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江汉论坛》1983年第8期。

22. 《新时期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运用和发展》,《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6期。

23. 《要重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学习与实践》1984 年第 1 期。

24. 《伟大的历史转折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毛泽东思想研究》1984 年第 1 期。

25.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江汉论坛》1984 年第 10 期。

26.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27. 《关于认识总公式的几个问题》,《毛泽东思想研究》1985 年第 2 期。

28. 《重读"两论解说"有感》,载《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29. 《坚持和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黄石市委党校校刊》1985 年第 1 期。

30.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领导科学》,《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 年第 5 期(署名:雍涛、陈祖华)。

31. 《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长江日报》1986 年 9 月 19 日。

32. 《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变化》,《毛泽东思想研究》1987 年第 1 期。

33. 《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新概括》,《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 年第 1 期。

34.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 年第 5 期。

35.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与当前认识论研究》,《现代哲学》1988 年第 1 期。

36.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刍议》,《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 年第 4 期。

37. 《毛泽东哲学思想新发展》,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马克

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38. 《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载《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39. 《论改革中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载《企业与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40. 《改革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特点和处理方法》，《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 年第 1 期。

41. 《论改革时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方法》，《毛泽东思想研究》1988 年第 6 期。

42.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载《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辅导材料》，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第 1 期。

43. 《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反思》，《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 年第 1 期。

44.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与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0 年第 4 期（署名：雍涛、肖诗美）。

45. 《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江汉论坛》1990 年第 4 期。

46. 《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典范——纪念李达诞辰 100 周年》，《武汉大学学报》1990 年第 6 期。

47. 《毛泽东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人民日报》1991 年 3 月 15 日。

48. 《毛泽东哲学思想不容歪曲》，载《毛泽东哲学思想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49. 《关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几个问题》，载《回答现实的呼唤——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50. 《毛泽东方法论思想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1 年第 4 期。

51. 《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学习〈毛选〉第 2 版》，《湖北社会

科学》1991年第9期。

52. 《〈实践论〉、〈矛盾论〉研究述评》，载《毛泽东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53. 《实事求是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载《永远的旗帜》，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4.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旗帜》，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5. 《毛泽东思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6期、《高校理论参考》1993年12期。

56. 《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阶段》，《大连日报》1994年2月16日。

57.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载《毛泽东在武汉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

58.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与政工》1994年第1期。

59. 《从毛泽东的探索到邓小平的创造》，《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4年第1期。

60.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阶段》，《城市党建》1994年第1—2期。

61. 《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哲学基础》，《学习月刊》1994年第4期。

62. 《毛泽东的哲学构成体系吗?》，《说不尽的毛泽东》（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3.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结合》，《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1994年第4期、《高校理论参考》1994年第12期。

64. 《从〈邓选〉看邓小平思想方法论》，《学习月刊》1994年第11—12期。

65. 《毛泽东哲学的双重文化性格》，《毛泽东思想论坛》1995年

第4期。

66.《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河》,《毛泽东思想论坛》1996年第2期。

67.《论稳定、改革和发展》,《学习月刊》1996年第10期。

68.《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载《邓小平理论与跨世纪的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9.《邓小平理论中的超前认识论思想》,载《超前认识论研究》,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7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学习月刊》1996年第12期。

71.《〈伟大的转折　历史的启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8周年、南方谈话发表5周年》,《湖北日报》1997年1月16日。

72.《邓小平哲学的特点及方法论结构》,《珞珈哲学论坛》第2辑,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

73.《〈实践论〉〈矛盾论〉的当代哲学意义》,《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年第4期。

74.《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湖北日报》1998年12月18日。

75.《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教学》1998年第5期、《长江论坛》1998年第4期。

76.《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历史意义》,《湖北日报》1998年5月21日。

77.《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学习月刊》1998年第12期。

78.《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理论月刊》1998年第10期、《毛泽东思想研究》1999年第1期,入选中宣部编《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学习出版社1999年版。

79.《"两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载《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80.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珞珈哲学论坛》第2辑,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1期。

81. 《邓小平哲学论纲》,《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年第2期。

8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年第6期。

83. 《论毛泽东的人学思想》,《江汉论坛》2001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1年第1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

84. 《再论邓小平哲学》,《三峡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3期。

85. 《论两次历史性飞跃——纪念建党80周年》,入选教育部召开的建党80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光荣属于伟大的党》,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

86. 《"南方谈话":中国发展方向论》,《长江日报》2002年1月17日。

87. 《"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增刊,《探索》2002年第2期。

88. 《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金陵瞭望》2002年第6期。

89. 《毛泽东的文化哲学》,《哲学评论》2002年第1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90. 《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2年第1期,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1. 《〈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评介》,《江汉论坛》1998年第2期。

92.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道路〉评介》,《四川党史》1998年第2期。

93. 《〈睿智——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序》,载《睿智——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署名:陶德麟、雍

涛）。

94. 《〈新实学〉序》，载《新实学——实践领域的规律性问题研究》，金城出版社 2002 年版。

95. 《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哲学思想》，《广西日报》1981 年 11 月 6 日（署名：刘纲纪、雍涛、陈祖华、李南熏）。

96. 《世纪之交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珞珈哲学论坛》第 3 辑，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97. 《关于办好哲学专业的几点意见》，《珞珈哲学论坛》第 5 辑，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9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两论"的历史意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0 年第 1 期。

99.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学习与实践》2000 年第 10 期。

100. 《李达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 年第 6 期。

责任编辑:张振明
装帧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顾杰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雍涛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
ISBN 7-01-003919-4

Ⅰ.毛…　Ⅱ.雍…　Ⅲ.毛泽东思想:哲学思想-研究-
文集　Ⅳ.A841.6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6999 号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MAO ZEDONG ZHEXUE SIXIANG YU
MAKESI ZHUYI ZHEXUE ZHONGGUO HUA

雍　涛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25
字数:340 千字　印数:1-2,000 册

ISBN 7-01-003919-4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内容简介

本书汇集的三十余篇论文，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者所发表的百余篇文章中挑选出来的。全书分上、下两篇，对毛泽东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哲学，进行了阐释，充分反映出作者多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个人风格和独特思路。

责任编辑：张振明
封面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顾杰珍





ISBN 7-01-003919-4
定价：25.00元